

CHIANG KAI-SHEK AND HITLER

王晓华 张庆军◎著



惺惺相惜、亲密合作到撕破脸皮、断交宣战，个中内幕鲜为人知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是东方大国的党、政、军领袖——蒋介石。他曾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

上的崇拜与现实的需要，让他坚定了联德的决心。

是西方帝国的法西斯首脑——希特勒。为了满足侵略扩张的野心，他迫不及待地想加强同中国的贸易合作。

一批又一批的“影子顾问”来到中国。

台海出版社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CHIANG KAI-SHEK AND HITLER

虽然二战期间中德两国分属不同阵营，但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中的两国却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关系。佛采尔、塞克特、法肯豪森这些德国军界响当当的人物，相继来到蒋介石的身边做起了谋士，并在国民党北伐和抗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民党精锐部队也使用了先进的德国装备。作为交换，德国军火商急需的钨、锑、锰等稀有矿产，也源源不断地从中国运到德国。德国顾问亲手打造的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在淞沪会战中威风八面，上海滩的那场喋血之战更被外国军事评论家称为“德国式的战争”。

中国的战略原料虽然对纳粹德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二战开始之后，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逐渐无法同其盟友日本相比拟。希特勒不得不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

蒋介石与希特勒之间究竟有何恩怨纠葛？ 德国军事顾问又给中国军队带来了 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我们拨开历史云雾，
解读那段曾经讳莫如深的历史密档。

上架建议·历史事件

ISBN 978-7-80141-791-6



9 787801 417916 >

定价：36.00元

CHIANG KAI-SHEK AND HITLER



从惺惺相惜、亲密合作到撕破脸皮、断交宣战，个中内幕鲜为人知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 王晓华, 张庆军著. --北京:台海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80141-791-6

I. ①蒋…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蒋介石(1887~1975)-生平事迹 ②希特勒, A.(1889~1945)-生平事迹 ③中德关系-国际关系史-1927~1938
IV. ①K827=7②K835.167=5③D829.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3207号

蒋介石与希特勒:1927~1938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编 著:王晓华 张庆军

责任编辑:王 艳

装帧设计:天下书装

版式设计:通联图文

特约校对:罗 金

责任印制:蔡 旭

出版发行:台海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 话:010-64041652(发行, 邮购)

传 真:010-84045799(总编室)

网 址: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thcbs@126.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60×1040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8

版 次: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141-791-6

定 价:3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作为现代史上东西方两大独裁者的蒋介石与希特勒，真称得上惺惺相惜，尽管他们平生未能谋面，却是神交已久，互为欣赏。

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一位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在他眼里，犹太人还有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低劣的种群”。然而，对于中国人，他却是“网开一面”，认为中国人是“特殊的，不同一般的人种，理应享受更多的权利”，是“有一些文明的人种”。

据说，希特勒产生这种认识是源于童年的记忆：他在维也纳穷途潦倒之际，曾受到一位旅居奥地利华人的无私帮助。作为第三帝国的领袖，希特勒对中国的好感也是从利益进行考量的，其根本的目的在于扩大法西斯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影响，从中获取巨大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政权对于法西斯体制下的德国充满了景仰并有意效仿时，更是增加了一种心理上的认同感和满足感。所以，希特勒私下里对蒋介石也屡有称赞之词，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的荣誉军刀和自己的照片，以表示其“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

同样，蒋介石对德国外交的重视也源于利益上的需求。“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开始对苏联产生恶感。其时，广东政府偏居一隅，英美诸国尚视其为“南赤”，压抑之，打击之。为了在外交上摆脱困境，特别是对高素质的军事顾问和专家的急迫需求，蒋介石将目光率先转向了德国，以寻求新的合作。更由于德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而失去了列强的地位，因此双方的这种合作完全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不附带政治上或国家利益上的索取。另外，在心理上，蒋介石对日尔曼人所具有的认真、严肃、执著以及遵守纪律的民族精神由衷地欣赏，认为引进这种精神正是改革当时中国动乱贫穷社会的良方，德国名相俾斯麦一直是他崇拜的偶像，而希特勒的横空出世，则被认为是俾斯麦“铁血统

治”的延续。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这样的人物,以期帮助建立中国式的独裁统治。

因为双方的利益契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关系进入到了蜜月期。

然而中德之间的合作却是在各种羁绊下进行的。由于德国作为一战战败国的种种限制以及后来德日之间的关系,中德的合作总是在帷幕的后面悄悄地进行,以致于长期鲜为人知。

中德之间的合作最初主要在军事领域中进行,而向中国派送高等级的军事顾问就是最引人注目的内容,马格斯·包尔、赫尔曼·克里拜尔、乔治·佛采尔、汉斯·冯·赛克特、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德国军界的精英相继藏头匿尾,躲躲闪闪地进入了中国。他们的能量不可低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犹如一柄柄被遮掩住光芒的锋刃,随时都可能作出惊人一击。

随着希特勒的上台,这种合作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并逐渐摆脱了一战后战胜国给予德国的各种束缚,开始向其他领域延伸。在经济方面,发展和扩大对华贸易,从中国进口其急需的钨、铅、锑等稀有矿产以及花生、棉花、棉布、麻、猪鬃等农产品,德国的军火也源源不断地运向了中國。为此,希特勒特致电蒋介石,称“两国的密切合作也是两国人民的利益所在”,而蒋介石也感谢希特勒“对于德华两国间经济合作热心支持,使国交益敦亲睦,特致谢忱”。

然而,蒋介石与希特勒互相的欣赏与合作却因中日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鉴于德国与日本在战略上的同盟关系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一段历史一直讳莫如深。如今,人们又开始关注到这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感谢台海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向读者再现这一段历史的机会。

目 录

1.蒋中正钟情德顾问 朱家骅奉命穿针线	1
2.德意志东山再起 兴登堡投鼠忌器	13
3.包上校流浪归来 蒋介石望穿秋水	22
4.包尔择时不巧 “二济”殷勤留客	30
5.包顾问逃出险地 蒋介石一见倾心	45
6.陈仪出访德国 打开外交绿灯	54
7.大战一触即发 包尔从容论兵	63
8.撒手归西 包尔死因不明 睹物思人 蒋氏泪湿衣襟	69
9.克里拜尔才不胜任 南京政府另觅新人	77
10.模范军初露锋芒 郑大章歪打正着	87
11.为营步步嗟何及 横扫千军如卷席	98
12.佛采尔大展神通 朱毛险闯鬼门关	106
13.无功而返 蒋介石再度下野 顿失所倚 顾问团跌落凡间	111
14.上海滩硝烟弥漫 好儿男拼死疆场	120
15.嘘声四起 顾问团饱受指责 疑神暗鬼 佛采尔犯蒋大忌	130

目 录

- 16.佛采尔不知深浅 塞克特静极思动 151
- 17.希特勒入主总理府 塞克特欣然登庐山 159
- 18.红军开局不利 李德计不如人 173
- 19.两个拳头打人 拳拳落空 红军壁上观战 痛失好局 186
- 20.塞克特鸠占鹊巢 佛采尔含怒而去 197
- 21.起草应付时局建议书 构思中日战争形势图 208
- 22.张治中密筑“兴登堡防线” 中国军装备德意志军火 220
- 23.中日大战一触即发 法肯豪森策划布防 235
- 24.卢沟桥引燃全国烽火 张治中出手先发制人 247
- 25.上海滩日军遭遇德国式战争 巧施美人计日舰逃出长江口
..... 257
- 26.坚守要塞 海陆两军遭重创 偏袒日本 陶德曼调停战争
..... 267
- 27.大战台儿庄 中外幕僚运筹帷幄 召回顾问团 德国元首掣剑
入鞘 277

1

蒋中正钟情德顾问 朱家骅奉命穿针线

1926年的日历刚刚掀开，广州城内冠盖云集，各地的国民党要员以及中共代表纷至沓来，参加在此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月4日，大会正式召开（国民党“二大”于1926年1月1日开幕，因正值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故1月4日方正式举行会议）。晚上，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举行盛大宴会，为与会代表洗尘接风。

汪精卫一身乳白色的西装，越发显得气宇轩昂， he 今天是宴会的主人，穿梭在宾客之间，笑意盈盈。

只有蒋介石的脸一直铁青着，从他踏进大厅起，就未有过一丝欢颜。宴会开始时汪精卫的祝酒辞引来的满座掌声让他鼻中不时发出不屑之音，他在冷眼观看汪精卫的表演。汪精卫这番忙碌用意何在，蒋介石心中很清楚，“不外乎表现自己的主人形象，让大家意识到他才是这个党、这个政府的领袖”。

蒋介石对坐在汪精卫身旁的苏联顾问季山嘉也有不满，这个季山嘉刚刚接替了加伦的职务，负责指导广东国民政府的工作，与汪精卫过从甚密，几乎须臾不离。这让蒋介石感到担心，因为季山嘉的态度关系到苏联政府的支持，汪精卫也委实会演戏，一副“左”得可爱的形象，赢得了苏联顾问对他的欣赏。而对蒋介石，则显然没有对汪精卫那样亲热，不能不让他生出嫉妒

失落之感。

蒋介石因此也对自己的处境不无担心，他熟读经史，懂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现在广东平定了，蒋介石认为自己功高盖主，因此自然也有“震主”的嫌疑，说不准哪天就会来一个“杯酒释兵权”。

蒋介石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天的到来。既然已有问鼎之心，就不能退缩，就不能躲避，就不能任人摆布。他的“事业”正“方兴未艾”，还要让它如日中天。

他早想好了一篇“大题目”。

汪精卫春风满面地返回了座位，他注意到蒋介石席前的酒杯不见了，代之以一杯清水。自从掌管黄埔军校以来，蒋介石戒烟戒酒，自律甚严，和在上海滩时的形象迥然不同。

汪精卫也不勉强他，举杯恭维说：

“广东统一，形势看好，介石兄所率党军建功厥伟，功在国家，功在史册，当浮一大白（即：满饮一大杯酒）。”

蒋介石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汪先生抬举了，介石不过略尽职守而已，说不上功在史册。”

这几句话不咸不淡，透着冷漠。但汪精卫并不介意，白兰地里的酒精已经在他的血管里发生了作用，所以他依然兴致勃勃地劝蒋介石给代表们讲几句话。

“你现在已经是革命的英雄和功臣，又刚回到广州，许多人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蒋介石正有此意，所以毫不推却。

他把准备好的题目拿了出来。

这个题目就是——北伐。

这篇讲话并非蒋介石的即兴演说，而是刻意之作，用词用语都很斟酌。他清了清嗓子，示意周围安静下来：

“今天，主席与各位同志集合一堂，我初返省城，与各位同志相别已久，

因乘这个机会，略抒一点意见。刚才主席与季将军（即季山嘉）都已讲过，去年广东军事、政治的成绩，全由各位同志实行四个字得来，这四个字就是‘亲爱团结’。各位同志能相亲相爱，互相团结，自然发出极大的力量，能扫除反革命派，统一广东。”

说到这里，蒋介石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真是违心之论，却又不得不以此为开场白，其用意不过是讨好苏联顾问和中共代表。因为就在当天，一向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召集的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在上海宣告闭幕，并发表《为取消共产派在本党的党籍告同志书》，公然提出分共、反共的口号。共产党的力量发展太快了。就以这次大会而言，在全数 256 位代表席中，中共代表占了 90 席，超出了与会者的三分之一，大有反客为主之势，这让蒋介石心里很不舒服。但眼下还不是撕脸反目的时候，否则，他还能指望谁出力出钱出人帮他打天下、夺天下。汪精卫不就是靠着一付左派的面孔混出今天的局面，所以，这套面子上的话还是要说的。

开场白后，他很快切入了主题：

“倘若我们依照这四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出语惊人，全场大哗，满堂宾客皆盯着侃侃而论的蒋介石，不知他底气为何这样壮。

蒋介石神气地挺着胸脯，分析说：

“我对于今日中国全国的局面，以及本党的前途，都曾仔细观察，常常抱着极大乐观与希望，深信我们中国国民党必能统一中国，而且在本年内，就可以统一。此种工作，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我们从客观的地位观察，凡无主义者，虽胜必败，而民众已渐渐接受本党主义，所以知道本党能成功。现在我们的敌人，在国内就是一股不明主义的军阀。他们将倒未倒，或已倒而有复起之势力，似乎还有许多。但我们试看任何军阀，都不能在最近时期内继续存在三年以上，他们没有三年以上的命运。去年此时，奉系张作霖的势力，可说大到极点。他占领京奉、京汉、津浦三条大铁路，兼并江苏、安徽，直欲从东三省达到长江上下游，然而他现在已几乎

灭亡了。军阀自身的崩溃，即是本党主义的开张。现在种种事实与消息，都可证明本党打倒军阀的目的必可达到。所以中国大小军阀均将倒下，只看本党能否统一中国。我们因统一广东稍迟，不能利用此次郭松龄倒戈的机会，直捣北京、天津，这是十分可惜的。从敌人内部看去，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即可将军阀一概打倒，收复北京，奉迎总理灵柩至南京紫金山安葬。军阀的势力，即使侥幸延长若干年，也断不能统一中国。统一中国的，只有本党。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内部利害冲突，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中国自然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主义了。……不过广东的事，虽然已告一段落，但前途还是很远，而且责任更加重大了，要比去年更加努力百倍，方才有成功的希望。各位同志，去年团结亲爱，今年更加热心努力。我们的革命，必定成功。敬祝各位同志健康。”

蒋介石高举起茶杯，以茶代酒，一仰首，亮了杯底。

掌声随之而起，刚才蒋介石这番分析，合情合理，让人大为振奋。

在一片掌声中，汪精卫被冷落到了在一旁，“这分明在与自己抢镜头”。在他看来，蒋介石这番演讲，就是在哗众取宠。说什么完成总理遗愿，试想想，现在广东的军队，满打满算，也就是十万有余，能够出征作战的，只及半数。以5万之兵，打算统一中国，不是言大而夸是什么。

苏联顾问季山嘉也皱紧了眉头，他是位富有斗争经验的战士，一眼就看出了蒋介石讲话的用心，之所以倡言北伐，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握住军权不放。自从来到中国，他就潜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从孙中山历次斗争的实践找经验找教训。他发现，孙中山之所以屡遭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支革命的武装，过分依赖军阀的力量，也就是对旧式军队的利用，这无异于是以暴易暴，与虎谋皮。

这种现象至今也没有彻底消除，虽然已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辖下的军队仍带有浓厚的地域性和私人性，比如蒋介石正逐步加强对黄埔军的控制，另外如朱培德的滇军、谭延闿的湘军、李福林的福军等等，都是长期聚集在某个人的旗下，再加上地理、乡里、亲情等关系的作用，已经

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性和排他性，除非原来的长官，别人休想指挥。

季山嘉很为自己国内的苏联红军骄傲，那是一支铁的队伍，统一于一个号令之下，如身使臂，令出如山。他也梦想有朝一日，经他之手，在中国改造成这样一支革命的武装。因此，他很想乘现在形势相对稳定之际做一番的工作，将军权集中于军事委员会。从理论上说，现在广东境内的战事已结束，各军事将领理应协助他完成这项工作，都是革命的同志嘛，为什么把军队当成私人财产抓着不放，除非抱有个人的目的。所以，蒋介石一提出北伐，他就本能地反感。因为如此，整顿军队就成为一句空话。试想一支没有统一号令的军队，与乌合之众有什么区别，不把军队整顿好，北伐又怎么有把握？

遗憾的是，季山嘉对中国一知半解，他看到了中国军阀的本质，视军队如生命，如私有，所以立志改造；却又忽视了它的复杂性，将其简单化与粗暴化。

由于汪精卫与苏联顾问的反对，蒋介石的北伐计划遭到了冷遇。自此，苏联顾问的东山住宅，就少见蒋介石的身影。他不是轻易放弃努力的人，他懂得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道理；他也了解汪精卫的性格，此人精明有余，刚猛不足，缺毅力，少恒心，只要能攻破季山嘉这道堤坝，汪精卫坚持不了多久。

季山嘉却难以对付，这个人来到中国后就一直以导师自居，定下来的主意很难更改。在他眼里，广东政府的官员和军队将领都应该是虚心求教的学生和听命唯谨的下属。所以，蒋介石的数次聒噪已让他耳热心烦，耐不住地冷嘲热讽：“不客气地说，你们中国军人都有一种刺鼻的中世纪气息，贪鄙者多，割据者多，干政者多，与封建军阀相差不多，不切实改造一番，怎么看都没有革命的气象。”

蒋介石头上的青筋暴了起来，这太污辱人了，刺得他内心的火气化作一串冰冷的笑：

“不错，季顾问的教训有道理，中正也深为汗颜，也深为警惕，莫非中正也为一封建军阀也，莫非中正要求北伐、完成先总理遗愿也有军人干政之嫌也？”

瞧,又转到北伐上来了,季山嘉压住了火气,问:“北伐究竟有几成胜算?农民运动起来了么?军饷军械准备充足了么?蒋介石同志,这是一场关系到革命前途的战争。”

“我们有总理的在天之灵,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主义、革命的灵魂,以有精神、有主义、有灵魂之军队战无精神、无主义、无灵魂之敌人,胜负之数岂无定理。”

眼看蒋介石纠缠不清,季山嘉点起手中的雪茄,稳定了一下情绪:“好吧,谈谈你的北伐计划。”

蒋介石提出取道湖南,饮马长江,直下东南的进军路线。他现在正秘密与江浙财团联系,希望通过他们与英美搭上关系,并进而取得支持。

“想投奔英美了。”季山嘉不满地哼了一下。关于北伐的方略,苏联顾问内部有一个共识,主张北伐打到武汉后继续北上与号称“北赤”的冯玉祥的西北军汇合,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并直接取得苏联的陆路支援,而不急于顺江东下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对抗。当然,这一进军路线也含有为苏联利益着想的成分。

蒋介石本来也曾积极拥护这条路线,然而时过境迁,为了摆脱苏联的束缚,与江浙财团靠近,建立一份自己的基业,他已经彻底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所以,季山嘉当然不能同意蒋介石的方案了,“蒋同志当不应忘记北上援助国民军也是您的主张,一直到今年年初,我们还在商量运兵天津援助事,蒋同志不是也同意在北方寻觅一如黄埔之革命根据地,其发展效力必大于南方十倍也。”

蒋介石果然一时语塞。

对方却得理不饶人,又将了他一军:

“蒋同志打算什么时候实现自己的诺言?”

“胡扯!”蒋介石在心中骂道,海天苍茫,关山万里,从广东运兵到西北,岂不是儿戏之谈。要不是季山嘉无知,就是对他的讥讽。他腾地站起来,眼睛盯紧了对方:

“季顾问莫非根本想取消北伐？”

季山嘉也毫不示弱，面对着蒋介石：

“我等不远万里而来，是为了帮助中国革命，也是为了帮助蒋校长，既意存帮助，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若以此误会别有用心，则无异禁我等不可直言也。”

显然，季山嘉在向他挑明，自己绝不会无原则地顺从、赞同他的意见。蒋介石愤怒地失去了常态，口不择言地大声嚷着：

“我以诚来，彼以诈信，非可共事也！非可共事也！”

他与季山嘉的关系到此已彻底破裂，犹如冰炭不能同炉。

早春二月，北方依然残冬未消、乍暖还寒，南国的广州却已是草长莺飞、暖意醉人了。舒适的阳光像情人的眼睛一样温柔，刚从上海赶来的张静江眯缝着眼睛享受着这一切。

是他让蒋介石陪着他一起游白云山的。这段日子，蒋介石的情绪烦躁紧张，时而亢奋像斗鸡，时而沉静如坐禅。张静江看出了其中症结，要点化他一番。

蜷缩在轿中的张静江瘦削弱小如孩儿，却雄心万丈，胸有丘壑。他和蒋介石一样，都来之浙江，出于吴兴望门之族。据说蒋介石父亲在奉化溪口开的“玉泰盐铺”，也是张家生意的一个分支。

张静江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身残体弱，所以，他要把一腔的抱负通过另一个躯体实现，让他的能量在别人身上闪光，发挥自己潜在的力量。

在一艘出洋的客轮上，他遇上了素不相识的孙中山，那时孙中山的事业正处于艰难困顿之中，名声却早传闻海外。

本来就有着“民族主义情绪”的张静江，凭着特有的商人的精明和政治的敏锐，认准并抓住了这一机会，叩响了孙中山的住舱。

他没有过多的客套，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他给了孙中山自己在法国经商的地址，并且约定，只要是为了革命，他张静江愿意倾囊相助。有需钱财时，可附一密电，以英文字母为暗号，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C为三万元，

其余类推,他一定如数寄到,决不食言。

真好像是天方夜谭。孙中山最初也仅姑妄听之,未想到后来真的陷入囊中羞涩至罗掘俱穷的境地,于是病急乱投医,按图索骥写上张静江在法国巴黎的地址,是文只有一个“A”。

数日后,一万元如期汇至。

于是又有了B字电、C字电……

凡是有求于张静江的,孙中山从来没有失望过。

张静江也成了“革命奇人”,每个人都能掂量出他的分量。

现在,他又把筹码压到了蒋介石身上。

轿夫都是特别挑选的,步履坚实而轻快,将张静江、蒋介石送上了白云山顶。

直到轿子落定,蒋介石才在轿夫的伺候下迈腿跨出。

蒋介石站在山顶,极目远眺,云色苍茫,天际寥廓,让人辄兴考槃之思,叹宇宙之宏大,造化之神奇,个人之微小。他不由慨然而曰:

“如何可使我驰责释负,达隐居者之目的耶?”

坐在身旁轿中的张静江微微一笑,这不是蒋介石的真心话,他能看透红尘,能离开权力吗?因此直截了当地问道:

“北伐的事进行得如何?”

一句话勾起了蒋介石的怒火:

“有季山嘉挡道,这件事难成。”

张静江皱起眉头:

“汪兆铭什么意见?”

蒋介石更怒:

“他们是一路的。汪精卫对季山嘉是言听计从,为这,我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相劝。”

蒋介石的信措词十分严厉:

“……自弟由汕回省以来,即提议北伐,而吾兄当时极赞成之,并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不料经顾问季山嘉反对此议,而兄不能自主之一端也。

“季山嘉提议，派兵由海道运往北方，此为儿骊欺人之谈，实为其根本打消北伐之毒计，弟即知其无北伐之诚意。……弟谓彼用意，与吾总理北伐毕生之志完全相反……”

“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军事陷于被动地位，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上无丝毫自动之余地，革命前途几至濒于绝境。故与兄提议，必先于确实交涉，不可使中国陷于被动地位，以违反我总理联合苏俄之本旨，与苏俄扶助中国革命之成约。然此不可专为苏联同志责，而亦不能辞其责任也。”

“季山嘉劝弟往北方练兵之计，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盖弟在粤一日，而季山嘉个人之计划总难实现，故其不得不设法使弟离粤，以失去军中之重心，减少吾党之实力……”

“汪兆铭对你的信有什么反应？”张静江关心的是结果。

“置若罔闻。”蒋介石咬牙切齿。

“他们疑我忌我，挖我墙角，拆我台面，无所不用其极。”

张静江神色凝重起来。

蒋介石更加危言耸听：“汪精卫的手已经插到了军队，黄埔军校也出现了倒蒋暗潮。更骇人听闻的是，据说要将人赶出广东，季山嘉屡次让我去北方练兵，不是无的放矢。”

他本来就是疑心很重的人，戴上有色眼镜，就更加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了。

“政治生活，皆阴谋组成也，让人难以忍受。”蒋介石冲着张静江大嚷。

张静江说：“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近观曾文正公嘉言钞，乃知其拂逆之甚，毁谤之丛，非人所能堪，而其劝弟则在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这些道理你都懂。”

张静江一番话让蒋介石冷静了下来，也有些飘飘然。他挺了挺腰杆，像要试一下究竟能承受多大的重量。干“大事”者，怎能如此心浮气躁，他感到今天受益匪浅。

张静江点明了今天出游的用意：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上海金融、工商界的一些巨子及社会闻人，如张公权、陈光甫、虞洽卿、黄金荣者，都把注压到了你的身上，因此，北伐的发动越快越好，北伐的路线也必须坚持东下的方针，在这两点上是非争不可。”

蒋介石频频点头。

“非常之世，当以非常之手段，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静江一字一顿，目露凶光。

这几句话也像重锤，敲打着蒋介石，让他反复咀嚼玩味。

于是，蒋介石“果断”地发动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海军军校校长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广东省办事处名义，“矫诏”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调中山舰去黄埔候用，后因得悉无此命令，即征得蒋介石同意返回广州，遂招致右派分子诬陷，谓为“阴谋”。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戒严，以图谋叛乱罪逮捕李之龙，制造“中山舰事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宅，逼迫中共党员退出第一军，彻底撕掉了汪精卫的面子，大扫了苏联顾问的威信。

对于蒋介石的举动，张静江十分赞许，认为一石数鸟，干得漂亮。但是他提醒蒋介石，做事必须留有余地，还未到与苏联人割袍断交的时候，眼下之计，还是力争早日出兵北伐，还得依靠苏联人的帮助，“革命”口号还要喊，“联俄联共”还要叫，没有他们的支持，部队连广东的大门都出不去。

蒋介石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这个道理我懂，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和苏俄交恶是迟早的事，而广东政府偏居一隅，迫切需要国际上的支援。既然苏联人不可恃，而英美诸列强对南方政府尚存有偏见，视之为南赤，且对我有政治目的，如此，这外交上的窘境如何打破？军事上的援助从何处寻觅？特别是顾问人选，既要有真才实料，又得用着放心，又有什么人能顶苏联人的缺？委实让人心烦。”

张静江一付胸有成竹的模样：“难道不能另辟门径。”

“请二兄（蒋介石私下里对张静江的称呼）指教。”蒋介石的眼神里流露出期盼。

张静江把手指向世界地图中德国的位置。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蒋介石连连称是。在世界列强诸国中，德国曾一度傲视群雄，特别是它的陆军，无论从理论到实战，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顶尖水平，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军队中许多精英人物都在家中赋闲，又不甘寂寞，因此将他们引进中国，是一件极可操作的事。另外，作为战败国，德国也放下了身段，双方的相处将是平等的。此外，由于德国正处于各种束缚之中，极需打开外交上的途径，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估计是乐于和中国方面展开合作的。

然而中德关系冷淡已久，谁人与之居间联系，蒋介石一片茫然。

张静江微微一笑：“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最佳人选。”

“是谁？”蒋介石竟一把抓住张静江的胳膊，着急地问。

“朱家骅。”

朱家骅何许人也？

此人与张静江同为浙江吴兴同乡，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1926年来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在当时已经是颇有名气。

蒋介石的眉头却皱了起来，朱家骅的名字他早有耳闻，听说颇关心政治，热衷于一些社会活动，好像有点不务正业。

张静江连忙为朱家骅解释，朱家骅确实热衷政治，但那是有治理河山之大志，非一般钻营之徒可比。否则，戴季陶为什么对其百般推许，称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易培基算半个，而那一个，则非朱家骅莫属。

蒋介石点点头，看来得对朱家骅重新认识了。戴季陶是他的密友，此人的性格他再熟悉不过了，目高于顶，一般人根本不在他的眼里，他能对朱家骅如此看重，说明此人确有不凡之处。于是对张静江交待道，既然朱家骅是个人才，那就轻视不得，再通过戴季陶进行沟通与邀请，以示郑重。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张静江与戴季陶共同出面，请朱家骅代为联系，寻找与德国合作的途径。

恰如张静江所言,朱家骅虽是一介书生,却是身在象牙塔,心在庙堂,眼见改变国策的大动作就要从他手中开始,自然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他知道,一旦联系成功,在未来建立的新政权中,他的分量将非同一般,无论在蒋介石或是德国人的眼中,都会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他立即给德国的老师、德国工程学会主席马脱昂斯教授去信,表达了广东政府迫切与德国展开合作之意,并请其提前与德国军界有名望的将领进行联系。

蒋介石向德国人抛出了橄榄枝。

2

德意志东山再起 兴登堡投鼠忌器

20年代末期的德国,从表面上看,已经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沮丧,天空湛蓝,阳光明媚,音乐裹在月光晨露中,蔷薇花爬在别致的矮墙上,一尘不染的大街两侧,菩提树枝影婆娑。看到的德国人,都是那样地从容不迫,那样地温文尔雅,已不复战争前后的那种躁动、狂热。

德意志是一个善于隐藏痛苦的民族,它情愿默默地躲在无人的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默默地反思,默默地忍耐,默默地积聚,以待风云际会,东山再起。

这种忍耐,有时让人感到可怕、阴沉。因为它可能化作民族振兴的动力,也可能化作一团不可理喻的烈火,吞噬、毁灭一切。所以它的宿敌法国,强邻英国,甚至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都用忧心忡忡的目光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并以种种桎梏束缚着萌发在它深处的心魔。

现在,马脱昂斯教授正被这个心魔煎熬得五内俱焚。

从莱茵河吹来的风已经暖和得让教授脱下那件穿了一冬的深灰色长风衣。他把它优雅地搭在手臂上,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时针指向1927年3月末的某一天下午3点。按照约定,他准时迈上威廉街上一幢有着高高台阶的建筑物。

这是德国的核心,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府。

一位年轻的官员领他走进了一间气派的屋子。

一位同样气派的老者正襟危坐，浑身散发着威严，马脱昂斯教授对他并不陌生。兴登堡总统还在陆军部参谋总长任上时他们就有过接触，作为德国工程学会主席，马脱昂斯与支撑德国经济的某些著名财团、企业，如西门子公司、克虏伯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也算得上是个名人。

简短的寒暄后，马脱昂斯递上那封发自中国的信，他的学生朱家骅言辞恳切，希望老师在德国物色一批专门人才充作广东政府的顾问，学军事的、学经济的、学工程的都要，越快越好。

带着德国人惯有的那种认真劲，马脱昂斯没有忙着给朱家骅回信。他在地图上先找到了广州的地理位置，接着查阅了所能看到的报刊资料。这位工程学教授不是书呆子，他很清楚地知道，由于战争的后遗症，德国的经济建立在一个很薄弱的基础上，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英、法、美诸战胜国就会利用德国的弱点转嫁经济危机。未雨绸缪，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市场，将给德国经济提供一个避风的港湾。

马脱昂斯对政治也不陌生。从查阅的资料看，中国的南方政府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政权。北京的政权已经老朽了，从以往的表现，他看不出还能有什么新的作为。苏联人是精明的，他们为什么对南方政府投入那么大的热情，不会没有所图，现在终于有了取而代之的机会，马脱昂斯兴奋得直搓手。

与那个时代相当一部分德国人的心理相同，马脱昂斯也有一种由战败而引发的民族羞耻，他对朱家骅请求代为物色德国军事顾问一事最感兴奋。战争是政治的终结手段，是经济振兴的一剂猛药，是走向世界权力巅峰的最佳捷径。就在10年前，德国人用此手段险些征服了世界，最后功败垂成。这10年的积聚，10年的含羞忍辱，德国军人应该重新走向辉煌了，他们应该以此为契机，作为军事扩张的新起点。

马脱昂斯也论证了此事的可行性。德国虽然沦为战败国，被逐出了列强的行列，其国际地位与中国相似乃尔，成了平等伙伴，但是德国与中国又有不同，它有着迅速复兴的基础和实力，并且正向着重新崛起的目标努力地靠近。因此，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德国是西方世界惟一可以给予中国实际帮助，

而又不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中国交往的国家，这当然符合中国政府的需要，并能在心理上引起认同感。

再说，从当时复杂的国际关系来看，西方列强哪个不想插手中国，他们又联合，又排挤，又相互嫉妒，有时甚至抱着“我吃不着，你也别吃”的心理，中国当局也束手无策，生怕讨好了一家，得罪了别家。如果聘用德国顾问，就可以免去这种“摆不平”的麻烦。

另外，刚刚遭遇失败这一事实，在德国人固有的坚韧不拔和认真刻板中，又减去了几分西方民族对东方民族的傲慢，更适合与当时的中国当局打交道。马脱昂斯认识的一位叫做施太乃斯的德军上尉，曾经作过一番比较：

“法国人太倨傲，太浮躁，做中国顾问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他们把中国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中国当局，如果中国不照他的指示去办，他只是耸耸肩便完事。英国人呢？太懒惰，所以也不行。苏联人则不坏，可是他们的心理跟中国人差不多，他们说‘尼契夫’，中国人说‘没有法子’，这语调是极相像的。其次他们的顾问也太专门化，每个顾问懂的只是大炮的特殊结构，而这对于中国是没有多大帮助的。因为中国的军备大都来自世界各国，所以非懂得各种炮不可。”

因此，施太乃斯上尉得意洋洋地宣称：

“惟一适合中国人需要的外国顾问，也许只有德国人了。”

带着以上的自信，马脱昂斯相信能够说服兴登堡总统。他舔了一下嘴唇，这才发现自己已经滔滔不绝讲了将近半个小时。

兴登堡忍受着马脱昂斯的高谈阔论，内心早有了疲倦。他并非是心无所动，说实在的，这位共和国的总统并不喜欢这个共和国，他骨子里还是一位德国军人，渴望的是战场上的鲜血淋漓，他忘不了德国军队曾有过的辉煌，忘不了作为德军总司令宣布战争失败时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当时，他甚至没有勇气向德皇威廉二世报告这一结果，他的最大心愿就是重新率领着德国军队驰骋战场，奏着得胜鼓接受如潮的欢呼。

但是，这位近80岁高龄的总统如今少了以往的几分冲动，多了几分稳重，他知道魏玛共和国在德国并不怎么讨人喜欢，这几年一直处于风雨飘摇

中，好不容易渡过了难关，德国经济出现转机，工业产量于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到1927年增加到122%，失业人数战后第一次降到了百万以下，兴登堡才觉得日子好过了些。他已经老了，英雄迟暮的沧桑感悄悄地潜进了他的心头，来日无多，他更希望保持一种平稳、安定。

所以，他把朱家骅的那份电文推还给了马脱昂斯，语言中带着敷衍和推诿。他提醒马脱昂斯，早在1920年，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就派代表卜尔熙来华为恢复两国关系开展活动，次年，德中双方在北京举行了新签《德中协约》换文仪式，德国经济势力已经重新回到了中国。根据今年的报告，德国在华公司已经超过战前的数目，达300余家，旅德华侨亦达3000余人，德国顾问及工程师成为中国各地方衙门座上客。如四川的杨森、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以及直系的吴佩孚，都聘请了德国人，其中江苏的齐燮元还于1923年8月派出代表团访德，希望引进德国资本来江苏投资，发展实业。

“德国经济开始恢复了在华的优势地位，众多德国顾问赴华为德国资本财团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其中仅1925年度，在中国全部的进口军火武器中，从德国进口的就占总价额的一半以上。我们应该满意了，不要妄想全部占领中国市场，那样会遭到列强联合抵制的。”兴登堡警告说。

马脱昂斯挺了挺身子，他觉得兴登堡答非所问。现在是中国的南方政府与德国打交道，迄今为止，德国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这一区域。

兴登堡用一种夸张的手势打断了马脱昂斯，教授的信息不会不灵通吧，据其所知，早在1924年的秋天，以凡尔特·契尔鲁腾伯格海军上尉为首的一批10余人德国卸任军官就抵达了广州，受聘于广东政府，其中数人进入了黄埔军校充任军事教官。这怎么能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毫无进展呢。

马脱昂斯轻蔑地撇了撇嘴，凡尔特·契尔鲁腾伯格之流只能算是一盘小菜，上不得台面。现在人家希望聘请的是塞克特、鲁登道夫、佛采尔这样的德国名将。将这些重量级的人物派往中国，才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阵剧烈的咳嗽从兴登堡的胸腔中迸发，他为马脱昂斯的想法而惊讶，以上提到的那些都是德国陆军中的精华，一举一动都受到全世界的注视。中国人想聘请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你马脱昂斯难道不知道禁忌吗？

“我想没有必要将《凡尔赛和约》有关德国部分的规定念给教授听吧。”兴登堡话里带刺。

“那是个丑恶的条约，”马脱昂斯愤怒地喊道，“整个德国都为它感到羞耻。”

“确实是不公平，但我们得执行。”兴登堡语调坚定，“而且那个丑恶的条约正是你刚才提到的塞克特将军参加签定的，他总不能自食其言吧。”

只要一有机会，兴登堡总忘不了要攻击一番他以前的袍泽塞克特将军。因为塞克特在背后骂了一句他最怕听的话——“此老朽不堪任事。”

这句话骂到了兴登堡的痛处，因为一直有人就年龄问题对他展开攻击，骂他昏庸，骂他弩马恋栈，骂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重重暮气。

兴登堡以前是很器重塞克特的。此人出生于军人世家，其家族成员多任普鲁士王室的文武官职。他成年之后即入德军服役，19岁时升任步兵团军官，接着考入陆军军官学校，一毕业便调入参谋本部服务。他处事周密，性格坚韧，善于谋划，甚得上司青睐，故而沿着各种不同类型的参谋长的道路直线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是德第三军团参谋长，1914年秋季，他与德军另一名将佛采尔合作，在北线一举突破法军防线，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事后德国皇帝特别致电祝贺，表彰二人作战有功。

从此，塞克特与佛采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北线作战的成功使最高统帅部对塞克特刮目相看，遂调其出任新成立的第十一军团参谋长。不负所望，1919年5月，该军团在麦肯逊和塞克特指挥下，在哥利士大破俄军，席卷波兰全境，进而攻入俄国本土，德军获空前胜利，塞克特也被誉为德国军事史上最杰出的参谋长。

德国战败后，塞克特经由俄国、波兰返回国内。战败的结局使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为此而痛哭失声。兴登堡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他，鼓励他担负起收拾残局的重任，把德国军队带出低迷的状态。

塞克特脸上肌肉抽缩了一下，心里发誓，一定要重新锻就德国军队的锋芒。

战后，塞克特从战场被召回，出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的军事代表。作为战败的一方忍受着胜利者的奚落和白眼，塞克特一面在心里诅咒，一面脸上露着笑容和委屈，他告诫自己必须克制、忍耐，只要能德国军队留下一些火种，什么样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和会签定了严格限制德国军事活动的条约，但没有彻底封杀德国军队的生路。会后，塞克特被任命为和平军组织委员会主席，不久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

为了使德国军队卷土重来，塞克特呕心沥血。《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队数量有严格苛刻的限制，塞克特就在质量上大做文章，决心训练出10万精兵，要把每一个士兵都训练成可以领导训练和指挥作战的骨干，把军官培养成未来的司令官和统帅。隆美尔、波克、李布等，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如雷贯耳的名字、希特勒麾下最出色的战将，当时都是塞克特手下不起眼的小军官。

由于塞克特在训练上卓有成效，日后有人将他与军界传奇人物毛奇和希里芬并举。认为毛奇从最基本点铸造了德国现代战争的模型，并奠定了指挥原则；希里芬展望并设计了宏深的计划，给德国带来了无比的光荣；而塞克特则是在失败后的灰烬中组织起森严的小型军事武装，其中每一分子与细胞安排均极近完善与充实，一旦时机适当即可无限制地扩充。不夸张地说，是塞克特保留并整顿了战后濒临灭亡的德国军队，故被誉为“国防军之父”、“国防军的杰出缔造者”。

塞克特是位极端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了振兴德国军队，他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为。自他担任陆军总司令以来，总司令部已经成了国中之国，任何人都别想插手陆军，包括兴登堡元帅。

最初塞克特还有顾虑，但挡不住总司令部部队室主任（该职即战前的参谋长，因受《凡尔赛和约》限制，故改其名）佛采尔三番五次劝说。佛采尔道：特殊的时刻，需要特殊的人，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意志。兴登堡是个过时的人物了，而且性格上有不可原谅的软弱之处，当年任参谋总长的时候不就被他的助手鲁登道夫玩弄于股掌之上，总长反而成了次长的傀儡。

提到鲁登道夫，塞克特脸上挂上了严霜。他对此人一向没有好感，冲动、霸道，甚至有点粗俗，奇怪佛采尔为什么和他成为至交。

鲁登道夫在德国陆军中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此人才干不可否认，但作风专横，有“铁腕”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军队以陆军为主，统帅机关为陆军部，参谋本部不过是陆军部所属的幕僚机构，起着咨询和拾遗补缺的作用。鲁登道夫可不是甘当配角、听人摆布的角色。上任伊始，就说服时任参谋总长的兴登堡争取扩大参谋本部的权力，削减陆军部的权限，使参谋本部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指挥机构。在一次陆军部高级军事会议上，鲁登道夫攥紧拳头咆哮道：战争的胜负决定国家的存亡，为配合总体战需要，参谋本部要成为国家最高决策与监督机关，以便对政府部门和军队进行有效的控制，包括经济发展、工业生产、新闻宣传和兵民动员等等。总之，参谋本部的权力要深入到德意志的每个角落。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不仅没把兴登堡放在眼里，就连出席会议的德皇威廉二世也为他的咄咄气势所慑服。因此有人称这一时期是“鲁登道夫独裁期”。

或者是为报知遇之恩，或者是佛采尔跟鲁登道夫一样头脑狂热、性格专横，他们俩人非常有共同语言，行动上也配合得天衣无缝。1917年佛采尔协同鲁登道夫指挥6个师的德军，闪电式地突破意大利北部防线，使德军长驱直入向威尼斯挺进。这一战役后来也作为成功的典范写进了军事教科书。

战争结束后，鲁登道夫畏罪逃到了瑞典，佛采尔仍然留在军中，担任柏林驻防旅参谋长。那几年德国社会空前动荡，尤其是大批的退役军人成了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对霍亨索伦王朝充满了眷念，因为自普鲁士王威廉一世时代(1713年—1740年)开始，职业军人即是一种荣誉，德国社会尚武的风气和对军威的尊崇，使职业军官享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军官们自视高傲，感觉良好。现在战争失败，大批军官被迫退出现役，沦为一般平民，忙着为生计而奔波。缺少面包，缺少取暖的燃料，缺少女人的青睐，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自然也把憎恶和怒火发到刚刚成立的魏玛共和政府头上。1920年3月，首都柏林发生了由卡普领导的暴动，主力军就是失意的复员军人，政府仓皇逃出，如果不是德国民众反对，工人发动了总罢工，魏

玛共和国恐怕就此夭折了。

鲁登道夫在国外为这次政变摇唇鼓舌，推波助澜，他在德国军队中颇具影响，因此政变时德国陆军均作壁上观。塞克特最初的念头是想出兵镇压的，尽管他很同情这些退役军官，对已被推翻的皇族王室非常留恋，但他认为现在进行复辟活动，会造成国内的混乱，德国将永劫不复。眼下当务之急，莫过于德国内部之团结与实力之恢复，所以他对支持这次政变的鲁登道夫颇为不满，认为这是在为德国添乱。他跺跺脚，准备召集部队。

佛采尔及时拦住了他。佛氏的心情很激动，指着暴乱的人群，这些都是昔日并肩作战的战友啊，他们与你有着袍泽之谊，僚属之亲，你下得了狠心向他们开枪吗？

看到塞克特脸上出现了犹豫，佛采尔的劝告又换了一个角度。何必为那个令人讨厌的共和国得罪军人阶层，作为德国军队的领袖，你需要赢得他们的尊敬、信任。

黑夜里，塞克特将军脸上的夹鼻眼镜闪闪发亮，他的浓眉费力地动了动，终于扭转身子返回了自己的书房。

政变平息后，陆军总司令因在政变中镇压不力而引咎辞职，佛采尔支持塞克特继任陆军总司令，政变分子及其同情者也将政变中没有流血的功劳归于塞克特。一时间，塞克特无论在现役或退役军人中的威望，无出其右者。

塞克特坐上了德国陆军第一把交椅，他心里明白佛采尔在政变中的功绩。上台不久，佛采尔就收到了一份委任状，一跃而为陆总部队室主任，成为陆军中实力派人物。

佛采尔的专横与鲁登道夫有相似之处，他要把陆军建成国中之国，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他谁的账都不买，为所欲为，甚至瞒着兴登堡总统私下里和苏联军方进行军火贸易和军事合作。佛采尔忘了一点，鲁登道夫与兴登堡的关系可不是他同塞克特能与之相比的，加上又有人因佛采尔专权而不满，从中离间，兴登堡终于忍不住发话了。

“塞克特将军是被那个坏小子带坏了。”

那个“坏小子”自然是指佛采尔了。

佛采尔仍然不知收敛,1926年秋,塞克特和佛采尔二人未经政府同意,擅自邀请原德皇储检阅部队,德国朝野震动。这样的举动未免太过分,太让共和国难堪了。兴登堡忍无可忍,一怒之下,免去了塞克特和佛采尔的军中职务。

从此,塞克特、佛采尔成了在野之身,他们恨透了兴登堡。

3

包上校流浪归来 蒋介石望穿秋水

塞克特的府邸距总统府不远，穿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向东折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就看到一幢宽敞的住宅掩映在葱茏的草木中。马脱昂斯教授按响了门铃，这时黄昏的阳光给他肩上镀上了一层金色。

从总统府失望地出来后，他马不停蹄地转到了这里，一心想叩开希望之门。

一位仆人将马脱昂斯引进了客厅，佛采尔瘦削的身影先于主人进入了教授的视线。

在这里见到佛采尔并不意外。自从离开军队，他和塞克特过从更密，更多的是发泄对兴登堡的仇恨。他们甚至参加了反共和的国家人民党，这是个极右组织，对刚刚崛起的纳粹党持合作态度。

他们自甘堕落了，竟混迹委身于他们以前不屑一顾的小组织当中，他们甚至开始欣赏起那位崭露头角，嘴上留着卓别林式小胡子的前奥地利下士希特勒，因为那个人看起来更狂热，更热衷德国霸业的重建，也更铁腕。他的充满生气，他的咄咄逼人，他的富有侵略色彩的积极进取，都使老态龙钟的兴登堡总统显得更保守，更过时，更古董。塞克特、佛采尔现在宁愿通过帮助希特勒来报复兴登堡、报复共和国。

由于塞克特的名气，被推选为议会代表。佛采尔就不那么运气了，从事政治活动并非他的特长，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最喜欢的休闲方式，就是

坐在这间舒适的客厅里，谈以往的经历，谈今天的失意，谈将来的预测，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战争、军队，佛采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个职业军人。

与主人和佛采尔打过招呼，另一位客人就大出马脱昂斯所料了。一向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鲁登道夫像一堵墙站到他的面前，表情还像以前那样坚毅，眼神还像以前那样阴沉。战争期间，作为总体战的设计者，鲁登道夫经常向工商业各界人士咨询，他是那个时候认识马脱昂斯的。

马脱昂斯至今还记得鲁登道夫的一句名言：

“要大炮，不要黄油。”

这是个战争狂人、疯子。

他和塞克特本不是一路人。不仅仅是性格上的不同，他们一个冲动，一个谨慎；一个大胆，一个周密；一个性烈如火，一个冷酷似冰。而且，在卡普暴动时，塞克特毕竟是共和国那边的人，鲁登道夫从心理上就与其产生了隔阂。

让他们走到一起的是希特勒的纳粹。自从听过了希特勒的几次演讲，鲁登道夫就断定建立德国世界霸业的重任必将落在这个前陆军下士瘦削的肩上。为此，他不惜放下架子追随希特勒，发动了德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啤酒馆政变。这一事件发生在1923年11月8日的晚上，那时塞克特还在陆军总司令任上，还瞧不起这群乌合之众，于是以有力的手段予以了镇压。包括希特勒、鲁登道夫在内的10名政变分子，都被送上了法庭。

塞克特、鲁登道夫之间隔阂的消除当然是在前者被罢免军职以后。失意人遇伤心人，共同语言自然就多了起来，加上佛采尔穿针引线，现在，鲁登道夫已是这里的常客了。

佣人端上了咖啡，马脱昂斯顾不上斯文地喝下半杯，这才谈起他在总统府的遭遇。

佛采尔用细长的手指敲打着桌面，有点阴阳怪气：

“那老家伙尸位素餐，整个德国都要上锈了。”他的话一向那么刻薄。

鲁登道夫皱皱眉头，没有发话，毕竟以前与兴登堡共事多年，他不愿这样糟蹋那位老人。塞克特则反复琢磨马脱昂斯带来的那封信，又递给佛采

尔、鲁登道夫传阅。

“信里点着名希望我们接受聘请。”

“难得那位中国的蒋将军还识货，我倒是乐意去中国走一趟，这是我们德国重新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佛采尔很是心动。

“通过官方渠道肯定不通，兴登堡的拒绝还是有道理的。”塞克特说了句公道话，他亲自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签定，知道国际对德国的限制。《和约》第179条规定：德国不但不能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团驻在任何外国，而且“将采取合宜办法，禁阻德国公民离开其领土，以投效于任何外国之陆军、海军和空军，或随之以助陆军、海军或空军之练习，或大概在一外国给协助于其陆军、海军或空军之教育”。上述规定清楚表明，任何德国公民即使以私人身份充当别国军事顾问都是非法的。兴登堡在这个问题上谨慎小心和故意推诿是可以理解的。

“说实话，如果像契尔鲁腾伯格上尉那样的小人物溜到中国，尚不会引起注意，但他们人微言轻，对中国的当权人物产生不了决定性的影响，若是在座诸位中的任何一位，凭你们的经验、名声，肯定不会受到漠视而大有用武之地。但是作为德国陆军中最有头有脸的几位人物，违反《和约》的规定跑到中国，必然引起国际舆论的猜测、疑忌，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纠缠和麻烦，这对德国的重新奋起会有阻碍作用。”

“看来我们只能坐在这里品尝着咖啡，让机会从眼前跑过。”佛采尔又不甘又无奈。

“难呵！”塞克特一时也想不出办法。

鲁登道夫一直在踱步，猛一击掌：“世界上没有想不出办法的事！契尔鲁腾伯格之流分量太轻，我们这帮人目标太大，难道不可以权衡机变，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塞克特、佛采尔眼睛一亮，他们已经明白了鲁登道夫的意思。

“马格斯·包尔上校，他是我在参谋本部时的助手，我认为他是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

满屋人都拍案叫绝，这个包尔，军阶、名声、影响都处于最合适的位置，既不让人轻视，也不惹人注目，但经验、才干、魄力却是一流的。

包尔是一个典型的日尔曼人，金黄色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浅灰色的眼睛闪着迷蒙，鼻梁高耸，下巴结实，整个面部线条柔和而有力，紧抿的嘴唇显示了内心的冷静，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这样的人随便往哪儿一站，都让人不敢小视。

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流浪生活，他又重新回到这块熟悉的土地，来到熟悉的城市。马格斯·包尔也参加了1920年发生的卡普政变，并且是这一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政变失败后，他开始了流浪生活，辗转于西班牙、奥地利，甚至把足迹留在了南美洲的阿根廷，最后在苏联落脚，在苏联红军中担任炮兵顾问。干炮兵的人都知道，包尔是这一军种里最出类拔萃的专家之一。他发明的新型重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出尽了风头，柏林大学因此而授予他荣誉博士称号。苏联人知道他的价值，延聘他到军中充做了师爷。

如果不是鲁登道夫的召唤，包尔也许还会在苏联再干几年。他与这些苏联同行相处得很融洽，也暗自佩服对方在火炮制造、炮兵战术理论等各方面的造诣。现阶段苏联红军炮兵的素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军炮兵的水平已不能同日而语。

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鲁登道夫和包尔也都是在野之身，但包尔见到以前的上司时，仍然毕恭毕敬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只是脚下磕不出以前穿着马靴时碰出来的清脆。

鲁登道夫愉快地点点头。包尔的一个军礼又把他带回了过去的战争年代，当时他和兴登堡很欣赏眼前的这位军官，著名的兴登堡作战计划就是出自包尔那个聪明的脑袋，而总体战的战略构想，实际的发明权也应属于包尔，是包尔向他提议在作战中使用一切手段与力量，包括大量生产潜艇，对敌方的补给舰船进行袭击，扩大军火和重武器的生产，甚至使用毒气。他鲁登道夫只是把这一切付诸实践，却被冠上了总体战创造者之名。

包尔的性格与鲁登道夫大相径庭。包尔头脑精细，目光锐利，一步一个脚印，这一点倒是和塞克特相仿，因此对鲁登道夫起到了互补的作用。熟悉

内情的人都知道，鲁登道夫拿出台面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包尔头脑里的产品，所以有人开玩笑，鲁登道夫是德国的参谋长，包尔是鲁登道夫的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德皇、兴登堡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连德皇自己也承认是鲁登道夫的傀儡），但对包尔却言听计从，故又有比喻，鲁登道夫是敲响德国战鼓的大槌，而大槌手则是包尔。

马脱昂斯与包尔也不是第一次见面。战争期间，包尔极力主张大规模生产重重大炮，克虏伯、西门子等垄断财团因此大发了一笔战争财，他们视包尔为衣食父母。

几年的流浪生活，使包尔变得更沉稳，更成熟，更锐利。红粉馈佳人，宝剑赠壮士，货卖识家，他等着有人来开发他的价值。何况，这次使命又与他为之献身的德国军队的振兴密切相关。

他目光炯炯地接受了鲁登道夫、马脱昂斯的推荐。

“上校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启程？”马脱昂斯很性急。

“稍安勿躁，我还打算去克虏伯、西门子这些著名公司作一番调查。有必要的話，还得去一趟瑞典。现代战争已不光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是军事力量和国民素质的全面对抗。”包尔的脸色很平静。

“这就是内行人说的话。”鲁登道夫不无得意地夸耀着以前的下属。作为总体战的设计者，包尔的很多战争思想在当时看来很有独到之处。鲁登道夫走到马脱昂斯面前，用眼睛盯牢他：“记住转告您的中国朋友，包尔先生不仅是一个军事专家，而且是个经济专家，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佳人选。”

“对此，我有充分的信心。”马脱昂斯轻快地踱起步来，“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建议，为了给中国当权者一个震撼的印象，包尔上校应该准备一份计划，注明他在中国将要开展的工作。”

“那当然，德国人订计划是世界一流的。”鲁登道夫愉快地拍起了包尔的肩膀。

墙壁上挂着的日历已经撕到了1926年的夏天，这时候的广州已是繁花似锦，灼热的阳光让人已有炽热之感，但蒋介石依然戎装整齐，风纪扣扣得

端正结实。

张静江掀掉了从去冬以来一直盖在腿上的毛毯，只是坐在轮椅上的身躯还是那样地委琐，那样地病病恹恹，实在与这大好的光景不协调。

“二哥，这是加伦将军所拟的北伐作战计划，你有什么意见？”蒋介石将一叠报告推到张静江手边。自从“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汪精卫愤而远走他国，苏联方面也撤走了与他不和的季山嘉，接任季山嘉工作的鲍罗廷吸取了以往的经验，几乎变成了好好先生，对蒋介石的约束和监督不如从前。倒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像以往那样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准备北伐。

张静江把作战计划翻得哗哗作响，半晌，由衷地夸赞道：“加伦将军果然有点真才实学。”

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苏联元帅。加伦是他在中国的名字，曾任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和远东方面军司令，先后荣获五枚红旗勋章和两枚代表苏联最高荣誉的列宁勋章。在苏联国内战争期间，他曾指挥南方游击军深入敌后，奔袭哥萨克白匪军的后方。后来又率领他们翻越乌拉尔南部高山峻岭，穿过巴什基利亚茂植森林的泥泞的沼泽地，踏开一条布满荆棘、死亡的“地狱之道”，终于与红军队伍会师。他的这一壮举，曾被誉为可与俄国一代名将苏沃洛夫出师瑞士相媲美。其苦、其险、其不可思议，让人瞠目结舌，赞叹不已。

蒋介石是个爱面子的人。苏联政府推荐这样一位声名卓著的将领充作他的军事顾问，也使他脸上增色不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分量，而且加伦将军为人谦虚，善于周旋，在国民党人中威信也很高。自打与德国方面秘密接触后，蒋介石就担心，加伦走后的空缺，继任者是否有能力填补。就说眼前这份北伐作战计划吧，他也曾躲在沙角台闭门不出，呕心沥血半月余，搞出了一份，但与加伦将军的一比，相差何止以道里计，那是大师与初入门者之间的差距。“朱家骅有消息吗？”蒋介石等到张静江翻完计划后问。

张静江点点头，他知道蒋介石想问什么，担心什么。

“他的侄子从柏林来电，兴登堡总统对我们的要求态度含糊，不甚积极，大概是出于对《凡尔赛和约》的考虑。”

“鲁登道夫呢？塞克特呢？佛采尔呢？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来也好。”蒋介石有点焦急。

“他们都很想来中国服务，但都投鼠忌器，礼貌地拒绝了。”张静江摘下眼镜，不紧不慢地擦擦镜片。

蒋介石失望地倒在椅子上，有点不甘心：

“这么说，我们暂时还不能赶走苏联人，还要把他们的意见奉为座右铭，继续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

“加伦的作战计划并不坏，我看就是德国人也未必比他高明，而且北伐在即，我们还是需要苏联人帮助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再说，德国人也并没有完全拒绝我们，鲁登道夫向我们推荐了一位前德军上校包尔。”张静江慢悠悠地劝道。

“一个上校。”蒋介石语气里有了轻蔑。

“据说是鲁登道夫的一个参谋，火炮专家，挺能干。”

蒋介石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看来还得有一场失败才能彻底打掉德国人的傲慢，他们的眼光超不出鼻子底下的欧洲。一个参谋能与加伦这样的将军等量齐观，究其症结，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在世界战略意义上的地位，没有重视我们的广州政府，认为在我蒋某人身上不值得下本钱，下功夫。”

张静江不满地皱皱眉头，已经成为广州政府实际领袖人物的蒋介石总让人感到缺乏修养，特别在熟人面前，性格上的弱点更容易暴露，焦躁、偏拗，有时还有点歇斯底里。

“德国人办事认真，他们不会滥竽充数，推荐一个不合格的人，这有损他们的利益。据说这个包尔是鲁登道夫最得力的助手，上次世界大战西线兴登堡计划就出自他的手笔。”

蒋介石果然停止了牢骚。兴登堡计划他是知道的，那是一次著名的战役行动，德国人在那次战役里显示了计划的缜密，战术行动的鬼诡，战役方向的大气磅礴，取得惊人的战果。包尔能参与制定这样的战略计划，必有过人之处。

“这是朱家骅让我转交的包尔亲拟的《现代军队组织建议书》，刚由柏林

寄来,是包尔在中国的打算,看看合不合你的意,如果不喜欢,再通知朱家骅打发掉他不迟。”张静江口气里有一种教训人的味道,在蒋介石面前,他从来都是以长者自居的。

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洋洋洒洒地铺开,蒋介石的额头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他完全沉浸在包尔的建议书中,良久,方抬起头来,拍案叫绝:

“真是一语破的,一语破的,道出了中国的症结,建军的真谛,立国的根本。”

包尔的什么锦囊妙计让蒋介石如此兴奋,如此欣喜,如此惊叹?今天,我们已经看不见原文了,只能了解其大概内容。在这份建议书中,包尔针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从现代战争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意识、国民素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建议:在政治上,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个人统治,以铁腕政策治理国家;在经济上,以军事工业为龙头,带动其他经济的发展;在外交上,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与西方列强妥协,并以反共产主义为标榜,取得西方国家的认同感;在社会心理方面,提倡尚武精神、服从主义、军国主义,给传统的“尊王攘夷”的口号注上时代的色彩。

以上所言,正是蒋介石追求的,难怪他兴奋,难怪他急不可耐。

“甚获吾心,甚获吾心。”他站起身,隔着桌子伸开手,像是要越过关山万里,将包尔从德意志一把拉到中国。

“请朱家骅向包尔先生转达我的问候和致意,并希望他尽早赴任,至于来华工作各项条件,我们一切从优。”蒋介石重新抓过那份置在一旁的加伦将军所拟的北伐作战计划,手里掂了掂,心中涌起一阵过河拆桥的恶毒,盘算道:

“该寻个机会打发苏联人了。”

4

包尔择时不巧
“二济”殷勤留客

花落花开，冬去春来，转眼间跨进了1927年，蒋介石这边秋水望穿，马格斯·包尔则冷眼旁观，他担心明珠暗投。

在原德国陆军参谋部里，包尔上校的谨慎就出了名，每次制定作战计划，他连最微末的细节处都要考虑到。那种琐碎，那种精细，有时让大大咧咧的鲁登道夫急得跳脚，但最终总心悦诚服。现在，面对来自中国的盛情相邀，他又以一贯的谨慎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谋定而后动。他要考察未来的雇主究竟是可造之才，还是难雕朽木，这也是良禽择木的原则。

其间，马脱昂斯教授催促过他：“德国财团已经等不及要进入中国市场了。”种种迹象表明，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为了德国的利益，要尽早寻找新的殖民地宣泄、减轻、分流这场灾难。

包尔白了教授一眼，语气依然是惯有的冷静：“我要保证德国的马克不能白白地流失。广州政府的内部很不稳定，他们面临的敌人很强大，等胜利的天平已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将军，我会及时登上旅程。”

鲁登道夫理解这位昔日下属的犹豫，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驱车来到包尔的门前，他随身带了份刚到的报纸。

摊开报纸，一行黑色大字跳入包尔的眼帘——“中国的蒋介石将军日前在南京建立政府”。包尔的灰眼睛里露出些许亮色。

“该是你打点行装的时候了。”鲁登道夫耸耸肩，从怀里掏出一瓶酒，“我

为你伐行。”

中国。南京城里，夏日的风吹得石头城热浪滚滚。这座长江边上的著名“火炉”果然名不虚传。

北伐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匆匆从前线赶回京师。由于蒋系第一路军回防南京，他的第三路军整个地突出于正面，直接面对直鲁联军的攻击，形成孤军奋战之势。这种以邻为壑、暗存实力的伎俩实在让他愤怒，于是不待请示，将他的部队置于芜湖、安庆，坐视重镇徐州危殆而不顾。

1927年7月24日，徐州陷于孙传芳、张宗昌之手。

蒋介石铁青着脸等着李宗仁。尽管已汗透重衫，但他总司令的行头没有一丝马虎，甚至腰间的皮带也没有除下。

这一年来，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托先总理孙中山在天之灵，倚仗着中国共产党的全力帮助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依靠着军队和人民的浴血奋战，蒋介石按照加伦将军制定的战略方针，于1926年7月发动了北伐，一路上进展堪称顺利。

北伐之初，敌我双方能参战的兵力对比，至少在10倍左右，即我方不过5万余人，敌方则肯定在50万以上。力量如此悬殊，这仗该如何打啊？

必须承认加伦将军的功劳。加伦的军事才华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论及军事艺术，中国古代有一句明训：“善用兵者，以少为多；不善用者，虽多而愈少也。”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加伦虽然没有读过宋朝欧阳修的名句，对这层道理却懂得透彻。以少击多的关键，就在于集中力量，造成局部的优势，各个击破，从而取得整个战略的主动。

加伦像一位高明的拳手，瞄准了对方的破绽。北伐中，他针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各怀心机，不是铁板一块的情况，制定出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战略。根据他的设计，北伐按如下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即首先出师两湖，重锤打击吴佩孚，廓清湖南、湖北的北洋势力，而置孙传芳于一旁，尽量利用孙、吴之间的矛盾，争取其暂时的“中立”。同时，在闽粤边境部署一支有相当力量的预备队，防备孙传芳的侧袭，以求万全之策。

随着武汉三镇的占领,北伐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因为武汉为九省通衢之地,华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有此立足之地,即可以此为依托,将战争转到江西,全力与孙传芳作战。同时,部署在闽粤边境之预备队,也应向福建、浙江进军,与江西战场配合作战,形成对孙传芳的夹攻,争取早日攻克南京,力求在长江流域扎下根基。

攻克南京后,北伐即进入了第三阶段。此一阶段的战略部署为兵分两路,一支沿京汉线北上,与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河南,夺取中原,进击北京;另一支则沿京浦线进攻,最后两支部队共同夺取京津地区,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主力,把国民革命推向全国,夺取北伐战争的彻底胜利。

一切都如加伦所料,北伐军首先出师两湖,与名扬天下的直系大帅吴佩孚大战于汀泗桥、贺胜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后移师江西,与号称北洋新秀的七省联军司令孙传芳杀得难解难分;与此同时,蒋介石手下第一号大将何应钦率东路军进击八闽,掩袭浙江。北伐军终于实现江南大会师,到1927年春,已经是饮马长江,底定东南,牢牢掌握住半壁江山。

蒋介石的突然背叛革命使加伦的计划打了折扣。他自出道北伐始,就有三块心病挥之不去,其一是中国共产党,其二是仍戴着左派面具随时都可能返回国门的汪精卫以及支持他的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其三则是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

共产党令蒋介石恐惧,因为他们政治目标明确,意志品质顽强,尤其是他们号召民众、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能力非同凡响,现在借助北伐的发展,已隐约形成气候。蒋介石心里暗道,今后能与他争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

汪精卫则令蒋介石憎恶,他了解这个人,巧言令色,薄幸无情,权欲极重。奇怪精明如斯的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为什么还信任支持他,最近汪精卫已从法国回到了武汉,以国民党正统自居,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

蒋介石很庆幸他及时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于猝不及防中将共产党人一脚踩进血泊之中,想恢复元气还需时日。至于汪精卫,他冷笑一声,不足为惧,先总理生前就有言:“汪书生难成大事。”南京方面刚宣布清共,汪则迫于各方面压力,也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宣布与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割袍断

交,分道扬镳。“真是自毁长城,没有共产党和苏联顾问支持,他那个武汉政府迟早要垮台。”蒋介石如此断言。他感到胸口顺畅了许多,三块心病暂去其二,眼下只剩坐在面前的李宗仁了。

在李宗仁面前,蒋介石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心虚。尽管他贵为北伐军总司令,总担心李宗仁在骨子里轻视他。这份心虚缘于他的黄埔军在战场上的不争气。

说来令人烦恼,蒋介石的第一军论装备、待遇、数量都为各军之冠,而且选择作战目标也是挑肥拣瘦,享尽照顾。比如说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叶挺的独立团和桂系的第七军压箱底的本钱都拿出来拚了,第一军却是蓄锐养精。直到两湖战场胜券在握,武汉三镇三取其二,只剩下孤独的武昌时,蒋介石才把第一军派上场,原以为唾手可得,可为两湖战场画上个圆满的句号,谁知就偏偏不能如人意。第一军在武昌城前铆足了劲,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还是铩羽而归。收兵时,满脸羞愤的蒋介石感受到了李宗仁那嘲讽的眼光像刀锋一样刮过。

打马转身,他又来到江西战场,希望挽回面子。谁知两度受挫于南昌,尤其第二次南昌之战,竟然弄巧成拙,中了人家反埋伏之计,如果不是白崇禧临危不乱,牵着他的手冲出重围,他这位北伐军的总司令是否成为孙传芳的阶下囚也未可知。

与第一军的不堪一击相较,李宗仁的第七军则出尽了风头,两湖战场上势如破竹,江西战场上威风八面,有人以“钢军”誉之。不仅第七军如此,张发奎的第四军、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的第八军,也都是攻城略地,战功卓著。李宗仁的话很刻薄,他以“无尺寸之功”评价蒋介石的黄埔军。

李宗仁的话刺疼了蒋介石,但他没有找到第一军堕落的根本原因。“中山舰事件”后,该军中公开的中共党员一概被清洗出军队,原有的革命精神、战斗精神荡然无存,往日之荣耀落上了斑斑污点,抽鸦片者有之,酗酒者有之,强买强卖者有之,欺负百姓者有之,恨得蒋介石指着鼻子骂:

“这是第一军的无上耻辱,是第一军的姦贼,谁都可以枪毙。”

他痛心疾首，往日的第一军哪里去了？想当年强攻惠州，血战棉湖，黄埔军人的气概惊天地、泣鬼神。如今恍如隔世，他气得浑身哆嗦：

“你们如果不能按照我的话去做，我不再讲什么话，只有多预备几颗子弹，来枪毙我自己的学生。”

痛心之余，他不禁想起答应前往中国的马格斯·包尔上校，希望包尔能将德国陆军的精髓移植到他的第一军中，届时，就容不得李宗仁之流在他面前飞扬跋扈了。

见到李宗仁，蒋介石只是哼了一声，算是打过招呼了，一旁站着的何应钦看不过眼，招呼李宗仁旁边看座。

没容李宗仁落座，蒋介石已发话，徐州失守，兹事重大，不仅南京受到威胁，也给直鲁联军有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和反攻江南的立足之地。

李宗仁理直气壮，因为蒋的第一军回防南京，是以防止武汉方面东征为借口（是时武汉方面唐生智部正鼓桴东下，以讨蒋护党为号召），所以他开口道：

“既然如总司令言，汉方精锐倾巢来犯，我亦以精锐阻之，第七军难道不是精锐，不应该调至芜湖、安庆严阵以待吗？”

蒋介石噎得胸中发闷，他听出了潜台词，李宗仁在指责他暗存私心，既然第一军可回防，第七军又为何不可？

“好吧，你的第七军尽管回撤，我自带第一军反攻徐州。”他气鼓鼓地打断李宗仁的申辩，不无赌气地发誓：

“打不下徐州，我不回南京。”

何应钦张了张嘴，想劝阻蒋介石，但对方盛怒之下，岂能听得进他的劝告。何不无遗憾地摇摇头，如果有加伦将军在，一定会对蒋介石的冲动据理力争，并直至说服。

但是加伦已在蒋介石“清党”前愤而辞职，他不能容忍自己跟一个革命的叛逆一起共事。加伦的价值也自他离去后蒋介石才愈益体会到，那是他所共有共事的顾问中最杰出和最优秀的。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向苏联方面要求，请加伦不计前嫌，再返中国。可惜，那时苏联已开始了所谓“大清洗”，

加伦将军榜上有名，不久即蒙冤致死。

面对着蒋介石的不理智，李宗仁也在心里大声地回答：

“若如此，彼恐永不回南京矣。身为主帅，徒逞意气，焉有不败之理。”

果然被李宗仁不幸言中，蒋介石负气来到徐州前线，指挥包括王天培第十军在内的4个军全面投入了反攻。

王天培的第十军担任左翼作战，平心而论，该部还是挺卖力的。作为贵州地方武装投靠过来的杂牌军，本来已饱受冷眼，加之王天培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一向亲密，就更遭蒋介石反感了。平日里蒋介石打量王天培的眼神，总有一股若隐若现的寒气。

第十军拚死而战，三次冲进徐州城，都因正面及右翼部队未能协助攻击，被守敌赶了出来，弄得站在玉龙山督战的蒋介石一阵兴奋，一阵失望，焦躁情绪油然而生。

他是在上海交易所闯过的，有一种去不掉的赌徒心理，他要孤注一掷来搏一回。于是下令所有预备队调入第一线作战，企图一举拿下徐州。

此举大错特错，守敌孙传芳就是要诱使北伐军与之决战。他早已藏好杀手锏，一支伏兵沿铁路线突然杀出，并佐以铁甲车助阵，直扑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卧牛山。第十军急忙调军阻击，无奈部队早已在连续攻城中锋芒尽折，心有余而力不足，战至下午，不得已撤退至霸王山一线。

王天培一退，孙传芳顺势出击，全线向南压迫。由于蒋介石将预备队都调上前线，一旦被敌突破，后继无援，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慌得他打马而逃。攻城部队陷入混乱，被条条块块地分割包围，各自为战，各觅逃路，全线崩溃之势已难于挽回。

这一败，一直败到浦口都还不了手，蒋军忙于逃命，连铁路、桥梁都来不及拆，追兵乘胜掩杀，从徐州一直杀到长江边，才悻悻然罢兵。自北伐以来，如此之败绩，如此之狼狈，尚属首次。

蒋介石脸面丢尽，羞于见人，他将徐州之败迁怒于王天培，斥之为“畏敌如虎”、“怯战而逃”。这八字评语王天培承受不起，也着实冤枉，所以他反唇相讥：

“徐州溃败时，总司令身在何处？”

蒋介石天颜震怒，太阳穴的青筋怦怦直跳，还没有人敢对他如此不恭。王天培是李宗仁前敌总指挥，干脆拿他杀鸡儆猴，一泄怒火。

李宗仁拍案而起，蒋介石杀王天培太没道理，摆明敲山震虎，向第七军示威。他与白崇禧一番商量后，决定向蒋介石摊牌。如今的桂系风头正劲，兵精将勇，李、白也都非池中之物，甘居人下，早有自成局面之想。

何应钦也被他们拉了过来。何与王天培是贵州老乡，蒋介石无辜杀王天培，让何应钦意冷心寒，害怕有朝一日也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首先由白崇禧发难。蒋介石要白崇禧部署军队准备与武汉方面作战，运筹帷幄，排兵布阵，白崇禧最擅长了。

白氏眼一白：“宁汉本一家，这种自相残杀的仗，我看不打为好。”

蒋介石怔在当场。

李宗仁接上了话：“既然汉方已经宣明分共立场，再打我们就授人以柄了。内讧一起，何以对党国，何以对人民，何以对九泉之下先总理。”

蒋介石心里呸了一口：“你们也配提先总理。”他忍住气，隐隐意识到：李、白在赶他下台了，连忙试探口风：

“好吧，二位说得也有理。徐州新败，军心不稳。这次吃亏就是没有听德邻（李宗仁字德邻）的劝告，也说明我指挥无方，众望不孚。我现在决心下野，休息一下。”

说完这话，蒋介石眼睛紧盯着何应钦，只要他挽留一下，就可以赖着不走。

何应钦偏偏把眼睛别了过去。

白崇禧轻轻咳嗽一声：“总司令应该歇一歇了。”他顺水推舟接过蒋介石的话。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上海宣布下野。

真是“世事如棋”，人算不如天算。马格斯·包尔一直等了一年半，只待蒋介石成立了南京政府，方放心地前往中国，未料到一路辗转，当“德绍”号货

轮鸣着汽笛徐徐靠上广州的天字码头时，前来迎接的朱家骅一句话让他的心凉到了冰点。

“蒋总司令刚刚宣布下野。”

犹如高山顶上失足，大江心里翻船，一向镇静的包尔也是面色惨白，他提着行李迈不动步子，不知是走是留？

望着包尔失望至极的表情，朱家骅也感到过意不去，一面招呼挑夫将包尔的行李搬到车上，一面安慰道：

“中国的事情说不准，时晴时阴，蒋总司令的暂时下野，也是权宜之计，事情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朱家骅的德语很流利，带一点柏林的土音，让包尔感到很亲切。

拉着包尔上了汽车，朱家骅又从皮包里掏出一叠报纸晃了晃：“现在要求蒋总司令复职的呼声很高，这是西北军长官冯玉祥的电报，这个人手下有几十万军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推崇总司令为‘一柱擎天，惟有公焉’。还有南京政府的敦请，表彰总司令‘身许党国，矢志靡他，务期剑及履及，照常供职，勉成大业’，敦请他‘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速回宁’。许多党国元老也表示与总司令同进退，事情仍然大有可为。”朱家骅喋喋不休。

“军队的情况怎么样，他们是否效忠总司令？”包尔打断朱家骅，他本人是崇尚武力的，深知军队的重要性。

“蒋总司令的第一军为中国军队之冠，绝对忠诚，是由他的黄埔军校学生组成，总司令下野时，他们不在附近，否则也不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包尔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他刚想触及一些实质性问题，车外一阵喧哗，摇开车窗向外望，一支穿着土黄色咔叽布的队伍正在过街。

包尔的眼光立刻锐利起来，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支军队的素质之好，远远高于他在来华前对中国军队的估计。他本来以为中国的军人只配与非洲土著作战，作战水平还停留在中世纪。现在看来，他得收回这些偏见。仅从这支队伍的行进行列观察，完全是按照当今流行的《步兵典范》，中规中矩，士兵精神饱满，兵种间的搭配也尽可能地合理，武器装备虽说比不上德国陆军，但也还算差强人意，其中还配置了不少火炮。包尔从朱家骅嘴里了解到，

这支留给他深刻印象的军队正是蒋介石的王牌二十师，是由原黄埔第一师中一个团扩编而成，正宗的嫡系。他暗暗点点头，对蒋介石又恢复了一点信心。

“这一带地面有战事？”待队伍过尽，汽车重新启动，包尔问了一句。

“真是内行。”朱家骅心里赞了一声。原来包尔注意到那些随征的大炮都卸去了炮衣，显然随时准备参加战斗。

“共产党在南昌闹了一点小乱子，其中一支正向潮汕窜逃，不要紧，我们会很快平息这场暴乱的。”朱家骅故意轻描淡写，表示不以为然。

包尔提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现在怎么办？“我可不是旁观者，旅游是塞克特将军的爱好，他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如果你们邀请我只是免费旅游，那是请错了对象。”

朱家骅咧咧嘴笑了笑：“我们当然知道塞克特将军的这种嗜好，但我们邀请他不是让他来领略东方风光，而是想借重他的领兵之道、治兵之才，既然他有许多原因而不能屈驾，和鲁登道夫将军一起推荐了包尔先生，包尔先生就稍安勿躁，英雄总有用武之地的。”

这一番话等于什么都没说，包尔不免焦急起来。

朱家骅连忙向他露了底。早几天，李济深私下里打听，蒋介石请的德国顾问是什么人？何时到？有何来头？甚至还亲自上门询问，要求朱家骅在新来顾问未见蒋介石之前，由他做东道主接待。

朱家骅不敢推诿。李济深在广州的势力，无论军政两界，都盘根错节，现在更是一言九鼎，惟我独尊。他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得罪他，立刻就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只能满口应承，一旦包尔踏上广州地面，立即带他登门拜谒。

“李济深——”包尔皱着眉头思索，在他的印象里，似乎这是个二流人物，他的军事实力并不强。

“错矣。”朱家骅连连摇头，李济深是军界前辈、粤军领袖，在广东政府，他的第四军实力最为雄厚，但此人与蒋介石不和，1924年5月，黄埔军校建成，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兼教练部主任，他岂甘屈居蒋介石之下，

根本没踏上黄埔一步。

蒋介石心胸何等狭窄，容不得李济深妄自称大，一直想着釜底抽薪，彻底搞垮第四军。当年讨伐南线土著军阀邓本殷，兵力本来已占绝对优势。蒋介石的第一军偏偏要赶在第四军身后助战，进攻海南，企图乘机将第四军驱入琼州海峡而消灭之。幸亏李济深警觉，坚决拒绝第一军助战，蒋介石阴谋才无从实施。

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在北伐军编组过程中，蒋介石利用职权之便借公行私，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全部出发，以战斗力极差的李福林第五军防守珠江三角洲辽阔地区，他的第一军只抽调两个师归王柏龄指挥，而且是作为“御林军”，基本上没打什么恶仗。李济深留守广州，主持后方工作，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他的第四军4个师中，却被调走了战斗力最强的陈铭枢的第十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只剩下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要防守的地区远及西江和海南岛一带。政治中心广州及东江、潮州等军事重镇，则都落在黄埔系重兵控制之中。比如说，维持广州治安的大权握在蒋的亲信钱大钧手里，他身兼公安局长和戒严司令两要职；黄埔军校则由刚走马上任的教育长、蒋的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方鼎英代理；另外，像海军处以及战略要地惠州、潮汕等，都是清一色的蒋派人物掌权。

李济深针锋相对，但是他的手腕更巧妙，多是因利乘便，看不出痕迹。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蒋介石麾下武将文臣个个官运亨通，与钱大钧并称“黄埔八大金钢”的刘峙、顾祝同分别当上了第一军、第九军军长，这就让钱大钧十分眼红，不仅直接向蒋介石要官，还央求李济深帮忙说情。李济深何乐而不为，把钱大钧天花乱坠地夸奖了一番，保举他为第三十二军军长。蒋介石焉能看不出李济深伎俩，但顾虑钱大钧要官不成，恐反生忌恨，咬咬牙签发了委任状。果然，就在钱大钧官瘾已尝、踌躇满志之时，李济深取消了广州戒严司令部，广州市公安局也走马换将，换上了李的亲信、第八路军参谋长邓世增，钱大钧的三十二军被指定驻扎韶关位置。

钱大钧荣升，帮蒋看守黄埔军校的方鼎英也不免心痒眼热，经过一番活

动,蒋介石不忍拂其面,升他为新编十一军军长。为扩充实力,方将素质好、装备精良的军校教导总队编入十一军,不久就全部离开广东,李济深又拔掉一颗眼中钉。

接着,他又把眼睛盯住设在广州的海军处。海军处长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林振雄,此人与海军毫无渊源,又心浮气躁,鲁莽狂妄,蒋介石刚离开广州不久,他便心血来潮,在毫无借口的情况下,突然下令所属粤海舰队升火集中省河,卸下炮衣,逼迫李济深离开广州,否则将大炮问候。李济深在广州的势力何等雄厚,林振雄的鲁莽正好让他找到借口,立即要求蒋介石将林调走,“严加告诫”。林振雄的作法也实在太过分,太露骨。蒋介石无话可说,只能再吃一次哑巴亏。

所以,现在的广东,李济深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听完朱家骅介绍,包尔来了一点兴趣,他答应见一见李济深,能让蒋介石屡处下风,此人定有不凡之处。包尔十分乐意和中国军界实力人物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华灯初上,李济深假省政府大花厅西侧包间设宴为包尔接风,广东地面上头面人物出席不少,忝做陪客。台面上水陆并陈,珍肴罗列,香槟酒冰得恰到好处,笑声起处,席面正欢。

李济深举杯敬酒,他告诉包尔,自己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也有德国教练,时至今日,记忆犹深,他对德国人战争理论之理解,工作态度之认真,战术研究之深刻,尤感佩服。

包尔含蓄地笑了笑,望望台面,太奢侈、太豪华铺陈了,德军上层人物也经常举行宴饮,但不过几道点心、水果而已。当他听说主人也曾接受过德国人的教育,不禁莞尔,恐怕他连皮毛也未学到。

从李济深的笑容看,包尔思忖,此人或许有点东方式的精明,但缺少一种骨子里的狠劲。还有,李济深言语表情间时常流露出一种对现状的满足,缺少一种开拓的侵略的精神,包尔将这种情绪归结为“不思进取”,这是很不符合德国军人口味的。

所以,当李济深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留在广东工作时,包尔沉吟着,半晌不作答。

李济深以为他在考虑待遇、报酬问题，很大方地挥挥手，转身对朱家骅道：

“好货不便宜，我建议包尔顾问的月薪按每月1000大洋发放。”

“1000大洋！”在座的人都羡慕地瞪圆了眼。按当时的物价指数，1000大洋的薪水，可以说是很不菲了。

包尔点头表示了谢意，但他以一个军人的坦率明确地拒绝了李济深的邀请：“我是应蒋总司令的要求来华的，我的职责是对整个南方革命军的武装建设进行指导……”

未等朱家骅翻译完，李济深的脸色就已经变了，看来包尔将他和蒋介石并未放在一个档次。

朱家骅下面的翻译让李济深脸色稍为平和了些：

“既然蒋总司令暂时下野，我等一时无有去处，感谢李将军的款待和尊重，我将在广东逗留一段时间，并乐意与李将军贡献自己的意见。”包尔绅士般地结束了他的谈话。

在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包尔绝大部分时间在中山大学校园里与朱家骅盘桓，耳朵却支楞起来捕捉中国的每一丝信息。最近一段时间，广州的局势十分混乱，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武装已经进入了广东境内，粤军张发奎部借口“追剿”乱军，也进入粤境“就食”，那位长得像戏子一般的政客汪精卫也带着一班人马到这里安营扎寨，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政治投机。正如包尔所评价的那样，李济深和汪精卫是朋友，和张发奎是僚属，于是依旧往来酬酢，依旧高枕无忧，殊不知，汪张联手，一场变乱发生在即。

包尔真正心烦意乱了，那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度渐渐褪了色，忍不住向朱家骅咆哮起来，如果中国局势依然一团乱麻，那他就抬腿走人。他警告说：德国所有大财团都会对你们中国人感到失望，包括那位下了野的蒋总司令，并且至少20年内，不会再向中国借一个马克。

朱家骅依然不紧不慢，他已经向蒋介石报告了包尔来华的消息，只因蒋东游日本，回信迟了些，好在这段难熬的日子快过去了。

蒋介石最近托人捎来一信函只有一句话：

“囑包上校即刻来沪。”

现在,这份信函就放在包尔的面前。

“中国有句古语,‘福兮祸所伏’,蒋总司令这次下野,安知不是他的政治策略。最近他远游东瀛,收获甚丰,日本人何等精明,为什么都表示要支持蒋总司令的政权,并答应资助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朱家骅口气里不无卖弄。

包尔的神色专注起来。

“当然,蒋总司令对列强一视同仁,他在东京宣布,准备接受任何强国的援助。果然,美利坚不落人后,也许诺全力支持蒋介石将军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朱家骅意味深长地朝包尔眨了一下眼睛,“我毕业于贵国的大学,马脱昂斯教授是我的恩师,对德国的好感不言而喻,希望包尔先生能认清形势,以德意志民族的坚韧不拔,以德国陆军的勇往直前,迈向既定的目标。”

包尔梳理了一下头上的金发,站起身来:“我可以考虑你的建议,立刻动身上路,最近容克财团给我来电,让我回国汇报情况,我打算在1928年初返德,届时,中国的情况会明朗化,以便决定我们的对华政策。”

朱家骅笑了,也站起身,凑到包尔身边,表情有点神秘:

“有一个人一直想见你,你不妨对他多用点功夫,今后会大有用处的。”

“谁?”包尔瞪他的灰眼睛问。

“陈济棠,李济深的十一师师长。”

陈济棠,这位后来被称为“南天王”雄霸一方的地方实力派如今还处于隐晦韬光的时期,他对李济深目前还是毕恭毕敬,一副忠诚模样。

包尔与他第一次见面是在那天欢迎宴会上,因为朱家骅介绍包尔不仅是军事专家,而且是个经济专家,身后有德国各大财团支持,陈济棠就有意识地多看了包尔几眼。

包尔却如芒刺在背,他感到那种眼光很锐利,很阴戾。陈济棠表面上谦谦有礼,遮掩不住内在的锋芒,那是一种霸气,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

散席时,陈济棠挨到包尔身边,摇出一张名刺,虽然只是淡淡地客套了一句,但包尔的直觉告诉他,陈济棠对他另有用心。

这天,在朱家骅安排下,陈济棠轻车简从来到了中山大学。他们的谈话安排在校长室里,朱家骅吩咐校役,任何人不得打扰。

陈济棠大马金刀地坐在上首,目光如炬。

朱家骅安慰他,包尔先生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妨直言。他早已看出,陈济棠非寄居人下之人,有自立局面打算,因此早存了拉拢之心。今后蒋李争雄时,也算事先安插在李济深身边的一颗棋子。

陈济棠缓缓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仔细地打开来,向前推了推,示意包尔看清楚。

包尔的灰眼睛放出了光彩。陈济棠放在桌上的东西他如何认不出,那些都是德国军火上最不可或缺的稀有贵金属,其中尤以钨、锑、锰最让人垂涎。看来陈济棠确实不同于一般军阀,他懂得什么最能打动德国人的心。

“您怀里揣的是金子,有了它您可以随时换取我们的任何帮助。”包尔的喉咙有点发干,他迫不及待地作出承诺。

“见利忘义。”这下连朱家骅对包尔也不满了,区区的几块黑矿石就让他忘了雇主的利益,他咳嗽一声,一语双关:

“据我所知,这些稀有矿产并不集中于广东,它们的主要产地分别是在江西、湖南、贵州,当然了,广州作为最大的输出口岸,地位十分重要,但广州现在的主人是李济深总参谋长,能否优先供应德国,还要得到他的首肯。”

包尔听出了朱家骅的意思,光是他和陈济棠的一厢情愿还是不行。

陈济棠更是懂得这弦外之音,这是挑拨他和李济深的关系,鼓励他另立旗帜,将广东建成一个归顺中央的藩镇。

于是,他答非所问,对朱家骅拍着胸口保证:“请转告蒋总司令,济棠翘首以盼总司令尽早复职,并矢志效忠中央,一切惟总司令马首是瞻。”

朱家骅心领神会:“我会转告总司令的,今后广东方面的事,还望陈师长鼎力相助。”望望周围无人,湊上前去,“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与总司令有

蒋介石◎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隙,我担心他扣住包尔顾问,你能否安排一下。”

陈济棠不在乎地一摆手:“区区小事,理当效劳。”告辞前,他没忘记与包尔打招呼:

“后会有期。”

包尔用力地点点头。与其说是陈济棠,不如说是那几块黑矿石,让他不能忘怀。

5

包顾问逃出险地 蒋介石一见倾心

1927年12月1日下午，上海大华饭店，军乐喧天，冠盖云集，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婚礼在这里隆重地举行，新郎是已经跨过不惑之年的蒋介石，新娘宋美龄的年龄在当时是国家级机密，但后来人准确地考证出她当年正是30岁。按当时婚嫁的时俗来看，30岁当然属于大龄女之列了。

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把披着婚纱的宋家小妹交到蒋介石手里那一刻，标志着中国买办财团与军事独裁者结合的完成，标志着帝国主义、官僚买办与新军阀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难怪蒋介石红光满面：

“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

现在的蒋介石，正在走向他人生的巅峰，已不复3个月前下野时的狼狈、失意，要求他出山的呼声排山倒海。为了巴结这位即将重出江湖的独裁者，各级要员、各路诸侯，如过江之鲫，纷纷来参加婚礼，馈赠的贺礼堆积如山，琳琅满目，除李宗仁外，连一向恨蒋入骨的第六军军长程潜都不能免俗。

在所有的礼物中，蒋介石最满意的还是朱家骅从广州给他送来的包尔上校。

包尔上校前几天刚踏上上海码头，当他出现在蒋介石客厅时，不禁让主人大大为感动。

一向注意仪表的前德军上校居然一脸憔悴，眼睛泛着血丝，原本光洁如

滑的下巴如同雨后的泥泞，胡须杂乱丛生，笔挺挺的西服打上了褶皱。蒋介石惊问何故，原来包尔临行前，恰好张发奎及部将黄琪翔联合汪精卫一班人马在广州向李济深发难，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张黄事件”。

暴乱发生时，包尔的下榻之处中山大学也受到了波及，幸亏与陈济棠有约，一队人马保护着包尔和朱家骅才匆匆赶到码头，随便搭上一艘去上海的货轮离开了广州。

蒋介石一阵感动，“板荡识诚臣”，包尔是在他最失意的时候来华的，并且拒绝了李济深月薪1000大洋的诱惑，义无反顾地来上海投奔他。望着包尔疲惫的神色，蒋介石连忙派人领他梳洗更衣。

包尔换装之际，蒋介石坐在客厅里耐心地等着，他有太多的问题要请教了。早在他日本留学期间，就对德国首相俾斯麦在统一德国过程中所奉行的“铁血政策”以及稳重沉着干练的作风十分佩服，这很符合他倔强固执的性格，所以曾两度寻机赴德留学，并下了一阵苦功学习德语，可惜这门语言太晦涩、太拗口，蒋介石没有学习语言的天才，悻悻然半途而废了。

沉思间，包尔已经焕然一新地站在蒋介石面前。“真是德国军人的典范。”蒋介石心里喝了一声彩，包尔的身躯如标枪一样笔直，勃发着军人的英武，着装整洁，动作果断，用语准确，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了军人的整齐划一，有条不紊，严谨刻板。

蒋介石问：“包顾问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包尔答：“中枢无力，群雄并起，以下犯上，干弱叶盛。”

蒋介石肃然起敬，站起身来，绕过桌子，走到包尔面前，激动地握起拳头。他觉得包尔字字珠玑，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弊病，解决以上诸问题，正是能否建成以他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关键。

“日尔曼民族在中世纪之所以不能与英国、法国诸强争雄，就是因为诸侯分裂，大小公国星罗棋布，分散了民族的力量，直到俾斯麦首相的铁血政策削弱群雄，统一德国，才有了后来的强盛，这一点，总司令可以借鉴。”

蒋介石听得眉飞色舞：“接着说，接着说。”他连连催促着包尔。

“贵国的历史也有相同的例子，汉王朝有一位叫做晁错的大臣，著有一篇名文，谓之《削藩策》，我们德国也有他的译文，总司令一定详熟。”

精通历史的蒋介石对这段历史自然不陌生。西汉初年,为巩固政权,刘邦实行分封制度,延至文景时期,诸侯王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如当时著名政治家贾谊比喻的:“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失今不治,必为锢疾。”这种状况,汉景帝时期更为严重,故有御史大夫晁错“患诸侯疆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向景帝上了《削藩策》,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势力,以为“不如此,宗庙不安”。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进行削藩。吴王刘濞为首,借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景帝被迫将晁错“衣以朝衣,斩东市”,叛军不仅不退兵,反而公开争夺皇位。景帝遂以武力镇压,大破叛军,七国都被废除。以后,历史上将皇帝削弱地方实力,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的措施称为“削藩”。

没有人比蒋介石对这段历史体会更深了,那一出“逼宫戏”犹在眼前,但他却一时无以应对。不要说李宗仁尾大不掉,其他多路诸侯,哪一个不是骄骛难羁,目高于顶,如冯玉祥,如阎锡山,如李济深,枝强干弱的局面早已形成。

至1927年底,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阵营中,军队人数近200万,达80个军左右,形成五大军事集团,即蒋系、桂系、冯系、阎系、粤系。其中蒋系虽略微占优,但绝对经受不起其他派系的联手一击,政学系老牌政客、蒋介石首席智囊杨永泰就看出了这层危险,提出裁兵减政,以巩固中枢,其实,这也是“削藩策”。但杨永泰文人出身,不谙军伍,拿不出具体办法,因此总有隔靴搔痒之感,蒋介石希望包尔能以内行人的眼光为他找出一条可行的通道。

“视武力为倚恃,视军队为生命,这是中国军人之通病,让他们裁军,难于登天。如果没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搞急了,恐怕内乱即起,大祸将至。”蒋介石忧心忡忡。

包尔拍拍椅子的扶手:“贵总司令忧虑的是,所谓裁军,当顺天时,合民意,现在尚在南北政府交战期间,当然无从谈起,必须等到中国统一之后,届时以舒解民困为理由,施行化兵为工之政策,谅任何人也找不出反对的借口。”

“好一个‘化兵为工’!”蒋介石豁然开朗,他转向朱家骅,夸奖道。包尔上校给他的印象甚佳,他决定正式聘请。

他问包尔，来华工作有什么要求。

朱家骅插嘴道，李济深也很欣赏包尔，并答应以月薪1000大洋为条件。

蒋介石不以为然：“我们绝不少于李济深给的数。”

岂知包尔摇摇头：“我不是为钱来华的，我的目的是德中利益的共同发展。再说，我领了薪水，就有顾问名义，这将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朱家骅连忙向蒋介石解释了《凡尔赛和约》的有关规定。

蒋介石又一次大为感动。在他接触的洋顾问中，追名逐利者甚多，没有包尔这样超脱的，这样以国家利益为上的，这样富有个人牺牲精神的，他在心里认定：包尔是他“惟一的欧洲朋友”。

这样的谈话前后持续了一周，每一次都是那样的融洽，那样的相见恨晚。谈话的内容无所不包，为了帮助蒋介石建立起独裁政权，包尔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验，建议在中国进行“造神”运动，推崇权威，迷信权威，“没有偶像的国家，是松散的国家”。必须对出版、广播、电影等大众传播媒介实行统制；同时控制经济，按公司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的发展；预备着手对军队的复员与重组……包尔滔滔不绝，要言不烦，蒋介石听得喜不自胜，神情恭敬如初入学堂的小学生。

“介石虽然现在仍是在野之身，但复职出山也就是这两日的事，扫荡北地，统一中国也是指日可待，烦请顾问先生未雨绸缪，为介石拟定一个全面计划，则中国幸甚。”

包尔点点头，这是他分内事，当全力以赴。

朱家骅在旁捅了捅他，最近又接到马脱昂斯教授的来信，请朱帮助包尔让德国财团尽早打入中国市场。现在乘着蒋介石心情好，应该及时提出。

蒋介石注意到了这个小动作，眼睛立刻警觉起来，他不允许有任何事情瞒着他。

包尔兜了一个大圈，漫不经心地说，他在广州曾见识过蒋总司令的队伍，以中国的标准来说，应该是很优秀的。

这句评价很复杂，蒋介石来了兴趣。

“看得出训练有素，精神饱满，士气高昂，这是蒋总司令治兵有方。”

蒋介石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恕我直言，贵军的装备至少落后世界20年，那些少量的苏式或日式火炮已属于淘汰产品，即使较之于大战期间欧洲军队也有不如，现代化的战争将是立体战争，大战末期，飞机已经投入了战场，对铁甲车战术的运用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包尔的灰眼睛里闪耀着狂热的光芒，忍不住向蒋介石透露道，根据他的消息，德国国防军司令部绝密计划，要求德军将在今后10年内武器装备达到一个标准，即在未来大规模战斗中，每一个独立建制必须配置150架飞机，并可以组成50辆坦克的方阵，给对方作战单位施以绞肉机式的毁灭性打击。“这就是现代战争的方向。”他竖起一个指头晃了晃。

蒋介石怦然心动，如果他的军队也达到如此的装备，在中国争雄逐鹿，焉有对手。

“德国西门子公司的军用通讯设备，克虏伯集团的大炮、火器，容克公司的飞机制造，在世界上素有盛名，总司令若有意将中国军队建设成现代化武装，本人愿意引荐。”包尔盯紧了蒋介石。

“很好，很好。”蒋介石稳稳地落在座椅上，他明白包尔在向他推销德国军火，这本来就是两厢情愿的事，所以他很爽快地答应马上物色人选，组成代表团，由包尔协助，尽快与德国方面建立起全面的联系并加强合作的深度。

月过中天，曲终人尽，婚礼一结束，蒋介石携新娘宋美龄连夜驱车，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千丈岩下，飞瀑倒悬，妙高台上，指点江山。1928年1月2日，他再次接到南京国民政府电，内称：

“自兴师北伐，执事受命统军，勘定东南，威加河朔，大勳克集，何异方殷；乃以贤劳自请引退，暂事休息，未遽坚宿。现值战局扩张，岂能久事逸豫，应即旋都复职，共竟革命全功。贵总司令许身党国，必有以赴中枢付托之重，慰国人喁喁之望也。”

蒋介石奋袂而起，于千呼万唤中终于重新走出山明水秀的溪口镇，2月2日至7日，由他一手把持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如今，他不仅官复原职，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并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对中

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负其责任”。

重新上台伊始，蒋介石即宣布举行“第二次北伐”。元月9日，在其“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中，他宣布：

“中正……秉承中央，齐一军令，集中力量，务于最短期内……歼灭奉鲁军阀，实现总理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

战事异常顺利，国民革命军组成四个集团军，近百万之众，分由津浦路正面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井陘、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奉系控制的冀、鲁、察三省腹地。至1928年6月，数路大军会师于北京城下，3日，张作霖黯然踏上出关列车，北京城不战而下，城头上飘扬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7月6日，蒋介石偕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至北平西山碧云寺祭灵，以告慰孙中山于九泉。

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停厝之所在。自7月6日晨起，人山人海，大门外汽车已无处停放，冠盖云集，祭者不绝，花圈、花篮如云堆浪涌，簇拥在灵塔之前。

蒋介石三天前就住在寺内含育舍，一表对孙中山怀念之情，另外也有示自己为先总理继承人之意。

这一日，他闻鸡即起，澄心静虑，一枝楠香青烟袅袅，如若拜佛参禅，等候着祭典的开始。

8时20分，在悲沉雄壮的军乐声中，蒋介石身着黄色中山服，灰蓝色布裤，打着裹腿，足登皮鞋，满脸威色中遮不住一丝大功告成的得意与自信，缓缓走向祭塔。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紧跟其后。

蒋介石的步子迈得缓慢而从容。犹忆当年北上，恍如昨日，风风雨雨北伐路，竟让他整整走了两年，其中之曲折、艰辛，惟有心知。

灵台就在前面，蒋介石拾阶而上，路还有多远？伸展到何方？他的眼睛默默地向前望去，奉系的东北军仍虎踞关外，东北尚未归于国民政府辖下，张宗昌的残部仍在滦河一带负隅顽抗。但这些他不担心。7月1日，少帅张学良已发表声明，声明绝不妨碍国家统一。如今双方信使来往，显然东北已无用兵必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于白山黑水为时不会太远（该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奉、吉、黑、热四省自当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至于张宗昌，更不足为患，他已布置白崇禧、商震等将领各率所部，联合

围剿,不愁不灭此獠。对此,蒋介石胸有成竹。

让他真正担心的,是现在紧随他身后的冯、阎、李三大派系巨头,他们现在已经羽翼丰满,功高震主,一场新的战争必将难免。

除此之外,他还有忧虑。曾是北伐战友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他的突然打击下遭到重创,但中国共产党的能量他清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今,大江南北,共产主义的革命之火遍地燃烧,工农运动依然没有沉寂,中国大地上依然蕴藏着令他害怕的力量。

蒋介石一步步地向前走去,他在乞求孙中山的在天之灵,庇佑他能永远顺利地走下去。

祭典开始了,哀乐阵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恭敬而立,行礼如仪。阎锡山手下大将商震代读祭文,一阵阵沉雄的声浪回旋在碧云寺上空。

商震代读的祭文有两篇,一篇以中国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名义,一篇以蒋介石个人名义。蒋氏的个人特殊化处处有所表现,这也正是他的用心与目的。

蒋介石抚棺而哭,泣不成声。

这哭声,有真诚的怀念。自从1924年12月13日与孙中山黄埔一别,便与先生永诀,就此音容两渺茫。想起孙中山对自己扶掖期待,耳提面命,蒋介石悲由心来,哀痛不能自胜。

这哭声,也有炫耀之成分。“本党……征诛用肃,主义遐宣,遂一中国。革命兮将成,国本兮将复;八表沉霾兮,至此一豁;海宇震其奋进兮,旷前史而烨烁。”这自然是蒋总司令的功劳了。

这哭声,也有杀伐之音。祭文中,对反共、反俄,已直言不讳;对削藩、排异,已隐约有指,“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自意白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

太阳已经爬上了半空,阳光斜刺里洒下,蒋介石没完没了地哀嚎,终于让人们不胜忍耐,冯玉祥拭着泪走过去试图扶起蒋介石。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长相十分孔武,庞大的身躯像

一堵移动的墙，周身线条如刀雕斧劈般粗犷。此人由一介行伍至开府封疆，当有过人之处，特别善于夹缝中求生存，利用各种矛盾求发展，所作所为及行事方式颇遭时人争议，曾以40字赠之：

“一信基督，二联俄共，三次逼宫，四次革命，五原誓师，六月反共，七驱老于（右任），八结中正，九存阴险，十分活动。”

其中有褒有贬，除说他“阴险”有恶意攻击之嫌外，其余均是事实，尤其最后一条，对冯玉祥最近的表现，刻画得十分形象和传神。

冯玉祥活得真累，他的潜在敌人太多，但目前首先要对付阎锡山。当年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西北军兵退西北，阎锡山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突然出兵，隔断西北军河南与直隶间的联系，冯部之韩复榘、石友三、陈希圣等部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委曲存身，被阎锡山一股脑兼收并蓄，讨得不少便宜。

落难之中的冯玉祥记住了这笔账，两年后东山再起，与阎锡山又成了盟友，双方在方顺桥对奉系的那场战斗中，冯玉祥突然想起两年前那笔旧账，在战斗最吃紧之时，司令部将韩复榘撤离阵地，给晋军背后留出一个绝大的缺口，如果不是白崇禧及时增援，后果不堪设想。

冯玉祥对蒋介石也有不满。这次战争，他的二集团军出力甚多，收获甚少。唾手可得、令人垂涎的京津地区被蒋介石劈手夺去而赠给了阎锡山，以致冯军抵北京而不得入。

但是，冯玉祥咽下了这口恶气，目前他还打算与蒋介石闹翻，还打算拉住蒋介石，以压迫阎锡山、李宗仁，形成冯与蒋共天下的局面。

伏在棺前的蒋介石已经哭得发昏，没有理会冯玉祥的搀扶，一甩手，又扑倒在灵前。

从内心言，蒋介石早对冯玉祥起了厌恶警戒之心，二集团军发展迅速，其兵力与一集团军不分轩輊，并拥有甘、陕、豫、鲁数省，已经形成了与他抗衡的能力。之所以将京津地区交给阎锡山，就是“扶弱抑强”之计，就是想对冯玉祥有所控制，有所压迫。

就在蒋介石甩开冯玉祥搀扶的时候，站在稍后的阎锡山嘴角露出一丝讥笑，“自取其辱。”他心里哼了一声，冯玉祥此举的用意不外乎突出自己，表现他与蒋介石非同一般的僚属关系，显出比其他集团军总司令高出一头。殊

不知,蒋介石最讨厌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他称兄道弟。

阎锡山,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商人出身。他是以前商人的精明来从事政治的,此次北伐,数他收益最多。参战虽迟,但蒋介石却把最大的一块糖果——京津地区分配给了他,真是一份不薄的人情啊。

阎锡山是见过大世面的,没有因此而受宠若惊,他能看透蒋介石的用心,所以也并不领情。现在的阎锡山,还没有体会到蒋介石的厉害之处,这位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自称平生除袁世凯外,余者皆不足为惧。袁氏一死,即乘时而起,有了争雄天下的打算。刚才看到冯玉祥欲和蒋介石套近乎,顿吃一惊,“绝不能让他们联起手来”。他暗暗定下计策,今后的侧重点,就是离开蒋冯关系,以蒋压冯,以冯牵蒋,审时度势,见机而作。

在所有参加祭典的人中,惟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一滴泪未流。他觉得对孙中山的怀念和哀悼不在于形式,因此对蒋介石的做作,对冯玉祥、阎锡山以及其他人的频频拭泪视为矫情。他的脸色很沉重,如凝霜一般,自从蒋介石复职出山,他就知道今后少不了有小鞋穿。果然,就连这次参加祭典,蒋介石也想撇开他,一直未予通知,一直想生出点事端的冯玉祥乘机发出邀请,让蒋介石顿时处于尴尬境地。

蒋介石的脸色变得也快,一面暗骂冯玉祥居心叵测,一面带着人从南京乘军舰逆流而上,来到李宗仁驻地安庆,邀其同赴北京。面对蒋介石的笑脸,李宗仁心里阵阵发寒,惕然自警,理解到了笑里藏刀的含义。今天他参加祭典,那脸色和心情是一样的沉重。

泪眼婆娑中,蒋介石依稀读出了这几大军事巨头表情的变化,依稀听见了他们各自的咬牙切齿声,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口袋,那里面正装着由包尔上校设计的,对付他的新一轮对手的锦囊妙计——《军事整理案》。

6

陈仪出访德国 打开外交绿灯

出西山碧云寺,大约一箭之遥,就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住宅。傍晚,各大集团军巨头和来参加西山祭典的政客,已团团坐在李宅的客厅,每人的面前放着一份《军事整理案》,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包尔的杰作。

包尔是在1928年初返回德国的,他已经看准,重新出山的蒋介石必然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德国已经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与南京政府合作,不用担心投资得不到回报。

与来时的孤寂相较,包尔返德时的声势就大多了,一个具有相当级别的中国代表团和他一起踏上了旅程,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蒋总司令的浙江老乡、日本士官学校校友、中国军界知名人物、时任十九军军长、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的陈仪。

陈仪不是一介武夫,他留过洋,见多识广,阅历丰富,素有“儒将”之称,他了解《凡尔赛和约》的内容,很担心德国政府对待中国代表团的態度。因此,他专门拜访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迪尔,向他探询中德合作的可能性。迪尔沉思片刻,命人端来咖啡、点心招待来客。

陈仪心不在焉地吃了两块点心,坚持要迪尔作出明确的答复。

迪尔为难地咂咂嘴,承认说:

“德国因受凡尔赛和约限制,无法公开表示愿与中国进行有关军事等方面的合作。”

“谢谢领事先生的坦率。”陈仪起身打算告辞。

“但我们可以找个变通的说法，”迪尔伸出手希望陈仪耐心一点，“中德间正常外交公务访问不可因此而受到伤害，自然也不在限制之列。”

陈仪心领神会地笑了一笑：“只要贵国政府便于接待，一切变通都可以见机而作。”他皱了皱眉头，蒋介石一再嘱咐他再物色一批有经验的德国军事人员来华工作，这可不是随便找个理由能蒙混过关的。

迪尔也不敢作主，只能答应：“愿先向柏林请示才能决定聘请德国专家来华之事是否可行。”

带着这份担心，陈仪又找到了蒋介石，蒋倒没有为难这位日本士官学校的师兄。“德国人严谨有余，灵活不足。”他批评说，递过一纸信函，“带上它，也许能帮助你们在德国的活动。”

这是蒋介石亲笔写给德国外长史特莱斯曼的，文曰：

“史特莱斯曼外交总长阁下：中德外交，素称揖睦，本司令切愿向有之睦谊，因两国人民之合作与同情日加亲密。现敝国国民革命将次成功，亟欲并合中外文化之特长，以促成革故鼎新之伟业。素仰贵国礼乐之文化与新近之发展，于敝国建设事业可资以借镜者必多。兹特遣考察委员长陈仪、委员李薰、胡庶华、项德方等前来贵国实地研究，并饬携函趋候起居，藉承领导，诸希与以方便，无任感荷。”

1928年4月底，陈仪率中国代表团抵达德国，他们负有两项使命，一是为吸引德国大企业与财团加入中国经济复兴进行全面接触；一是聘请德国顾问，尤其是军事顾问来华为蒋政权服务。

包尔前后张罗着，陪同陈仪一行在德国进行了广泛的活动，他们考察了德国著名大企业克虏伯、西门子、比埃尔—伊法等大公司。站在克虏伯组装车间，陈仪瞪大了眼睛，20年前他到过日本，见识过一些近代化的生产规模，那时已让他咋舌，但与今天所见，又不可同日而语。高大的吊车穿梭运行，自动装配流水线有条不紊，比儿童拼积木还简单，转眼间，一门门大炮出现在眼前，一辆辆坦克定了型，一挺挺机关枪排列成行，“把这些十分之一给中国就行了。”他羡慕地想。

于是，他慷慨地敞开了荷包，第一批定货就价值100万马克，足够6个师

的装备之用。德国大老板和包尔眉开眼笑，他们端来点心，热情地拍着陈仪肩膀，抢着推销自己的产品。

克虏伯集团许诺：保证为中国提供全套兵工厂设备。

比埃尔—伊法公司拿出帮助中国发展通讯事业的计划。

容克公司推出了他们制造的新型飞机，虽然包尔知道那不过是库存积压，但并不说破，他欺陈仪不懂行。

总之，是皆大欢喜。

兴登堡总统也接见了陈仪。这天他的心情很好，有点饶舌，喋喋不休问了陈仪许多无关痛痒的问题。陈仪摇摇头，想起中国一句老话：“廉颇老矣。”威名赫赫的兴登堡似乎已不复往日的精明和强干。

陈仪向兴登堡转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有语曰：“通过彼此间日益增长的同情与合作，中德友谊更加密切了”，希望在与德国的合作中，“把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因素融为一体”。

兴登堡手一挥：“德国陆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你们总司令应该以它为楷模。”他全然忘了《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忘了两年前他曾明确拒绝马脱昂斯教授向他提出派遣德国顾问去华工作的建议。说实话，他的头脑已经糊涂了，人们也是听听而已。

果然，德国外交部依然明确地回答包尔和陈仪：按照德国目前形势，派遣军事顾问赴华，多有不便。外交部长史特莱斯曼不满地瞪了包尔一眼，那意思是：你还要添什么乱。

包尔挺直的身躯矮了矮，他知道自己的名声在政府中很不佳，因此有点心虚，神色中也带上了谄媚，他表示对德国政府的立场完全理解。随即转过身向陈仪解释，以自己为例，像他这样既没与中国政府订立服务合同又没拿中国一分钱薪水的人也可以为中国政府服务，只要不以“军事顾问”名义出面，一切均可变通办理。

他劝陈仪尽可以放心地回国，他本人则在德国再呆一段日子，落实好聘请顾问一事。

临行前，包尔与陈仪有一次长谈，他递过一个信封：“总司令曾与我讨论过编遣中国军队的问题，从最近报导的消息看，取得战争胜利的日子随时会

来临,这个问题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了。我的一些想法、建议都写在信上,给总司令参考。”

回国后,陈仪将德国之行向蒋介石作了汇报。

汇报结束后,陈仪仍然不走,吞吞吐吐似有话说。蒋介石奇怪地望了他一眼,心中陡然明白过来。

这一次,陈仪在德国订购了6个师的武器装备,他想留一点加强他的十九军。

蒋介石连忙封住他的嘴,南京刚刚定为首都,治安问题尤为重要,他打算建立一支警察、宪兵队伍,从德国进口的这批装备已经派上用场了。

陈仪悄然退出后。蒋介石反复把玩着包尔的来信,不禁佩服德国人做事之认真,踏实,缜密。“人才难得啊。”他感叹了一声,更坚定了从德国引进军事顾问的打算。

包尔的信围绕着蒋介石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即军队的复兴与整编,指出现在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时候。

离南京前,他找来财政部长宋子文,宋子文长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民政府财政支绌,已有难以为继之虞。

“全国共有84个军,272个师,18个独立旅。全年经费,照目前编制,经常费共需5亿4千6百万元,临时费共需9600多万元,而全国每年实收入4亿万,加上新税也只能收入4亿5千万元。”

这么大的窟窿哪里去补?难怪宋子文整天呈焦头烂额状。

蒋介石默默递上包尔的信,宋子文眉头顿时舒展,连称包顾问有眼光:

“自我重新厘定军制,大加裁汰,实无以苏民生之积困。”宋子文念着包尔的信,一拍手,“内战连年,民心思定,我们就以恢复国家元气为借口裁军减军,谅也不会落下别人攻击的口实,理直气壮得很。”

“接着看,接着看。”蒋介石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包尔确实有魄力,有胆识。信中,他提出了三期裁兵的建议,第一期:准备;第二期:旋行裁减半数;第三期:截至50万人。

现在,蒋介石就按照包尔的建议,试探着走出了第一步。

客厅里鸦雀无声,人人都埋首于那份《军事整理案》,该案提出:现在全

国有300个师，准备裁汰250个师，留下50个师，准备每集团军留8师至10师，中央另建宪兵10师。

这分明是弱枝强干。按照这一方案，蒋介石至少可以控制20个师，所有人对这一点都洞若观火。

一阵难堪的沉默，冯、阎、李三大军事巨头眼观鼻，鼻观心，他们不准备贸然肯定或否定，因为他们还没有成熟的对策，还没有私下达成交易，结成联盟，弄不好就成了众矢之的。

蒋介石一脸严肃，仿佛正义在他这边：“本党为解放民众而革命，破坏期间，民众已饱受不可免之牺牲。军事既终，若于军队问题无适当之解决，不独国家财政，不胜巨额军费之负担，人民膏血不能再应无量之供求，而以200万少壮同胞之劳力，悉令弃置于不生产之军队生活……倘若实行裁兵，望国内军阀之觉悟，化兵为工之政策，博大仁慈，昭垂天下。今北伐完成，久困之民，渴望天日，值兹更始之际，合国防计划与兵工政策为整个之计议，确定兵额，分别裁留。以裁兵者强兵，且以裁兵促全国庶政入于正规，此实千载一时之良机也。吾国之苦兵祸久矣，惟贯以革命之精神，及可望彻底之解决。”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与会者的确难以反驳。

见大家不吭声，蒋介石放缓了一下语气：“既然诸位没有意见，就请签字吧。”

西山会议只是个预备会，正式的编遣方案还得1928年底在南京正式讨论决定。11月中旬，蒋介石望穿秋水终于盼来了包尔。

中国代表团离德后，包尔一直加紧活动，为德国军事顾问进入中国打开通道。

物色人选比较容易。包尔原来就在德军参谋本部工作，人头很熟，加上鲁登道夫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名单：

 退任陆军少将顾德威，战史专家，他的肚子里装满了经典之战。

 退任陆军中将林德曼，军事后勤专家，中国人现在还不理解现代战争后勤的重要性，需补上这一课。

 麦次纳博士，化学及毒瓦斯专家，化学战将在今后的战争中变得举足轻

重,把麦次纳这样的人才送到中国,真有点舍不得。

冯·克莱特纳尔,警备专家,那位中国的蒋总司令应该建立起一支效忠于他的卫队,他会发现冯·克莱特纳尔先生在这方面是个高手。

柯纳上校,这位来自汉堡的英俊军官对宪兵的训练很有一套。

汪根海姆少校,炮兵专家。

赖特上尉,很不错的飞行员,他可以帮助刚刚起飞的中国空军。

恺培尔,地质学家。

奥托,统计学家。

甘蒂尔,建筑学家。

舒巴特,都市规划专家。

……

我们不能仅向中国输出军事人才,还要搭配一些其他方面专家,否则国际社会会指责我们在贩卖战争。

鲁登道夫很快活地抽起了雪茄,他为昔日的部下又派上了新的用场而感到安慰。

德国外交部却给包尔和鲁登道夫迎头一盆冷水,严禁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说实话,他们讨厌包尔和鲁登道夫之类的战争狂人,就是有他们这群人在,德国的战争狂热开始死灰复燃,德国外交部已经饱受国际社会的责难。

包尔不是轻易放弃的人,再说此事已经万事俱备,只等德国方面放人了。

思前想后,包尔意识到只有借助中国方面给德国施加压力了。不久,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奉南京国民政府电令,继续与德方交涉,要求聘用一批德国退伍军官来华充当军事顾问,协助中国重整陆军的计划。

包尔被请到了德国外交部。接待他的第四司司长陶德曼一反往日的粗暴和傲慢,很客气,很热情,反反复复打听包尔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包尔心中有数,微笑不语。

陶德曼终于耐不住性子,拿出一份电文。在这份电文中,中国方面口气强硬,郑重地警告德方,如再不同意,则中国将改聘法国军官。

收到这份电文时,德国外交部一片哗然。法国乃德国宿敌,现在中国远

德而近法，自然引起不安。于是有人批评道，德国外交政策太保守，太刻板，就像80岁的兴登堡总统一样老朽昏庸。

史特莱斯曼外长知道这是包尔的花招，指令兼管亚洲事务的陶德曼在接受南京首任驻德公使蒋作宾呈递国书时，核实中国政府的真实用意。蒋作宾十分肯定地告诉陶德曼，中国方面绝不是虚声恫吓，蒋总司令的态度在历次指示中已经很明确。

陶德曼为难地叹了口气，提出变通办法：既然中国非请军事顾问，能否照顾德国的面子和利益，从荷兰或瑞士物色人选，只要不用法国人就行。

蒋作宾拱拱手，表示歉意：“中国政府只愿聘请德国顾问，因为惟有德国顾问方可赢得中国政府的信心。”

中国人的固执，让德国方面进退两难。“包尔这家伙向中国人施展了魔力。”陶德曼耸耸肩站起了身，表示送客。

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请来了包尔，希望找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可以让中方保证德国顾问在华将纯粹担任军事学校教官职务，而不服务于军中，并开列一份拟聘的名单及拟授职务，尽量采用不张扬的形式，避免国际社会干预。”包尔答道。

陶德曼频频点头，心思略动。

包尔乘势又加了一把火：“《凡尔赛和约》是一副镣铐，如果我们不试图冲破它，德国总有一天会窒息而亡。”

“好吧，我跟史特莱斯曼外长说说。”陶德曼终于松了口，“记住，千万不要替德国惹出麻烦。”他一再地叮嘱着包尔。

“大功告成。”向来冷静的包尔在心里暗暗欢呼了一声。现在，他已成为中方在德国的代理人，为了统一中方对德接洽途径，包尔还建议在中国驻柏林公使馆内设立一个商务专员处，统一管理中方购买军火、工业品及物色德国顾问事宜。这一机构并不受中国外交部管辖，而直接为军方控制。商务处第一任商务专员是获得过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又留学德国研究数学及弹道学的著名兵士专家俞大维。不久之后，俞氏回国，由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子谭伯羽接任此职。柏林中国使馆商务处从此成为中德经济与军事合作的桥梁。

1928年11月，经过中德双方反复协商，终于组建了一个德国顾问团。在

包尔率领下，顾问团启程来华，包尔于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所聘第一位德国顾问负责人。

德国顾问团的在华使命由此拉开序幕。由于国际社会对它的诸多警惕、限制，所以顾问团的工作只能遮遮掩掩，犹如藏在黑暗中的利剑，犀利、毒辣、凶狠，却时时掩饰着锋芒。

第一任德国赴华顾问团共有团员25人，其中10人是军事训练教官，6人是军械与物资补给专家，4人是民政警事顾问。包尔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

南京政府对德国顾问团的到来给予了热烈的欢迎。蒋介石特别举行了有政府各部门主管官员参加的盛大欢迎宴会，觥筹交错，竭尽宾主之欢。席间，蒋介石特别指示政府各机关尽力配合顾问团的工作，并给予各顾问优厚待遇。包尔总顾问除由中方免费提供食宿汽车及司机外，每月发给薪金1400元，合3920马克。“我们是中央政府，总不能低于李任潮（济深）的数。”蒋介石手面一向阔绰。

包尔的两位助手史脱次纳中尉和胡默尔少尉月薪则分别为500元和400元，而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德国地质学权威月薪也不过600元，按当时的中国物价指数，维持一个5口之家的中等生活水准，一年有300元已经是富足有余。为解决译员不足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公开登报招聘50名德文翻译分配给顾问团使用，难怪包尔上校声称：“对南京政府的接待，甚为满意。”

来华初期一段时间里，包尔在毕业于德国陆军某大学的李鼎将军陪同下，对上海、武汉、南京一带进行了数月的考察访问，其目的在于了解中国的军事、经济状况与发展潜力。在他回到南京后，就迁入了南京政府特别为他设立的办公室，着手整理考察期间所搜集到的资料。之后，他撰写了多份研究报告及备忘录，呈送给蒋介石，就中国军队的裁减、重建、整训及经济的发展，重工业、航空运输业、农业、矿业的建设及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等多方面的内容提出一揽子建议与意见，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与赞赏。包尔经常与蒋会见，交往甚密，这一切甚至引起了德国驻华大使馆一些官员的嫉妒与误解，认为抢了他们的风头，有越俎代庖之嫌。英法舆论则指责包尔来华是为了帮助蒋介石重建军队，违反了《凡尔赛条约》。

随同包尔一同来华的其他德国顾问，也纷纷投入了中方为他们安排的各项工作中，警方顾问克莱特纳尔被分配到杭州浙江省政府担任警察顾问，已经初露锋芒的戴笠几次登门拜访，请教特工工作经验；普鲁士农业部高级官员桑梯尔博士任农业推广与移民政策顾问；德国经济部高级顾问舒伯特博士负责都市行政发展与计划；汉堡军官柯纳上校和文德少校及来自萨克森的古希上尉充任国家安全、宪警训练及陆空交通管制方面的顾问；汪根海姆少校还是干他的老本行，任中央军校及炮兵部队教官；赖特上尉、魏克斯波斯基及汉赛尔工程师参与中国空军建设工作。

在蒋介石主持下，包尔每周五晚在南京三元巷总司令部内为中方高级官员进行一次讲演，讲课内容包括军事工业、新式武器及化学战等，共进行20余次。包尔本来就是参谋出身，讲课尤为擅长，深入浅出，娓娓而谈，对过去战争的总结、对现代战争的趋势，分析归纳得头头是道。听他讲课的，除蒋介石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以及各军事院校机关、一些部队的高级军官，连素称“知兵”的小诸葛白崇禧偶来京师，也不漏过，连称包尔的讲课“有味道”。

将冯玉祥等各实力派首领调到南京，也是包尔等人的主意。返华后，他与蒋介石讨论最多的，还是军队编遣问题。蒋介石依然忧虑重重，担心激成事变，造成群雄并讨的局面。

智囊杨永泰微微一笑，山人自有妙计。他向蒋介石建议，编遣军队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把各路诸侯调到中央当官，使其脱离老巢，同时取消各地的政治分会，这叫“离窝毁巢”；第二步，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实力派赖以活动的资本，这叫“釜底抽薪”，不愁藩镇不削，豪强不弱。杨永泰是旧式文人出身，喜爱用一些旧词典故。

包尔很同意杨永泰的主张，认为“非常地表现了东方人的智慧”。

得到包尔表扬的杨永泰又谦虚起来：“我是书生论兵，只能大概地说说，至于精细处，比如编遣军队的具体方案，还得包尔先生亲自捉刀。”

蒋介石也用鼓励的眼光看着包尔：“你就勉为其难吧，我相信顾问阁下的忠诚和能力。”

7

大战一触即发 包尔从容论兵

虽然坐落于长江以南、东海之滨，虽然有“火炉”之称，但冬天的石头城，寒风如刀，丝毫不比北国逊色，因为没有暖气，包尔只能靠大喝热咖啡提神取暖。

在他案头，置放着中国国内兵力一览表。

属于国民革命军方面有一、二、三、四集团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合计兵额在220万人以上，计有84个军，72个师，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约为300个师，其中蒋介石第一集团军共有20个军，但其中10个军系北洋旧部，4个军属友军，只有6个军为老班底。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兼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拥兵8个方面军，53个师，5个旅，据有陕、甘、豫、鲁四省。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兼太原政治分会主席，据有山西、河北两省，拥兵9个军，25个师，8个独立旅。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据有湖南、湖北两省，拥兵16个军，62个师；而该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控扼山海关至天津一线，张定璠控制着上海。

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兼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据有广东、广西两省，拥兵5个军，21个师。

除了以上五大军事实力集团外，在关外还有掌握30万东北军，克绍箕裘

的少帅张学良；云南龙云的滇军尚有两个军，10个师；四川川军约有34个师，26个旅。

这种腿比腰粗，趾与胫齐的外强内弱形势让一心促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包尔不能容忍，他手握笔杆，伏下身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终于，一份洋洋洒洒的《军队编遣方案》脱稿而出。

蒋介石看了连连点头，这份方案无一不是从他的利益出发，且话中有话，暗藏机锋，有无限引申发挥的空间，如能实现，真可谓“一纸定天下”。

1929年元旦，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开幕。蒋介石按计而行，高官相诱，冯、阎、桂、李（济深）各大派系首领一个个鱼贯入京。冯玉祥尚做着好梦，欲提出他的裁留标准，称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性者编，无革命性者遣；枪械齐备者编，枪械不全者遣——即所谓“三有三无加齐全”。按此标准，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另编8个师。

冯玉祥的提议引起众怒，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一概侧目而视，冯焕章（冯玉祥字焕章）太不自量，凭什么把其他各系各军都压下一头。

蒋介石更是连连冷笑，“娘希匹，莫非他真以为和中央政府一字并肩，平起平坐。”他在心里骂道，脸上却不动声色，因为他早已做了手脚，于是将眼睛瞟向阎锡山。

早在正式会议前，蒋介石就派何应钦带上包尔起草的编遣方案找过阎锡山，希望阎能附和，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增加一个中央区。这样，蒋军的兵力总数，至少是第二集团军的双倍。

一向不好说话的阎锡山这次出奇地爽快，连声答应绝不负蒋总司令之托。果然他十分守信，见蒋介石眼光扫向他，立即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端出了自己的货色：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杂牌军编为68个师。至于中央区问题嘛，他十分大方地一挥手，可划68个师归中央处理。

阎氏方案一出，蒋介石即知道他已经胜券在握。四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超过40万，蒋部也大体在此数，李部桂军约20万，阎部晋军尚不足20万。按照阎的提议，裁减最多的将是冯玉祥，裁减最少的则是李宗仁、阎锡

山。而由于68个师由中央处理,实际上蒋部第一集团军一面减少一部分,一面却又增加6—8个师,就好像左边口袋里的钱换到了右边口袋。因此,这一方案除了对冯玉祥不利,其他人皆大欢喜。

形势果然成了一边倒,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高举双手赞成阎氏提议。真是一石多鸟,让人拍案叫绝,他们为自己毫末未损而庆幸,为冯玉祥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为蒋介石利令智昏而暗自窃喜。蒋介石聪明一世,糊涂一时,那位德国顾问更是纸上谈兵,他怎么懂得中国政治的奥妙、东方式的复杂,阎锡山的提案里还埋伏着另一毒招,骨子里还有离间蒋、冯关系的作用。偷眼窥去,冯玉祥已是怒容满面,恨蒋程度绝不逊于恨阎。果然,在以后的会议里,冯玉祥一概装病不出,仅派代表应付。

李宗仁、李济深等人的笑容也就到此为止,阎锡山的得意也应该就此打住了,随着会议的进程,他们发现最大的赢家还是蒋介石。1月17日,会议通过了以包尔《军队编遣方案》为蓝本的《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其规定如下:

1. 由国民政府即发明令,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于取消。取消之后,即设编遣区;各部队原有官长,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编遣时期,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现有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之命令,不得移动。

2. 全国现有军队,除中央直辖各部队及海军各舰队,应由编遣委员会进行派员缩编外(即设中央编遣区),其余分为六个编遣区实行编遣。第一编遣区负责第一集团军的编遣;第二编遣区负责第二集团军的编遣;第三编遣区负责第三集团军的编遣;第四编遣区负责第四集团军的编遣;第五编遣区负责东北军的编遣;第六编遣区负责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各省军队的编遣。

3. 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旅,炮兵16团,工兵8团(共计兵额约80万,空军海军另定)。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的40%为限。

4. 各省区得就编余官兵,改编地方警察、保安队等,其人员以3000至6000

为限。

5.各集团军均保留11个师，中央可控制二个编遣区。

各大军头面面相觑，至此，他们方明白蒋介石的厉害，那位德国顾问的深沉。按上述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级军官原地待命，静候编遣与委任。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无异成了俎上鱼肉，任人摆布。

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部”的牌子摘掉了，代之以“第三集团军结束办事处”；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一下子被裁撤了七八个师；李宗仁的桂军也明里暗里遭到蒋系人马的分化、离间。痛定思痛，他们开始捐弃前嫌，从相互攻讦、相互挖墙角，转为相互同情，相互声援。会议临近尾声时，冯玉祥提出动议：“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先休息一个时期再编遣。”蒋介石来不及反驳，已听到一片赞同之声。阎锡山还敲着边鼓帮腔，现在离年关不远，不如早点休会，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蒋介石尴尬了好一阵，却没有勇气拒绝，不然，会有人骂他“太没有人情味了”。

阎锡山走了，“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南京城是蒋介石的势力范围，阎锡山怕有不测；冯玉祥也走了，他是以养病为由向蒋介石告假的，蒋介石知道冯玉祥害的是“心病”，但还没到撕破脸的时候，总不能霸王上弓，强挽客人不放，只得拱手一揖，互道一声珍重，眼看着鸟儿入林，猛虎归山。

送罢冯玉祥归来，蒋介石脸色冷得像一块生铁，侍卫长王世和几次探头探脑想报告什么，都被蒋介石暴喝退下，直至掌灯时分，才找到机会说话：

“洋顾问包尔先生从下午起，就一直等您接见了。”

蒋介石一跃而起：“快请，”转身又向王世和喝道，“为什么不早报告？”

王世和不敢为自己申辩，连忙乖巧地退下。

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清晰而有力，包尔上校挺着胸脯，排闥而入，矜持地坐在蒋介石的下手方，报告说：派去各实力派军队中充任军官的黄埔生大都

遭到了拒绝,甚至遭到了污辱,裁减军队的行动实际上已陷入了停顿,已通过
的编遣军队大纲成了一纸空文。“这种目无纲纪,实则就是以下犯上,一支训
练有素的军队,一支现代化、国家化的军队,是不允许出现此类现象的。”

“将骄兵惰,国之不幸。”蒋介石喃喃自语,抬起头,十分诚恳地征求包尔
的意见。

包尔的脸上腾起一股杀气,他做了一个果断的动作,右手向下用力一
切:

“武力解决。”

一股寒风呼啸着从石头城掠过,蒋介石站起身,踱到窗前,月色冰冷,草
木萧瑟,夜幕深处,有几声庆岁的鞭炮不时地燃响:“这个年过不安稳了。”包
尔的建议,搔到了他的痒处,道破了他的心事。

“武力解决”异己的方案就此端上了桌面。

根据智囊杨永泰制定的对付消灭异己的八字方针,即“远交近攻,各个
击破”,蒋介石确定了打击目标和打段,以武力解决第四集团军,以经济解决
第二集团军,以政治解决第三集团军,以外交解决东北军。

至于打击顺序,他没有一丝犹豫。两年前桂系上演的“逼宫戏”,让他引
为奇耻大辱,再说,桂系近在肘腋,横跨大江南北,与活动范围均在黄河以北
的第二、第三集团军相比,危险更直接,感受更强烈。

杨永泰面露难色,他提醒蒋介石,不能轻开战端,桂系的实力不俗。他指
着地图比划着,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历来亲桂,而湖北又由李宗仁坐镇,率领
夏威的第七军,陶钧的十八军,胡宗铎的十九军,并指挥湖南的何键、叶琪、
鲁涤平的部队,南通两广,北达中原,上溯可进四川,下扼南京、上海,是东西
南北的枢纽之地,并有留守广西的黄绍竑为倚恃,纵深辽阔,且与广东的李
济深形成互相呼应之势。

杨永泰的手指又从地图下端移到上方,如今,桂系的势力早已越过长
江,仅白崇禧部就有10万之众,除拥有李品仙的五十一师,廖磊的五十三师
外,还有魏益山军,陈辅之旅,安俊才的骑兵部队。打下北平之后,白崇禧部
东征扫荡直鲁联军,五十一师进驻了唐山,五十三师驻扎在北平、古冶一带,

将桂系的势力伸展到河北。据说,现在又暗中把部队拉到安徽地区,使之靠近南京,一旦蒋桂发生冲突,便可策应武汉,夹击南京。因此,以武力平桂,必须慎之又慎……

一向听不得逆耳之语的蒋介石挥手打断了杨永泰的啰嗦,文人论兵,总谈不到要害处,且听听包顾问的意见。

包尔胸有成竹地走到桌前,往面前挪了挪地图,桂军的阵势,宛如一字长蛇,头在北,尾在南,腰在两湖,看似壮观,其实破绽很明显。他提醒与会各位,就在19个世纪中叶,中国发生过太平天国起义,那支太平军就是从广西出发,最后定都南京。而清朝最终取胜的战略就是争夺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将拳头砸向起义军的腹部。安庆离武汉不远,昔日太平军的形势与桂军相似;白崇禧虽然号称知兵,但平津距首都有千里之遥,沿途又有中央军分段驻扎,不仅不能策应武汉,自顾尚且不暇,况且他的部将多为唐生智旧部,军心不稳。而黄绍竑屯兵广西,偏居一隅,更是难成气候,届时战事一起,中央政府即可号令东南诸省其他实力派武装呼应政府行动,武汉必陷入孤兵作战之困境,南京则稳操胜券,当无疑义。

包尔的双眼如两盏灯,炯炯发光。他继续发挥道,此战,胜败与否,已不必怀疑,只是打则必须速打,胜则必须速胜,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威信未立,如果战事旷日持久,兵连则祸及,民怨沸腾,则中央不仅不能建威,声名将就此堕地。因此,包尔建议,不打则已,打则全力,以闪电战的形式一举摧垮桂军。

“闪电战。”参加会议的军政厅厅长张治中喃喃念道,对这个名词似有所闻。前不久,他也曾率一个军事代表团出访德国,并拜访了德国国防部,德方曾友好地向他提供了军事训练机密手册,讨论了未来战争的趋势。那时,张治中听说了德军正在研究一个重要的课题,即闪电战的战略战术应用,顾名思义,就是集中优势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方式,突然打击敌之要害,于瞬间完成战略战术打击目的。

“好!”蒋介石心中高声喝彩,这每月1400大洋请来的顾问果然价有所值。他站起身,走向包尔,希望就他刚才所提的什么“闪电战术”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以备采用。

8

撒手西归 包尔死因不明 睹物思人 蒋氏泪湿衣襟

据李宗仁事后回顾,1929年发生的蒋桂战争,乃是他们“中了蒋先生的圈套”。

蒋介石十分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李宗仁、白崇禧都有政治野心,白崇禧甚至在北平散布说:“中国统一成功都是由北向南,从没有从南向北统一成功的。”言下之意蒋介石所标榜的统一不会长久,他要由北向南统一中国。

李、白的这种情绪,自然对桂军将领有所影响,比如驻守湖北的桂军三猛将陶钧、胡宗铎、夏威就对蒋介石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北伐战场上亲眼目睹蒋系军队不堪作战的狼狈场面,委实让人不敢恭维。

所以,在一次举行欢迎蒋介石视察武汉的宴会上,群贤毕聚,文武齐全,却独独缺少桂军这三员大将,盘箸虚陈,情形颇为尴尬。使位居首座而气量偏狭的蒋总司令颇为难堪,心头不悦不说,可能更疑窦丛生。

更糟糕的是,宴会的翌日,蒋介石循例检阅桂军驻汉部队,蒋氏即席训话,大意谓革命军人应忠诚拥护中央政府,应尽服从天职和确守军纪,不惜为国家牺牲云云。辞毕,身为阅兵总指挥官的胡宗铎,心血来潮想出风头,突然站到阅兵台前,对中央来宾诸公和官佐士兵扯开喉咙,针锋相对道:革命北伐军在进展期间,中央政府改潮迭起,致影响军事,屡受波折。自今以后,深盼中枢开诚布公,赏罚分明,用人惟才,造成政府廉洁风气,俾武装同志为牺牲才有意义,等等。用李宗仁的话评论:“宗铎此种言论,发之于私人谈

话之间，尚无不可，在这种场面下，公开演说，实在大为不雅，蒋先生当然大为不快。”言念及此，十分后悔，“夏、胡、陶三人都是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然因百战功高，本已有骄蹇之态，一旦战事平息，住入繁华的大都市，经不起声色犬马的诱惑，都娶了年轻的新欢，宴安鸩毒，目无余子；及卷入政治漩涡，又因缺乏政治素养，难免误事。”

李宗仁说的“政治漩涡”，就是蒋桂战争的导火索，轰动一时的“湘案”。

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人称“鲁胖子”，心眼不算灵活，他与桂系的关系一向不错，与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谭延闿原本僚属，自然血浓于水，感情上更深一层。如今蒋、谭成了国府双驾马车，桂军自然对鲁涤平也警惕起来。

蒋介石马上抓住桂系这种心理，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夸张地向鲁涤平示好，偏袒宠爱之意溢于言表，并以偷偷摸摸的形式，向鲁运去大量军械。

这一着，着实让桂军生疑，认为这是蒋鲁之间的默契，暗含倒桂的阴谋。胡宗铎、夏威等都是无法无天的主儿，一合计干脆一不作，二不休，端掉鲁涤平，代之以表面上更亲近桂系的何键。

于是，就有了“湘案”。1929年2月12日，武汉政治分会发出决议，称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撤免鲁涤平湖南省主席兼十八师师长职，宣布任命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并派叶琪的第九师、夏威的第七军向长沙进兵。鲁措手不及之下，乘外轮经九江转赴南京，鲁部戴岳旅经浏阳向万载撤退，桂军一举控制了湖南。

在此期间，李宗仁、白崇禧、蒋介石都装聋作哑，乃至事变发生，仿佛梦中惊醒，随即展开一连串活动。

蒋介石雷霆震怒，抓住“湘案”不放，称桂军行动有违法纪，并召开第177次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对“湘案”“秉公彻查具复听候编遣委员会核办”，对桂系展开口诛笔伐。

李宗仁、白崇禧却摆出低姿态，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宗仁还打电报给蒋介石，称“迭次重要会议，奸人辄肆流言。今复出此，盼始终亮察，持以镇静”。李济深也赶到南京，希望调解蒋桂之间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

蒋介石偏偏不给面子，此时，他已通过俞作柏说服了夏威手下的师长李

明瑞、杨腾辉等伺机叛桂，战事更有把握。因此，3月20日，他在国民党三大全体会议上称：“中央对于地方上的不法事件，只有执行法纪，绝无所谓调停的可能。”为示强硬，当天下午就将李济深押往汤山俱乐部监禁，26日，发布讨伐令，29日，“御驾亲征”赴前线指挥战争，蒋桂之战的硝烟就此燃起。

此次大军出征，包尔也随行赞襄军机，运筹帷幄，排兵布阵。已久不闻战鼓之声了，今日重新嗅着血腥，忍不住地阵阵激动，他向蒋介石递过去一份早已拟好的讨桂军事行动计划。

蒋军进攻武汉的战斗序列是：

总司令蒋中正。

总参谋长何应欽。

前敌总指挥朱培德。

第一军军长刘峙，辖刘峙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蒋鼎文的第九师。

第二军军长朱绍良，辖朱绍良的第八师，夏斗寅的第十三师及独立第一旅。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辖缪培南的第四师，王钧的第七师，曹万顺的第十一师，金汉鼎的第十二师，鲁涤平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熊式辉的第五师。

总司令部直属部队为张砺生骑兵第二师。

总预备队为方策的第六师，方鼎英第十师，徐源泉第四十八师。

“目前，各参战部队已到达指定集结地，我已按总司令要求，命令第一军集中在潜山、太湖（安徽省的县治）；第二军集中在英山及其以北地区；第三军集中九江、建昌、南昌、高安一带，并要求他们每日密报部队转移与部署的情况，随时准备出击。”

包尔的安排让蒋介石无可挑剔，转而询问各部作战目标。

“拟以江西各部队为第一路军，由朱培德军长为总指挥，西攻武长路，截断桂系南逃之路。刘峙、朱绍良的第一、二军，编成第二路军，以刘峙为总指挥，沿长江进攻武汉。另外，冯玉祥也打来电报，宣布将出五师助战，现在冯玉祥部将领韩复榘已率三个师驻扎信阳……”

不等包尔说完，蒋介石发出一阵冷笑：“冯焕章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派韩

复榘来不是助战，是想抢武汉。”

包尔不理睬蒋介石的打断：“我拟将韩复榘部编为第三路军，以韩为总指挥，从河南沿平汉线进攻武汉。从军事角度看，这一路兵力的配置是有必要的。为了防止总司令担心的情况出现，可否请粤军张发奎重掌第四师，并委任他为第一路军右翼总指挥。张素为汪精卫股肱，与中央有隙，今中央捐弃前嫌，张理当激发忠良，奋勇报国。给他规定的任务是：占领咸宁、蒲圻，即时攻取武昌城，以便速战速决，抢在冯玉祥部队之前占领武汉。”

“包顾问算无遗策。”蒋介石由衷地夸奖了一句，继续埋头那份作战计划，后抬起头问：

“空军还要参加作战？我们的兵力够充足了。”

他摇了摇头，因为他知道中央政府的空军力量薄弱，还属于刚起步阶段，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因此，他不无理怨地冲着包尔道，陈仪订购的那批德国军火还未到货，其中就有德国容克式飞机。否则，这次就派上用场了。

包尔绕过话题，劝道，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中央政府的空军尽管尚不能形成规模作战能力，但是聊胜于无，还是能对对方起到心理上震慑作用的，同时为改变传统的单一作战方式，演练未来作战形式提供经验。

蒋介石点点头，包尔最后一句话打动了他。

3月27日，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一出全武行正式开打，蒋军分三路杀向鄂境，军舰沿长江逆流而上，航空队由张静愚率领飞临江西上空。已经潜至广西的李宗仁遥控指挥，委任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别为第一、二、三、四、五路总司令，在黄陂至武穴之线布防待敌。其中，第一路守湘东，第二路守青山，第三路守黄陂郭家湾之线，第四路守阳罗，第五路在三、四路的中间布防。

因夏威患病，不能到职，早与蒋有约的李明瑞遂以第三路军副司令代理司令职，他负责把守的恰是桂军整个防线的正面，也是最重要一环。

28日，蒋介石发布总攻击令，包尔居间策划调度，由于计划周密、得体，战场上举一动如在眼前，指挥得心应手，蒋介石打仗还很少这样轻松过。

包尔集中兵力攻击桂军正面防线。他向蒋介石解释,这是德国陆军常用的战术,一旦撕开口子,就猛捅进去,然后再向两边扩大。

飞机队首先出战,当两架“莱茵”式飞机晃着翅膀出现在桂军上空阵地时,引起一片恐慌,中国军人毕竟见识太少。第七军纵然有能战之名,但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对付天上的敌人,眼看着一片花花绿绿的东西当空洒下,一个个惊恐万状:

“飞机下蛋啦!”

这片花花绿绿的东西并非炸弹,而是蒋军印制的《告桂系军队书》,内称:“官兵如带械来归,各赏洋5元;官兵如为徒手来归的一律收容;如能杀了你叛逆长官来归的,必得重赏官级。”

李明瑞乘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提出不为军阀作战的口号,相约带队脱离战斗。李明瑞一走,桂军防线顿时敞开一个缺口。

此时,号称“福金刚”的蒋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刘峙正准备扎营安寨,长途奔波,他想歇一夜再战。

包尔来到他的帐中,要刘峙立即率队追击,星夜进兵,抢占武汉。

见刘峙稍有犹豫,包尔脸色一沉,掏出蒋介石手令:“24小时之内你没有出现在武汉城下,我会向总司令建议以贻误军机罪对你进行处罚。”

说完,扭头就走。

“妈的,洋鬼子真不讲人情。”刘峙骂道,但却心服口服。

蒋介石兵不血刃占领了武汉,心中好不得意,于是大封官爵,犒赏三军,他也曾问包尔,有什么个人要求。

包尔摇摇头:“惟求德中合作愉快,惟求南京政府稳固,惟求蒋总司令迅速勘平天下。”

说这话的时候,包尔忍不住发出一阵揪心的咳嗽。蒋介石心痛地发现,包尔的脸色苍白而憔悴,毕竟已是花甲老人了,再加上常年军中的摔打、国外的奔波,包尔已经是心力交瘁了,然而他却要强好胜,就拿此次军事行动来说,连续几个月,包尔可说是食不知味,枕不安寝,劳心费力,竭神尽虑,他的生命之火已呈现出油尽灯枯的态势。

稍稍喘定，他又支撑起身板，恢复了军人的挺拔，建议蒋介石，挟战胜之余威，乘势彻底铲除桂系，并以此震服其他各实力派，切实树立起中央政府的威信。

4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武汉民众书》，杀气腾腾宣称：“此次讨逆之目的，亦不仅在讨伐李、白。务使李、白铲除之后，永无继李、白而起之叛徒。”同时制定《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准备继续用兵桂境，务以“根本铲除为目的”。

蒋桂战争仍在继续。

蒋介石轻松赢得这一仗，得意非凡，他在武汉发通电，开大会，作讲演，会见外国领事，召见各级官佐，酬酢无虚日，忙得不亦乐乎。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趋炎附势之輩如过江之鲫，他们通关节，走门路，蒋介石的身边人自然成了巴结对象。

有两个人最惹人注目，一个是蒋的首席智囊杨永泰，此人摸透蒋的脾性口味，所献计策无不采纳，几乎成了蒋介石的“秉笔大臣”。

另一个就是包尔，蒋介石对他的信任无以复加，且对包尔个人人品、工作态度、吃苦精神、细心程度无不啧啧而赞，凡包尔所请，无不俯允。于是包尔成了各家宴请的座上客，门庭若市。

包尔不善应酬，也不习惯这套，常向蒋介石叫苦，蒋介石总是笑眯眯回答他，入乡随俗，这是联络感情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如此。

无可奈何之下，包尔硬着头皮出席各种宴会。几次以后，他已为那种喧哗，那种繁文缛节，那种酒池肉林，弄得不胜其烦。

这是五月的晴朗的一天，包尔早晨一起床就感到头晕目眩，本想好好休息一天，中午，却有人敲响门扉，送上一份大红酒金请帖。

把玩着这份请帖，听着翻译的啰嗦，这是一份地方贤达豪绅的邀请，他建议包尔一定要出席。

“这些人都是地头蛇，许多事情离了他们玩不转。”

包尔也有心接触一下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遂点头吩咐更衣。

中国人待客的热情包尔早已领教，席间的丰盛像是开食品博览会，美不胜收。包尔胃口不好，每样浅尝辄止，但一盘盘尝下来，那分量已经十分可观。

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舶来品自然不少，宴客的白兰地味道居然十分正宗，慢慢地勾起了包尔那份尘封已久的普鲁士军人的勇武和粗犷，没了克制，喝出了兴奋。他把外衣脱了下来，白衬衫的领结除了下来，露出了长满汗毛的胸膛。

散宴后回到轿车，依然燥热难当，摇下车窗玻璃，吩咐司机开往沿江的大道，一任清爽的江风洗去他满身的酒气。

夜深时，他才回到寓所，卫兵注意到，包尔的脚步已经踉踉跄跄。

这一夜，只听包尔折腾不休，起床、喝水、呕吐、呻吟，至天色大亮，勤务员推门而进，大吃一惊，包尔依然高卧不起，透红的脸上布满了疱疹，一声声咳嗽揪人心肺。

医生诊断，包尔顾问是出“天花”了。

病情迅速恶化，蒋介石命令将包尔送到上海诊治，并且指示“不惜代价”让包尔恢复健康。

大限将至，岂非人力所能挽。5月6日，包尔在上海溘然而去。

关于包尔之死，外间传闻甚多，其中某些说法，令人毛骨悚然。据有人考证，包尔在德国期间，已注射过防疫疫苗，“天花”一说，根本不成立。

这些人言之凿凿，称：自蒋军占领武汉后，桂系胡、陶、夏三军长宣布下野，何应钦念及与李、白的友谊，私下里认为“穷寇勿追”，然而包尔却以为“除恶务尽”，唆使蒋介石制定“根本铲除”之政策，结果引发西南实力派人物愤恨，决定对包尔下手。

两广大山密林，多毒虫奇卉，自古就有“制蛊”一说，十分神秘诡异，被下蛊的人往往死得不明不白，死状也极为恐怖。蛊毒的制作方法也匪夷所思，据说其中一种制作方法就是采集百种毒虫，置于瓦盆，让其互相撕咬，最后留仅存的那只，取其毒素，佐以其他特别配置的毒液、香料，混合而成，或成块状，或成粉状，或成液状，或无声无味，或奇香扑鼻，视情况而定。

包尔死了，死得蹊跷，死得不甘。临终前，他自知康复无望，曾口授遗嘱，由航空顾问傅克斯中校笔录。在遗嘱中，包尔对蒋介石对德国顾问的爱护关心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继续与德国顾问团合作，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他推荐克里拜尔接替他的总顾问职务，并请求蒋介石照顾他的家属。

对于包尔的死，蒋介石十分悲痛惋惜，一时无语凝噎，“表示从此会使他感到很孤独”。包尔来华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组建了德国顾问团，创立了顾问团工作模式，制定了工作方向，为未来10年的中德合作奠定了基础，为恢复发展中德关系作出了贡献。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深为蒋介石所欣赏，成为蒋介石“特别重视和敬重的名将之一”。从以上意义而言，包尔称得上是近代中德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现在，蒋介石的案头上正放着包尔的遗嘱，睹物思人，蒋介石感念包尔的勤奋、才华、忠诚，答应了包尔的所有请求，立即下令将包尔之子恩斯特·包尔（时任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联络官）招来委为随身顾问，待之如义子，并同时命令由克里拜尔中校代理顾问团团团长职务。蒋介石的人情味往往在这些细枝末节上表现得很浓郁，也很能打动人。

9

克里拜尔才不胜任 南京政府另觅新人

包尔在华工作期间，德国顾问团仍然属于非官方性质，多为退役军官和反共和分子，在国内遭到压迫甚至驱逐、通缉，是包尔将他们一手推荐给中国的，现在都像模像样地成了人物，成了座上宾，那一份感激自然溢于言表，其具体的表现是：对包尔的言听计从。

然而，他们对继任者克里拜尔中校就没有那份恭敬了。平心而论，德国陆军在当时世人的眼里还是有点分量的，德国陆军也因此而孤芳自赏，视自己为真正的军人。他们在一开始瞧不起纳粹，当然也瞧不起那个奥地利下士希特勒，但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却让他们走上了与纳粹同流合污的道路。在纳粹刚刚崛起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德国军官，耻于与纳粹为伍的。

克里拜尔中校却是个老资格的纳粹党员，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是一位资深军官，早年曾随八国联军侵略过中国。战后，他曾与还在下层社会苦苦挣扎的希特勒共同发动反对德国共和政府的“啤酒馆暴动”，并一同被捕下狱。希特勒在狱中写作《我的奋斗》一书时，融入了不少克里拜尔的见解，两人关系十分密切。出狱之后，克氏因在国内进行纳粹党活动遭到打压，就与克鲁马赫上尉等纳粹党员一起参加了包尔的赴华顾问团，1929年春，带着避难与宣扬纳粹政府主张的双重任务来到中国。他与包尔曾同为鲁登道夫的助手，关系不错，所以包尔临终前推荐他接替团长职务。

但克里拜尔却没有包尔那份威信，特别是那些经济顾问，他们不是军

人,没有服从的习惯,且大都恃才傲物,对于顾问团军事为主的方针颇不满意,不甘心克里拜尔发号施令,公开说自己来华是为中国政府服务的,而不是为顾问团长服务的。

客观地说,克里拜尔虽然不是一位出色的顾问团长,但努力工作,接任伊始就带着随从赶往武汉前线,参加指挥布防与追击。不久,又转向河南准备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他坐在装甲车里制定的那份《国军对冯军警备计划》,被蒋介石夸奖为“料敌机先,功不可没”。这份计划对未来的蒋冯之战作了准确的预测,“为防止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待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拟以三路大军作战,甚至具体规定了各部集结的地点及作战方向;还假设了冯军发起进攻可能经过的路线,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后来的战争发展,几乎完全循着克里拜尔的思路,使蒋军一开始就占尽先手之利。

按常理,克里拜尔如此忠心耿耿、奔波操劳,蒋介石应该论功行赏,正式任命他为顾问团团长,但不久却有风声传出,南京国民政府已有意聘请更有才干的德国顾问。

这不是空穴来风。

蒋介石对克里拜尔的不满来自以下原因。

由于东西方文化思想传统上的差异,德国顾问在制定讨伐内乱的作战指挥战略战术方面,不时会与中方指挥者产生矛盾。例如,蒋介石对于地方实力派武装,一向是阴谋与武力并重,他并不希望一举将其歼灭,而希望在武力威慑之后加以收买,化为己用。但德国顾问却不这么认为,他们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要求毫不留情地追击,歼灭反蒋武装。蒋桂战争到了尾声时,蒋已胜券在握,克里拜尔力主中央军进入两广,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蒋介石却虑及与陈济棠的关系,虑及中央军实力的损耗,坚持两广人(陈济棠、李明瑞、杨腾辉)打两广人(李宗仁、白崇禧)的策略,最终使桂系有了喘息之机,渡过了难关。还有像蒋介石用重金收买冯玉祥部将韩复榘等等,都让克里拜尔看不顺眼,认为不是军人的作派,是践踏战争的艺术,忍不住拍起了桌子:

“这种打法不上派，胜之不武。”

蒋介石勃然大怒，克里拜尔懂得什么战争艺术。什么叫“胜之不武”？战争和政治一样，实力和阴谋永远是取胜的关键。

克里拜尔的日耳曼血统中确实缺少一点圆滑，甚至在牵涉德方利益时也那么不变通。在中国进口武器的选择上，他本来有相当的影响力，然而却根据中国军队的实际需要，提议中方购买许多非德产的军火，如捷克、法国等国的武器产品，以求适应中国的实际。这就“使德国军火巨子甚感愤怒，认为顾问未能维护德方之利益”，甚至还迁怒于中国政府。

克里拜尔成了受气包，哪一方都把不快发到了他的头上。1929年下半年发生的“飞机风波”，终于宣告了他在华使命的结束。

说起来，这还是包尔种下的祸根。当年他落脚广州，曾受到李济深、陈济棠的接待，对陈济棠带来的钨、铋等稀有金属十分动心，后来广东地方政府也派了一个代表团访德，包尔同他们约定，本着一视同仁的原则，德国工商界愿意向他们提供产品，或以现金交易，或以货易货，拿广东出产的钨、铋矿石作为交换。

克里拜尔曾提醒包尔，南京方面和广东方面矛盾甚深，这样做会惹出麻烦的。包尔丝毫不为所动，德国战车的发动需要原料，这远比中国的内政更重要。

在包尔的联系下，广东地方当局向德国西姆逊公司订购了三架容克式战斗机，协议交由雷克梅航运公司运往广东，待一切手续办妥，货款付清，已是1929年末，包尔去世几个月了。

期间，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蒋介石的“削藩策”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蒋桂战争已经尘埃落定。在这一轮的交锋中，支持桂系的李济深也因被制汤山，导致他的部将陈济棠乘时而起，取得了广东的军政大权。

陈济棠可不像李济深那般忠厚，一方面他与蒋介石虚与委蛇，宣称自己服从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提高警惕，“蒋介石用金钱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使之倒戈相向，互相仇视，进行火并，最后是蒋坐收渔利。”所以他整

军经武,大有自立门户之想。现在闻听三架容克式飞机即将起运来粤,自然喜出望外,认为这是扩展粤军实力、发展空军的大好机会。

蒋介石岂能让这批军火轻易运到广州,不要刚刚打垮了李宗仁,再崛起个陈济棠来。听说陈济棠的野心一点不逊色于李宗仁,曾花高价买下广东花县芙蓉镇洪秀全的祖坟地,只因为阴阳先生说那是出天子的地方。由此可见,此人已存有争江山社稷之想。

于是,一封电报飞到了德国外交部,正式向德方提出抗议,措词十分严厉,强烈要求将这三架飞机改运上海,没收归中央。

陈济棠也不示弱,付钱给货,天经地义,立即严厉警告德方,如果不履约将飞机运往广东,则立即停止一切对德贸易,并驱逐全部在粤德侨。

这一手果然厉害,让德国方面左右为难,只能寄希望顾问团在中国国内做工作,平息这场风波。

克里拜尔刚想开口就被陈济棠堵了回去,德国私下里派遣军事顾问到其他国,已经有违国际法规,现在居然还敢说三道四。他威胁说,如敢再生事端,粤方报纸将全盘披露其内幕。

蒋介石自然不愿因小失大,强忍着吞下这口气。

火却撒到了克里拜尔头上。

1930年元旦,蒋介石请全体德国顾问聚会,并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结束后,蒋介石站起身,走到前台,清了清嗓子,满脸不快:

“中国政府为了进行各种必要之改革,不惜以大量金钱聘用德国顾问。但在过去一年,若干顾问未曾给予中国政府任何具体之建议,且对于所呈之问题无法作肯定之答复。现十八年(1929年)已过,十九年即将开始,余深希望顾问先生不要再辜负自己所负之责任。”

克里拜尔脸上烧得厉害,他知道蒋介石批评的“若干顾问”指的是谁。

果然,此后不久,外间有风声传出,德国方面将另有人员接替克里拜尔的工作。

蒋介石辞退克里拜尔还有一个虚荣心问题,即克氏的官阶太低,一国之

君竟用一位退休的陆军中校充西席，那是有失身份的。蒋氏一向对“面子”看得很重，比如说他的家系，本是一支普通的寒族，上溯数代也找不出像样的人物，于是他就希望能找出个体面的祖宗。结果，周公第三子伯龄成了蒋家的始祖，以下则有东汉时的函亭侯蒋澄，宋代的金紫大夫蒋浚明，真是贤哲辈出，蒋介石也可以聊以自慰，自诩“名人之后”了。

李宗仁也说过一件趣事，事关蒋介石的学历。蒋介石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打下北京后，乃派曾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任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5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质问刘宗纪，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本来“英雄不问出身”，蒋介石实在是多此一举。

现在，蒋介石这种虚荣心又发作了，他找来朱家骅，指示他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另行寻聘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德国将领，“最好是鲁登道夫这一流的人物”。

作为前德国陆军的实际领袖，鲁登道夫倒是极愿意充作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因参加了“啤酒馆暴动”，他在魏玛共和国已是声名狼藉，日子并不好过。孰料，他这一心愿遭到了德国外交部的坚决拒绝，像鲁登道夫这样声名的人来华工作，将给德中两国带来的麻烦比利益还多。

像以前推荐包尔一样，鲁登道夫又推荐了佛采尔。因为佛采尔不仅擅长实战指挥，军事理论方面也颇有造诣，再加上他对共和国的仇恨，在国内无所事事，于是成了最佳人选。

鲁登道夫向中国驻柏林使馆转达了自己的意见，顺便捎去佛氏所著《同盟战争》一书，作为其才华的证明。该书已有中译本，蒋介石拜读之下，当即拍板。5月24日，正式发布任命，通告德国顾问团全体人员：

“本人谨告诸位先生，经本人聘请将抵达本人总部之步兵司令佛采尔将军担任顾问团团团长职位，深冀诸位秉承以往之热忱，继续全力支持佛采尔将

军并克尽佛将军分配予各位之职守。”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佛氏刚踏上中国土地，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已腾起漫天的硝烟。

自“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冯玉祥分别离开南京，回到驻地，整军经武，积极备战，准备下一轮的交锋。蒋桂战争起，冯玉祥首先跃跃欲试，想效卞庄刺虎之术，令骁将韩复榘率精兵从河南沿平汉线进攻武汉，乘势掩有两湖，成为最大赢家。

冯玉祥这点心眼，蒋介石一眼窥破，防范在先。待韩复榘兵临武汉时，已晚了三秋，城头早换上了蒋字大旗。

见韩复榘到，蒋介石开中门迎接，执手相见，温语有加，一口一个“向方兄”，并奉上70万元：“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蒋介石脸上的笑容像绽开的花朵。

一介武夫韩复榘受宠若惊，连连拱手作揖：“蒋总司令礼贤下士，卑职心领了，这钱不能收，受之有愧。”

刚刚赶到汉口的宋美龄娇嗔地命令韩复榘收下：“总司令经常说，你们西北军太辛苦了，这次向方兄又率兵助阵，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

偷眼窥去，只见宋美龄仪态万方，光彩照人，那一份书卷气，那一份高贵气，让韩复榘不敢仰视。

偏偏宋美龄找他逗乐：“听说韩主席（韩为山东省主席）刚娶了新夫人，叫纪甘青，长得是貌美如花，我和总司令没有时间登门道贺，只能选了四色礼物聊做贺喜。”说完，返身回里屋拿出包裹。

韩复榘已经不是受宠若惊了，相形之下，冯玉祥太严厉、太霸道了，西北军实行的是家长制管理，对高级将领如子侄一般，每次提升前，命人用军棍打一顿屁股，就连鹿钟麟等大将都不能免。韩复榘娶一个名伶纪甘青为妾，冯玉祥就大为不满，公开责备道：

“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这不是指着和尚骂秃驴嘛，韩复榘很是窝火。蒋总司令是全国领袖，蒋夫人是第一

夫人，母仪天下，人家为什么那么给面子。想到这里，韩复榘的胸脯挺直了，从心里失去了对冯玉祥的畏惧和忠诚。

蒋介石早已看透西北军的清苦，杨永泰建议“经济解决第二集团军”，就是指用“银弹”对待冯玉祥的部下。果然，这招极灵，一个亮相便赢得了韩复榘的心。

他还派钱大钧赴襄樊慰问冯部另一大将石友三，给了石30万元。石当场就表示，一旦有事，决不与中央交手。

这等于在冯玉祥身边安了两颗钉子。

蒋桂战争告一段落后，蒋介石立即腾出手对付冯玉祥。1929年5月7日，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惟一之希望》文，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发兵讨冯张目。

面对蒋介石的威胁，冯玉祥召集部将于5月中旬召开华阴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从山东、河南一线撤至潼关集结，武装反抗蒋介石。

岂料变起肘腋，在蒋介石策动下，韩复榘、石友三突然宣布拥蒋反冯。蒋介石的“银弹”发挥了作用，西北军发生了激烈分化。

冯玉祥只能宣告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而不出，惟一的希望就是说服阎锡山共同反蒋，局面或许能为之一变。

冯玉祥的希望成了现实。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岂能不懂唇亡齿寒之理，尽管他几度犹豫，几度观望，几度首鼠两端，最终还是打起了反蒋大旗，指责蒋氏政权“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以张撻伐”。

与此同时，退避西南的桂系势力也重整旗鼓，联合粤军张发奎部与晋军、冯军遥相呼应。一时间，烽火燃遍大江南北。

佛采尔见猎心喜，中国的局势对于一位厌倦政治争斗、热烈向往枪炮战火的职业军官来说，真是一展身手的大好机会。行装未卸，即主动请缨。

蒋介石正为反蒋派的群起而攻绞尽脑汁。见佛采尔来，也没有客套，径直将他领到作战地图前，一道道粗大的箭头犬牙交错，战场的形势极为

复杂。

命为“中华民国第二方面军”的西北军，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倾30万大军分六路进入河南，向东发展。1930年4月下旬，以孙良诚为总指挥的第一路军（辖梁冠英、王和平、张印相、安树德、刘凤歧等部），以庞炳勋为总指挥的第二路军（辖孟振三、冯安邦、徐福胜等部），以孙连仲为总指挥的第五路军（辖高树勋、刘兆祥、张自忠、李松昆等部），由郑州以南地区东进，与晋军配合，投入陇海线的作战；以吉鸿昌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率其所属第四师，以宋哲元为总指挥的第四路军（辖魏凤楼、冯治安、田春芳、赵登禹等部），由郑州南下，投入平汉线的战斗；以张维玺为总指挥的第六路军（辖刘汝明、田金凯部），由荆紫关、浙川，直趋襄阳、樊城，移兵豫西南，窥视武汉。刘郁芳率部留守陕甘后方。原在许昌的杂色部队樊钟秀部，命为“中华民国第八方面军”，归冯玉祥指挥。刘桂棠、王振等部也归附冯的麾下，在平汉战场作战。

命为“中华民国第三方面军”的晋军，以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张荫梧、傅作义为副总指挥，兵分六路，分别投入津浦战场、陇海战场作战，总兵力20余万。其中，以傅作义为总指挥的第二路军（辖傅作义的第十军，李生达的第四军），以张荫梧为总指挥的第四路军（辖王靖国的第三军，李服膺的第五军，冯鹏翥的第九军），沿津浦线，越过德州，南攻济南。以张会诏的第八军为总预备队；以孙楚为总指挥的第一路军（辖孙楚的第一军，关福安的第七军），以杨效欧为总指挥的第三路军（辖杨效欧的第二军，刘茂恩等其他部队），由陇海路侧击徐州。以杨耀芳的第六军为预备队；原驻扎在归德、鹿邑、亳州一带的孙殿英部，编为第三方面军的第五路军，委任孙殿英为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拟率部攻取蚌埠，原驻扎在开封、归德一带的万选才部，编为第三方面军的第六路军，委任万选才为总指挥兼河南省主席，拟据守归德要地，并相机东进徐州。原驻扎在考城一带的刘春荣部，编为第二十军，委任刘为军长，拟率部由考城东攻鲁西。此外，晋军又新组编了4个保安队，共10个团。还有炮兵13个团，及各特种兵团，飞机72架，都投入了前线作战。

原驻扎在新乡地区的石友三部（因石拒绝蒋抽调他的军队南下打桂，故宣布归冯反蒋），编为“中华民国第四方面军”，以石友三为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

倾10万之众东攻鲁西。拟由东明趋济宁，与晋军的第二、第四路军会攻济南。

为了统一指挥二、三、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特任命鹿钟麟为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为副总指挥，力图按统一部署作战。

在南方，桂、张联军编为“中华民国第一方面军”，组成总司令部，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副之，白崇禧为总参谋长，陈翰誉为副参谋长。下辖三路军：

第一路军指挥官张发奎，辖第四军，第四十三师。

第二路军指挥官白崇禧（兼），辖第七军，第四十七师。

第三路军指挥官黄绍竑（兼），辖第八军，教导一师，教导二师。

1930年5月下旬，第一方面军所属各部，先后放弃浔州、贵县等地，秘密与助蒋作战人陈济棠的粤军脱离接触，取破釜沉舟之策，三路人马共3万众，分途入湘。第一路取柳州、桂林，出全州，向永州、衡阳前进；第二路军左出平乐，经永明、道州，趋永州、衡阳；第三路军置于迁江地区，掩护各军集中北进，待一、二路军进入湘境后跟进。

反蒋联合阵线集中70万大军，分别在津浦、陇海与鲁西南、平汉、湖南四个战场同时进兵，就是要让蒋介石顾此失彼。其战略目标是：沿津浦线南下之第三方面军，与沿陇海路东进之第二方面军及第三方面军之一部，在第四方面军配合下，攻占济南，会师徐州，进兵南京；第一方面军沿粤汉路北进，与沿平汉线南下之第二方面军南北对进，夹击湖北蒋军，会师武汉，控制长江中下游，一举推翻南京国民政府。

难怪蒋介石忧心忡忡，像这样的多头作战，像这样的大阵势，他还没经历过。站在地图前的其他蒋将军将领也屏住呼吸，这仗怎么打？谁的心中都没谱，都把眼光转向了佛采尔，想看看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名将胸中的韬略。

佛采尔的神色中出现了傲慢和不屑，嘴角向上牵了牵。中国人的战争在他眼里几乎等同于游戏，其军队素质、装备、战术起码落后西方20年，即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相比也有不如。佛采尔这不是自大，当年攻破法国防线那一役，惨烈程度和规模都不是眼前站着的这群中国人所能想象的。再说，他

对两面作战、三面作战，乃至四面、五面作战都有经验。

德国人的认真劲也使佛采尔胸有成竹。在他出席这次作战会议之前，召见了包尔时代帮助蒋介石建立“航空侦察队”的顾问赖曼和毛伦霍夫。

毛伦将一叠空中拍摄的照片放在佛采尔面前，这些照片拍得很清晰，反映了反蒋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主动权。但佛采尔不满足这些表面现象，拿起放大镜，对照片上的一些局部细节仔细辨认，眉宇间露出一片轻松。

10

模范军初露锋芒 郑大章歪打正着

站在作战地图前的佛采尔又恢复了一战时的那种神采飞扬，那种嗜血成性，那种冷酷镇静，他洋洋洒洒道：“兵者之道：攻敌之必救。环顾整个战场，作战焦点有两处，一者桂张联军与冯玉祥军队夹攻之下的武汉；一者连接津浦线和平汉线的中间地段陇海路战场。控制了武汉，就使敌方南北两大战场处于孤立分割状态，桂张联军则难有作为；控制了陇海路战场，则使晋冯两军各自为战，宜于被政府军分割消灭。”

根据这一态势，佛采尔提出建议，中央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在徐州以西的陇海战场，以压倒对方之势，一举粉碎其东进、南下攻击，迅速取胜。

说到这里，他向蒋介石微微欠身，表示，如果总司令御驾亲征，他愿意忝列其行。

至于南方战场，他建议地面上的作战部队仍以地方武装为主，佐以中央空军、海军助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守住武汉，桂张军将知难而退。

还有津浦线方面，佛采尔认为不妨暂取守势，待挺过最艰难的一段，抽调陇海战场重兵，给予全力一击。

一阵长时间的寂静后，刘峙小心翼翼地问：冯玉祥的军队历来善打硬仗，号称是中国军队中最难啃的骨头，陇海战场夹于平汉战场、津浦战场之间，一旦形成合击之势，中央军将有灭顶之灾。

佛采尔从皮包中取出空中侦察照片，指点着说，他已细心研究辨认过，

反蒋军之武器装备和兵种两个方面均不能同中央军相比,从这些照片看,冯军的部队还带有中世纪冷兵器作战的痕迹,许多士兵只装备着大刀。

一名顾问团成员悄悄递上一份他的研究报告。据悉,阎军步兵每班步枪11支,冲锋枪1挺;冯军更等而下之,每班步枪6支,大刀6把。阎军每营有机炮一连(4挺机枪,2门迫击炮),冯军每团有机枪一连(共6挺),迫击炮一连(共6门)。一个炮兵营只有4门野炮,4门山炮。显然,这种装备配置,常使战斗不能取得预期效果。

佛采尔转身,打量着刘峙,据说我的前任包尔上校为贵国的军队订购了大量军火,现在已经按德国标准装备了6个师。如果我们不缺乏勇气和智慧,只要有4个师,就可以在两个星期内结束战争。

佛采尔的大夸海口让蒋介石感到振奋,他给刘峙打气说:“枪械弹药,我们既可以自己造,也可以从外国大批购买,在这一点上,我们比敌人条件优越得多,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杀伤。”

他又转向佛采尔,眼光中充满信任,恭请佛采尔为他设计全盘战略。

老练狠辣的佛采尔当场就为蒋介石拟定了一份作战计划:在山东战场,以韩复榘、陈调元、马鸿逵、刘珍年等杂牌部队对付晋军与石友三部,以保证蒋军主力在陇海战场作战;在两湖战场与平汉战场,把湖北、河南的杂色部队搜罗在一起,编成第三军团,以何成浚为总指挥,下辖王金钰的第九军,徐源泉的第十军,杨虎城的第七军,郝梦龄的五十四师,肖之楚的四十四师,范石生的五十一师,李温衍的五十三师,夏斗寅的十三师等部队,其战略任务为拖住冯军的主力,使其既不能南下武汉,也分散其兵力,确保蒋的嫡系在陇海战场奏效。何应钦坐镇武汉,督率湖南的何键(已宣布服从中央),指挥陈济棠的粤军骚扰桂张联军,保证武汉战略要地的安全。

战事按照佛采尔的设计而发展。

在平汉战场,中央军主要以空军力量协助何成浚第三军团作战,一开始曾抽调三个航空队进行侦察、轰炸任务,赖曼上尉、毛奇上尉亲赴前线指导。最初,空军的战术十分简单,不外乎拍拍照片,投几颗炸弹,于对方威胁不

大,数月后则已经形成初步的陆空协同作战,令人刮目相看。德国顾问的要求很严格,规定航空队在陆军发起攻击前,以全部空军轰炸对方阵地,然后以部分飞机在阵地上空掩护陆军迅速攻击,晚上才许飞回。

6月4日,冯部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樊钟秀亲临前线指挥,中央军飞机前来轰炸,因为冯军缺乏反击能力,所以有恃无恐,两架容克式飞机摇着翅膀上下翻飞、左右盘旋,机关枪打得像爆豆一样,120磅重的炸弹鱼贯而下,樊钟秀身陷险境,当场倒在飞机的扫射下,冯军折了一员大将。后来桂张联军在湖南发起攻势,占领了长沙,进入湖北,西北军也越过许昌,向南追击,南北夹击武汉的形势已经形成。冯玉祥却突然裹足不前,率军东移,因而贻误了战机。推究其原因,恐怕也与蒋军的飞机不断骚扰有关(樊钟秀死后,许昌方面吃紧,冯玉祥不得不从豫东抽调兵力,而造成主战场力量薄弱,蒋军趁势加紧攻击)。而这一战术的制定,恰是佛采尔整盘计划中的关键一招。

以杂牌部队和空军牵致桂张联军和平汉路冯军的计划既然得以实现,佛采尔建议蒋介石全力以赴陇海战场。5月9日中午,蒋介石在徐州下达命令,令蒋军务部于11日起,各由集中地全线向反蒋军发起攻击。刘峙集中了刚刚装备起来的教导一师、教导二师及第十一师,于5月15日发动了归德之战。

这是一场重头戏,归德扼陇海入豫之咽喉,乃徽、鲁、豫三省之要冲。但阎锡山目光短浅,不肯损耗实力,如此重要的地方,仅由素质不良的万选才部之万殿尊、石振青两个师驻守归德。

相比之下,蒋介石占据绝对优势,装备精良,兵种齐全,身旁还有一大群德国顾问出谋划策。佛采尔刚刚完成对顾问团的整顿,按职能和任务在组织上进行了分工。所有顾问分成三组,各组设主任一人,均隶属总顾问,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第一组负责军事组织与教导部队的编练,武器弹药的筹划与分配飞行员的训练及陆军通讯和情报、军事顾问的监督与部队布防等。主任一职由总顾问兼任。

第二组主管军事教育与训练,主任一职由炮兵中将林德曼(后退出南京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顾问团,赴广东陈济棠处任政治、经济、军事总顾问)担任。凡在中央军校、各军事专科学校以及陆军大学任职的德国教员均由该组统辖。

第三组系文职顾问,由舒巴特担任主任。该组包括警察、航空、经济与国防工业,其工作中心是协助第一组与第二组军事任务的发展,设法在经济上占领中国市场。

顾问团的人数也由包尔时期的26名增加到70名,网罗了更多领域的人才。现将佛采尔时期德国顾问团名单罗列如下:

时间:1931年—1933年

姓名	军衔军种	任职单位	兼职工作单位及曾任职位
1.佛采尔	步兵中将	总顾问办公处	参谋本部
2.克鲁格	总顾问办公处	工兵学校	
3.克鲁马赫	炮兵上尉	总顾问办公处	骑兵旅、军官学校、炮兵学校
4.布鲁吉斯特	总顾问办公处		
5.顾德威	步兵少将	参谋本部	陆军大学
6.史培曼	步兵中将	陆军大学	参谋本部、陆军大学
7.莱柏尔	军医司	参谋本部、陆军大学、八十七师等	
8.林德曼	退役步兵中将	陆军大学	
9.古 稀		陆军大学	
10.克里拜尔		步兵中校	
11.王思翰		步兵少校	
12.罗露夫		测量总局	
13.哈特曼	炮兵少校	测量总局	炮兵一团
14.赖 曼	航空兵上尉	测量总局	教导队航空班
15.饶美亚		测量总局	
16.布盖特纳		测量总局	
17.霍伯斯		交通司	
18.皮尔纳		交通司	航空署,铁道炮队司令部
19.喀诺布尔司多夫	通讯兵少校	炮兵学校	交通司、八十七师、税警团
20.百 禄		航空署	
21.佛莱迈里		兵工署	

22.亨尼希		兵工署	
23.杜好尔		兵工署	
24.麦次纳	化学瓦斯工程师	兵工署	
25.布鲁麦		兵工署	
26.屈本		军需署	
27.洛森	骑兵上校	骑兵旅	
28.罗伦次		骑兵旅	
29.蒋弟恩	骑兵上尉	骑兵旅	
30.爱基弟	军官学校	骑兵旅	
31.马德	步兵上校	军官学校	
32.诺尔特		军官学校	
33.凯塞		军官学校	
34.胡劳恩斯坦	步兵少校	军官学校	
35.达麦劳	步兵上尉	军官学校	
36.布鲁霍因		军官学校	
37.毕里茨	炮兵少校	炮兵学校	军官学校
38.希麦曼		八十七师	
39.马约	骑兵上尉	八十七师	
40.包尔	骑兵中尉	八十七师	
41.摩里茨		八十七师	
42.马丁		八十七师	
43.包茨		八十七师	
44.波洛		八十七师	
45.霍茨		八十八师	
46.施特莱勃	步兵上尉	八十八师	
47.史特斯纳	通讯兵中尉	八十八师	
48.韦白	工兵少校	八十八师	
49.霍默尔	步兵少尉	八十八师	
50.费尔曼	步兵上校	八十八师	
51.哈赛	炮兵上尉	炮兵学校	
52.基尔伯	炮兵卜尉	炮兵学校	

53. 毕格尔	炮兵中尉	炮兵学校	炮兵工团
54. 郝 茨	弹药士	炮兵学校	
55. 舒尔茨	工兵军官	炮兵学校	
56. 郎格尔	工兵军官	炮兵学校	
57. 魏尔克	步兵上校	步兵学校	
58. 布罗赛		步兵学校	
59. 艾勃卡		兽医学校	
60. 班哈特			
61. 邵姆堡	步兵上校	税警团	任佛采尔副官
62. 施坦因	步兵上尉	税警团	
63. 洛巴	海防专家		
64. 洛梅桑	侦探专家		
65. 毛伦霍夫	航空兵中尉	教导总队航空班	
66. 毛 奇	航空兵上尉	教导总队航空班	
67. 斯迭开	步兵少将	陆军大学	
68. 斯太丘	步兵少将	陆军大学	
69. 赖 义	海军上校	陆军大学	
70. 包姆巴赫	炮兵上尉	陆军大学	炮兵顾问

此次出征，佛采尔挑选了一批精华，使用教导一师和教导二师充当主力，随时侍奉蒋介石左右，就是想卖弄一下德国顾问训练的成果。

教一师、教二师堪称蒋军中精锐之精锐，骨干均由黄埔生充任，士兵也以各地征来的淳朴青年为主，绝少滑头轻浮的老兵痞、老兵油子，师长分别由冯轶斐、张治中担任，能征惯战，文武兼备。蒋介石也是看中其朝气蓬勃才交由德国顾问作试验点的。

此后，教一师、教二师成了蒋介石的宠儿，军饷充足，装备精良，官长一律呢子服，士兵一身黄叶叽，整齐划一，十分精神。它的编制也属甲种编制，以教一师为例，师下辖3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还有1个工兵营。至于武器装备，更令其他各军瞠目结舌，以德国制造的自动步枪为主，并配以加农炮，还有一队铁甲车。每个连的机关枪达到10挺以上，仅这一点，就使反蒋军望尘莫及。

教一师、教二师的训练工作也完全由德国顾问主持，一切按德国步兵操典要求，行军布阵，攻防转换，招招式式都带有德国陆军的痕迹，连军号鼓点都有德国味。

15日，归德之战正式开打，教一师担任正面主攻，教二师侧翼迂回包抄。冯轶裴杀鸡用上了牛刀，按照德军教典，先集中炮火施以轰击，大小不同口径的“卜福斯”、“克虏伯”、“十五生”一齐发威，将近一个小时，归德城外守军的附属阵地已被夷为平地。

这仗好打了，万选才部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哪里见过这种阵势。留在前线观察的佛采尔副官邵姆保上校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楚，硝烟散后，蒋军阵营里响起了冲锋号，进攻部队中的连排级基层军官首先站起身来，排成散兵线，高举手枪，向敌阵逼去。在即将到达对方射击范围时，后排士兵一拥上前，组成攻击队形发起冲锋，军官们则落在后面成了督战队。

“大有起色，大有起色。”邵姆保夸奖着他的德国同行，不过几个月，教一师已经被调教出了模样，这阵形、这模式、这精气神，有点似曾相识了。

归德之战，仅进行了两天，蒋介石以全胜而结束战斗，教一师、教二师被他好生夸奖了一番，佛采尔面上也有光。

战争，不仅仅是力的较量，物质的较量，也是人的较量，精神的较量，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众多。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名篇《战争论》就充满了这样的辩证法，但他的同胞佛采尔似乎忽略了这一点，蒋介石也忽略了这一点。

教一师、教二师装备是第一流的，但不能表明他们在中国战场上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归德之战不久，教一师就遇到了强劲的对手，冯玉祥摆了个口袋阵，晋军在民权、西陵寺、潮庄一线摆开架式，凭借坚固工事与蒋军激战，将其主力吸引到阵地的正面。

晋军善守不善攻，将士用命时，也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况且他们现在心中有数，仗打得自然有板有眼，沉稳得很。

张治中率领的教二师，会同刘峙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等蒋军主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相形之下，第一师、第二师都是老队伍，久经沙场，但

新组建的教二师不逊色，虎虎而有生气，或突前，或迂回，瞻之在左，忽焉在右，飘忽灵逸，加上武器精良，在与晋军对垒中，一点不落下风，随着陈诚十一师加入战团，大有一举突破晋军防线之势。

就在这节骨眼上，冯玉祥猝然发难，西北军主力庞炳勋、孙良诚、吉鸿昌、宋哲元等部采取包围迂回战术，突然出现在蒋军左右两翼，正面之晋军也奋起反击，蒋军几个师的主力部队全部陷入重兵包围之中，眼看将要遭到灭顶之灾。

北伐之前，遍数国内诸将，称冯玉祥练兵第一，西北军的吃苦耐劳、勇猛善战为各军之冠。他们缺枪少弹，但不缺勇气，尤其擅长夜战、近战、肉搏战。

蒋军的作战特点也很明显，武器精良，又受过德国顾问的精心调教，因此充分发挥了优势，如果摆开堂堂正正的决战之势，对手绝对难越雷池一步。有一次教二师在管村一带被团团围住，号称“吉大胆”的西北军猛将吉鸿昌虎目圆睁，与部下一击掌，相互勉励道：“三日内当灭此獠。”

这一仗打得好惨烈，冯军的进攻，如风如潮，但始终没有打乱教二师的阵脚。张治中确实带兵有方，德国顾问确实调教得力，教二师的火器配置、防御体系都十分合理，远则炮击，近则枪射，正射、俯射、侧射，阵前组成了一道严密的火力网。冯军的大刀队虽然勇猛，毕竟是血肉之躯，蒋军的阵前，尸体为塞，令吉鸿昌虎目流泪。

到了夜晚，则又成了西北军的天下，教二师的德国大炮被夜色淹没了威风，花机关枪也失去了准星，找不到目标。冯军大刀队蛇行虎伏，偷营摸哨，神出鬼没，让教二师防不胜防。这种零敲碎打，虽然不能置蒋军于死地，却也使其伤筋动骨，损员折将。

张治中应对无策，德国顾问也找不出破解的办法。德国陆军也很重视夜战，但那是大规模的穿插、奇袭，像这类骚扰战术，西北军确实更高一筹，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态，那种贴身肉搏时的凶猛，是蒋军所缺乏的，也是调教不出来的。数日之后，蒋军已是斗志涣散，士气低迷，不得不寻机突围。

教二师最终还是凭借其优良的装备杀出了血路，他们以铁甲车开路，中间裹以炮队，自动步枪营殿后，两翼花机关枪护住阵型，强行突破冯军的包围圈。尽管侥幸身免，但损失惨重，被迫放弃了预定的战略目标全线后撤。

这一战，让蒋介石清醒了许多，让佛采尔清醒了许多。现在，他们正在柳河车站的指挥车里，绞尽脑汁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蒋介石皱紧眉头站在地图前，形势不容乐观，蒋军在陇海线上发起的先发制人的攻势，以小胜开始，以大败告终，已失去与反蒋军决战的能力。在晋西南战场，马鸿逵的十五路军与蒋嫡系二十六军被石友三打得大败而逃。这个石友三，虽然反复多变，打仗却毫不含糊，有“剃刀”之称，教一师也曾与之交过手，丝毫未占便宜。石友三将俘获的教一师官兵捆绑在前沿阵地，让蒋军的攻击投鼠忌器。这种撒泼放刁的打法，佛采尔在教科书上是找不到应对方法的。于是，双方呈胶着之状。

由于石友三牵制了大量蒋军，阎锡山指挥的晋军主力沿津浦线正面蜂涌而下，5月29日强渡黄河，6月25日攻克济南，然后分兵两路，攻占泰安，袭取兖州，大有攻取徐州之势。津浦战场已完全在晋军控制之下，蒋介石的初期作战计划完全破产了。

所以，他把不满的眼光投向佛采尔，德国人制定的战术不过尔尔。看来佛采尔这位前德国陆军中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如包尔顾问多矣。

佛采尔紧抿嘴唇，两道浓眉挤得似要会师一处，他也没有料到冯军如此顽强，如此坚韧。也是蒋军太不济，德国人可以卖给他们武器，教给他们战术，但那种强悍却是学不来的。

一阵沉闷的雷声从天上滚过，正是七月流火的季节，指挥车里闷热难当，卫队的官兵大都三三两两散在车站附近，他们衣衫不整，贪婪地捕捉偶尔刮来的一丝凉风。

只有蒋介石和佛采尔依然戎装整齐，保持着军人的风度，文人出身的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不停地摇着纸扇，悄悄地溜出车厢。天色已晚，月光如水，周佛海长长吐了一口浊气，摇了摇发胀的脑袋，在他的脚刚刚与地面接触的一瞬，一阵激烈的枪声猝然响起，周佛海面如土色地又缩回了车厢。

“怎么回事？”蒋介石、佛采尔同时从地图旁转过身来，望着一脸茫然的周佛海。

侍卫长王世和倒还机警，从车厢探出头大声喊：

“升火！开车！撤！”

由于蒋介石坐镇柳河指挥已有时日,而且没有动身的迹象,因此一直待命出发的车头恰巧征调另用,王世和喊破嗓子也无济于事,指挥车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像一条死蛇。

枪声越来越密集,爆炸声此起彼伏,参谋长杨杰爬到车厢顶上张望,只见不远处的柳河机场火光冲天,“糟糕,归德空军基地被袭。”他不由地惊呼出声。

一时间,蒋介石与佛采尔怔在了当场。

佛采尔懊恼地丢开了手中大号的碳素笔,空军是他的王牌,担负着支援陆军、摧毁冯军正面防线的重任。据空中侦察队报告,这一战术已经收到了成效,兰封、考城、曹县、开封一带冯军防线已被炸得七零八落,佛采尔正准备建议蒋介石重新集结兵力,实施第二次突破。

现在这一计划已无实现的条件了,停放在归德机场的第四航空队几乎全军覆没。

也是他们太猖狂,惹恼了冯玉祥手下最擅打恶仗的骑兵师。那还是6月上旬的一个傍晚,两架“摩斯”式轰炸机执行完轰炸任务返回,在柘城发现西北军的一个骑兵团,见猎心喜,扎下机头,迎着马队一顿痛击。

恰巧冯部骁将郑大章在这个骑兵团。郑大章勇敢善战,却不知如何同飞机斗法,慌得打马而逃,被蒋机追得狼狈不堪。

这一怒非同小可。在战场上,只有郑大章打人的份,还从未有人在他面前逼过威风,所以被诮为“百胜将”、“飞将军”,今天这个面子是栽到底了。

所以他决定报复。

两个精锐的骑兵连在郑大章亲自率领下直插蒋军纵深,这是一招险棋,稍有暴露或延缓,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但郑大章艺高人胆大,躲过了蒋军数道警戒线,一个漂亮的直插,已经出现在归德机场的停机坪上。

轮到冯军的大刀显威风了,火光中,骑兵队纵横驰骋,蒋军守备队根本未能组成像样的抵抗,已经倒在冯军的大刀之下。杀得性起时,有人甚至向飞机抡起大刀,砍向轮胎,震得双臂发麻。

“浇汽油,放火烧。”郑大章骑在马上大喊。

几分钟后,归德机场已成一片火海,三架“可塞”、三架“摩斯”、两架“莱

茵”烧成了一堆废铁，郑大章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得手后的郑大章益发勇不可当，他想扩大战果，到柳河车站再去折腾一番，当然，他不知道现在的柳河正是蒋介石的驻扎之地。

歪打正着，郑大章插向了蒋军的要害。

蒋介石痛苦地咧了咧嘴，现在他已无心计较归德那边的损失了，他担心的是归德机场与柳河车站只不过一箭之遥，以郑大章骑兵的速度，一顿饭的时间，必定波及此处。

好在卫队训练有素，已经抢占了有利地形。远处，西北军的马蹄声在浓浓的夜色中隐约可闻，敲打得人心中发颤。

柳河车站的灯光刹那间打得雪亮，领头的郑大章勒紧缰绳，奇怪守军竟有这样的胆量，一副好整以暇、充满信心的模样。

佛采尔将军协助参谋长杨杰具体指挥这场遭遇战。杨杰是一名儒将，才高八斗，但对佛采尔很佩服，眼看着佛氏东指西点，把一支百余人的卫队安排得井井有条，柳河车站转瞬间形成了一座堡垒。

当郑大章的骑兵刚出现在视线范围，佛采尔朝杨杰示意，部队可以开火，先发制人。几乎集中了所有机关枪、冲锋枪，向郑大章的骑兵泼撒过去。所谓“先声夺人”，柳河车站的蒋军甫一亮相，就给人实力强大的感觉。

蒋介石也爬到车厢上，亲自指挥一个重机枪班投入战团。黑暗中，他不停地在胸口划着十字，他刚皈依基督教不久，祈祷西方的上帝保佑他渡过这一难关。

或许是西方的上帝帮了他的忙。郑大章一挥手，示意部队火速转移，他不想恋战，以为柳河守军实力不俗。殊不知，这是蒋军在唱空城计，以西北军骑兵的剽悍、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只要一个冲锋，蒋介石就难逃阶下囚的命运。

11

为营步步嗟何及 横扫千军如卷席

从车厢上爬下来，蒋介石已经是汗透重衫，脸上表情依然很平静。他这份镇定，也有刻意掩饰的成分，他是很注意维持形象的。

佛采尔却是从内心里就毫无紧张，坦然自若，他认为这是一个军人必备的素质，没什么了不起。

他还在为归德机场的损失而懊恼，所以当杨杰提出重新集结部队准备向陇海线发动第二次战役时，他粗暴地打断说：

“没有空军的支持，中央军只能像地面上的蚂蚁，推进不了几公里。以他们的素质，简直是在糟蹋德国人的先进武器，糟蹋德国顾问的智慧。”

蒋介石的自尊心大大受挫，立刻反唇相讥：

“中央军队是完全按照德国顾问制定的战术行动的，战场上的失利不能全部归咎于他们，指挥方面也有责任。”

佛采尔瞪圆了眼睛，他想找出更有力的话反击他的雇主。

杨杰连忙打圆场，他指着地图道，现在中央军已经陷入多面作战的窘境，得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佛采尔压下火气，恢复了冷静。刚才郑大章的突然撤退给了他灵感，对方的指挥肯定出了问题，这就是心理上的缺乏信心。平汉线上，反蒋军已越过许昌，武汉指日可下，冯玉祥却忽然鸣锣收兵；陇海线上，蒋军节节失利，对方却没乘胜追击，而是采取了保守的内线作战方针；津浦线上，阎锡山分

明已经取得先手之利,却在一边追击,一边修筑防御阵地,显出攻守上的矛盾和犹豫。联想到郑大章功亏一篑,撤兵柳河。佛采尔悟出了一个道理,反蒋军的底气不足,心有所虑,虑自己孤军深入,虑别人以邻为壑。因此他提议,不能把兵力分散,而应集中一处,从敌人最弱处下手,打开缺口。

“贵国有句成语,‘困兽犹斗’,冯的军队就是这样一只很凶猛的困兽,中央军委想降伏它,要付出代价的。”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古之名将均不屑为。”杨杰同意佛采尔的观点。

“那就打阎老西,他最滑头,坏点子最多。冯焕章与他有隙,北伐时期方顺桥之战就曾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再说晋军战斗力远不如西北军多矣。阎某治兵过于宽厚,手下双枪将甚多。”蒋介石嘴角出现一丝讥讽。

“双枪将?”佛采尔不解这个名词。

杨杰笑着告诉他,晋军中不少人都有大烟瘾,打仗时都随身带着烟枪,故称“双枪将。”

佛采尔摇摇头,这在德国军队中简直不可思议。

7月下旬,中央军委重启战端,作战重心从陇海线转移。蒋介石按佛采尔建议,把追击桂系的十九路军及夏斗寅的十三师,调往徐州以北,投入津浦战场的作战。李韞衍五十三师,从湖北经长江转海运,从青岛登陆,配合韩复榘部沿胶济线前进。

在陇海战场,蒋介石一口气抽出了第十六军、第四军、教三师等主力部队,第二军团的总指挥部也由陇海线的柳河车站转到了山东的滕县。佛采尔仍然不满意,指名要抽调陈诚的第十一师和教一师进入津浦战场。

蒋介石为难地倒吸一口气,这两个师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在后来的国民党五大主力中,十一师就名列其中,是陈诚集团的看家部队。前不久,陆陆续续运来的德国装备,除了分配给教一师、教二师外,十一师也理直气壮地拿了一份。在这方面,他们从来是不会吃亏的。在陇海战场的前期战斗中,这两个师也是顶梁柱,蒋介石往往把他们用在最关键和最吃劲处。

佛采尔耐住性子劝说蒋介石,不战则已,战则全力。拿下津浦线,整个战场就将大有起色。他保证,他将运用他在德国国内的影响,促成更大的军火交易,补充战争的损失。他知道,蒋介石还为前期战斗的失利,十一师、教一

师、教二师损失了大批的德国武器而耿耿于怀。

蒋介石牙一咬，摆出豁出去的模样，让佛采尔随心所欲。

阎锡山指挥作战，不是从军事战略出发，而是看战场上“行情”涨落。蒋军猛攻陇海线时，他大发神勇，陷济南，攻兖州，大有直驱徐州之势。如若他能保持这种势头，沿津浦线继续南下，很快将和陇海线西北军形成策应，握成拳头，砸向南京。

可惜他中途止住了脚步，眼看着十一师、教一师火速开往津浦战场，他最先想到的是保存实力，不进反退，从兖州撤退至新泰、石埠、黄山坨、尧山口、五家岭、九山、宁阳、汶上、平阴之线，并在东阿、肥城、泰安之线构筑预备阵地。佛采尔拿着空中侦察队拍摄的照片摊在蒋介石面前，乐呵呵道：吾计成矣。建议蒋介石立刻发动会战，彻底解决津浦线之患。

蒋介石依计而行，兵分三路，中央军沿津浦线正面向北佯攻，击尧山口、龙门山、攻宁阳；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右翼军的六十师由泗水向东，攻击新泰。六十一师由泗水跟进，骑兵一旅集中在泗水机动，左翼军的教一师、三师，在小孟、南马庄一带展开，向汶河南岸攻击前进。警二旅由南站向汶上攻击前进。第十师在宁阳以西，第一师在兖州西北为总预备队。炮兵集团集结于铁路正面的管村、李家坝附近。

佛采尔亲自下到炮兵阵地，参加具体指挥，蒋介石、杨杰等人也饶有兴致地前来观战。

蒋介石是学炮兵出身的，对于炮战并不外行，眼看着佛采尔把个偌大的炮群指挥得心应手，也不由夸奖道：

“佛采尔乃炮神也。”

佛采尔益发抖擞精神，神色动作多了几分卖弄和夸张。7月28日黄昏，总攻打响，佛采尔先以重炮猛击对方阵地，中间绝无间隙。于此同时，航空队也飞临泰安附近上空，校正炮兵坐标，伺机作补充性轰炸。一个时辰后，佛采尔一扬胳膊，炮队作延伸轰击，航空队也以轰炸代替扫射。随着凄厉的军号声，蒋军进攻部队一齐杀出。

真正称得上摧枯拉朽，晋军的防线早被炸得七零八落，佛采尔把个炮兵指挥得出神入化，炮弹像长了眼睛，成了攻击部队的向导、工兵，为他们打开

一条条通道。侥幸躲过炮击的守军还未从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醒过神来，蒋军的自动步枪已经抵住了他们的胸口。

战至8月4日，晋军全线崩溃，退缩于泰安、肥城、平阴一线。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陇海线上的冯玉祥，希望他能发动攻势，缓解蒋军对津浦线的压迫。

平心而论，至此蒋介石虽然已经确立了战场上的优势，但是由优势化为胜势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反蒋联合阵线仍未破裂，晋冯军实力犹存，关外张学良态度未明，如果蒋介石一味用强，激起困兽犹斗之志，这一场战争肯定旷日持久，中央政府的威信就会愈益堕落。

佛采尔也没有速胜的把握。他谨慎多了，前一阶段在陇海线和冯玉祥部队的较量，使他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韧劲。“那是武器装备、军饷给养完全不能与中央军相比的，否则，谁胜谁负只有上帝能判断了。”佛采尔如是说。因此，当蒋介石让他拿出一个迅速解决战事的计划时，他感到无从下手。

“只有等津浦线战事结束，我们才能继续对冯玉祥用兵。”佛采尔认为没有别的选择。

“等不及了，顾祝同打电报来，冯军攻势猛烈，他的总预备队都投入了使用，一旦冲进津浦战场，胜负将会逆转。”杨杰口气有点惊慌。

佛采尔也担心这一点。

惟有蒋介石，神情显得笃笃定定：“陇海战场我绝对有把握，你们现在准备善后战事罢。”他拉长了腔调，成竹在胸。

佛采尔不解地摇摇头。

战争艺术的最高境界，乃“不战而屈人之兵”。佛采尔只是一位穷兵黩武的武夫，哪能解得其中妙处。

蒋介石的手段尽管不那么光明正大，但却实用有效。他已经找到制服西北军的最佳手段，那就是两年前杨永泰向他所献的计策，以经济手段解决之。

陇海线战场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最荒唐的一幕。两军阵前，一排排活动帐篷、流动车厢星罗棋布，酒香、肉香、夹杂女人的笑声，银元的叮当声代替了刺鼻的硝烟、痛苦的呻吟、刺刀的撞击。西北军苦怕了，苦久了，在蒋军的“银弹”、“肉弹”攻击下，不战自降。

佛采尔自愧不如。德国人的先进武器，他苦心制定的战略战术，都不如

这些“银弹”、“肉弹”有效，他心悦诚服地夸奖道：

“蒋介石是传统中国敌对竞争者运用攻心战而表演至终场的大师。”

佛采尔承认，如果从一个战略家的角度来衡量，蒋介石属于统帅级的人物，他的政治眼光、他的全盘韬略，显然普通的军事将领达不到。包括他佛采尔本人，也只是一个纯粹的军人而已，也有自愧不如处。

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终于尘埃落定，至1931年11月，蒋介石已经在各个战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发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李宗仁、白崇禧也避居一隅，聊作卧薪尝胆之想。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

论功行赏，鉴于佛采尔在中原大战期间的表现，蒋介石予以“功不可没”四字评语。外国记者报道，大战中，佛氏和他的副官邵姆保少校下榻于蒋总司令的专列上，参与谋划，每一个决策，无不先听佛采尔将军的意见与建议。日方秘密派到前线观察中国军队作战的间谍也注意到：佛采尔率领德国顾问全副武装在归德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与蒋共生死，丝毫不避嫌他们的身份和使命。

蒋介石欣赏这种忠诚、勇敢、勤勉，因此他对佛采尔的态度在原来的礼貌和尊敬里又加进了亲热和随便。他们之间的讲话也变得不拘小节。有一次，蒋介石竟然口不择言地称佛氏为佛采尔上将。

佛采尔一怔，他在德国陆军中是以中将衔退役的，蒋介石却无缘无故给他拔高一级。

但他随即莞尔一笑，根据东方政治的特点——“朕即天下”，蒋介石发言了，就是圣旨，就是板上钉钉，他完全可以以“上将”自居。

从此，佛采尔一概自称为“陆军上将”。

这天，他应蒋介石之邀，来到蒋在中央军校的官邸。蒋起家于黄埔军校，住在自己的学生中间，他感到最安全、最亲切。

侍卫官将佛采尔领进了客厅，落座之后，他仔细地打量着四周。

客厅的布置简单而庄重，一排沙发、几张硬木座椅、茶几，墙上挂的是孙中山写给蒋介石的对联：

安危他日终须仗，
甘苦来时要共尝。

这是主人有意表明与孙中山的亲密关系。一张绘有山水的屏风给这间宽阔的客厅增加了点暖色调。

蒋介石缓缓从楼上下来，楼梯没有铺地毯，因而那有节奏的脚步声制造出一种出场效果，佛采尔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敛眉肃目。

跟在蒋介石后面的是黄埔系第一号大将何应钦。他本来也长得相貌堂堂，但在蒋介石的威严笼罩下，不禁显出了几分委琐。

何应钦，字敬之，贵州省兴义县人。有人形容他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云从龙，风从虎”，“若汤有伊尹，周有吕尚”，显然是言过其实了。

就何应钦一生表现来看，才华并不突出。对日抗争，他畏敌如虎；对共作战，鲜少胜绩。然而，他刚走上战场的时候，却有“常胜将军”的美誉。蒋介石记得很清楚，黄埔时期，广东政府举行东征，讨伐陈炯明。棉湖一役，何应钦沉着应战，挽狂澜于既倒，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刻挺身上阵，一举转败为胜，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当场解下佩剑赠给何应钦，以表敬意。北伐时期，又是何应钦在蒋介石纠缠于江西战场寸功未建、进退两难之际，率偏师直下福建，一路势如破竹，取八闽，掩浙江，打破僵局，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江西战场，为黄埔系挽回了声誉，为蒋介石挣足了面子。直至目前为止，在何应钦的征战生涯中，还没有打败仗的记录。

所以，蒋介石又把他派上了“剿共”战场。刚才，他们已经在楼上谈了好一会。

与佛采尔打过招呼，三人团团坐下，蒋介石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形势。

中原大战期间，各路军阀忙于厮杀，共产党则乘势发展武装，已经走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形成了气候。尤其是朱、毛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打出了一块天地。蒋介石是知道中国共产党能量的，不能不为之警惕，中原大战结束后，立即组织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指挥的第一次“围剿”，结果铩羽而归，湘军张辉瓒师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惊非同小可，共产党势力发展之快超出了他的想象，10万兵马居然被杀得落荒而逃。他牙咬了咬，随即组织第二次“围剿”，兵力也增加了一倍，

达20万之众。

刚才，他与何应钦讨论了“围剿”战略，两人意见不尽相同。现在邀请佛采尔，也是听听他的想法。

自中原大战后，佛采尔益发神采飞扬，益发好为人师。他没有直接对何应钦的战略设想进行评论，而是大谈了一通“闪击战”的理论。

何应钦皱起了眉头，他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对德国人的战术不以为然。

“闪击战属猝然打击的一种手段，往往多用于弱对强，小对大，有备对无备等类型战争。国军对赤军，是强对弱，大对小，而且赤区也早有防范，故闪击战效用有限，并有孤军深入险地之虞。”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佛采尔见状连忙反驳：“闪击战的价值是辩证的，弱者用之，即出奇制胜，一箭定江山之效；强者用之，则有雷霆万钧之威。据情报部门汇报，赤军数量已由第一次‘围剿’时的4万人减少到3万人，与国军作战兵力相比是1:7的比例。国军即使兵分数路，在相对兵力上仍占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次‘围剿’失败，症结即在于此。”何应钦厉声喝断！

“鲁涤平之败，在于情势未审，计虑不周，以10万之兵力分进合击，缝隙甚多。朱、毛轻易利用其空间，无妨出入穿插；张辉瓒之亡，在于轻敌冒进，长驱直入，造成孤军突出，使朱、毛得以集中兵力予以聚歼。前车之辙，后事之师，校长应该三思。”

蒋介石沉重地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职以为此次‘围剿’方针，应厚集兵力，严密包围及取缓进为要，一面加调部队及电闽防堵，以图布置严密；一面断绝物资输入苏区，而使红军坐困。其作战要旨与原则为八字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佛采尔鼻子里哼了一声，讽刺道：“何将军，我总算明白很多国军将领为什么私下里称您为‘婆婆’了。”

何应钦涨红了脸，军中确实有一种议论，认为何应钦过于谨慎，不敢弄险，有一种婆婆妈妈式的胆小与稳重。

蒋介石也有同感，因此他在同意何应钦八字方针的同时又希望何能采

纳佛采尔的意见,加快进攻速度。

“军事行动要快,趁朱、毛陶醉胜利,打他个措手不及。”他顿了一顿,又在何的八字方针后缀上另外八字:

“分进合击,互相策应。”

因此,第二次“围剿”中的蒋军战略,实际上是何应钦与佛采尔战略思想的大杂烩。

蒋军的这套战术,从军事角度看,本身就充满了矛盾。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其实是以占领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主。而红军历来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且这也不应是战争的主要目的。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歼灭对方有生力量。

正因为这种战略保守思想的限制,何应钦将佛采尔战略进攻的精神理解得支离破碎,面对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兵力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的意识极为模糊。他的进击战略单位是师,并未形成足以对付红军主力各个击破策略的更大的作战单位。虽然规定了“分进合击,互相策应”的方针,而下达给各路军的任务,却没有明确的“合击”目标,更不能临时组织起“合击”的力量。所以,只有“分进”,没有“合击”。

看准了这一点,朱德、毛泽东从容用兵,由西向东,逐一横扫。从1931年5月16日白云山战役吃掉公秉藩师开始,何应钦就没有听到过令人愉快的消息,北撤的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西援的高树勋第二百一十七师,据守广昌的胡祖玉第五师,扼守建宁的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均先后被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不过半个月时间,红军从富田到建宁,转战700里,连打5个胜仗,横扫何应钦800里战线,打垮蒋军13个师,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枝,真是痛快淋漓。激情澎湃的毛泽东,不禁唱起了《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12

佛采尔大展神通 朱毛险闯鬼门关

蒋介石哭了，哭得痛心疾首。这是在南昌行营一次作战会议上检讨“围剿”红军失败的教训时流下的眼泪，顿时引起举座哗然。

随同前往南昌的十八军军长陈诚站在校长的侧后，一脸怒气瞪着何应钦。弟子无能，师受其辱。是何应钦指挥不力，才造成赤匪猖獗，领袖不安。

列席会议的佛采尔顾问一脸傲然，事先他就说过何应钦的战术不行，果然言中，因此有一种未卜先知的得意与舍我其谁的神气。

何应钦耷拉着脑袋，他感受到了气氛的压抑，败军之将，夫复何言。

蒋介石在检讨自己，中原大战得胜后，他有点忘形，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因约法问题的争执，一怒之下竟然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关进了汤山，天下顿时大乱，群雄并讨。曾在中原大战中拔刀相助的粤军陈济棠也树起“反蒋”大旗，公开叫阵。蒋介石问计于智囊杨永泰，杨沉吟半晌：

“血浓于水，无论桂系、粤系、冯系、阎系，或者把汪精卫算上，仍然算国民党内内讧，争的是‘集权’与‘分权’，是要‘分肥’；共产党则不同，争的是社稷江山。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蒋主席（5月份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刚刚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当会把握。”

蒋介石重重点了下那精光的脑袋。

佛采尔也赞成杨永泰的意见。另外他也有私心，由于在中原大战中，德国顾问过于招摇，已引起外间舆论的注意，德国国内也批评他太不避嫌，现

在他想借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缓和一下气氛。因为欧美诸列强视共产主义运动为洪水猛兽，只要你标榜反共，其他地方出一点格也没关系。

“‘剿共’应当为目前第一要务，可转移国内视线，调整矛盾。纵观天下大势，无论英美、法日诸列强国，无不高张反赤旗帜，国内各实力派，包括陈济棠，也多以反共为口号。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如果贸然干扰政府行动，则以‘红帽子’扣之，责其通匪，号令天下共击之。”

蒋介石抚掌赞成。6月6日，莅临江西，御驾亲征。13日，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

“中正以为全国军人之在今日，应有屹然不摇之决心，方可膺此时代艰巨之使命。

“中国今日，实不患贫者，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定……”

所以，他在南昌“剿共”会议上痛哭失声，一则是要激发陈诚之流将领的“血性天良”；二者也是宣明态度，号令三军，悠悠诸事，灭共为大。他发誓，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

蒋介石如此自信，乃倚仗自己的实力。佛采尔告诫他，战争就得下本钱，就得专心致志，前两次“围剿”失败，就因为杂牌军作战的不力。

蒋介石脸上有点发烧，他确有借助共产党手，除去一些非嫡系部队的打算，但共产党却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这无异贪小而失大。因此蒋介石答应佛采尔，可以任意点将。

佛采尔一口气开出五个嫡系师的名单，作为此次征战的主力。

陈诚的第十四师，蒋鼎文的第九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卫立煌的第十师，这5个师俱是甲种编制，达十万众。加上现留在中央苏区周围的非嫡系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

在军事战略上，佛采尔费了一番心思。“步步为营”被他认为保守而弃置不用，改打“长驱直入”，但蒋介石告诉他，红军作战的特点就是诱敌深入，一些前线回来的将领至今还谈虎色变。

“必须解决攻与守的矛盾。”蒋介石特别加重这句话的语气。

佛采尔就是佛采尔，蒋介石的要求难不倒他。很快，他就拿出了自己的方案。蒋军布置如下：

赣粤闽边剿匪总司令蒋中正

前敌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贺国光

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

第三军团总指挥朱绍良

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

第五师师长周浑元(代)

第四军团总指挥蒋鼎文

第九师师长蒋鼎文

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

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赵观涛

第六师师长赵观涛

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陈诚

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

第十四师师长陈 诚

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

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

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

第六十一师师长戴 戟

第二军团总指挥孙连仲

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

第二百一十七师师长高树勳

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

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

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

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预备军总指挥卫立煌

第十师师长卫立煌
攻城旅旅长李延年
圭泰万贛4县守备军
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衡
第七十七师师长罗 霖
第十二师三十四旅旅长马琨
空军总指挥毛邦初
下辖5个航空队

蒋介石斜着头端详着这份兵力部署，马上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之处——把“围剿”军分为“进剿”部队和“驻剿”部队两部分。“进剿”部队担任“长驱直入”的任务，寻找红军主力作战；“驻剿”部队已占领的地区修筑工事，作为“进剿”部队的依托，并就地“清剿”，巩固已占领地区。佛采尔还着重修改了何应钦以前战术的缺陷，认为何未能发挥优势兵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以“师”为作战单位显得过于单薄。因此，把以一个师为一路独立行动，改为以两、三个师为一路，互相策应，防止被红军各个击破。据佛采尔了解，以红军现有的力量，朱德、毛泽东纵是钢嘴铁牙，也不可能一口吃掉两个师的兵力，这样在进攻上就完全可以有恃无恐了。

佛采尔还有惊喜留给蒋介石。在决定用兵时间上，蒋介石的本意是等夏熟以后，部队征齐粮草、军需，再从容出征。佛采尔连连摇头：“总司令所想，也是赤军所想。一场大的军事行动刚刚结束，双方都需调整休息，这是常情。但战争就应该超越常理、常规，才会出奇制胜。”佛采尔拿出空中侦察队的报告，指点说，朱、毛的赤军已经化整为零，散落到赤区的附近，进行扩军和征粮诸事宜，因为他们算定总司令目前会暂缓军事行动，所以才好整以暇，从容不迫。

蒋介石陡然站起，似乎一下子找到了胜利的钥匙，对佛采尔也从骨子里透出一股佩服，德国军人这种逆水行舟的顽强，这种不依不饶的专注，让他深有所悟。

5月底，第二次“围剿”宣告失败仅一个月，蒋军30万人的庞大队伍重新压向了苏区。7月1日，正式进攻命令即下达至各级官佐。兼任左翼集团军总

司令的何应钦指挥朱绍良、蒋鼎文、赵观涛、陈诚等部共7个师的兵力，由南城、南丰方面向广昌、石城、宁都猛攻，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指挥蒋光鼐、孙连仲、上官云相等部共7个师的兵力，分别由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一线，向富田、东固、崇贤、沙溪、莲塘、宁都等地深入，实行“进剿”和“清剿”，按佛采尔设计的战略，是想把红军驱赶到赣江边而一举歼灭。

必须承认，佛采尔的出奇不意、蒋介石的动作果断，让朱德、毛泽东始料不及，打乱了红军的部署。6月初，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召开会议，确定三期工作方向，分别向北、向南、向西发展。红军主力星罗棋布分散于闽西、闽西北一带。直到6月下旬，已经发现敌人有对中央苏区“围剿”的迹象，估计敌人“会很快向我们进攻”。毛泽东根据常理判断：

“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粮，所以敌人8月15日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了新谷才能前进。7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8月也可以不管他……”

所以，大战拉开帷幕后，红军曾一时难以集中应战，被蒋介石抢了先手之利。各路“进剿”军长驱直入，如闪电般从各个角度切入中央根据地的腹地，整个苏区完全笼罩在蒋军的攻击之下。7月13日，广昌被陷；19日，陈诚所率领的第一路进击军占领宁都，此为根据地之重镇，前两次“围剿”均是以宁都为主要攻击目标，然未能越雷池半步。陈诚立此奇功，着实让蒋介石喜悦了一阵子。他向佛采尔伸出大拇指，夸道：

“佛顾问制定的作战计划精妙犀利，已见奇效。赤匪屡经我军跟踪猛击，其漏网残余者，本已不及万人。其向会昌、汀州狼狈逃窜时，又被沿途民团袭击堵截，所剩更属无几。预计本(7)月以内，必定全部歼灭，以期清除国家根本之大患。”

佛采尔像是没听到蒋介石的话，他目光炯炯，正全神贯注在空中侦察队送来的照片上。

照片上，一条长龙般的队伍清晰可辨。

13

无功而返 蒋介石再度下野 顿失所倚 顾问团跌落凡间

这是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主力，正在火速回师，千里救援。

仓促之中，朱德、毛泽东匆忙应战，但没有半丝惊慌、半丝失措，阵脚依然未乱。

山道上，毛泽东抹了一把汗，他心中也暗自惊讶蒋介石这股狠劲，连舔伤口的时间都没有，又气势汹汹扑来报一箭之仇。

“蒋介石身后有高人啦。”朱德也自言自语道。由于消息闭塞，他们并不知道有德国顾问助战，但根据判断，蒋介石指挥作战向来拘谨，很少能逃出他们的测度。

尽管在战略上已失去制胜的先机，朱、毛仍从不利中看到了有利。蒋军始终未能准确判断红军主力所在，连连扑空，士气已有损耗，阵形已有破绽，正是红军出击的有利时机。

7月10日前后，驻扎在闽西、闽西北一带的红军主力千里大行军，日夜兼程，火速赶往战场。朱、毛心急如焚，如果敌人在苏区巩固起阵势，那就主客易位，红军原先所占的“天时”、“地利”、“人和”将荡然无存。

这是怎样的一场急行军。7月，正是盛夏，战士们背负着全部行装，顶着烈日，像浩浩荡荡的铁流奔腾于崇山峻岭之中，一泻如注，毫无滞留。根据朱、毛的部署，红军主力没有从驻地直接插向预定的作战地区宁都、兴国一带，那样将同敌人主力硬对硬地碰撞在一起，而是向南划出一道漂亮的弧

线，实行大迂回，绕过敌人进攻的锋芒，从中央苏区南部插入敌人背后，“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由兴国经万安突破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毛泽东丢开烟头，乐呵呵道：

“让二次反‘围剿’好戏如法再上演一场。”他又在回味“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那种痛快、酣畅。

蒋介石没有让毛泽东的好梦成真，还差点置红军于绝地。这又有赖于佛采尔的及时提醒。自随蒋介石来到南昌，佛采尔就提起一百倍的精神，要会会毛泽东这个山沟里的战略家。尽管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尽管攻城略地抢占了大半个苏区，他也未有丝毫放松。他知道红军的主力并未受到创伤，他懂得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战略目的，所以一直寻找与红军决战的机会。然而20余天来，却到处扑空。打广昌、袭宁都、取富田、抢东固，每战辄下。这胜利来得容易，也没有分量和价值。他以一位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的敏感，意识到某种危险的逼近。“朱、毛钻到哪里去了？”他瞪大眼睛寻思着。

空中侦察队的报告解开了他心中的谜团。朱、毛红军如今正向兴国集中，有向富田移动的迹象。佛采尔急忙拉蒋介石至军用地图前，两人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朱、毛果然厉害，那个地区正是蒋军阵势中“柔软的下腹部”。佛采尔隐隐感觉到腹腔中生出一阵疼痛。

“哼，袭我侧翼，打我薄弱。”蒋介石重重吐出一口浊气，“幸亏佛顾问发现得早。”他感激地向佛采尔瞥了一眼，脸色又转出了阴冷，“来而不往非礼也。佛顾问打算调哪支部队迎战？”

佛采尔已是成竹在胸，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限第十四师陈师长诚，第十一师罗师长卓英，即刻率部抢占富田，会同周边部队，寻找决战机会，以期一战而定胜负。”

陈诚、罗卓英闻令而动，两支精兵抢在红军的前面，在富安一线，布下了天罗地网。

朱、毛及时地缩住了脚步。毛泽东庆幸地说，还是老区人啊，不是他们及时报信，我们是往死路上走啊。

朱德的脸色依然沉重，部队撤得动作慢了一点，现在还有一只脚留在鬼

门关。周围强敌环伺，实际上已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只剩下高兴圩及其周围几十里的巴掌之地控制在红军手中。如果敌人发现涌来，对红军而言，将是灭顶之灾。他望了一眼毛泽东，对方也是愁云锁眉，吸着烟卷一言不发。

毛泽东口袋里的烟已被抽完了，他终于抬起了头，走过来与朱德商量。正面之陈诚、罗卓英部，左侧之蒋鼎文、蔡廷锴部，赣江方向之赵观涛部，俱是能战之师，一旦被他们咬上，难以脱身啊。惟有由龙冈向良村、莲塘进犯的上官云相第三路进击军，原是孙传芳旧部，乃北方军队，不习山战，容易被击破。

朱德频频点头，他补充说：以部分红军会同地方部队和赤卫队，伪装红军主力，向西佯动，示形于敌。把敌人精锐陈诚、罗卓英、蒋鼎文吸引到赣江边区，把蒋光鼐、蔡廷锴部牵制在兴国以东，出其不意，集中红军主力从中间突破包围圈，迎战上官云相。

8月5日晚，细雨迷蒙，红军主力乘敌人频繁调动之空隙，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第九师与第六十、六十一、五十二师之间40里的结合部迂回穿行。一向镇定的毛泽东也紧张得顾不得抹一把脸上的雨水。太玄乎了，40里的空隙让一支3万大军无声无息地通过，不亚于骆驼穿过针眼那样困难。不仅我方不能有半点偏差，半点闪失，即或敌方有哪支部队心血来潮越过了自己的防区，偏离了行军路线，和红军不期而遇，后果都可怕得让人不敢去想。

3万人的队伍犹如无声的溪流，偃旗息鼓，衔枚疾走，穿行在雨雾中、大山里。一切能够发光的东西都包扎隐蔽，白铁油桶用烟熏黑，白马穿上伪装衣；一切能发响的用具如铁锅、铁锹、锅铲，都用布包好；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不准响枪，不准……整整一夜，每个人的心都吊在嗓子眼。部队昼伏夜行，8月6日夜12时，准时插向预伏地点——莲塘之北的十万州山谷，随着一声枪响，部队如山洪暴发，猛虎下山，扑向上官云相的第九师。

红军从此敲开了胜利之门，十万州一战，全歼上官云相一个旅。然后乘势扑良村，郝梦龄落荒而逃。良村刚破，龙冈又被红军围得水泄不通。龙冈是张辉瓒葬身之所，守敌周浑元不住为自己祈祷，千万别作张辉瓒第二，于是深夜敲开报务员的房门，连声向南昌行营呼叫求援。他站在山头上，只见山

下火把点点，口令声声，枪刺在月光下闪着寒辉。他打着冷颤心里想，虽说龙冈工事坚固，但凭他孤军困守，总有一天，会被红军踏平山头。

已经就寝的佛采尔被蒋介石从床上叫醒，当他看到周浑元的求救电报时立刻咆哮起来，红军是怎么从高兴圩突围出来的？陈诚、罗卓英、蔡廷锴难道都睡着了？3万多人的大军从身边溜过都茫然无知。

蒋介石也很窝火，煮熟的鸭子飞了，再想把红军圈起来绝非易事。

发了一通火后，佛采尔冷静下来。凑到地图前，不禁发出阵阵冷笑。

他判断朱、毛攻打龙冈是虚晃一枪。他向蒋介石附过耳去，脸上露出了得意与残忍。

不幸被佛采尔料中，朱、毛一面兵困龙冈，一面竖起耳朵捕捉各方信息。得知敌毛炳文第八师已从君埠、南陵地区经黄陂而救龙冈，毛泽东眉毛一扬：

“调虎离山之计成矣。”只要打下黄陂，再北上攻临川，取抚州，就算脱出了蒋介石的天罗地网。那时候，就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了。

红军如乌龙摆尾，在龙冈甩出了一个大大的水花，又一头潜入深山密林。3日之后，当重新露出身形，已盘旋在黄陂四周，呼风唤雨，逞威施能。

总攻击的时间定在中午12时。天降暴雨，红四军、红十二军进入前沿阵地。朱、毛一改以往战术，借助雷电风暴，大搞精神震慑。军号集中，炮火集中，兵力集中，弹药毫无吝惜地铺洒向敌人阵地。战士们组成集团冲锋阵势，如巨浪排山倒海般奔涌。仅一个多小时，毛炳文第八师的4个团就从花名簿上勾掉了。

红四军军长林彪跑过来向毛泽东请示，部队是否继续追击。

毛泽东的烟瘾正在发作，他的浑身已经湿透，衣袋里的烟卷、火柴都泡潮了，点不着火。善解人意的林彪从怀中掏出刚刚缴获的听装香烟和打火机，这在红军是稀罕玩意。

毛泽东忙不迭地点燃香烟，一边喷着烟雾，一边责备林彪，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不懂得军情紧急，见机而作，乘敌人丧魂落魄之际，衔尾急追。

林彪面露难色，刚才与朱德匆匆见了一面，人慌马乱之际，只是叮嘱他收束部队，就急忙走开了，说是通知红十二军也暂停行动。

毛泽东一怔，朱德此举必有道理。

朱德带来的消息让毛泽东大惊失色，从毛炳文的师部缴获一份第六师师长赵观涛和第十师师长卫立煌发出的紧急电报，报这两个师已向黄陂地区开来，现驻扎在离黄陂仅10公里的砍柴冈。

真是苍天有眼！如果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敌人必将会师于黄陂，正在作战的红军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危境。要知道，赵、卫两师都是红军力求避免正面交锋的蒋介石精锐。尤其是卫立煌，此人行伍出身，却能在黄埔系一统天下的蒋军嫡系中立稳脚跟，没有一点真本领是打不出这块天地的。当年与孙传芳血战龙潭，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是北伐战史上最残酷的一仗。卫立煌一战成名，从此以善打恶仗，狠仗著称于世。毛泽东深知此人是蒋军中难得一见之虎将，如若被他盯上，想全身而退，谈何容易。

接踵而来的消息更让朱、毛觉察到形势的险恶。敌军主力被部分红军西引到赣江边后，连连扑空，知道中了红军调虎离山之计。莲塘、良村两次战斗后，尽管朱、毛在龙冈虚晃一枪，瞒过了周浑元，瞒过了毛炳文，但没有瞒过蒋介石，没有瞒过佛采尔。佛采尔站在作战沙盘前，长满汗毛的手比划着，纵然红军千变万化，出路只有一条，除非北攻临川，出抚州，否则跳不出包围圈。而黄陂则是必经之地，又疏于防范，聪明如斯的朱德、毛泽东是不会放过这个破绽的。蒋介石轻轻拍了拍精光的脑袋，急令赵、卫两师及高树勋第二十七师、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等共凑足8个师的兵力，星夜赶往黄陂，以堵住朱、毛的退路。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他庆幸地心里嘀咕了一声。

佛采尔的判断准确，蒋介石的布置也很及时，毛泽东确有北出抚州的打算。尽管打黄陂堪称神速，堪称出奇不意，但蒋介石却歪打正着，将红军一网罩住。

朱、毛连夜从黄陂撤出，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合拢，闪躲腾挪的余地已经有限。红军局促于君埠这一弹丸之地，一向潇洒的毛泽东脸色也严峻异常。

看来他的对手智商并不弱，脑瓜足够使唤。

毛泽东的好胜之心陡起，他喜欢挑战，喜欢同强敌周旋。红军已面临最危急时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他当仁不让地拿出了自己的主张，讨论可以，但必须执行。生死存亡之际，来不得半点犹豫和礼让。

朱德对毛泽东表现了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往日的宽厚变成了令重如山：“按毛总政委的命令去做，若哪一个出了差错，那是对红军犯罪，对革命犯罪。”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8月14日晨，红十二军佯动北行。蒋介石既已看透毛泽东意图，毛泽东干脆顺水推舟，利用蒋介石害怕红军北攻临川的心理，故意让红十二军招摇过市。军长罗炳辉把这出戏演得维妙维肖，一方面躲躲闪闪，一方面又故露破绽。蒋介石曾经产生过几分怀疑，佛采尔却对自己的判断毫不动摇，空中侦察队拍的照片很清楚，红军野炊时，那炊烟弥漫了半边天，不是红军的大部队是什么？

殊不知，这是罗炳辉反战国时孙臆添兵减灶之法，每次宿营，遍地挖下锅灶，烧上一把火即弃而不用，这种古老的战术，却瞒过了号称“现代战争理论家”的佛采尔。所以佛采尔理直气壮反问蒋介石：如果北行的红军不是主力，那么朱德、毛泽东率领的大部队总不能穿上隐身衣吧。

蒋介石也在暗笑自己神经过敏，蒋军已将红军堵在君埠一段，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并采取东西对进，红军除了向北跑，别无生路啊。

毛泽东却从绝境中觅得了胜机。

15日夜，在红十二军掩护下，朱、毛率领的红军主力由君埠向西疾进。每一个战士都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突围是一定的，但突围的方向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西进意味着和迎面而来的敌人作对面穿插。蒋光鼐、韩德勤、陈诚、罗卓英各纵队约20万人正分兵两路与堵在东北方向的赵观涛、卫立煌、许克祥等部会合，红军必须见缝插针穿行在敌人集结部。这中间的间隙最窄处不过10公里，且呈犬牙交错状，形势比上一次“钻牛角尖”更是危殆。

毛泽东又一次被逼到“钢丝上跳舞”。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是“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节”。他和朱德各自手握指南针，亲自带领部队前

进。在以往及后来的行军中，毛泽东如此紧张慎重，绝无仅有。

关于此次夜行军的气氛，有亲历者曾作过详细描绘，真是让人透不过气来：

……部队在大山丛中，沿着一条小河沟蜿蜒西进。一会儿走上山腰，一会儿又弯下谷底。开始还有小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钻进了荒僻的丛林草莽中。借着星光，可以看到新砍的树桩和灌木根。部队便攀藤附葛，在这新辟的山道间行进。就在不远的山头上，“咕咕咕，咕咕咕”，敌人的重机枪在单调地打着花样。手电筒的闪光，阴森森的忽明忽灭。在我们前进的队伍里，不断地传来肃静的命令。原来我们已经走到敌人两军的间隙里来了。离这里两翼不到5公里便是敌军。

直至天亮，大雾弥漫天际，山野间一片混沌，毛泽东才长喘一口气，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合围。部队行进到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一线休整待命。老区人民载歌载舞欢迎红军健儿，“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毛泽东的身躯也和着节拍而晃动，刚刚从险境脱离，他也需要调整一下情绪，松弛一下紧张的心理。

南昌城里，蒋介石、佛采尔却把心拎到了嗓子眼。但他们没有看到预期的胜利，蒋军主力已悉被红十二军吸引北去，整整半个月，依然没能找到红军主力。狂妄傲慢的陈诚大骂红军没有胆量与他对阵，久经沙场的卫立煌白了他一眼，这正是红军高明之处，陈诚这小子才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调一个位置试试，朱、毛早把他生吞活剥了。

直至8月底，蒋介石、佛采尔终于如梦初醒，又中了毛泽东调虎离山之计！再令部队西移，几十万大军跋山涉水，怨声载道。苏区地方武装和赤卫队不时干扰，一会一排冷枪，一会红旗满山，弄不清是红军主力还是游击队。一天应战数次，饥不得食，困不得眠，行不得安，焦头烂额，无所适从。“与红军作战是无期徒刑。”就连某些高级军官也发此哀叹。历经千险万苦，重新再与对手照面，红军已休养生息半个月，磨刀霍霍，严阵以待。

蒋介石却撑不下去了。尽管此人性格倔强，有一股死拼到底的韧劲，佛

采尔也劝他咬紧牙关继续和毛泽东周旋，但后院火起，已烧到了他的眉毛。因扣押胡汉民而引发的宁、粤之争已从怒目相向到拳脚相加，粤军陈济棠联合起中原大战失败的桂系军阀及失势的唐生智、反复无常的石友三，乘蒋介石集重兵于苏区之际，群起发难。先有唐生智潜回湖南，召集旧部，搅得三湘不安。此人为湘军旧宿，威望尚存，一旦东山再起，将是一个劲敌，故不可不防；再有石友三在北方挥刀弄棒，虽说他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南京政府已经朝野震动；最让蒋介石心惊肉跳的，还是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的联络，如今已兵发衡阳，这一着无异于朝他胸口猛击一锤，不得不从“剿共”队伍中抽调兵力去防范堵截。他仰天长叹，感到了力不从心。

总撤退令陆续传达至蒋军各部，蒋介石也在一片凄风苦雨中离开南昌，打道回了石头城。一路上蒋闷闷不乐，他在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论兵力，论装备，他无处不占尽优势，为什么朱、毛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难以撼动，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把这层意思透露给了佛采尔，心高气傲的佛采尔立刻敏感起来，他以为蒋介石指责他制定的战略战术有误，因此为自己辩解说：

“战略战术是通过具体的部队、具体的士兵去实现完成的，它对体现者也有素质素养的要求。从战斗的经过看，总体战略应该说是成功的，政府军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战场的主动权，两次把赤军逼到绝境，形成聚歼的态势，但他们两次都莫名其妙地松开了我们的绞索。迄今为止，参战部队的将领都说不清赤军是从哪里突围的。战场上取胜的机会来之不易，但政府军却一而再地把握不住战机。这样的军队，打胜仗才是怪事呢。”

蒋介石没有接话，他第一次对佛采尔产生了不满，认为佛氏在推诿责任，在指责他的军队无能。

佛采尔根本不理会蒋介石的脸色，径直说下去，他认为如果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能够投入这场战争，胜负则还是个未知之数。

蒋介石冷笑地哼出声来，原来德国军人也有虚荣心，佛采尔这是担心受到轻视，担心在雇主心中开始贬值。蒋介石脸色缓和了些，他为能够窥出人性的弱点而窃窃私喜，这将有利于他对佛采尔的控制和使用。

另外,他也认为佛采尔的话不无道理,他的军队在与国内军阀作战中还算差强人意,但与红军这样的对手较量,就显得盾不坚,矛不利。德国人训练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在中原大战中表现甚佳,是否能够承受更大的压力,应付更激烈的场面,尚待考验,但必须尽早有一个结论,因为这代表军队建设、训练的方向。

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是蒋介石的试验田,是佛采尔的心血凝结,是德国顾问在中国工作的成绩表。淞沪抗战爆发后,佛采尔带着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走上了战场,就像老师带着学生走上考场一般。

蒋介石惴惴不安地躲在南京观战,从江西“剿共”战场前线归来,他没有安生过一天,内忧外患,纷至沓来。高潮当数1931年发生的日军强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件,尽管蒋介石守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形势的发展已经超过了他能控制的范围。国内的抗日热情不断高涨,日军的侵略野心不断膨胀,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让蒋介石怎一个“愁”字了得。终于在1932年年底,因各种矛盾纠缠难解,他被迫第二次下野。

蒋介石下野,德国顾问团顿失依托,佛采尔也成了自由之身。

蒋在台上时,顾问团直属蒋介石,其建议一经采纳,即以军事命令方式下达执行,雷厉风行,快速、便捷,与德国军队高效率的办事作风相仿。另外,蒋介石对顾问团也予以了尊重的态度,这些都让佛采尔感到满意。

蒋介石下野前,曾考虑过顾问团的去处,把他们分别派往政府各军事有关部门充当顾问,成为各部门的部属。从天子脚下跌到了凡间,那一份不平衡溢了满脸。佛采尔特别激动,反复强调:

“我等以钧座进退为进退,绝不恋栈。”

蒋介石一阵感动,连忙安慰佛采尔稍安勿躁,大局仍有可为之处,蒋某人的进退也是政治上的需要。他劝佛采尔暂到军政部委屈一段日子,帮助何应钦处理军务事宜。现在,何应钦正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

14

上海滩硝烟弥漫 健儿男拼死疆场

刚刚跨进军政部，已听到一片吵嚷声。抬眼望去，对着何应钦大吼的，是佛采尔熟悉的八十七师一位旅长，叫宋希濂，此人黄埔一期毕业，平时文质彬彬，有一股书卷气，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对老长官何应钦大动肝火。

此时，正值“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的前夕，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拟将战场移至淞沪一带。自1932年初，挑衅不断，日本和尚、浪人、士兵连续生事。1月18日，日本僧侣5人到杨树浦向三友实业社总厂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寻衅，发生冲突，行凶日僧被工人殴伤。事后，日方诬称有一日僧因伤重致死，于20日煽动日本青年保护团团员50余人前往三友实业社纵火。日本政府立刻借口保侨，派出巡洋舰及第十五驱逐舰陆战队驶赴上海。1月27日，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赔偿、惩凶和封闭抗日救国会。

日军驻沪海军司令更提出撤退闸北中国驻军的无理要求。吴铁城揣摩蒋介石意图，本已全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日方竟于1月28日夜向驻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进攻，负责淞沪防务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也是一位血性汉子，毅然下令还击。上海滩顿时笼罩于大战的硝烟之中。

战争开始，日方参战部队为海军陆战队6000余人，并有航空母舰一艘助战，由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中将任司令官，分三路向闸北一带我十

九路军防地进攻。十九路军则利用街道楼群堡垒进行反击，战事一时呈胶着状态。

日军决定扩大战争规模，拟以植田谦吉中将任司令官，率第九师团及第二十四混成旅团驰援上海，驻防国内的第十一师团也在启运途中，白川义则大将随时准备赴任接替总指挥之职，将战线由闸北延伸至江湾、庙行、吴淞、宝山等地。日军战斗序列如下：

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

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

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

第十一师团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

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直亮中将

混成第二十四旅旅长下元熊弥少将(第十二师团编成的混成旅)

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植松。

我十九路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全国民情沸腾，一致要求中央军出兵助战。已故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认为，劝将不如激将。她效诸葛亮孔明激司马懿之法，将一件女儿裳转至黄埔军人手中，并附小诗一首，令人血脉贲张。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驻守在杭州的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首先按捺不住，找到蒋介石主动请战。蒋氏虽为在野之身，但依然牢牢控制着军队。

蒋介石眼珠转了转，表示很理解俞济时的心情：

“国亡即在日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

话锋一转，又将责任推到何应钦头上：“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赴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

有了蒋介石这句话，驻在南京的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来到了军政部，面见何应钦，要求出兵上海。

何应钦哪有对日作战的勇气，连连摆手称：他当不了这个家。

站在一旁的佛采尔脸上露出了鄙夷之色，“畏敌如虎，哪像一个军人”。他使了个眼色，招呼宋希濂出来。

淞沪战事一起，佛采尔已心痒难耐。确实如他所称，他是个军人，只对战争感兴趣，对政治则“讨厌”。只要让他有仗打，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正义与否等类的问题则不属于他考虑的范围。再说，食人之禄，忠人之事，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原则。

本着这个原则，他为何应钦出谋划策，甚至主动请缨，但这并非出于对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同情。另外，他还存着私心，就是想把德国顾问亲自调教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带到淞沪战场，用中国人的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

遗憾的是，佛采尔费尽口舌，也难说动何应钦。正巧宋希濂也来请战，佛采尔决定双管齐下。

他与宋希濂耳语一番后，两人分道而行，佛采尔径直找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已经度过刚下野时的那种失落，最近已与汪精卫完成了政治分赃，即将重新出山。他把这消息透露给了佛采尔，佛采尔向他表示了祝贺，然后拿出一本剪报，中外舆论都对现在南京主政的孙科政府多有指责，认为其对日政策过于软弱，这也是他们注定要下台的一个重要原因。蒋先生执中国政府之牛耳，也是意料中的事。

这几句话蒋介石爱听，脸上浮出了得意之色。

“蒋先生重登舞台，获个碰头彩很是重要，淞沪之战就是机会。”在中国生活久了，佛采尔也会将一些京剧术语用在日常对话中。

蒋介石点点头：“已经有人这样劝我了，这是刚拟的一份通电草稿，我马上让人译出来给你。”

通电内容如下：

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党国幸甚！

蒋中正 印

拿着这份通电，佛采尔兴冲冲来到军政部。听人说何部长已回府，此时尚不足午后4时，太阳还明晃晃挂在天际，看来何应钦也“清闲”得很。

走近何府，佛采尔发现里面已乱成一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他与宋希濂商定，由佛氏说动蒋介石，由宋氏回部队，煽动部下情绪，逼迫何应钦表态，同意参加淞沪抗战。

宋希濂拉上一卡车官兵，直闯何宅。黄埔六期生、现在八十七师任职的王作霖，一席话说得剜切动人：

“我是部长的学生，也跟部长当过参谋，我听过您多次的讲话，您总是勉励大家说，当军人的要保卫国家，爱国爱民，才算是克尽了军人的天职。但是‘九一八’事变丧失了整个东北，我们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都骂国民政府丧权辱国，骂我们军人无耻。现在日本人打到大门口来了，我们还不起来抵抗，这同部长平日对我们教导的话，是多么不相称！”

何应钦哑口无言，众怒难犯啊。佛采尔凑近他，递过蒋介石的通电，低声道：

“这是草稿，即将正式发表，蒋先生让我递给你过目。”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何应钦在心里对蒋介石大大不满，负气地冲着佛采尔：

“那就让第五军进上海吧，作战计划也由你负责，我过个目就行了。”

佛采尔早就跃跃欲试了。

这一次，佛采尔尽遣精华，张治中的第五军悉数上阵。除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外，连教导总队和宋子文的税警团都一股脑拿了出来。

前文说过，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号称有“五大主力”，分别为十八军（十一师为中坚），第五军，七十四师，新一军，新六军。其中第五军的骨干力量就是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而新一军的前身就是税警团。

通过各方面的情报，佛采尔猜测着日军的作战意图。为了更好地把握战局，并考察第五军的具体表现，他提出亲临上海前线的要求。

蒋介石眼里露出赞赏之色，一个军人，就应该有这种蹈危涉险的精神。

佛采尔到达上海时，战事已见扩大之势。日军激战10余日，两败于闸北，三溃于吴淞，部队减员近3000人，武器装备损耗严重，消息传到日本，朝野大哗。为挽回声誉，调集近万名士兵，准备“给支那人颜色看看”。

帐篷里，佛采尔和张治中俯在地图前。佛采尔用手指重重戳了一下庙行一带，断定道，这里将是日军主要突破口。

张治中眉毛一扬：“好钢用在刀刃上，就让八十八师守庙行，八十七师机动迂回，佛顾问以为如何？”

“我对他们充满信心。”佛采尔眼里闪出一些光彩。

战斗比想象中更要惨烈。负责指挥作战的植田谦吉策划了一个“中央突破”的计划，重点指向庙行镇南端地区，企图在突破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十九路军歼灭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席卷，将第五军歼灭于杨家行、吴淞地区。

2月20日凌晨4时许，植田命令日军大炮向江湾、庙行一线第五军阵地猛轰，飞机、装甲车、步兵协同作战。第五军也立即报以颜色，不让敌人越雷池半步。

佛采尔在望远镜中看得十分清楚，日军训练有素，陆空配合、步炮配合很是默契，各种战术运用得也很熟练，集团、个人作战能力都令人刮目。

而第五军的配备虽然在国内首屈一指，但与日军相比，就要逊色多了，这主要反映在重武器数量的不足，步炮的协同不够。但就作战能力看，则充分表现了平时训练水平，甚至有超水平发挥，攻防转换，俱有板有眼，足可与对方周旋。

然而最让佛采尔满意的，是第五军那股斗志。庙行之战进行了两天半，双方都杀红了眼，将重兵调集到竹园墩麦家宅一带，摆开了决战的架势。中国官兵丝毫不怯场，这种仗打得比内战过瘾，他们有一种责任感、荣誉感激荡充沛于胸间，由无形变有形，化精神为力量，这大概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言的“浩然之气”。它运行于四肢百骸，导引于意念行动，求仁取义，一往无前，奔腾犹如火焰，凝重宛如山岳。

对阵的日军第九师团也是王牌劲旅，在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的熏陶中，

在“武士道”精神浸润下，人性尽丧，疯狂如兽，其攻势如狂涛巨浪，汹涌不息。就连生性冷酷的佛采尔也暗自心惊，日军之凶悍，较之他一向引为自豪的德国陆军，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五军急红了眼。

八十七师五百一十八团三营十一连连长朱明，出征前已报必死之心，鼓励士兵曰：

“倭寇乘虚蹈隙，恣意侵掠，东北三省沦于万劫，东南半壁岂能瓦全。吾辈军人食国之俸，捍卫国土，奋勇歼敌，马革裹尸，此其时也。好男儿以七尺躯握三尺剑，此役战而胜则成功，而败则成仁已耳。”

朱明实现了他的诺言。这位来自江西的青年，家道小康，自幼聪颖，双亲钟爱如掌上明珠。从军后，志向远大，平时训练刻苦，爱兵如子。佛采尔私下里承认，就是在德国军队中，也很难找出这样优秀的青年。此次战斗，朱明统帅本连官兵向敌猛力冲击。其时，弹如注雨，炮若流星。朱明巍然不动，指挥若定。不意一弹穿喉，遂扑倒地。壮志未竟，英灵已杳，能不叹乎。

与朱明私交甚厚的八十七师某部代理连长裴福龙是福建闽侯人，“九一八”事变时，他即惭于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求战不成，曾打算脱离该师，只身前往前线抗敌。因此这一次随军出征赴沪，喜不自胜之态洋溢于外，歼敌立功之心鼓荡于内。庙行之战，枪弹横曳，居然未尝一变欣喜之色。远则长枪击敌，近则短刺肉搏。酣战中不觉部下已伤亡殆尽，遂大呼扑敌，血溅五步，伏尸数人。

生性平和的八十七师五百一十七团三连上尉连副蔡策元，平时娴静寡言，临阵却孔武多谋。中原大战时，蒋介石论功行赏，他辞避不受，尝谓：“仗剑乃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东三省沦陷，他愤然作色，口占一绝：

丈夫当一仰天啸，兄弟闯墙蜗角争。尘海茫茫几侠骨，更谁人去问东屏。
庙行之战，让他有了一泄其愤的机会。

随着敌军的猛攻，我军防线已呈多处溃漏之势，蔡策元率部随团作机动策应，补漏堵缺，率旗斩将。苦战经旬，却在一次转移防线中被敌包围，以疲惫之兵当五倍精锐之敌，从午夜直杀到第二天午间，仍难出重围。敌军又以

一千之众，突袭蔡策元所在团部。危急之际，蔡策元令战士多执手榴弹与敌作同归于尽之搏，幸得友军一部增援，才得免受垓下之围。突围中，蔡策元率先冲阵，身中数弹，长埋于血雨腥风之中。当其一息犹存时，尚喃喃作语：

“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东海填。同志们除敌未尽，兄弟们努力杀敌。”

八十八师五百二十八团排长顾伟，此役之表现更令人拍案击节。此人身世奇特，13岁即从老僧读《春秋》于深山古庙中，咏吟之中不知有世界，但儒家“尊王攘夷”及民族正气之思想已不知不觉浸透其血液。一日有客憩于庙中，与僧坐谈槐下，论国家多难，外侮濒临，不胜唏嘘。顾伟侧听之下，如梦里警钟，第二日则不告而辞，只有片纸留言：

“吾觅招兵所也。”

顾伟进了八十八师，因作战有功，升迁至排长。平时沉静寡言，战时身先士卒。上级曾有调令他至别部迁升，士兵尽哭而不舍，顾伟遂不忍去。此次庙行之战，全排士兵如一人，日军大众进犯，却难动阵脚，肉搏数次，终不得逞，遂以排炮轰击。霎时，阵地犹如火海，顾伟操机关枪奋勇还击，却遭弹片横削，右臂齐根尽折。该部营长落泪不止，命撤下战场，顾伟怒喝曰：

“不见有左臂乎？”

顾伟独臂再战，奋勇令人瞠目。稍顷，又负数创，乃大吼跃起，狂突敌阵。部下之士，见长官拼命，也随即出击，呼吼震天。攻阵之日军惧其凶勇，胆魄尽丧，弃战而逃。顾伟却颓卧于血泊中，长眠不起。

以上事迹，令佛采尔也唏嘘感叹，中国军人这种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并非是他德式训练的结果，他们身上蕴藏的巨大能量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战斗已呈白热化，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都亲自上前线督战。这两位黄埔一期生，官阶也不算低了，却将指挥部安在第一线位置。

张治中也亲率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前往八十八师指挥所策应。在这里，他遇到观敌瞭阵的佛采尔。

张治中也是一位名将，处事果断，审时度势，走了一着先手棋，急调八十七师旅长宋希濂率精兵强渡蕴藻浜，击敌侧背，缓解主阵地压力。

佛采尔做了个手势，请张治中暂缓决策。迂回击敌是他早想到的，但第五军兵种单一，工兵力量特别薄弱，中间横着一条大河，宋希濂身上总没有一对翅膀吧。

张治中有点不耐烦，他觉得佛采尔有点婆婆妈妈，保国卫家，总不能被一条水沟拦住道，中国军人有中国军人的办法。

果然，宋希濂到河边一看，渡河工作已经展开，速度之快连他也未想到：

“哪里来的这许多五花八门的渡河工具呢？除几只小木船外，还有大木桶……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打听之下，才知道两团的队伍，除留有一部分在北岸阵地戒备之外，全都渡过河，迅速驱逐或消灭了敌军的哨兵，向前攻击去了。我真没想到这样快的速度！当我登上一个小木船准备过河的时候，突然西面阵地工事里跑来五二一的一个连长（忘其姓名），一面向我敬礼，一面大声说：‘报告旅长，请准许我们这一连也过河去打日本鬼子。’我说：‘那怎么行！北岸阵地的戒备还是要紧的。’他说：‘旅长，我们在南京一再请求要来上海抗日，总算达到了目的，来了十多天，却没有机会和日本鬼子好好干一场，大家都憋不住气了！现在有了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全连的士兵简直难过得不得了，纷纷向我质询责难，弄得我也很难应付他们。’这个连长的一番话，使我恍然理解了有这许多形形色色的渡河工具和部队这样快就跨过了蕴藻浜的原因，是的，大家都憋不住了。”

由于宋希濂旅出兵神速，起到了攻敌不备、出其不意之效果。敌军的指挥部根本没有预想到我军会强渡蕴藻浜来攻击他们的侧背，不仅正面参加庙行镇进攻的日军感到威胁，右翼在殷行镇附近的敌军炮兵阵地也受到袭击。该旅某部连长刘宏扬渡河时就发出豪言壮语：“昔甘宁以百骑乱曹营，而我岂不能以百余健儿制倭寇死命耶。”果然，刘宏扬的话有幸言中，敌军终陷于数面夹击之中，停止了庙行进攻。所谓“中央突破”计划，至此完全落空。

此战，第五军两个师几乎全部投入了战斗，一役之间，伤亡官兵千余名，而日军精锐第九师团及久留米师团也遭受重创。从庙行到江湾，敌尸堆积如山，有三四千名之多。其惨烈，实为沪战爆发以来所未有。

一直在前线观战的佛采尔对第五军称赞不已，该军“成绩显著，无任欣

慰”。堪称一支精锐之师，攻得出，守得住，有冲击力，有韧性，完全可以与任何一支强敌相抗衡。他沾沾自喜道：如果能以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作为样板建设中国陆军，不久，他将能看到一支与西方最优秀陆军（德国陆军）相媲美的军队出现在东半球。

日军前线观察家也在发给国内的报导中敏感地提到了第五军，他们断定这就是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训练的样板师：“德国人在公然违背《凡尔赛和约》，但必须承认他们在中国的工作是有效率，有成绩的。沪战中支那军队的表现已说明，他们在战争理论和战术应用方面，已经接近了战争的精髓。某些局部的配合，可以窥出平时训练的有素。自动武器的装备率也普遍高于国内的其他部队，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向。”

尽管淞沪一役最终以当局的缺乏信心以及总体战略失误而遭致失败，但其咎不在淞沪守兵，不在第五军，不在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他们已向全世界显示了敢战、能战的勇气和力量。“我国、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就连蒋介石在打给张治中的电报中也如是说。

第五军的身价由此而倍增，为以后厕身“五大主力”打下了基础。德国顾问佛采尔的身价也因此水涨船高，国舅宋子文亲自登门拜访了他。

宋子文是典型的亲英美派代表，也不乏爱国之心，对日本的侵略深恶痛绝，因此主张对日强硬。他为佛采尔作为客卿先主人走上战场而感激，因此一见面就拱拱手：

“感谢十九路军及第五军的英雄们，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国际友人们，你们使我们懂得：只要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并加以适当训练，我们完全能够保卫我们神圣的权利和民族的荣誉。”

佛采尔并不领情，打趣说，自己是个食肉动物，是个军人，需要见血，需要听到枪声，如果宋部长（宋为当时财政部长）天天为他找一场战争消遣，他将活得很滋润。

“你们德国人和日本人一样好战。”宋子文眉头紧皱，“弱肉强食，生存法则。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他转向佛采尔，口气里不无失望。

“我们曾被告知：诸如国联盟约、华盛顿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等国际公约，完全能够保护弱国免受外来侵略。我们曾寄希望于这些国际公约，天真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被消灭。这一幻想现在已经被打破，我们就像如梦初醒，方才知道国际公约的效用须以实力为后盾。”

黠武主义的佛采尔大点其头，十分赞同宋子文的意见。

“不管怎样，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生存，她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力量，她必须英勇善战，她必须把国防力量置于公共教育、商业、民主原则和公民权等其他一切事情之上。事实上，生存是自然界的第一法则，应高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文质彬彬的宋子文牙咬得咯咯响。

他建议佛采尔扩大训练计划，可将训练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的经验向整个中央军体系推广。宋子文甚至要求，将财政部所属的税警团也交付德国顾问训练。

佛采尔这一喜非同小可。税警团是宋子文亲自抓的，财政部长用钱不愁，所有武器都是从欧美进口，成员也很精干，优中选优，强中选强，文化程度高，有极强的可塑性，该团团团长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高才生，与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窗。

但税警团在淞沪战场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因王赓在战斗最激烈之际探望前妻、名噪大江南北的交际花陆小曼时被日军俘虏，搜出炮兵阵地图，导致税警团遭受重大损失。痛定思痛，宋子文觉得美式训练有点散漫，不如德国人严谨、刻板，战争嘛，就是不近人情的事。

佛采尔一口答应了宋子文的要求。中国是个大市场，美国人也削尖了脑袋往里面钻，能够把他们堵在篱笆之外，由德国独占，何乐而不为。

他不知道，这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15

嘘声四起 顾问团饱受指责 疑神暗鬼 佛采尔犯蒋大忌

佛采尔准备大干一场。他向蒋介石建议,准备向德国国内广募人员,充实顾问团,扩大培训中国军队规模。

佛采尔的意见,遭到军政部的强烈反对。蒋介石下野期间,顾问团下放到各军事相关部门,接触面一大,矛盾便不可避免。这些顾问在蒋介石面前尚敛眉顺眼,到了下面就有点颐指气使,以教师爷自居,很遭逅病。

1932年1月6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军政部兵工署长陈仪首先发难,提请“改定外员顾问延聘手续,及约文内容以资遵守案”。打算对德籍顾问权限进行限制,并赶走部分不满意者。

一贯谨慎的何应钦不敢作主,他知道佛采尔还未失宠,贸然解聘,蒋介石会以为在挖他墙角,于是提笔批示道:

令兵工署署长 陈仪

为据称各顾问之延聘订约以及核定去留等手续,前悉聆决于国府主席。自移归本部后,其约文应否予以修改,附其合同底稿,签请核示由。呈件均悉。查此案经于本年第一次军事整理会议议决,关于外员顾问延聘手续,决议由军政部统一办理,关于约文内容应即仍旧,暂勿变更。除分令外,仰即知照。

此令。聘约底稿存。

部长 何应钦

自那出“逼官戏”后，没有蒋介石发话，何应钦什么事也不敢做。

佛采尔更加飞扬跋扈了。许多人都在想，如果他掌握军训大权，中国军队岂不成了德国顾问的天下？

于是，反对之声鹊起，一时不绝于耳。训练总监部第四期译述班学员魏汉乔中校向蒋介石呈送了一份题为《改进德籍顾问训练部队方法之报告》，提出了诸多批评：

溯自聘用德国军事顾问以来，已历五载，数十名顾问所训练之军队，除军校不计外，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而已。至今八十七师之连教练尚未完成，而八十八师则正开始班教练，进度迟缓，无可语言。此固由于频年征战，军队缺少训练时间，而其主要原因则实由顾问运用之未尽善也。现在所聘顾问，多分派到各师工作，每师至少须有顾问8人（步兵2名，骑兵1名，炮兵1名，工兵1名，通讯1名，重火器1名，总顾问1名）。设欲教练成20个国防师，则需聘用顾问160多名，以其月薪之高，未免太不经济，兼以我国现在紊乱之局，欲使20个师同时得有训练之机会，亦不可能。故生以为，最好莫如实行下列方法。

一、分班训练

按兵种之特性，各于相当地点设立短期军官训练班，以训练一般下级军官。譬如步兵军官训练班，骑兵军官训练班，炮兵军官训练班，工兵军官训练班，通讯军官训练班及步兵重火器军官训练班之类。

二、分期教育

譬如最先召集为师或某军各兵种之军官若干名，分班授以各个教练及班教练，然后遣之回队，以其所受之学，授之士兵，并严定其于一定期间之内完成，其教育期满，则由总顾问偕同高级长官前往校阅，是谓为二期教育。由此推进，以至整个教育完成。

三、改组训监部，取消顾问处

上述两项，乃关于军队实地教练之事，新式操典之编译、教程参考书之颁布，均与实地教练有密切关系，应当相辅而行者也。假如一方聘用德国顾

问，授军队以德式操法，一方又在训部编译诸多唾余及时代落伍之军事书籍，以为官兵参考，殊不免貽人以矛盾滑稽之谓，且南辕北辙，终难达到整军经武之目的。为除斯弊起见，应将训监部思想陈腐之留日派老军官概行淘汰而改组之。同时，取消军政部顾问处，将其译述人员归并之于训部，使其担任一切军事书籍编译整理之责。

上陈三种意见，果能见诸事实，非特无事之时对于训练不生故障，即在战时，亦可轮流抽调后方各部队之军官以训练之。他若进度之迅速，动作之划一，顾问之减少，冗员之淘汰，经费之节省，乃意中事耳。是否有当，仰祈鉴察。谨呈：校长蒋

训练总监部中校译述第四期学生魏汉乔谨呈

与魏汉乔提议同时上报的，还有军事委员会李待琛的《改良军事顾问运用以增加效力之管见》，用语尖刻，颇为切中时弊，他提议：

关于军队者：

一、主张不使顾问直接教练士兵，而以军官佐接受顾问之讲话，以资传授。

理由：

1. 士兵之程度太低，稍涉于学术之用语，顾问虽讲解，而士兵未必理会。不如使对军官佐演讲，再由军官佐教授士兵，则顾问可以尽量发挥其特长，而学修者可以接受较高深之学术。

2. 因译述者感觉材[?]难，故以军官佐为学修员，较之以士兵为学修员者，有较少之译述员即可敷用。

二、关于学校者主张亦准一项之要领。

三、关于工厂者主张亦准一项之要领。

但须有直接指授工匠之必要，使自应使之直接教育工匠，以期增进其伎俩。

四、主张使顾问为学术上发挥，而不使其为事务上之监督，或行政上之指导。

理由：

学习其特殊之学术乃聘用客卿之本旨，故凡起草计划或编纂军学之某种教程，或为长篇之著述等类之工作，最能使顾问尽量发挥其特长。至于事务上之监督，或行政上之指导，则于未尽谙悉国情之外员，其措施较之出于本国人员者，或易启扞格难行之弊。若欲吸收西方之美善风气，以改良吾国之弊习，亦可使顾问将其观察之所得，与夫改善之经验，向配属机关之首长建议，以供采择。

现时顾问人数既多，开支复巨，顾问之努力工作，成绩昭著者，固不乏人；而工作不力，毫无建树者，实亦不免，似此殊非我政府聘请顾问之本旨。待琛个人探其究竟，实以现时聘请顾问办法诸多缺陷，且各顾问之上，有总顾问处之设，我政府主管机关，不独无遴选人才之机会，并丧失直接指挥监督之权。故关于现有顾问之运用，殊不能敏捷，以收借才异地之效。兹乘开会讨论之便，除提出运用顾问之意见外，为便于运用方法之实施起见，更请改良聘用外员之方法，并取消总顾问名义。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提议人 李待琛

上述两份报告和意见书，摆在蒋介石桌上足有一个星期。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几次看到蒋介石对着它揉着太阳穴，苦苦思索，他开始对德国顾问的成效感到怀疑了，两年多时间过去了，佛采尔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八十七师、八十八师。按此速度，中央军的整训工作，建立所谓现代化军队的目标，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实现。

另外，他也感到佛采尔有点桀骜不驯，有点自高自大，有点恣意妄为。上次“围剿”红军作战失败，居然一股脑将责任推给了作战部队；淞沪战场，蒋介石一再交待，“照顾好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那是国军命脉所在”，但佛采尔却阳奉阴违，为了检验他的训练成果，将第五军推到第一线，打得遍体鳞伤，“娘希匹，不是自己身上肉不心疼呵”。还有，据说佛采尔已经接手对税警团的训练工作，为了重视起见，特意派出自己的副官邵姆保负责此项事宜。这件事，让蒋介石有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苦恼，宋子文这位国舅爷，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干得还不够瘾，又要把手插向军队，是何居心哉。

为此，他曾找过佛采尔，暗示他不要和宋子文套近乎。

佛采尔不解，如果是君主时代，宋子文就是皇亲国戚，成立一支税警团有什么关系？他试探着道：

“宋部长是您亲戚，那支部队对您绝对忠诚。”

蒋介石挥手打断了他的话。佛采尔不懂中国历史，不知道外戚干政的故事，两汉时期，外戚为祸曾达到过顶峰，汉家王室的衰败就是明例，这也为以后历代统治者所警戒。但这些话蒋介石当着外人面说不出口，只能强调佛采尔不能跟军界以外的人多联系。

“中国有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子文是抓经济的，应该心无旁骛。”

佛采尔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却并没有引起重视。

因此蒋介石决定敲打敲打他。

借着魏汉乔、李待琛掀起的风波，军事委员会于1932年9月1日召开临时会议，根据刘光等17人的书面意见，提出《改良军事顾问之运用以期增进效力案》。摘要如下：

甲：缔聘手续与办理机关：

1. 聘用事宜由聘用机关主持，不必用国府名义缔聘。
2. 先由聘用机关将需要情形及理由人数期限呈请军委会委员长核准后，再由各该机关遴选适当人员交军政部顾问处办理缔聘手续。

乙：聘用前注意事项：

1. 人数不宜过多。
2. 人选宜严格考查其长攻之学术是否适合聘用之目的。
3. 应以需要为主，其学识经验确实超过一般华员者始可决定聘用。若于国内人员程度等量齐观者可不必修。
4. 应委托驻外武官或公使确切调查是否现役，年轻校官以上之将校并注意其学籍，以为选用之标准，不可依赖顾问个人意见，随便推荐。
5. 凡欲聘用之机关可先将希望何项人才之条件要件告知顾问处，俾供给与希求合适。
6. 不必限定国籍，宜按需要情形分别物色。
7. 宜多聘技术人员。

丙：立约时注意事项：

1.最初试用期可定为6个月，以后继续聘用，每次以一年为度，或按照计划分别规定，不宜一律。

2.优待应有相当限制。

3.名义宜改称某校某队顾问，不必用国府顾问名称，或如技术人员均称为技师、技士。

4.薪金宜由聘用机关支付。

5.合同中应载明完全受聘用机关之支配。

6.现行顾问聘约中第10条规定事项宜删改。（第10条……顾问如有疏忽之处，总顾问有权首加警告，如警告后3个月仍未改变，然后向中国政府建议立时辞退之……）

丁：运用方式：

1.宜预定计划，俾使用机关常处于主动地位，顾问居于客体地位发表意见或建议。

2.宜集中于学校或组设各兵种教导队，令其训练造就干部军队或大部用于学校，以一小部分令其担任译述及重要问题之研究，编译各兵种技术教范，不宜令其直接训练士兵。

3.宜按技术种类组设各兵种研究委员会，令其参加研究或建议。

4.配属各机关应以其学力为主，不必固定于一机关。

5.使用机关应就关于建设上、改革上种种必要之问题令其解答或建议。

6.建议案之采用宜先分别审查，参酌国情规定实施程序。

7.所负责任及实地工作宜令本国人员共同办理，以便养成替代人员。

戊：管理与考核：

1.使用机关之主官应负考察全责，每年6月12日须将顾问成绩报送军政部备核。

2.服务机关派定后不宜时常调动，以免管理困难，费用虚靡，效能低减。

3.到使用机关后，应遵守该机关服务规则，并于每周或月终提出工作报告，交该机关。

4.关于学术科之理论动作宜求统一,并须顾虑国军编制装备,先行制定计划,编纂教材,须使用机关主管同意方可实施。

5.日尔曼人自信心颇强,纠正其计划宜谦和商讨,免生误会,致妨效果。

6.参与机密之顾问人数宜少,除优予待遇外,应讲求保持机密之方策。

7.评述人员应完全受聘用机关之管辖,与该机关内职员同等待遇。

己:职位与权责:

1.宜使其为学术上之发挥,不使其为事务上之监督或行政上之指导。

2.同一机关内有多数顾问不必另设领袖。

3.总顾问名义应取消,因法律上并无任何根据。

4.总顾问一席若必须设置,其权责应加规定,以免与其他顾问及顾问与顾问之间滋生误解。

以上种种,可以反映出南京政府对聘请外国专家,已经进入了一个较为理性的阶段,对外国专家的学识、专长以及是否适应中国的情况提出了要求,对其应负的责任、享受的待遇、遵循的规则都有了规范和约定。而在此之前,外国顾问团或顾问,往往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者大有人在,而且他们多以“教师爷”自居,养尊处优,颐指气使,干政弄权,对东道国缺乏尊敬。即以德国顾问团来说,德国是个战败国,其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但顾问团成员却从骨子里轻视中国。或许他们对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还有点拘束,因为他能决定是否敲掉他们的饭碗。而对中国其他军政官员,鼻孔却仰到了天上,与其工作发生密切关系的军政部与他们矛盾最大,一向好脾气的何应钦有时都忍不住私下嘟噜:

“德国佬太狂妄了。”

所以,这份议案从广义上来说,对中国聘请外国专家提出了要求、规则、办法;从狭义上来说,则是很有针对性地要求对德国顾问的权限、待遇进行约束,打击佛采尔的狂妄,不要忘了他是在中国,只是一个雇员。

蒋介石将佛采尔召到设在黄埔路的官邸,将这份议案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递了过去。

果然不出所料,佛采尔气炸了,灰褐色的眼睛里冒出了火苗,这第一项

第一款就不能让他接受，如果改由一般聘用机关聘用，他的价值将一落千丈，从“国师”沦为普通部门的配属。作为原德国陆军的参谋长，那份自尊心让他受不了。

回到寓所，军政处正式公函已到，精神与在蒋介石那里看到的议案大体一致。佛采尔一夜未眠，拿定了主意，“合则留，不合则去”，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

德国顾问团的命运全寄在这封信上了。

蒋介石用人有一个标准，就是以忠诚为第一位。这里所说的忠诚仅是指对蒋个人的忠实不二，而且不受任何道义、良心、大局利益所约束，死心塌地，无悔无怨。

当周佛海呈上佛采尔的长信时，蒋介石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已经心里开始考虑佛采尔留用与否，一切将依佛采尔的表现而定。这封信让蒋介石看了颇为感动。

委员长钧鉴：谨呈者。昨接军政部顾问处公函开：奉军政部转奉军事委员会开，嗣后顾问聘约由各级顾问服务机关长官或指派人员签字。等因，奉此。相应函达，即希转知已聘及未到各顾问。等由，准此，嗣后德籍顾问聘约悉由服务机关长官或指派人员签字，除即函军政部顾问处转呈军事委员会声明此种办法法律上不能成立外，敢不揣昧，请将左呈各节详加察核而剀切训令，实深感佩。

“真是个急性子。”蒋介石心里笑了笑，他喜欢急性子人，这种人一般心直口快，好控制，易驾驭。

佛采尔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不能修改聘约的道理，归结到一点：他是蒋介石的顾问，而不是中国的顾问，他相信的、服务的、效劳的都是个人，围绕着这个个人的所有利益，所谓“荣辱系于一身”。他在信中明确表示：

窃以为服务华军之德籍顾问，由钧座招致来华，官佐与军事技术人员，不问资格之深浅，年岁之长幼，俱因钧座之名驰中外，故不惮远涉重洋，愿供驱策。兼之各人愿本其所知所能，效力于中国陆军，以资赞助，是全体德籍在

华顾问服务之基础，非仅建筑于法律，实兼建筑于信仰也。其信仰之表示。最重要者，为全体顾问参加中国军事之改革。顾问当时应钩座之聘，来华任总顾问之职，为各顾问领袖者，亦以此为先决条件。

佛采尔声明，德国顾问团除蒋介石外，谁也不买账：

钩座事繁，自无暇签字聘约，故派一政府与军事方面大员，而以即军政部部长代行职权，故于签订聘约一层，法律上有明确之基础。惟非此则德籍顾问断不肯数年之久远离祖国，来华任军役。数年以来，关于法律信仰问题，从未发生何种困难……凡新聘顾问，必在德国方面示以有法律基础之向来通用聘约。惟根据聘约内之明文规定，德籍顾问对国民政府，即对国民革命军，在钩座指导之下，有履行聘约之义务。今后聘约不由钩座所指定之法律人员签订，而由服务机关长官或指派人员签订，则德籍顾问与国民革命军及钩座之信任情形，完全改变，是以不敢赞同。

照新规定，各师长、各校长、各署长等或其他指派人员，非特对各顾问聘约有签署之权，并且能任意修改，因德籍顾问专为信仰钩座而来，故无人肯赞成此种办法。

来华日久，佛采尔也知道了些官场内幕，知道蒋介石对何应钦有某种不满和戒备，因此他也来个“以夷制夷”，集中火力对何应钦掌握的军政部展开攻击：

顾问党军事委员会根据军政部建议而公布之规定，并未虑及凡与外人签订合同，莫不有法律基础，而对方法律代表人员，经由钩座指定，若照新规定办理，则聘约已失法律上之根据。

目前面谒朱总监，始悉此次变更主动者为军政部，顾问党军政部方面，对德顾问之工作，完全视为无足轻重，或且不予赞同，显为钩座革新中国军事之阻力。

由于佛采尔代表顾问团方面的坚决拒绝，并以效忠蒋氏个人赢得了蒋的欢心，所有改革顾问团工作的意见、方案都无疾而终。蒋介石于1933年9月16日电令参谋本部“军政部顾问处属隶问题应暂缓议”；1934年5月18日，又一次下令“兹令各处德顾问以后改属于本委员长直接管辖而受总顾问之指

挥”，军政部顾问处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处”，“转饬听属一体遵照”。德国顾问依然是天子近臣。

为报蒋介石知遇之恩，佛采尔以他自己的理解作了最大的努力。他以为对蒋介石的最大报答，是帮助蒋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的，具有极强战斗力的军队。为此，他殚精竭虑，跋山涉水，餐风宿露，言传身教，摸爬滚打在第一线。

这一天，佛采尔在八十七师训练场地正讲解战术动作要领，已是接近花甲之年的人了，又曾素负盛名，但佛采尔对这些最简单的战术原理依然讲得认真，动作做得十分到位。讲解间隙，他注意到西装革履的财政部长宋子文远远地站在旁边，佛采尔知道是找他的，但并没有分神，一直等课讲完才迎了上去。

对佛采尔这股认真劲，宋子文有点不以为然。德国人严谨得有点过分了，他们几乎是捏着钟表过生活，机械、精确，但太呆板。

“最近很少在税警团见到你们人了。”宋子文道。自淞沪战后，他们曾亲近了一阵子。

佛采尔不自然地嗯了一声，他不能给宋子文讲，这是蒋介石吩咐的。

宋子文没有再问下去，他意识到佛采尔有难言之隐，也隐约猜到了些什么，但他无所谓。对蒋介石，他还没有服从到俯首帖耳的程度，早年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让他还保持着某种人格的自尊。

今天，他是特地邀请佛采尔一道北上的。淞沪之战烽火刚熄，长城关口狼烟又起。从1932年1月发生的榆关之战起，日本军国主义一步紧迫一步向所谓“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力图改变这个体系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格局。此种努力的基本方向，就是从对中国局部性和间断性的侵略战争发展到全面性和长期性的侵略战争。与此相对应的是，蒋介石也从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内“剿共”，转变到联共抗日，将重点转向对外抗战。对于日本，则是从“绝对不抵抗”，到“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发展到最后放弃不抵抗政策，走上对日抗战的道路，但这一切是勉强的。

长城抗战之初，蒋介石先是按兵不动，视线仍盯在共产党身上。但热河吃紧后，他坐不住了，一些社会名流如胡适、丁文江、翁文灏密电献策：

“热河告急，决非汉卿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

蒋介石于是派出自己的大舅子宋子文先赴北平劳军，鼓舞士气，表示国民政府对热河抗战和长城防御的重视，并兼顾外交上的周旋。这是一趟苦差，但宋子文没有推却，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作为炎黄子孙，他的血还是热的。

他之所以邀请佛采尔，因为佛采尔是军事专家，他的意见将对今后的军事行动有所裨益。另外，佛采尔有一个观点他也很赞成，政府的军队应以防御外敌为主要功能，中国目前最主要敌人，是想以灭亡中国为目的的日本人。在为中国设计的总体战略规划中，佛采尔也是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当然，这一切他只是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他不是正义的卫士，但他是个优秀的职业军人。

佛采尔没有马上接受宋子文的邀请，蒋介石的警告言犹在耳，让他与宋子文不要“走得太近”。

宋子文知道什么最能打动佛采尔。他描绘了一幅炮火连天的场面，这是未来中日大战的预演，将昭示着今后战争的发展，为今后战略规划的制定提供实验性的数据，等等。

佛采尔心动了，尤其是听说何应钦不久即随大军而到，并以十七军军长徐庭瑤组成华北第八军团，下辖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刘勘的第八十三师，准备投入战场。以上所述各师，均为蒋军嫡系，虽然不像八十七师、八十八师那样由德国人一手训练，但也派进了德国顾问，装备了德式武器，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好坏，也直接反映了德国顾问的训练效果和成绩。

佛采尔两眼发亮，早忘了蒋介石的告诫，以“考察”为名，与宋子文联袂踏上了北上的旅程。

宋子文到了北平就裹住了脚步，这里是他发挥能量的场所，捐款、演说，约见各国驻北平公使，佛采尔百无聊赖，只能跟着宋子文打转。

一直等到十七军到，佛采尔才有一种鱼归大海鸟归林的感觉。他喜欢

军营,喜欢戎马生涯,喜欢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喜欢死神擦肩而过的那种感觉。因此,当十七军开赴前线时,他不顾宋子文、何应钦的劝阻,一甩手,扬长而去。

何应钦摇摇头:“匹夫之勇。”他这样评价着佛采尔。

宋子文也摇摇头,但愿佛采尔这种勇气、责任心和认真劲能移植到眼前这位中方主帅身上。

由于蒋介石未战而先定基调,只以防御为守,很快导致热河沦陷,战事发展到长城防御阶段。因此,确保长城一线的安全,对南京政府来说,是稳定现状、以利将来进取所提出来的战略要求。对此,何应钦颇为乐观,从热河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和紧急北调的中央军在兵力上已占优势,加上万里长城的天然防线,虽不足胜,却也不虑败。因此确立了如下的战略构想:凭借长城及其周围的险峻形势,死守各关隘卡口,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争取时间进行国际交涉。

佛采尔长长地叹息一声,中方的战略太保守了,缺乏一种必胜的信心和勇气,这种情绪将会潜移默化地导致整个战局朝着黯淡的一面发展。

最初,他随着关麟征的二十五师行动,3月9日,部队赶至古北口,恰逢东北军六十七军王以哲部不支而撤,关麟征对于混乱中接防面露难色,这样,他的部队就正面突击在第一线。佛采尔从实际情况出发,向关麟征建议,从地形上看,长城比古北口地势高,高屋建瓴,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来犯之敌。副师长杜聿明也深以佛氏意见为然。但关麟征摇摇头,坚持将部队布置在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以避免日军锋芒。长城第一线守备仅留下东北军一百一十二师某部一个团的兵力,从而致使后来被动困窘。这让佛采尔感叹万分,关麟征也算得上一员虎将了,为什么却难脱国民党军队派系矛盾的影响而顾全大局。

果然,11日,敌军发起总攻后,一百一十二师阵地随即被突破。由于失去犄角支持,二十五师立即感到了压力,右侧阵地一个团联络被截断,整个防线顿呈扭动不灵之态。

也许关麟征意识到心胸的狭窄,对造成的损失感到内疚。他又发挥出勇

将的本色，亲率特务连赴右翼指挥。佛采尔暗暗点头赞许，对关麟征的印象有所改变，中国军人本不缺少勇气，只是缺少阐发、诱导和激励。他眼看着关麟征穿行在枪林弹雨中，突然，一个踉跄，高大的身躯仆然栽倒，犹如一堵墙轰然而塌。

事后得知，关麟征中了暗算，在敌一潜伏哨阻击下被手榴弹炸伤。但他咬着牙站了起来，仍指挥七十五旅反攻，夺回阵地。激战整日，二十五师阵地巍然不动。

12日的战斗最为激烈，尽管中央军装备较国内杂牌部队为优，但在日军的立体化攻势面前，却显出火力的单薄。战士们被日军炮火压得抬不起头，防御工事如同虚设，仅一阵排炮就被炸得七零八落。战术思想也过时落伍，巍峨的长城、险峻的山势，在冷兵器作战时代是天险，但在现代化战争中这种优势就大打了折扣，甚至带来相反的效果。炮弹落处，山石崩裂，如同开花弹，许多人被砸得皮破肉烂，日军的火力无形中增加了数倍。

最让佛采尔焦急的，是通讯设备的落后，二十五师各作战单位的联系，主要还是靠电话机，几个回合打下来，已剩不下几条完好的线路。眼看着杜聿明在指挥所里急得团团转，对着话筒声嘶力竭，无可奈何；眼看着电话兵跑进跑出，伤亡累累，不断减员，二十五师就像是一块大蛋糕，被日军切成数块，陷入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最悲壮的一幕发生了，该师某部7名士兵陷入敌军重围之中。为了保存力量，以待后援，杜聿明决定将部队转移到预备阵地，但由于联络中断，这7名战士未及跟上大部队行动，仍然据守在一个小山头上。

日军正要衔尾猛追，却遭遇到这7名战士的阻击，大部队硬是闯不过去，不禁恼羞成怒，大动干戈，出动飞机大炮认真地与这支孤兵对垒。当攻下山头后，7名战士全部殉国，日军对这种勇敢精神也油然而敬佩，特将这7名士兵的遗骸埋葬在一起，墓碑上铭刻着：“支那七勇士之墓”。

佛采尔默默无言，他感到了一种震撼正在他的心中升腾。以中国军人之勇猛、无畏，只要假以时日，训练得法，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一支最优秀的军队。

随着战争的进程，佛采尔也越来越有信心了，他已经看出攻方的破绽，已呈强弩之末，力有未逮之颓势。相反，中国人却越战越勇，显得后劲十足。他算过一笔账，进攻长城一线的日军计2个师团、3个旅团及3个骑兵联队，由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而何应钦手下可供调动的部队，计27个步兵师、6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还有若干炮、工兵部队，兵力绝对占优。所以，他隔过何应钦，直接向蒋介石呈送了《对攻击侵入热河日军我国应取之军事行动之意见》，指出：“由于日军于古北、喜峰诸口及其他各要隘经试探性之攻击未能得逞，实为其兵力不足之故。我军若获得胜利，未始不可由喜峰、古北两口同时出击而夺回承德、宽城线内之失地，击退日军于相当地点。”为了确保这一局部战役的胜利，佛采尔还托人带讯，请蒋介石派出八十八师，以期一锤定音。

接到佛采尔的意见书，蒋介石确有增兵打算，这几年受尽了日本人的恶气，也有心挺直腰杆对日本人说一声“不”。于是抄起电话，准备接通八十八师。

汪精卫一脚踏进屋子，面色欣喜：

“英公使蓝浦森调解有望，日本军方已答应谈判。”自从“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和蒋介石几分几合，现在一主政，一主军，又组成了国民政府的双驾马车，在对日问题上，他是一贯主张妥协的。

蒋介石眼睛里露出了怀疑，小鬼子没有信义，现在停战怕是缓兵之计。

“这回是真的，日本陆军部已密令关东军：‘如不立即撤兵，将奉敕令下达撤退命令。’也就是说，日本天皇都出面阻止了。关东军于4月19日终于紧急下令前线部队：‘一律返回长城一线。’和平的曙光终于出现了。”汪精卫兴奋得满脸飞金。

突然，他看到放在桌上的佛采尔报告，不禁摇摇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佛采尔只是一介武夫，哪里懂得政治与外交的妙用。汪精卫告诉蒋介石，他已派出亲日派人物黄郛赴北平协助何应钦谈判，值此之际，千万不能向北方再派一兵一卒，以刺激日本人，使“和平”成为泡影。

蒋介石有点犹豫，现在他已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如果坐失良机，则将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日军一旦卷土重来，中方以现有兵力是守不住长城防线的。

汪精卫一跺脚，为蒋介石冥顽而恼火：“‘攘外必先安内’是委员长亲自制定的基本国策，自古兵家最忌的就是两面作战，现在江西的‘剿共’战争正在吃紧的时候，孰重孰轻，委员长心中自有分寸。”

蒋介石猛然惊醒，连连点头。前不久，他刚刚发表了《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演说，“日本侵略是外来的，好像是皮肤上渐渐溃烂的疮毒”，而共产党的“捣乱”则“是内发的，如同内脏有了毛病，这实在是心腹之患”。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他只能置皮肤之患而不顾，寄希望于中日妥协的成功。

事后查明，日军的暂时撤退，只是日本内部军部与特务机关之间的谋略与战略之争，随着中方的示弱，日军又重新集结兵力，向长城一线发动进攻。

二十五师转移至新阵地不久，黄杰的第二师就赶过来接防。在这期间，佛采尔也去了趟北平，打听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是否采纳接受他的意见。

何应钦劝他就此留在北平：“马上就要谈判了，委员长吩咐，一切以维持现状为妥。”

佛采尔心一惊，据前线侦察所知，日军最近调动频繁，仅古北口外，就增添了大炮30门，战争的气味已经刺鼻的呛人，何应钦却在此奢谈什么和平！

他匆匆赶回前线，步子又沉又重，未来战局的发展，他知道凶多吉少。

第二师四旅旅长郑洞国接防的阵地位于南天门一带，佛采尔赶到时，正处于两军前哨接触战。黄杰师长拉着他巡视了阵地，希望能提供一点意见。

佛采尔指着郑洞国阵前左翼制高点八道楼子，希望黄杰至少派一个营的兵力加强守卫。

黄杰很不以为然，八道楼子地势险要，穿着大皮靴的日本鬼子根本爬不上那么陡的山坡，故仅派了一连士兵。谁知日军乘夜色掩护，偷袭而成。一夜之间，利害相易。

南天门一战打得实在艰苦，日军得地势之利，复以陆、空军联合作战，步兵群一波接一波掀来，曾几度冲上阵地，与我军在工事中肉搏。

佛采尔吃惊地注意到，“武士道”浸润下彪悍的日本士兵，在与瘦削的中国军人肉搏战中并不占便宜，因为这不光是比技术、比力量，也是比意志、比勇气、比心理素质。中国军人首先在气势上就不输于人，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滋生在心里，贯穿于四肢，凝聚于枪头，黄埔七期生、某部排长王政道出了这种力量的来源：

“国难日亟，非热血无以救亡，虽物资远逊敌人，负此大好头颅，终能抵抗也。”

易水悲风，哀军必勇，将士用命，居然以残陋之器在南天门一线阻挡了敌人整整8天。

长城抗战最终也失败了。中方被动地保守性防御刺激了关东军的野心，因为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于是倾全力发动进攻，并进迫滦东地区，威胁中国长城守军的侧背，与滦东作战攻势相配合。5月7日，关东军第六师团由山海关进发，进犯抚宁。9日，陷抚宁、卢龙。长城冷口以东守军将受夹击。何应钦下令放弃长城各口阵地，全线后撤，守卫平津。14日，日军攻下滦县，通向平津的大门完全敞开，长城防线彻底宣告崩溃。

佛采尔也匆匆回到了后方，带着一脑门心思，一连几日闭门不出，伏案疾书。长城抗战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让他如鲠在喉，不得不发。

有人评价，长城战役中，佛采尔深入前线和辛苦的程度无一国民党高级将领可比，这不是夸张之辞。由于他亲眼目睹，心感身受，体会、认识自然深刻，批评更能切中弊端，再加上他性格直率，用语尖锐，因此，在给蒋介石所写的战后总结火气十足，震聋发聩：

委员长钧鉴：谨呈者：前方状况严重，其原委谅早达钧听，刍蕘之见，不容再为缄默。窃以为此次作战，受日军最猛烈攻击者莫如中央军队，其忠勇奋斗，极堪嘉奖。但东北军苟遇日人攻击，靡不望风奔溃，事实昭彰，无庸隐讳。愿意其过不在士兵，而其主因在于官长之素质与营长以上之动作。东北军官长中当然不乏精锐勇敢人才，然遇非优势日军而失利，如斯可见其将校团精神与技能之缺乏。前数星期业经函呈，谓东北军将校团有充分改组与改良之必要，并附呈相当建议。惟此举之能否实现，当然视我日军之是否于

我时机。为中国民族与陆军前途计，甚冀有此种可能。

按目前已成情况，对于发展全国陆军有数种意见，谨为钧座呈之。上次报告，已将顾问在华北服务期间所得经验分别缕陈，兹将各种迅速改良建议附于各项批评之后，特将本报告分为三部：

甲、高级指挥；乙、军队指挥；丙、部队本身。

甲项说明：

全般陆军高级指挥所缺少之事件太多，无训练完善之参谋团。目前各司令部充任参谋之人太多，若用少数训练完善具有毅力之参谋，兼实任军伍勤务，语练下级指挥，其成绩自必甚佳。前奉令改组参谋本部，惟须经相当时间，使参谋人员按新途径以受新式训练，然已显著许多进步。必要者为收容出身国外或北平陆大学员，使在参谋本部继续训练，尤要者为在参谋本部经相当服务期间后，即派回部队任营、团、旅长，接近部队，实习指挥方法。非经此种任中重要实施工作，难于战时要求参谋官对于所发命令、战术或战略之处置适宜。

欲求高级指挥与军队教育俱收实益，窃以两种高级官长宜彻底澄清：

1. 只知侈谈理论，而不切于平时实地训练，更不适于战时应用。惜此项人员遍地充斥，有害于军队与指挥者匪浅。

2. 阻止用新法改革陆军之人。钧座虽于数年前已决心努力改革以求进步，而若辈偏固步自封，横施阻力。

华北战事已足证明，德人在中央军方面所施用之德国训练与战斗原则完全适当。古北口、冷口方面，华方明白事理，参加战役之上、中、下各级官长，迭向中国军界同人道及，非仅与顾问等言之。向纵深战斗无间，攻防俱成纵深形势——与历向钧座陈述者正同——为军事教育不易法则。许多旧式之高级官长虽甚干练勤奋，惟以为不必另求新法，惟知保存若辈昔日所学于日本或他处之旧法，今日仍可用于训练，此乃莫大歧误。倘钧座及各首领机关，能由高级官长中，择其最干练而又最有用人才，使之传播新精神于全军，则以中国初级军官与士兵人才之良好，必能蔚为千城，与他国陆军齐驱并驾。苟不严厉扫除无用或守旧之高级官长，必为今后进步障碍。深惜顾问系

外人，虽极希望熟识多数官长，而事实有所不能，惟冀钧座个人及左右亲信能选择最优人才，予以最宜位置耳。此项建议，苟见实施，则高级指挥之最要之件已具。盖高级指挥部必须有干练之上、中级（将官、校官）官长，战时方能确保成绩优良。

连带声明：军政部于全国陆军至关重要，实有相当改组之必要，且总觉该部人员太多，按其学识不胜所负之重要工作。军政部与参谋本部相似，部员均需择学识最富，能力最佳者充任，庶此项重要机关能任有益工作。

乙项说明：

关于军队指挥应学之件甚多，迭向钧座陈述，并蒙规定进行方针。陆军大学及其他各学校工作俱极勤奋，尤以附近中央军校归徐培根、桂永清两主任所办之训练班为佳，因两主任干练有为，辅以德籍专任顾问，故成绩出众。

鄙意以为，苟有可能即应设立高级训练班，学期数月，专收旅长以上之部队长官，使之多习新式用兵。此种将官训练班，非仅使学者略循新式用兵途径，兼须学习判断部队是否按新式典、范、令训练连、营、团、旅，各种演习即彼等良好练习时机。训练班毕业后，各员须能讲演新式训练，自拟营以上平时各种演习之规定。创办此项训练班，须按一定计划，用最优之中国教官与最良之德国顾问。设立此项训练班后，不但能熟悉各学员之能力，并能将新训练与用兵之精神普及全国陆军。此外，则中央军校附设之训练班仍继续办理，并将学期改为9月，惟每训练班之学员名额不宜超过500，附余名额，不如另组一班，另选他员主持。至中央军校循适当途径所造成之初级官长，蔚成良好与健康之军官团，迭经向钧座报告，兹于欣慰之余，特再申述此次华北战事中央各师之初级官长应战尤烈。

此外则对中国军官之进级方式，不无滋虑。必须每一军官由下至上，历任各级长官，每次必在任中服务数年，庶陆军与军官团胥受其益。此举迭向钧座陈述，苟不先任下级官长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断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经验，无论如何勇敢，亦于事无济。关于官长任命升迁，原为陆军与军官团首要问题，目前尚无何种明白规定，此固由于政治、军事之未入轨道，将来更有办理之必要。否则，欲求中国军官固有健康之发展与

中国陆军之改良，前途必多困难。

另有一事亦与军队指挥有关，即欲求军队指挥之完善，必须有充分之补助品。除上述之官长教育外，必须特种军队供指挥之用。首要者为通信队能于新式交战时，技术上迅速架设完善之通讯联络。中国陆军尚未识此中重要，此次华北战事屡改缺少此种良好通讯组织，前线军队指挥各军、各军团，以至军分会，俱应有良好的通信部队。邱局长近年来督率所部筹办成绩不可谓不佳，但以后之发展究宜采分权制式，宜照从前建议，各师自辖通信部队，各师平时演习即宜练习通信队之用。且各独立部队必须有搜索部队，如师骑兵、装甲汽车，亦此次华北战事所得经验。

良好工兵为构筑防御工事等所必要，亦于华北战事证明，欲使各师能独立补给弹药给需，宜逐渐将汽车队永久附属各师。关于办理汽车事宜，亦见邱局长炜暨其属员之成绩，惟应注意今后之逐渐分权。按军委会去岁颁行之陆军师编制表，上述各师俱有规定，惟因时间、财政俱无余裕，且因政局不清，故未能到处实施。此种缺点若能速为补救，必有益于陆军与战时用途。

丙项说明：

兹论及军队本身，几实战训练应取之途径，业经钧座妥行规定，派有德顾问，诸师业俱奉行。鄙意凡派有顾问诸师，中央军校暨附设之训练班，以及一般军官团之训练，驯使全国陆军俱按新意旨训练。兹有三点，须彻底改革：

1. 步兵射击训练宜大施改良，凡步兵团俱应有打靶场，使士兵有充分之射击训练。凡驻兵城市，俱应建筑打靶场，需费无多，均并应有时机实施战斗射击。由班始至一营战斗射击演习，另应选择适于训练地形。凡驻兵城市，周围必有地区可以实施新式训练，惟大小无定耳。官长每程度太浅，不能选获此项地形。另应选择地点供大部队演习之用，与南京之汤山相似，有大规模之演习场，方能使各军作实践演习，以应战用。无此种时机，而欲使军队由平时业务骤变战时动作，非常困难，且每易发生更大错误，东北军即显著之成例。平时不过担任守卫、操演诸勤务，若最严重之战斗训练，一切俱按新观察点，几从未问津。

2. 新式用兵须诸兵合作，尤要者为步、炮两兵。此次华北战事，日方已明

显示我，日军攻击何处，必集结炮兵破坏华军防御工事暨其守兵，然后步兵有飞机与战车掩护，攻击前进，此乃新式用兵。惟各师须有相当之新式兵器，施以新式训练，方有实施上述训练之可能。前钧座拟将最精诸师渐属以新式炮兵，希望努力促其实现，其迟速自以财政为衡。兹建议继续扩张炮兵，使多数精良陆军师按核准之建议，迅速属以炮兵。

3. 步兵必须有精利可恃武器，方能于攻击及防御时有良好成绩。此次华北战事，日军复足为之证明。

中国自造武器实不适用，因兵器不良，单独士兵每丧失信任兵器之心。欲使改良，则必须中国制造精良兵器，或直接购自国外。凡纪律、训练俱佳而兵器窳劣之部队，及反不足与内容欠佳而有精良武器之敌相持。据喀连甫斯基报告谓，核每枝步枪与机关枪之全部价格，政府支出之款，反超过于国外购买，而素质反劣。兵器不良，实为陆军自趋灭亡途径。该顾问之报告转呈钧阅，至该问题应如何改良，业于前函陈述。鄙意该问题真为中国陆军存亡关键，故极宜彻底改良。中国若有武装完善之陆军，即能对新式之敌，如日本者，切实抵抗或击破之。

除上述兵器技术上应予改良外，以后发展中国陆军，宜有充分而经实战训练之空军，自以战斗机负主要任务。所购飞机，宜以敌为标准，即选购世界最良之战斗机（即驱逐机），无论如何，宜比日机迅速精良，则我方战斗力已略占优势。无良好空军，即陆军较优，而对武装完善之敌如日本者，作战亦难期取胜。

对战车应加注意，业由华北战事证明，战车最劲之敌，莫过战车，仅恃抵抗战车武器，难收大效。战车队虽奉钧令编练，惟请深切注意，从建入手。华北战争，日方对忠勇之中央军，总以战车与装甲汽车决战，但成绩并不甚佳，惟东北军遇之，靡不望风而溃。

兹总结上言，申述鄙意，觉中国人民确能练成良好陆军，中国亦应如他国于此种基础上建设陆军，逐渐发展，自有造成强大国军之必要。列兵之人才甚佳，知足而守纪律之中国列兵此次华北应战亦极忠勇，造成新式军官团之人才，亦无虞缺乏。故希望近年来各学校养成之初级官长，必有俾实际显

著良好成绩。至部队之如何改良与训练及长官学成之如何促进，直至最高阶段，业经陈明欲求陆军进步，非有巨款不可。否则，从前所历指之缺点，无法革除。

钧座暨军事当局之首要任务，使全国人民暨其首领了解此中意旨，大多数人民俱明了日人欺压中国而有所觉悟，全国人民应有造成强大与良好陆军之志愿。中国苟能于短时期内编成十至十二师纪律良好，装备完善，经过实战训练之部队，则对内对外之政局必随之而顿改旧观。此项意见，业于民国十九年追随钧座在河南战胜后呈明，惟冀政局与时间能容许钧座所赞成之建议，一一见诸实施。区区之意见，尚乞鉴察。

肃颂

总顾问 佛采尔谨呈

(民国二十一年)5月23日

佛采尔做梦也未想到，这份意见书断送了他在中国的前程，蒋介石对他的诸多不满，由此而引发出来。

16

佛采尔不知深浅 塞克特静极思动

当蒋介石悄悄打听，还有谁更适合取代佛采尔总顾问的位子时，朱家骅简直惊呆了，脱口道：

“委员长对佛顾问还不满意？此人有胆有识，勤劳任勉，忠勇可嘉，乃难得之人才。”

蒋介石将佛采尔的意见书推向了朱家骅：“你看看吧，娘希匹，他以为可以在我面前指手划脚。”

朱家骅将这份意见书琢磨了半晌，也没看出名堂。平心而论，他觉得其中颇有见地，蒋本人也在上面作了许多批示，其中多有采纳和赞同。即使一开头对中国军队多有指责，那也是针对东北军的，伤不了蒋介石的颜面啊。

“众怒难犯，他替我惹了麻烦了。”蒋介石吼道，用手指对着意见书指指戳戳。

朱家骅恍然大悟，在许多文字中，佛采尔话中有话，对蒋介石提出了隐晦批评，非局中人，难以体会。作为一文职官员（朱家骅时任交通部长），他想得没有那么多。

譬如说，佛采尔就军官升迁提出意见，反对越级升任。这种现象，其实只

在蒋的黄埔嫡系中才会出现,无异于指责蒋任人唯亲,又怎能不让一大帮黄埔军官极为恼火。

还有,佛采尔对军政部也展开攻击,提出改组的建议。这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是对国民政府最高军事机关不满,认为“人浮于事”,“权限不清”。佛氏曾公开要求蒋介石“缩小军事委员会”,遭到驳斥后,现在又一次以曲折、隐晦的方式提了出来。

朱家骅不敢再为佛采尔辩护了,因为佛氏已经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军事委员会曾于1928年撤裁,1931年12月蒋下野,1932年3月上台后又恢复,其目的是掌握军权。蒋汪合作后,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但蒋介石哪甘专任军事,无论军事、财政、司法、外交、地方行政,一概插手,机构怎能不庞大,权限怎能清楚,汪精卫一班人马,曾就此问题专门向蒋介石攻击。如今佛采尔又添火加柴,不能不让蒋介石怀疑他的动机了。

其实,佛采尔与汪精卫一点瓜葛也没有,甚至遭到汪精卫某种程度的讨厌。汪是妥协派,尽管他与蒋介石矛盾甚大,但对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赞同的。而佛采尔却主张对日持强硬态度,在这份意见书里,也处处以日本为假想敌,淞沪战争、长城抗战期间,均身临前线,日本方面已经向德国驻华使馆提出正式抗议,德公使陶德曼解释之余,也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约束佛采尔行动的要求。

所以,汪精卫向蒋介石建议,立即炒佛采尔的鱿鱼。

蒋介石正怀疑佛采尔与汪之间有联络,当下顺水推舟,连连点头。

只有宋子文为佛采尔力争:“聘请谁做顾问是中国人的事,日本人不喜欢谁,我们就辞掉谁,未免太示弱于人了。”

蒋介石的目光愤怒地射向宋子文。最近,他正和这位国舅爷闹别扭,在一次财政预算会议上,蒋介石一开口就要2000万。

“干什么?”宋子文明知故问。

“追加‘剿共’拨款。”蒋答。

“‘剿共’、‘剿共’,那是个无底的洞。”宋子文心里腾起了火苗,国家财政拮据,入不敷出,每月赤字已近1000万之数,蒋介石却仍然狮子大开口,将民

脂民膏抛掷于内战的深渊中。因此他硬梆梆地回答道：

“国库囊中如洗，子文没有点石成金的本领。”

还从未有人敢这样对蒋介石说话，整个会场的气氛顿时凝固起来。半晌，蒋介石才喊出一嗓子：

“那你装备税警团的钱又从何而来，而且用的都是外汇。”

宋子文毫不示弱，反唇相讥：“税警团不姓宋，不是为私人看家护院的，所以淞沪抗战上了战场。”下面一句话他忍了忍没说出来，但意思已很明显：你蒋介石把钱用哪儿去了，都用在自相残杀中了。

有人连忙出来打圆场：“安内攘外，都是一样重要，委员长、宋部长都是为国事焦心，不妨从容商量。”

蒋介石的脾气岂是能按捺住的，已是雷霆震怒，他戟指喝道：

“子文，你的话说得太多了。”

宋子文脖子梗了梗，他知道蒋介石指的是什么，他与蒋介石在财政问题上的顶牛实际上是对日方针歧见的延续。

这一歧见自淞沪抗战始，至长城抗战发展到了高峰。宋子文多次公开表示了对日强硬的观点，主动将财政部所辖的税警团投入淞沪战场。长城抗战爆发后，他又一次致电张学良，提出动用税警团，并邀佛采尔一道北上，处置各项事宜。

在北平，宋子文发表了多次演讲，一再强调团结御侮，而只字不提“剿共”。与此相对照，蒋介石当时正在江西部署新一轮的“剿共”行动。这种现象引起了敏感的舆论界的注意。《大公报》曾以《政府对于军事上之责任》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今日者，全国军队受令于军委会，军委会受指导于蒋委员长，是则全局责任，首在于蒋。吾人不愿问，亦不愿知现在政府计划如何，但愿唤起军委会注意！”这里对蒋介石的不满，已呼之欲出了。而对于宋子文赴北平、热河一行，《大公报》则在题为《华北健儿之幸运》的社评中，大加赞扬。

蒋介石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次宋子文发表演讲，总有佛采尔随影附形。佛氏是个兴奋型的人，有时附和着宋子文，说了一些不符合他这个身份人说的话，这就影响了蒋汪合作政府既定的对日妥协政策，引发了南京政府

当权者的不满，而本来就看不惯佛采尔的军政部官员更是借题发挥，说佛采尔挟宋子文以自重，破坏了我国军事指挥体系，招来非军人干涉军事的现象，此风若长，后患无穷矣。

风言风语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心里一阵嘀咕，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已让他不安，为此专门敲打过佛采尔不要与宋套近乎。现在，眼见他们越来越热络，那种不安也随之俱增，这一文一武凑到一起，绝不是什么好事。蒋介石对谁都防着一手，他的大舅子也不例外。

蒋介石决心拆散宋子文与佛采尔的联系，现在准备辞退佛采尔，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宋子文不替佛采尔申辩犹可，一开口，反而加速了蒋介石的行动，他已经觉得不能等了，迫不及待地向朱家骅提出心中的人选。

“塞克特怎么样？他是原德国国防军的领袖人物，才华、声望俱不在佛氏之下，而其稳重、礼貌又超乎佛氏之上，更易合作、驾驭。”

“塞氏较之佛氏，自然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家骅也表示赞同，但他有点顾虑。众所周知，佛氏、塞氏有僚属之谊，向称莫逆。如果撤佛氏而代塞氏，出于友情和义气，塞克特有可能拒绝中国之行。

“这没关系。”蒋介石考虑了一会道，“我让佛顾问亲自把塞克特请来。”他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

此时的佛采尔，根本没有想到他正遭到蒋介石的暗算。这几天，他去了趟军政部，何应钦随手拿出一份文件让他过目。

这是蒋介石对他《意见书》的批复，上面圈圈点点，加满眉批。

在许多技术性问题上，诸如军队的训练、军官的培养、装备的添置更新，蒋介石都作了积极的反应，“照办”，“速照办”，“拟交X部照办”不绝于笔，惟有人事改革一条出现空白。

但这也够佛采尔兴奋、得意一阵子了，他觉得他的价值得到了承认和体现，心中对蒋介石升腾起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激。

他是个实干型的人物，立即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根据他的建议，军事教育首先得到了加强。1930年以前，南京政府所属军事院校只有北洋时创建的陆军大学和由黄埔军校发展而来的中央军校，现在南京政府已先后创立

了步兵学校、骑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辎重兵学校、通信兵学校等等，不一而足。在教学上，摒弃过分拘泥的日本成法，采纳“专在切合战用之实地工作”的德国典范令。并大量聘用德籍顾问施教，而日本教官相继遭到解聘。扩大了军事教育，培养了各类人才，从而又为特种兵建设奠定了基础。

30年代初期，中国的陆军主要兵种仅限于步兵，骑兵只是作为陆军的机动力量，炮兵、工兵、装甲兵、辎重兵作为兵种系统还没有确定，随着各项条件的逐渐成熟，陆军的合成化程度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1年，南京政府先后编成8个独立炮团，其中4个团配备“卜福斯”山炮，2个团配备“三八式”野炮，1个团配备“克虏伯”式野炮，1个团为“十五生”榴弹炮。山炮和榴弹炮每团下辖2营，野炮团下辖3营，制式基本上得到分类，便于后勤支援和性能发挥。1932年冬，在此基础上，又组建2个山炮旅，各辖2个炮兵团，其余4个团由炮兵总监训练。佛采尔在1933年初向蒋介石报告说，该年除训练好“卜福斯”炮兵二团外，到年底还“可以成立炮兵十营”。另将进口一批新式卜福斯随伴炮，装备步兵团，加强步兵的攻防火力。

关于航空兵，佛采尔主张将现有飞机按性能区分，分别执行战斗、观测、轰炸等任务。一切训练以日本为作战对象，选购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作战飞机，以与日空军抗衡。在佛采尔过问和帮助下，南京政府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炮兵航空观测机队。

南京政府的骑兵分别配置于各步兵部队，在装备落后，军队运动不便的情况下，骑兵仍不失为快速机动部队。佛采尔根据中原大战蒋军骑兵作战的经验，主张将其大部编成数个师，装备新式武器进行训练，并责成洛森顾问编练一至两个师的新式骑兵。

佛采尔的计划很庞大，举凡高射部队、战车队、伞兵部队，他都想一一发展，因此多次建议蒋介石购买特种兵装备器材。到佛采尔离任时，上述兵种有的得到了加强，有的具备了雏形，有的进入了议事范围。客观地评价说：佛采尔为南京政府的整军建军出了力，一方面加强了蒋介石反共实力，同时也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

沾沾自喜的佛采尔以为，他是南京政府的有功之臣，以为蒋介石对他须

夷难离,所以愈益专横,愈益自大,高视阔步,旁若无人。蒋介石在一旁冷冷地打量着,寻找着机会,让这个骄傲的日尔曼人自己滚蛋。

前文一再提及,佛采尔是一位标准的职业军人,他的兴趣只在战场,对政治、经济、外交诸问题甚至带有某种厌恶,因此与他的前任包尔相较,他并不适宜统领全面,兼顾各方的总顾问之职,他的思维仍然定格在单纯的军事战略方面,并不符合现代化建军的需要。

佛采尔也明白自己这方面的缺陷,因此委托他的助手布凯思特留心他所不擅长的经济、商业诸多方面的问题。现在,德国工商经等部门已对他有所抱怨,认为佛氏未能在中国为他们捞得足够的利益。德国国防部的控告更是尖刻,他们讽刺说:佛采尔提供的情况还比不上其它国家驻华使馆一名武官的信息有作用。

所以,他嘱咐布凯思特,要迅速发展中德间的贸易和其它领域的合作。目前,德国政府正在凡尔赛和约之下大搞“工业外交”,发展军备,以图复兴,顾问团的工作也要围绕德国政府的这条大方针进行。“血比水浓”,在佛采尔眼里,振兴德国陆军,恢复世界强国地位理所当然地比雇主的利益更重要。

布凯思特连连点头,他让佛采尔埋头喜欢的军事工作,“一切都按总顾问的意思办,请放心”,大包大揽地答应了下来。凭着德国顾问团在中国的影响,凭着佛采尔在蒋介石眼里的分量,凭着国舅爷宋子文与佛采尔的良好关系,布凯思特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外的军事订货。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捷克、荷兰各国大财团不满意了,他们对政府施加压力,向中国提出责问:难道中国就不需要别国专家的军事建议和武器供应?他们对德国独享中国军火市场而愤怒、眼红。听到这些抗议,德国外交部也火了,佛采尔搞什么名堂,政府怎么没有沾到光,好处都被企业大老板得了,揣进了他们个人的腰包。原来,布凯思特背着佛采尔做了不少手脚,因为他掌握着中方采购的建议权,德国一些大财团,特别是军火工业的巨头立即包围了布凯思特,将他奉为上宾。那种热情,那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场面让这位退役上校消受不起,很快就诺诺连声,惟命是从。于是,大批的订单飞向了德国,但花露水洒

得很不均匀,几家欢乐几家愁,有的财团撑得吃不下,有的企业却汤也喝着,所以就向政府抱怨,希望能从中干预。中国方面也发现了问题,布凯思特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因此诸多不合适的产品大量倾销到中国,而迫切需要者却是望穿秋水。有一次通信兵学校欲购一批无线电器材,布凯思特却送来了女式丝袜,气得何应钦把它们捧到了蒋介石的官邸。

“据美国使馆陆军武官调查报告,佛采尔顾问是否接受过德国军火商的‘红包’虽不敢肯定,但布凯思特从中谋利则无疑。”何应钦狠狠地告了一状。

蒋介石脸色气得煞白。

流言很快传了出来,说佛采尔是日本间谍,来华是为了刺探中国军情。长城抗战时,他建议增调中国军队北上,主动出击,是蓄意让日方找到扩大侵略行动的借口。

布凯思特心中有鬼,他的腰包已经装满了,不稀罕在中国这份工作了,因此力劝佛采尔和他一道联袂辞职。“以我对中国人表达方式的熟悉,他们这是变着法让你走人。我们不如主动一些,这样还走得体面。”

佛采尔不以为然地笑笑:“谣言止于智者,你以为蒋介石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说着,他整整衣履,准备与蒋介石“交流交流”。

蒋介石用一脸冰霜等着他,佛采尔吃惊地道:

“委员长难道怀疑我的忠诚?”

蒋介石有意不回答,留下一段长长的沉默,让佛采尔忍受着难堪,感受着压力。良久,方缓缓道:

“法国方面已派人试探,放出口风,贝当元帅拟将访问我国。”

话题的突然转换,让佛采尔始料不及,但略一思索,方觉寓有深意。贝当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名将,蒋介石邀其访华,是否别有动机?

眼看着佛采尔脸上露出了嫉妒之色,蒋介石语气一下变得轻柔起来,安慰着佛采尔说:“虽然贝当元帅是战胜国的主帅,但鄙人不以胜败论英雄,对德国陆军更加心仪。”

佛采尔心里好受了些,忍不住道,贝当也并非百战百胜,当年他与塞克特合作,不也将法军打得大败而逃。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蒋介石脸上露出了仰慕，早就闻听塞克特将军的英名，却吝缘一见，不胜遗憾。

“这有何难。”佛采尔安慰着蒋介石，“我与塞将军为莫逆之交，只要修书一封，说明委员长热情相邀，塞将军一定宠荣备至，立即启程。”佛采尔并不知道蒋介石的意图，他正打算着借重塞克特的名气，壮一壮顾问团日益衰落的声望。岂知是种瓜得豆，断送了自己在中国的前程。

17

希特勒入主总理府 塞克特欣然登庐山

有“德国的拿破仑”之称的塞克特将军正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德国的变化，希特勒的纳粹党正在迅速崛起。几乎人人都看得很清楚，魏玛共和国即将寿终正寝，那个几年前还一文不名的阿道夫·希特勒，居然在1932年春有勇气和德高望重的兴登堡元帅一起竞选德国总统，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处于一种何等病态的状况。

尽管这一次竞选以希特勒败北而终，但从选票的统计数字看，纳粹党的影响在迅速扩大。兴登堡总统实在太老了，而且头脑已经不太清楚。4年前他就闹过一次笑话，在接见中国公使蒋作宾向他呈递的国书时，老眼昏花，错把一名深目高鼻的德国译员当成蒋公使的随员，当场赞其德语讲得“与德国人一样好”，让蒋作宾摇头不止。

另外，头脑不清楚的兴登堡总统又一次老眼昏花地挑选了弗朗兹·冯·巴本，作为共和国的总理。“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大使这样描述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

塞克特将军义愤填膺，自从被兴登堡赶出国防军，他就与昔日的这位上司结下了梁子。现在，他已经不能忍受兴登堡的昏庸了，不能坐视德意志民族也像这位老人一样毫无生气。

他无奈地将眼光投向了希特勒。说实在的，他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德国军界里门第的观念非常严重，塞克特也不能免俗。

但希特勒这几年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他抓住了日尔曼人的心理，提出了“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统一日尔曼民族为一个大德意志国”的政治目标。1921年，纳粹党成立了冲锋队，1925年又成立了党卫军，开始向暴力夺取政权的目標前进。到了1931年，希特勒“走遍了德国，同重要的企业界人士私下会谈。”凭着他的巧舌如簧，凭着他狂热的煽动，德国大资产阶级开始相信他的能量，相信他能洗刷作为战败国的耻辱，将德国重新纳入世界列强的行列，于是，拱手赠上了200万马克。希特勒在接受这笔巨款的同时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要在德国根除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为德国“夺取生存空间”。

希特勒的激烈言辞让塞克特感到兴奋，德国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生机勃勃，这种锐意进取。塞克特对兴登堡的反感促使他对原来并不欣赏的希特勒产生了兴趣。当时德国军方并未被纳粹党掌握，而是一支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塞克特虽是在野之身，但影响尚在，国防部长柏龙白是他的老部下，与之联系颇多，关系密切。在复兴德国的大目标下，纳粹党人、陆军、德国财团终于形成了统一战线。从此，希特勒如虎添翼，加快了夺取政权的步伐。

历史应该记下这个日子，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这一天赶走了不孚众望的巴本内阁以及继任者施莱彻尔将军，坐上了国家总理的宝座。当天晚上，乐极忘形的纳粹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庆祝胜利。他们排成整齐的队形，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到威廉街，他们的乐队在震天的鼓声伴奏下吹着军乐，长统皮靴在马路上喀嚓喀嚓踩出了有力的节奏，他们的火炬高举着，成了一片火海，照亮了夜空，使聚集在人行道上观看的人们的欢呼声分外热烈。兴登堡站在他府邸的一个窗台前，看着下面游行的人群过去，他的手杖随着进行曲的拍子击着地板。他显然很高兴，终于选了一个能够按德国传统方式唤起人民的总理。这位老人，在年老昏愤之中，并没有意识到他那一天放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凶神恶煞。

在另一条街道上，塞克特也站在自己寓所一扇打开的窗户前，当希特勒

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的心情反而复杂起来。说到底,他还是同情并忠实于普鲁士王室的,但复辟无望,只能拥戴希特勒了。但一想到堂堂的“国防军之父”今后将要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无名小卒的鼻息,他心里就老大不舒服。另外,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与希特勒的看法也不一致,希特勒太好战了,太咄咄逼人了。德国还未完全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还应该休养生息一个阶段,还需要维持一个时期的国际和平。当然,希特勒不会听他的,纳粹分子和纳粹思想一起深入到德国军界的方方面面,塞克特一类的人物已经被视为“过时”、“落伍”、“保守”,而失去了往日的价值和分量。

就在这种不尴不尬的状况中,塞克特收到了佛采尔的邀请信。佛采尔的信写得像他的性格一样奔放,力促塞克特启驾:“中国政府经常邀请世界知名人士来华访问,藉以增进彼此间之友谊与了解,以及促进共同利益。有关邀请阁下前来,显然系在讨论形成德国制度与组织之深奥所在,尤以推动军事体系之原动力以及操纵经验。元帅(指蒋介石)常问部属有关阁下创建国防军之详情。”

塞克特怦然心动,现在,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约束已不像以前那样严格,希特勒甚至鼓励德国有意识无意识地去冒犯它。塞克特本性好动,酷爱旅游,对中国充满兴趣,现在做一次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公费旅行”又何乐而不为。另外,他对目前的德国形势也有一种眼不见、心不烦的摆脱感,同时还能增加一些个人经济上的收获。听说佛采尔带去的一帮德国顾问薪水不菲,以他以前的名气、地位、经验,相信中国政府是舍得出大价钱的。

“人的名声树的影”,塞克特访华的消息一经传出,广西的李宗仁闻风而动。自从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失败后,桂系集团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准备东山再起。现在听说塞克特即将来华,准备抢在蒋介石之前截住这位“国防军之父”。一位名叫安德烈亚斯·迈尔·马德尔的上尉代表中国广西省地方当局在塞克特启程前发出了邀请函,马德尔自1930年起便受聘于广西当局,任南宁军校教官。他声称广西是中国的“普鲁士”,最后必将统一全中国,并对德国复兴影响甚大,塞克特来此大有用武之地,天赐良机,不可错过云云。塞克特回信表示可以考虑。1933年4月中旬,塞克特携夫人离德启程,当时有两位

与德国国防部及工业界有密切关系的商人来华，一为汉斯·克兰，一为普莱。他们乘船刚抵香港码头，一辆轿车早已经等候在那里，认准塞克特一行迎了上去。来人自称是广东省政府官员，省主席陈济棠在广州扫榻以待，迎接德国贵宾。塞氏道：“鄙人已接受南京政府之约，不便前往。”来人温语柔词，盛情相邀：“陈主席仰慕将军大名，如久旱之盼甘霖，万望不吝大驾，屈尊一行。”

站在一旁的克兰捅了捅塞克特：“既是陈济棠相邀，此人不可得罪，德国最需要的军工原料，就需要他的放行。”看到塞克特面露难色，克兰出主意道：“将军尽可先赴南京方面之约，广州这头留我和普莱应付就够了。”

“也只能如此了。”塞克特耸耸肩膀。他注意到陈济棠的代表并未因留不住他而遗憾，甚至好像是专为克兰而来的，“他们之间有默契。”阅人多矣的塞克特在心里判断说。

关于克兰的身世、经历、背景，始终是个谜，就连塞克特本人也摸不清他的路数。在德国，他没有任何官职，却与德国经济部长沙赫特、外交部长牛赖特、国防经济厅厅长托马斯、国防军首脑柏龙白等上层人物过从甚密，就是连希特勒也经常召见他，待之以礼；后来在中国，他既无外交官头衔，亦非国民政府聘请的顾问，但出入国民政府如入家门，与孔祥熙、何应钦、翁文灏、钱昌照、俞大维等平肩论交；1936年初中国政府开列的德人授勋名单里，他亦忝列其中，且是惟一的“平民”。

从克兰所关心以及所从事的活动看，此人应属于投机商人之列。有人说他家资巨万，也有人说他潦倒时曾穷居柏林以借贷度日，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反差倒是投机商人的特征之一。

克兰之所以与塞克特搭上线，还是拜那位在南宁做教官的马德尔上尉所赐，他吹嘘说他与德国工商业界，与军界，与塞克特将军本人都有无比亲密的关系，只要给他10万马克的活动费，就能说服德国财团向广西投资，包括派遣军事顾问。但是，贫瘠的广西却无力负担这项开支，于是，与广西结盟的广东省财大气粗地掏出这笔钱，陈济棠自然也把客人抢回了自己的地盘。

汽笛声起，轮船缓缓地离开了香港，塞克特夫妇倚在船舷边，眼看着克

兰的身影逐渐消失在视线里,不由地生出一种寂寞孤单之感。

好在这种感觉没有维持多久。5月8日,塞克特乘船抵达上海,国民政府特派交通部长朱家骅前往码头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中方的接待工作是无可挑剔的,朱家骅以百忙之身受命为塞克特访华做全程陪同,考虑到塞氏已是67岁的高龄,同济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也陪行左右,妥为看护。这种高规格的礼遇,塞克特已经久违了。

这都是蒋介石的安排,欲先取之,必先予之。他要让塞克特受宠若惊,感恩图报。

5月的江南,正是繁花似锦,莺啼燕舞。塞克特夫妇在上海停留数日后,即乘火车前往南京,朱家骅原准备将他们安置在大行宫一带的中央饭店,塞克特一挥手,道:

“看我的老朋友去。”

这位老朋友自然是佛采尔。以他们以往的交情,又在异国他乡,佛采尔本应亲自去上海迎接的,谁知却不见动静,这让塞克特多少有点扫兴。

佛采尔的夫人热情地接待了来自家乡的客人,她歉意地解释道:佛采尔还留在北平协助华北防务,未能抽身相迎,怠慢之处,万望海涵。

“您了解他,我的丈夫是个工作狂。”佛氏夫人亲手端上了咖啡,招招手领着塞克特夫人去参观房间。应她之邀,塞氏夫妇已决定下榻于此。

听罢此言,塞克特心中稍有释然,转过头问朱家骅:

“贵国北方的形势很紧张?”

“已经缓和了许多。”朱家骅答,话锋一转,味道就不正了:

“其实佛顾问还是能抽出身来的,最近,我们同顾问团的合作出现了一点小的误解。”

塞克特眼睛里出现了警惕。

“佛顾问是您的老朋友、老部下,他的性格您知道最清楚,认真、负责,但是自大、狂妄、偏执,同我国政府的许多官员关系很紧张,德国顾问团内部也不团结,蒋委员长为此很伤脑筋,但又顾及佛顾问的自尊心,不便当面直接批评。”朱家骅为难地叹息着。

“听朱部长所言，佛将军那封邀请信是您们蒋委员长授意的？”塞克特已经听出了名堂。

“正是！”朱家骅肯定地答道，“蒋委员长的本意是借重您来协调一下佛顾问与顾问团及我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但佛顾问发出信后却对人私下言，他被中国人玩弄了，中国人是想走马换将，以阁下您取而代之。有此怨气，他对您的失礼也就可以理解了。”

坐在沙发里的塞克特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他为佛采尔的小肚鸡肠感到气愤。看来塞克特的心胸也不甚宽广，那脸色顿时非常难看，立马起身要移榻。

朱家骅连忙拦住，既来之，则安之，塞将军这一走，报界不免喧腾，就更露间隙了，两位将军几十年的友谊岂不就此结束，殊堪可惜。

塞克特气呼呼地重新坐下，此公老而弥辣，反不如年轻时冷静稳重了，亏他还称最了解佛采尔呢？佛氏的那种大大咧咧，待人处事的率真和不成熟，早在前德军参谋本部就为人熟知，现在塞克特却不能忍受了。

在南京小住几日，佛采尔夫人倒是十分热情，尽了待客之道。5月22日，塞氏夫妇乘上蒋介石派来的专用军舰溯江而上，直抵九江，蒋介石要在庐山上会见德国客人。

临上船时，塞克特从码头报贩那里买了一叠报纸，他注意到上面印有他的头像，这让他有点沾沾自喜。

朱家骅给他翻译了标题：“蒋委员长欲在庐山会见德国名将，共商‘剿共’军事行动”。在这则新闻里，记者也对塞克特与佛采尔的关系作了猜测，认为“剿共”战事在即，身为军事总顾问的佛采尔仍在华北，表明他与中国军事当局产生了矛盾，中方邀请塞克特将军赴南昌行营，显然是走马换将的前兆。

但是，塞克特却不想现在就取代佛采尔，一者他认为如此做未免心中有亏，愧对他与佛氏的几十年友谊；二者也是碍于身份，毕竟曾是德国军界第一人，总该摆摆架子，不能被人召之即来吧。

所以，在庐山上，任凭蒋介石热情相邀，塞克特仍婉言谢绝。他不无卖

弄地告诉蒋介石，希特勒也很看重他，动身前，希氏正组阁，请求他在军事上帮忙。

“贵国现总理希特勒可称拿破仑、俾斯麦式的人物，鄙人敬佩莫名，良禽择枝，塞将军肯定是拒绝不了了。”蒋介石表示十分理解。

“不，我不能同他合作！”塞克特望着瞪大眼睛的蒋介石道，“我知道贵国对他很欣赏，但他那一套我不懂，看不惯，更不赞成，闹哄哄的，成何体统。”说到这里，他叹了口气，“不过，话说回来，以德国现在的混乱形势，没有重心也不行，治重症须下猛药，否则无人能维持局面，希特勒或者能以他的那一套收效。”说到这里，塞克特抬头观察了一下对面坐着的蒋介石。这位中国的独裁者神情里有几分希特勒式的冷峭，不禁微微一动，也许蒋介石和希特勒还有差别，但也称得上乱世之枭雄，是一位“能够在动荡复杂环境里屹立不倒的人物”。

“在适当的时候，我是会考虑与之工作的。”塞克特心里落下了主意。

塞克特在庐山逗留了10天，与蒋氏相谈甚洽，一方夜半虚席，倾心向问；一方知无不言，纵论天下。这种宠优、亲热，甚至连陈诚一帮军政大员也眼热吃醋，讥讽蒋介石优遇塞克特甚至超过了刘备礼重诸葛亮。

6月2日，塞克特下山返南京，如果不是他不适应庐山变化不定的气候，或许还要再住下去。与蒋辞行时，蒋执手相送，其情浓浓，其语殷殷：

“愿以将军为师，将德国军队的精髓移植中国。”

塞克特也大为感动，他从皮包里拿出刚刚草拟成的《致蒋介石元帅陆军改革建议书》，扉页上一行字写得粗大醒目，朱家骅一旁翻译道：

“作为贡献中华民国与伟大领袖的友谊礼物。”

站在一旁的陈诚差点喷饭，这位德国老头也挺会拍马屁的。

由于有了一层误解，船抵南京下关码头，塞克特远远窥见了佛采尔的身影时，好心情立刻破坏无余。及至两人拥抱时，他的动作也是僵硬的，里里外外透着冷淡。

佛采尔也很矜持，由于《塘沽协定》的签定，北方局势暂时缓解，他又开

始了南方之行，准备去江西参加第五次“剿共”战役。路过南京时，恰与塞克特相逢，两人就此盘桓了几天。

关于塞克特在华的活动，佛采尔已从报纸上读到了，也隐隐猜出了什么，他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那种不快早就写在了脸上。

话不投机半句多，塞克特一上来就将顾问团的在华工作批评得一无是处，佛采尔出于对老上司的尊敬，强忍着怒气。他心里明白，邀请塞克特来华，对自己而言，是引狼入室，是蒋介石企图在他的头顶加上一顶重帽。

双方不欢而散，就此分道扬镳。

塞克特继续北行，在华北各地逗留了约3周时间，访问了山东、河北、北平各地。鉴于他往日的名声、地位，人们还是十分尊敬，主持华北政务的中方大员何应钦、黄郛等人，驻北平的德国公使陶德曼，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武官都出面迎接和款待。作为一名蜚声中外的军事家，他自然也少不了视察一番驻长城各口的中国军队，指手划脚一通。6月底，塞克特返回南京，途中思古之幽情大发，游览了曲阜孔圣人的故居，并与孔子后裔合影留念，后来这张照片就挂在他德国寓所的客厅里。

回到南京不久，塞克特即打道还府。临行前，朱家骅代表中国政府向塞克特赠送了34件珍贵礼品。

就在塞克特一一玩赏这些礼物时，朱家骅掏出了一封信：

“还有第35件呢。”

这是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里许诺说，只要塞氏肯留在中国，他一定给予他比现总顾问更高的地位，更有权力的职务，更加丰厚的待遇。

“感谢你们委员长的器重，尽管我暂时离开了中国，但有不得已之苦衷，贵国有句古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还不至于冥顽不化。”塞克特连打了几个哈哈，给朱家骅交了底。

离开南京后，塞克特似乎并不急于回国，德国外交部建议他顺道赴日本访问一次。日本人太敏感了，他们对甲午战后，英、德、俄三国干涉还辽仍记忆犹新，对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凶悍善战还感到忌惮。他们之所以敢欺负中国，因为中国是一盘散沙，一旦移植入日尔曼人的狂热、好斗、服

从及纪律，则立刻强弱易势。

一连串强烈的抗议飞向德国，飞向中国，指责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指责中国又在玩弄以夷制夷的策略。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倒不在乎什么凡尔赛和约，也瞧不起日本人，但在他那一揽子征服世界的计划中，却想利用日本人在东方牵制住苏联，因此指示外交部，让塞克特顺道访问日本，“平息一下小个子黄种人的怒气”。

塞克特当即拒绝了德国外交部的建议：“我可不想讨好日本人，也没有兴趣让我的脚步踏上那个东方岛国，外交部的人总是顾忌太多，像是看别人眼色的小媳妇。”他不满地向夫人嘟囔着。

塞克特有自己的日程安排和计划。船抵广州时，他悄无声息地上了岸，钻进陈济棠派来的小轿车，一溜烟驰离了码头。

坐在前排的克兰回过头来：“我给您的信收到了？”

塞克特：“你的建议很重要，包尔上校在中国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吃了资源不足的亏，所以协约国讽刺我们‘后劲不足’，德国欲想重新崛起，就必须扩大战备原料之进口，积蓄‘战争后劲’，而中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对我们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

“希特勒总理已经充分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准备启用著名的经济学家雅尔马尔·沙赫特教授，为其整理金融并主管经济。”消息灵通的克兰显得很兴奋，他已经意识到通向财富的大门正向他敞开。根据沙赫特制定的复兴德国经济的全盘新计划，德国将迅速扩大原料进口额，以作战略贮备。因此，希特勒将继续沿袭魏玛共和国的对华友好政策，发展扩大对华贸易，从中国进口急需的钨、铅、锑等稀有矿产以及花生、棉花、棉布、麻、猪鬃等农产品。而广东则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基地之一，现在他已捷足先登，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

作为一个投机商人，克兰的敏锐感是第一流的。下车伊始，就对中国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调查，根据他与陈济棠私下里的几次接触，他发现，这个南天王对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不大恭维，“天高皇帝远”，蒋介石的鞭子抡不到我们这块地盘。陈济棠的一位副官一再向克兰说明这种情况。

看来“广东省及其邻省对德国经济和德国工业可说是一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但这里的主人却与南京貌合神离，广东的事情必须得到陈济棠的首肯才能兑现。既然陈济棠才真正是德国急需之战略物资——钨、锑等稀有金属的实际控制者（粤省虽产钨不多，但中国出口钨沙大都须经过粤境），德国要想得到这些物资，就必须同陈济棠打交道。”

这就是克兰请塞克特来广东的原因。因为他与塞克特之间恰好能形成互补，克兰没有显赫的履历，不引人注目，善于讨价还价，做具体的工作；而塞克特名头响亮，本身就是一种信誉、一种保证，可以提高克兰的分量。

汽车直接开进了广东省政府，按塞克特的要求，尽量避免抛头露面。刚刚与蒋介石“亲热”过，现在又与蒋之政敌周旋，塞克特自己也感觉有点不太地道。

与广东方面的谈判非常顺利，有塞克特在背后撑腰，克兰的那些吹嘘也变得可信了。现在他俨然是德国政府的代表，拿腔捏调，一派官方的口吻，保证“日益强盛的德国绝不想在华施行任何图谋领土的政策，其兴趣仅在于开拓在华贸易市场”。

这种大口气让人没法不相信他，1933年7月20日，克兰与两广当局签定《琶江口兵工厂合约》共16节。代表两广当局在合约上签字的为陈济棠的代表、第一集团军参谋长缪培南和李宗仁的代表、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张任民。根据合约第一节：

买方（即两广当局）兹委托H.K.（即克兰），于7月20日由买方指定在琶江口南之地段，建筑下列之工厂，并须设备妥当，且能制造出品：

a. 炮厂

港币1850000元

每月出品额 10.5cm轻便野战榴弹炮5门

7.5cm步兵榴弹炮9门

7.5cm野战炮9门

b. 炮弹、信管及火药筒厂

港币1075000元

每月出口额12500个

c.毒气厂

港币490000元

内包括盐酸厂、毒气分解设备、自动装毒气设备

d.防毒面具厂

港币65000元

e.包装费、运费、保险费、建筑费、工厂修理费等

港币5180000元

f.特别用费10%，港币518000元

以上共计5698000元

合约规定，两广当局必须在两年之内按月偿清上述四家兵工厂之全部造价(约560万余马克)，付款方式为：直接交与德华银行，转入克兰账户。作为交换条件，克兰则保证所有兵工厂如期竣工。

中方代表中途曾有过犹豫。缪培南抽着烟卷，心事重重，广西地瘠民贫，根本没有余钱，广东虽称富庶，但也要量入为出，这笔款子我们尚能付得起，但今后合作项目多了，省里的外汇储备也是有限的。

克兰大笑，拍着缪培南的肩膀：“多虑了，多虑了。广东省遍地是宝，俯手即拾，有何担心？”

他顿了一顿，斟满两杯酒，递了一杯给缪培南，道：“只要陈主席愿意，他看中的德国武器，我都负责给你们弄来。作为回报，他必须满足德国对贵国农矿产诸方面的要求，双方以货易货，从此无需外汇结算。”

“以货易货？”缪培南喃喃念叨了几句，“这倒是个好主意，不妨一试。”

“就这样说定了！”克兰与缪培南轻轻一碰杯，中德间的贸易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克兰在广州的活动，终于引起德国外交部的不安。

德国驻华外交人员强烈反对克兰绕过南京国民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签定秘密合约。广州德国总领事当面告诫克兰：“你究竟想惹多大的麻烦？南京当局一旦知情，必将视其在广州的行为为不友善的举动，那时候可吃不了兜

着走。另外,美国、英国、日本亦必将反对德国势力渗入广州,还有,财政上的风险你考虑过没有?广东当局有能力偿还债务吗?”瓦格纳满脸通红,牙齿咬得咯咯响,恨不得一脚将克兰踹出广州。

已经来到中国任职有年、经验丰富的驻华公使陶德曼,对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有着更清醒的认识,陈济棠是个有野心的人,他与蒋介石已经斗过一次,没有分出胜负,他们必定还要大干一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搅到他们的矛盾中间是极不明智的。因此,陶德曼郑重地向外交部提出:

“与克兰达成协定的广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十分不稳定,德国政府在涉及向克兰方案提供官方支持的时候,必须谨慎从事。”

面对各方的压力,克兰并不惊慌,他手里捏着一张王牌,这就是塞克特。

塞克特与德国军方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刚一回国,就被国防部长柏龙白请到了办公室。

柏龙白详细地询问了他的中国之行,并征求他对德国远东政策的建议。

塞克特直言不讳地声明了自己亲华的观点,德国不应与中国为敌:“我们要设想当中国在所有领域各个方面都强大起来时,德国仍能确保自己的在华地位。德国与日本站在一边不会失去什么,但所得甚微!”他果断地一挥手,情绪激昂起来,“德国有的缺点日本都有,缺少战略资源、领土狭窄,我看不出讨好他们有什么必要,今后的努力还须再一次从军事方面着手,而不是为了取悦外交部。”

提到外交部,柏龙白不禁想到克兰在广州惹的麻烦:“陶德曼公使恨不得把这小子给生吃了。”柏龙白打趣道。

塞克特却很严肃:“克兰在中国干得很出色,他为德国战车找到了一个大油库。”说着话,他从皮包里拿出《琶江口兵工厂合约》复印本,摊在桌上道:

“难道这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不符合沙赫特博士的复兴德国‘新计划’的精神?”

柏龙白蹭地站了起来,只要能让德国战车滚动,他什么也不在乎!“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支持克兰,飞速发展的德国军火工业需要开拓海外市

场,重整德国军备亦需搜购大量的战略原料,但是,国际战略原料市场恰恰被我们的宿敌英法诸国所掌握,克兰的广东行动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前景。它不仅为德国军火工业争取到了海外订单,而且还能通过德国军事工业设备及军火与广东等省特有的农矿原料之间的互相交换,为德国带来渴望已久的战略物资,对德国十分有利。只有傻子才会拒绝,才会无动于衷。”

德国经济部也表了态。部长沙赫特早就垂涎中国南方诸省特有的战略物资,也早就想建立起政府直接控制下的官督商办式的,甚至是官办的对华贸易渠道,直接操纵对华军火及重工业产品和战略物资输入。因为自20世纪以来,德国对华贸易一直由汉堡、不莱梅一带的私营贸易控制,眼看着大笔财富流进私人的腰包,沙赫特当然也想让政府分分肥。

德国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问题最终提交到兴登堡总统和希特勒总理那儿。外交部长牛赖特警告说,克兰是在玩火,惹恼了蒋介石,德国从中国弄不到一盎司钨沙,塞克特将军与中国统治者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将受到根本上的威胁。

沙赫特反唇相讥道:“那位号称中国独裁者的蒋介石似乎管不了住在中国南部海岸的陈济棠。”他拿过一叠资料比划着说,

“德国之所以应该支持克兰行动,原因有二:第一,广东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溯自南京政府成立,中国对德贸易连年入超,中方一直无法以外汇与原料偿还德方,1931年至1933年已积欠德方共计1.3亿马克,致使商家裹足,中德贸易无法进一步扩大。广东则不同,广州不仅是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集散地,且陈济棠控制下的广东政府办事效率极高,交易重信用,按时交货与付款,绝未有拖泥带水的现象。”

沙赫特侃侃而谈,吸引了希特勒的目光。

“第二,广东当局控制着德方急需的矿产原料,钨、锑、锰等等,这些都是军火工业不可替代的原材料,是我们刻意搜购的对象,相信其他列强国也和我们一样对它们感兴趣。而中国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是举世闻名的锑、钨产地,其储量、产量均居全球之冠。以1928、1929、1930年三年为例,这三年中世界钨沙总产量分别为12534、16562、15670吨,而由中国出口者就分

别达7003、8304、9320吨,所占比例均在50%以上。就广东而言,该省不仅是产钨省份之一,而且还控制着中国最主要的钨锡外运路线。据中国矿业专家洪诚调查,中国钨沙出口地点最著者为香港与上海,次为汕头,其中,经过广东由香港出口及由广东直接出口者,五居其四。所以说,克兰抢占了广东,就等于在战略上抢占了制高点,能够收到最大的效果。”

眼看着希特勒的眼睛放出光来,牛赖特急忙反驳道,广东地位虽然重要,但它毕竟只是中国的一个省份,蒋介石与陈济棠两虎不相容,必有一争,根据他的判断,可以断定,失败者必是陈济棠,届时,塞克特将军将作为一个两面派的伪君子形象留在蒋介石的记忆里,整个德国也将遭受同样的指责。

希特勒眨眨眼睛,他是位实用主义者,既然克兰在广东能为德国带来利益,那就支持克兰;至于蒋介石,也不必得罪,对塞克特将军在广州的背后活动绝对保密,出了问题,把责任推给克兰就是了。

做完这番指示后,希特勒轻松地耸了耸肩膀。据悉,中国政府上层集团包括蒋介石都对他表示好感,甚至公开仿效,崇拜莫名,但他决不因中国某些人对他的谄媚而给予回报,他的对华关系立足点是建立在有眼前价值的“利用关系”上,他决不承认有必要与中国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

18

红军开局不利 李德计不如人

带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和愤怒，佛采尔赶到了江西南昌行营。其时，第五次“围剿”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了，一见面，就将塞克特的大作《陆军改革建议书》甩了出来，那口气明显带着夸耀：

“大手笔呵大手笔，真是金石之言，堪称建军治军之经典，中正甚为佩服，可惜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才。”

这番话让佛采尔听得酸溜溜的，明摆着蒋介石在暗示自己不如塞克特，佛采尔不禁起了好胜之心。

他将塞克特的建议书反复研究了一番，心中冷笑一声，“没什么新东西”，轻蔑地将它还给了蒋介石。

建议书内容如下：

首先，塞克特指出“政权的根基是军队”，这仍是拾前人牙慧；他建议中国应集中精力训练出一支素质优良、装备完善的核心武力——教导旅，用以作为将来在需要时无限扩充之基础，这不过照搬他组建德国国防军的经验，佛采尔已经在中国身体力行地实践过；在武器装备供应方面，塞克特不像佛采尔那样急功近利，主张从长远利益出发，必须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以欧洲军工企业为基础，建设中国的兵工厂，增加军火自给能力，改变完全依赖外购的弊端，以免在关键时刻受制于人，这一建议被中方采纳，在塞克特二

次来华后，便全力发展中国军工企业，为后来抗战爆发时保证中方武器弹药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应当实事求是；关于交通建设，塞克特将它提到重要的战略地位，但佛采尔笑话它不适时宜，现在蒋介石正集中精力与共产党作战，岂有余力顾及这些建设事宜；至于塞克特针对中日未来战争的实际，提出加强长江中下游战略防备的建议，佛采尔觉得还算说到了点子上。但总体而言，却没有什麼惊人之笔，值得蒋介石那样赞叹。

不谙世情的佛采尔也终于悟出了道理，蒋介石对塞克特的褒扬，就是让他识趣，准备收拾行囊走人。想到这里，他就要发火：“余来中国，服务于钧座，运筹帷幄，奔波前线，自付心无所愧，若有不当之处，万望陈明。”

蒋介石换上了笑容，现在他还用得着佛采尔，还需要他在新一轮对红军的作战中出谋划策，引进塞克特也是让他有一种危机感，产生一种竞争力，死心塌地听其驱遣。

他问佛采尔对眼下的“剿共”战争有什么建议，在蒋介石眼里，佛采尔的军事才能还是不容忽视的。

从来充满自信的佛采尔居然也期期艾艾，拿不出方策。第二、第三次“围剿”，他都参与了战术的制定，但都无功而返，更可怕的是，失败的原因让他百思不得其解，这使他不能够对症下药，既然找不到对手的破绽，以后的仗他也没把握。因此，一提到与红军作战，他就心里发怵。

耐着性子听完了佛采尔的意见，蒋介石心中涌起一阵失望。看来佛采尔已经是江郎才尽了，翻来覆去依然是什麼“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老一套，这些都在前几次“围剿”中使用过。

“除此之外，又能有什麼高明的招法？战略战术的充分发挥效力，还需要准确地理解和执行。”佛采尔又把责任推到了作战部队身上。

这一次，蒋介石毫不顾情面地批评了佛采尔：“余以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以外的问题，佛顾问未免忽视淡漠了。何谓军事战略，贵国的克劳塞维茨是这样定义的：是统帅为了达成在战斗中击败敌人取得胜利的目的，而如何调动运用他手中全部资源的艺术。”

佛采尔没有想到蒋介石会给他上一堂军事理论课，但他没法反驳，蒋介石

石说得在理，也指出了他的薄弱。在德国参谋部时，兴登堡就批评他“只会打仗”。

能让佛采尔这样的人慑服，蒋介石心中有几分得意，连续几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使他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智囊杨永泰的一席话让他豁然开朗，“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与其仅恃武力以摧匪焰，曷若修内政以弭乱源，以求标本兼治”。

蒋介石以手加额，连连称是，红军之所以能够发展为“燎原之火”，“乃源于过去党政军之施政错误，内政吏治之不能整饬，为其招乱之阶”。他站起身来，浑身兴奋得发热，以为找到了制服红军的绝招。

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全国各苏区发动全方位的进攻，所谓“政治军事双方并进”，“军队所到的地方，其政治、社会、教育、甚至产业，统统要军事化”，“党政军一定要整个地相辅相成，通力合作”，“使一事一物，皆能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有助军事发展。”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毕竟国共力量的悬殊太大，虽然中央苏区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但由于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防御能力顿时显得单薄了许多。

蒋介石随即又准备组织第五次“围剿”。

中央苏区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中国共产党内部因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自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在一片惋惜声中被迫赋闲“养病”，所幸朱德、周恩来仍坚持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不幸这一局面未能继续保持下去。

博古来了，李德来了，苏区遭殃了，红军遭殃了，中国革命遭殃了。

博古，原名秦邦宪，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28个半布尔什维克”小组织成员，王明的小兄弟。此人对革命是绝对忠诚，但缺少主见，对共产国际过于迷信，对王明过于崇拜。由于他长得黑黑瘦瘦，所以有一个绰号“黑面木偶”，一语双关，意思指他是王明的傀儡。

博古来苏区也是迫不得已，因为王明路线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

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中共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了，这才打点行装，投奔中央红军来了。

但博古此行，并没有落难者的味道。他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一进苏区，立刻神气起来，一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看什么都不顺眼，把毛泽东、朱德几年来取得的成绩、胜利贬得一无是处。

与博古经常在一起的高个子外国人，据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

李德本名奥特·布劳恩，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一个贫穷人家，从小在孤儿院长大。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缺少了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思辩和深沉，却夸张地继承了自信和固执。

李德后来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一名俄军战俘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十月革命期间，加入了苏联红军，后成为骑兵团参谋长，不久，又加入德国共产党，派赴国内工作。

在德国，李德有一段铁窗经历，越狱逃跑后，又秘密来到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三年期满毕业。

李德以后的一段经历就成了谜。传统的说法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他有地下工作的经验，熟悉英、德、俄三门语言，又有过街垒战经验，正适合王明“夺取中心城市”的策略，故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手下担任顾问，聊作咨询备忘之用。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据王稼祥回忆，他曾亲口问过王明：

“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派）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

王明连连摇头，一再声称共产国际并未参与此事，他个人也没有给过李德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东方部都没有派李德去中国。他只知道李德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派去的。

王稼祥一证，他不明白李德怎么扯上苏军总参谋部这根线。有人考证，王明的话是真的，但他也并非完全知情，准确地说，李德是由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门派来中国的，执行的是一项秘密使命。

在间谍史上,理查德·佐尔格是一个传奇的名字。他也是德国人,二三十年代曾是苏联设在东方间谍网的一位重要负责人,他主持的情报组织就是史上有名的“佐尔格小组”。这个小组在中国也有活动,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佐尔格在党内活动时也常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面,中共方面都把他领导的情报组织当成是共产国际在华的机构之一。“佐尔格小组”在中国的活动并非一帆风顺,1931年曾遭到国民党特工严重破坏,成员鲁格夫妇被国民政府查获逮捕,决定判处死刑。佐尔格通过关系活动后,国民党方面同意以2万美金为代价将鲁格夫妇赎回。佐尔格当即报告莫斯科,请自己所属的苏军情报部门赶紧派人送专款来营救鲁格夫妇。

苏军总参情报部闻风而动,立即派出党龄都已十多年的德国共产党老党员奥特·布劳恩(即李德)和赫尔曼·西伯勒尔。他们两人互不认识,都是由总部单独派遣,分别带上2万美元,来到上海,将钱送到目的地。1932年6月,鲁格夫妇获释,并被允许离开中国。

由于李德从事这项任务的性质,所以直到写回忆录时仍守口如瓶,所以对他的来历人言人殊,莫衷一是。

关于李德为什么又成了中共的军事顾问,据张国焘回忆,共产国际原本准备派遣一名经验更为丰富的德国籍军事顾问前往苏区,他们之间曾有接触: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记录。他年逾50,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去,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达到目的地。共产国际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即李德)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不如他老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摩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不必去评价谁优谁劣,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挑选的军事顾问跳不出德国人的圈子,大概一方面照顾苏联与南京政府的外交

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对德国人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有一种普遍的认可。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轻视、贬低德国的军队、德国的民族素质、德国的战斗经验、德国的军事理论。如果从纯职业性意义上来说，德国军人无疑属于优秀的行列。

但李德之所以被选派进入苏区，是因为走了博古的后门。他们在莫斯科就彼此熟悉，在博古离开上海时，李德要求他以中共名义向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尔特协商，将自己派往苏区。当时，在中国的国际代表都已看出，朱、毛领导的中央苏区有着最广阔的前景。

共产国际给李德规定的权限很明确：“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但博古没有留意这行话，他太需要李德了，因为他不懂军事，来到苏区就得听凭朱德、周恩来作主，听凭毛泽东评头论足，如今有了洋顾问，谁也不能再欺负他外行了。所以，李德到达瑞金的天头晚上，博古就约了张闻天去看他，一席长谈后，李德已经成了中共军事的主管，从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指导，直至训练、后勤、组织，都是他的职权范围。

博古对他的倚重，使李德忘乎所以起来，他以为自己就是克劳塞维茨，就是苏沃洛夫，就是拿破仑，其实是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某一天，博古拿着一份旧报纸匆匆而入，指着塞克特访问中国的那条新闻：“蒋介石也请来了德国顾问。”说罢，面露忧色。由于红军消息阻隔，他们并不知道塞克特不久后回国，协助蒋介石作战的仍是佛采尔。李德眼睛翻了翻：“何足惧哉！塞克特早就成了过时人物了。”

这话口气也太大了点。李德抱着枪刚刚走上战场时，塞克特、佛采尔早已是身经百战、名扬天下，他们的著述，有的成为军事院校的教材，李德也曾经孜孜不倦，埋首其中，可以说他们是两代人物，而且也绝不属于同一个档次。

名将的素质，就在许多平凡事上反映了出来，李德整天地夸夸其谈，整天地趾高气扬，佛采尔却忍住蒋介石的奚落、冷淡，扎扎实实地做好战前准备。鉴于以往的失败，佛采尔决心为蒋介石训练出一支能充分理解、严格执行上级作战意图的有力部队。练兵先练将，首先从军官抓起，对部队各级干

部,有计划地进行轮训,加强心理、文化、思想、战术技能诸方面的训练。从7月15日起,江西前线各级国民党军官轮班上了庐山,佛采尔亲自讲授,讲山地战,讲堡垒战,讲搜索战,口若悬河,旁征博引,蒋介石有时来旁听,听到精彩处也不禁夸赞。佛氏确实是难得一见之将才,尤可贵处,在于力行和实干。

训练期间,对付红军的新的战略思想开始成熟、定型。杨永泰继续丰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思想,对苏区展开经济上封锁,政治上攻心,采取保甲制度,施行“连坐法”,从而摧毁红军立身之本,使其“鱼儿离水”。

“鱼儿离水”,佛采尔眨眨眼睛,这个比喻很形象,也给了他启发。他向蒋介石提议,要把红军挤进绝地,就要采取稳打稳扎的堡垒战术,缩小苏区根据地,让红军这条大鱼跳上岸来。

蒋介石听了眉飞色舞,他手下一位叫做薛岳的将领也提到过这种战术,现在与洋顾问不谋而合了,他觉得可以一试。多少天来,他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摸索出一叠手稿,请佛采尔再加修饰,增添实战性内容,作为部队与中共作战的指导原则。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剿匪”手本》。在这本小册子里,除绪言外,共分6篇,第一篇为“救民”,第二篇为“气节”,第三篇为“纪律”,第四篇为“智勇”,第五篇为“勤劳”,第六篇为“战机”,还有附录“战斗秘诀”、“剿匪要诀歌”等等,其中不乏佛采尔的心血,反映了他的战术训练思想。

蒋介石确有歪才,他将他的反动和历年作战经验及佛采尔的军事才华融成一炉,甚至编成了歌谣,通俗易懂,简明好记。一时间,风景秀丽之庐山成了兵营,莺啼鸟鸣化做武夫的嘶吼,“剿匪要诀歌”唱得地动山摇,鬼哭狼嚎:

第一训练全靠动,锻炼体力要认真。每日起来学瞄准,每日一次练行军。强行急行百里零,翻山过水不要停。挖壕筑路本分事,人人要学好技能。跳宽要跳八尺壕,城墙要扒一丈高。拿个石头当炸弹,练习手劲向前抛。夜间练习练得好,偷营劫寨趁黑宵。越练越精气越壮,百战百胜成英豪。

第二行军要分班,各团队伍莫乱参。队伍总要成序列,伙食担子走中间。先派侦探次尖兵,前后侧卫任务明。本队居中向前进,四面处处要留心。交番

轮进最稳妥，行李简单莫繁琐。侦探第一要勇敢，还要沉着不懒惰。每日先行20里，一步一步看仔细。遇着岔路探埋伏，遇着树林探村庄。遇着贼匪来迎敌，飞鸟回报不要慌。看定地势并虚实，迟报一刻也不妨。

第三宿营要小心，周围地形须查明。哪是紧急集合场，哪里埋伏好路径。抵抗工事要两道，更防奸细起内应。饮水食物防中毒，炸弹地雷防陷阱。周围挖些好茅坑，免得热天臭气熏。交通要点多派哨，时时警戒要认真。严防匪方来间谍，探我虚实与奇正。乱匪耳目用巧计，进退来回无一定。弹药枪枝莫离身，夜间有警要镇静。假如匪军来夜袭，稳打稳扎莫作声。

第四防御要稳固，据点工事须合度。若守城垣和高垒，高沟深垒莫贻误。城脚外面设侧防，节省兵力有余裕。不避山高占瞰制，不怕匪多要稳住。节省子弹莫浪费，隔山远射效力缩。待匪接近三百米，百发百中更容易。匪始逼到外周边，榴弹砖石一起飞。出去如无真把握，固守阵地且待机。

第五攻击要稳健，选定方向求利便。打匪不要打正面，要抄侧背功立见。纵深配备为原则，要留后劲好应变。勿靠友军齐动作，独立专行制胜先。预埋伏兵运妙计，待机到时抄侧面。各部所留预备队，不宜早期先出现。留到最后五分钟，再接再厉如雷电。火线耐劳又耐苦，受伤不逞且饿肚。我有死伤不必惊，敌人死伤重十分。谁能坚持拼到底，谁是最后得胜军。

第六打仗要细想，出队要分五大支。中间一支且托住，左右两支先出去。另把一支备军应，再有一支做伏兵。队伍排在山坡上，团长位置要了望。看他哪边是来路，看他哪边是去向。

看他哪边有伏兵，看他哪个是官长。他呐喊来我不喊，他放枪来我不放。他若扑来我不动，待他疲劳再接仗。起首要阴后要阳，绪战示弱决战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打散贼匪回山逃。追贼专从两边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队伍切莫乱分毫。

第七……

歌声中，包含了蒋介石、佛采尔对红军作战的全部套路。

这些歌谣不只是唱唱而已，受训下山的军官视其为制胜之秘诀带到了军中。经过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已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部队的战斗

力大有起色。时任十八军某连连长的杨伯涛客观地作过评价：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已“一反过去深入苏区狼奔豕突处处被红军所乘的旧一套，而是主动地选择苏区有战略意义而又便于用兵的地区为一战役阶段。集中强大的兵力，作周到的准备，进行有限目标的攻击；攻占后即利用有利地形构筑碉堡封锁线，对苏区严加戒备阻绝封锁。在碉堡线后，随即整顿交通通信诸事宜，重要之点则构筑公路，密切衔接。政工人员则协同地方官吏地主豪劣严厉镇压人民，推行反动政令。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步步前进，蚕食苏区。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自由主宰战场，不冒风险。因此各部军心，大为稳定，俱能从容应战。”

轮训的军官一批批上山又下山，蒋介石也准备打道回府了。他和佛采尔两乘小轿一前一后行至半山望江亭，蒋介石拍拍轿杆，示意停轿，佛采尔不敢僭越，也停了下来。

蒋介石信步来到亭下，驻足远眺，骄阳如火，长江如带。如今，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已在头脑里酝酿成熟，作战方案就在佛采尔随身携带的皮包里，他已准备调集60个师以上的兵力，一大批黄埔战将披挂上阵，如陈诚、顾祝同、蒋鼎文、陈继承、李延年等等，最近又从国外进口了一大批武器，其中德国军火占相当份额，全部拨给了前线作战部队，以陈诚的十八军为例，花机关枪的配备率已经到了普及程度。蒋介石用眼睛盯牢了佛采尔，请他预测一下战争的结局。

佛采尔却把脸偏过了一边，说实话，惟独与红军作战，他心中无底。哪一次不是占尽优势，哪一次不是感觉良好，结果都是铩羽而归，因此这一次他再也不向蒋介石拍胸脯，打包票了，出言十分谨慎：

“且看战事发展吧。”

第五次反“围剿”的揭幕战，是从1933年9月25日黎川开始的，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苏区中央局大惊失色。

其实无需惊慌，“关起门来打狗”，“诱敌深入”一向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朱德、周恩来也深谙此道。

但后方负责指挥作战的李德不这样认为,根据他所执行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让蒋介石打破门户,这让他面子无光。

此外,他心中还有一个秘密。自从听说塞克特协助蒋介石作战,就不禁涌起一种愿望,他想以塞克特为试金石,检验一下自己的指挥能力,以塞克特之名望,他李德若能战而胜之,必将名扬天下。

黎川失守的同时,入闽作战已数月的彭德怀正率红三军团火速回师,途经黎川东北之洵口,恰与刚刚夺取黎川的赵观涛师迎头相撞,打了个遭遇战。

双方谁都没有料到在这狭窄的山道上不期而遇。两边的士兵都在低着头赶路,当第一声枪响之时,许多人眼里都露出一片愕然。

相形之下,红军的战术素养、应变能力就显示出了优势。彭德怀没有一丝惊慌,没有一点手忙脚乱,如同早就演练过一般,手下将领自觉而动,各自穿插迂回,先敌开火,先敌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一切井然有序。三军团历来以凶猛著称,最擅长这种混战,一场拼杀下来,彭德怀检查战场,敌第十八旅的两个团被他从“围剿”军的战斗序列上完全抹去,敌旅长葛钟山五花大绑摔在他的马前。

败绩传来,佛采尔不惊还喜。初战示弱,但愿红军产生误解,以为可与政府军分庭抗礼,打一场堂堂正正的正规战。

果然如佛采尔所料,洵口遭遇战让博古、李德喜不自胜,将之扩大为普遍意义,并引以为据,证明陈兵苏区边缘,“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之正确,立即制定收复黎川计划,攻占硝石、资溪桥,进取黎川,重新堵上苏区的北大门。

彭德怀有些犹豫。数月征战在外,鞍马劳顿,刚刚又经过一场搏杀,战士们已经累得抬不起手脚,安有余力钻到敌人的堡垒群中作战。

但中央军委的命令却是斩钉截铁,“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彭德怀硬着头皮将部队拉到了硝石、资溪桥之间,打了一场硬碰硬的破垒战。

蒋介石的“碉堡战术”显出了威力,占领黎川后,立即在四周建起层层碉

堡群，一切按照佛采尔的设计和布置“采取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碉堡个数。每个碉堡守备兵力减为一班，最大为一排，星罗棋布，形成宽式地带，以火网控制全地带及交通，守军的弹性战斗为要领，决战于地带以外，敌如潜入地带之内，则以各个碉堡构成之火网，予以极大之损害。封锁碉堡群之间隔，不得越过二里以上，每个碉堡群容兵一排，以三个班碉群连锁之”，形成风雨不透之势。

这仗就难打了，因为红军缺乏重武器，攻坚力受到了限制，纵然红三军团的战士个个都是打虎将，但老虎不出洞，他们也无可奈何，反而处处受制于人。连续周旋5个日夜，只能退了下来，检点兵马，已经有1000余红军战士伤亡挂彩，彭德怀直喊仗打得窝囊。

此仗，毛泽东甚为不满，予以严厉批评。洵口遭遇战本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却没能抓住机会捕捉战机，迫不及待攻打硝石、资溪桥，结果损兵折将，致使反“围剿”战斗“开脚一步就丢失了主动权”。

硝石、资溪桥之战，开了一个恶例，今后的战略有了一个错误的模式。“御敌于国门之外”，即是由此而开始施行的。

因此，黎川失守的严重性被夸大，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肖劲光成了替罪羊。

黎川失守，非战之罪。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肖劲光根据敌人进攻的态势，估计敌军必大举进犯黎川，他给前总发电，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的光泽、资溪一带，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不应死守黎川。已经“赋闲”的毛泽东不忍坐视，建议放弃黎川，诱敌深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李德反感地拒绝了这些意见。与毛泽东初见面，他就对毛泽东没有好感，毛欢迎他的方式很生硬，毛讲话爱用一些他听不懂的古老的格言，毛讽刺他不能吃味道很厚的油炸辣椒，“谁不吃红辣椒，谁就不能战斗”。几十年后，李德还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喋喋不休地展开攻击，更重要的是，毛站在博古的对立面，而李德则坚定地支持博古。

肖劲光在黎川坚持到最后一刻。他的主力已随三军团行动，手上只有一支70余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要想抗衡敌周浑元军三个师的进攻，

守住一座孤城，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他在掩护党政机关及群众安全撤退后，为避免遭敌包围，主动弃城而出。

他当时的心情十分坦然，十分理直气壮，红军一贯的战略，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无可厚非。

苏区中央局最初也没有对他有一语指责。

直至浒湾战斗后，黎川失守之事又再度提起，并上纲上线，染上了政治色彩。

浒湾战斗是继硝石、资溪桥之战后又一场旨在扫荡外围、收复黎川的进攻战。佛采尔很纳闷，红军的战术和他往日领教的有所不同，怎么如此毛躁、莽撞、冒失、固执，甚至杂着几分愚蠢，打对攻、打消耗，正合国民党军意，正中佛采尔、蒋介石下怀。

因此佛采尔断定，红军指挥层里肯定出现了人员变动。蒋介石笑咪咪地告诉他，据消息透露，中共也请了个德国顾问，中国名字叫李德，本名叫奥特·布劳恩。

“看来你们德国顾问中也有蠢才，中共请错了人啦。”蒋介石幸灾乐祸道。

佛采尔把布劳恩这个名字在心里过了几遍，却没有任何印象，德国稍有名气的将领没有他不知道的，这个布劳恩肯定是个无名之辈，不仅无名，且无能。就从已经发生的这几次战斗看，明显带有抄袭战术课本的痕迹，且生搬硬套，将纸上作业强行运用于实战。佛采尔注意到，红军常在预定的战斗步骤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进行下一个步骤的行动，而行动的开始往往是一个整点钟，这就表明红军作战有一个严格的时刻表。这种僵硬的作战风格很符合一些德军军官的习惯，而红军以往作战，却是机动灵活，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舍优取劣，重用起德国的一个未入流军官。

战斗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蒋军突破了红军的防线，并打通浒湾通道，收复黎川已成泡影。

李德这一怒非同小可，他想向彭德怀认罪，但没这个勇气，彭大将军性格粗豪，不是由着人欺负的。于是，肖劲光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一纸命令，撤了肖劲光的职，并提往前总审查。

彭德怀感到了不安，浒湾战斗失利，责任不在肖劲光，他把过失往自己身上揽，却让博古、李德感到了为难。肖劲光已被撤职，抓起来了，总不能向他赔礼道歉，承认错误吧？李德灰眼睛珠子转了几转，突然冒出一条理由：

“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

由此可见，黎川失守只是一个借口。肖劲光本人也清楚这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博古、李德反感的是肖劲光执行的依然是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前总办的一份叫做《铁拳》的杂志，就专门出了《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肖劲光心里真不是滋味，事情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却定性了，批判的文章也出来了，这不是蓄谋已久吗？

肖劲光最终被带上了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进行公审。一开始气氛很紧张，台下的口号喊得杀气腾腾，等到肖劲光辩护完，却是人人同情。以70余人教导队，抵御敌人三个师兵力的进攻，这是强人所难嘛，况且，上级又没有命令让他死守黎川，肖劲光究竟错在哪里？

公审大会草草结束，肖劲光依然被判了5年监禁，开除党籍、军籍，按李德、博古的主张，是要肖劲光项上的人头的，周恩来坚持要征求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彭德怀也挺身而出。多少年后，肖劲光还十分动情地说：

“周总理是个好人，大大的好人。”

“如果没有中央这些领导同志的保护，在红军离开中央苏区长征时，根本不会留下我这个‘罪犯’，很可能杀掉了。”

浒湾战斗失利后，红军又组织过德胜关战役，最终也未能扭转战局，不得不退守建宁地区。从黎川失守算起，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红军已由进攻态势转入防御战争。

李德和佛采尔的作战水平已分出了高下。

19

两个拳头打人 拳拳落空 红军壁上观战 痛失好局

如果仅从军事角度检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战略战术上最大的失误当为“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两个拳头打人”。如果说硝石、资溪桥之战开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恶例，第一炮就没有打响，那么，“两个拳头打人”则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尚未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型了。

聂荣臻元帅后来检讨了这一战术思想的形成和由来：第四次反“围剿”后期，我军抓住有利时机，分别发动三次战役，即强攻乐安、永丰打援、偷袭宜黄，因敌人坚守不出，我军缺乏攻坚利器，均无功而返。这就有了中央指示，聂荣臻回忆道：“6月13日（1933年），方面军接苏区中央局转发的中央关于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因为电文很长，所以我们一般都称之为‘长电’。这份长电实际上是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的意见。长电判断蒋介石与闽、粤敌人有矛盾，蒋介石在中央苏区北部取守势，我们攻击不容易，而且战果很少，所以要求将一方面军主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从这时起，即开始有‘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

聂荣臻提到的共产国际军事总顾问即是李德的顶头上司弗雷德。这又是一个神秘人物，据说他确有将军的身份和资历，是苏军情报部门的负责干部。弗雷德虽不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匈牙利混血儿），但与德国有很深的关系，曾经参加过鲁尔和汉堡1923年的起义。那时他叫斯坦因，在此前后还叫过吉尔伯特、赫伯、哈伯特和克雷贝尔等等，在中国名为弗雷德·斯特恩。

据李德回忆，弗雷德对他曾有交待：

“他要我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据是，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为了保证在危急的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他同我商定了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只有我们两人知道。”

由于李德在苏区“一切说了算”，“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自然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但是，它的战术效果却让人不敢恭维。毛泽东不客气地讽刺道：

“军事平均主义到1933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彭德怀的三军团成了那只打得疲劳的拳头。按照“长电”指示，三军团组成东方军挥戈闽西，劳师远征却收效甚微，回军苏区后又连续投入一系列战斗，在硝石、资溪桥之战时，周恩来、朱德一再主张一、三军团主力会师，打破敌人一路，却屡遭博古、李德拒绝，严令一、三军团夹抚河而阵，保持双拳出击之架式。此消彼长，佛采尔却从以往同红军的对阵中领悟到集中优势兵力的重要性，他向蒋介石建议，去掉旅的编制，扩大团的规模（因为团往往作为单独的作战单位独当一面），增强抗击打能力，进攻时，也往往数路并进，加强联络、保护，避免被红军一口吃掉的危险。

彭德怀开始焦急了，中央苏区的两个兄弟主力团——一军团和三军团，合则胜，分则败，这已被以往多次的实践所证明，博古、李德就是视而不见。现在蒋军又加强了戒备和保护措施，以往那种大歼灭战，将敌人成师成旅“包饺子”的场面看不到了，即以1933年12月12日发生的黎川城东的团村伏击战为例，这是彭德怀好不容易觅得的战机，我军以4个师1.2万余人之兵力，击溃敌3个师15个团共4万余人。战斗虽获胜利，但俘虏不及千人，打成了“击溃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战略意义不大，彭德怀不无愧惜道：

“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3个师15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3个团，就是18个团，再寻机歼敌20个团左右，敌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能够改变第五次反“围剿”结果的何止是团村伏击战，最大的转机发生

在1933年年底。当时，福建事变爆发，蔡廷锴、蒋光鼐之十九路军阵前反戈，给了蒋介石狠狠一记窝心锤，他倒在那张硬木雕花靠背椅上，泪花晶莹，心理几乎崩溃，“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殊可痛心”。佛采尔也是面如土色，心中暗暗叫苦。他判断红军必将与十九路军联手，“围剿”军将立即陷入两面作战的窘境，凭红军的冲击力，打破刚刚形成的包围圈，只是迟早之间的事。

果然，十九路军已经与红军停止敌对，握手言欢了。自从淞沪战场撤至福建，调来“围剿”红军，蒋光鼐、蔡廷锴就生出反蒋之心。抗日的英雄不愿做打内战的先锋，在第四次“围剿”苏区中，他们就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基本上没给红军造成什么麻烦。老长官陈铭枢一席话说得蒋蔡两位将军毛骨悚然：

“与红军作战，若战而胜，牺牲必大；若战而不胜，更不堪设想。”

此言意味深长，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十九路军也是主张抗日的，两雄相争，无论谁胜谁负，都对抗日有害。更何况蒋介石心狠手辣，看看他对付异己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让人心寒齿冷。

两位将军连忙请教陈铭枢，陈铭枢慢悠悠吐出四个字：

“联共反蒋。”

1933年9月22日，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的《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走进了彭德怀的指挥部。此人化名吴明，他与周恩来在法国时曾有过交往，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回国后进了黄埔，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脱离了中共。

彭德怀三步并作两步上前迎接，与十九路军交手不是一次了，尽管他略占上风，但赢得艰苦，赢得吃力，周恩来就一直不赞成与十九路军久耗，因为那是一支有抗日精神，战斗力颇强的队伍。现在化干戈为玉帛，少了一个对手，多了一支盟军，彭德怀心情为之一松。

红军端出了大脸盆猪肉、鸡子招待客人，事后博古、李德知道此事，都感到脸红，太寒酸了，太不讲卫生了。彭德怀倒很坦然，用脸盆盛菜、装饭，用脸盆洗脚、洗脸，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抗美援朝结束。

朱德、周恩来都力主与十九路军联合反蒋，主动出击。现在蒋军主力都

调到福建作战去了，对苏区的攻势已经缓解下来，乘这个机会，红军完全可以破阵而出，转到外线作战，届时，鹿死谁手，尚可一搏。

毛泽东也“屈驾”来到了“独立房子”，这是李德的住所，毛泽东平时总是避而远之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博古、李德的心中已被划入了“另册”，但在今天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了中国的前途、红军的生存，他放下了矜持，忍住了不快，要同这位洋顾问唠唠。

毛泽东显得有点激动，因为中央最近发给前方的指示中，并没有与十九路军合作的诚意。这份以项英名义发出的电报称：“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我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

“这叫什么话？共产党一向以诚待人，这种滑头，这种皮里阳秋，不是共产党人的风格嘛。”毛泽东愤怒地想，他知道项英也是秉承博古、李德的意旨，所以，尽管红军与十九路军签定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尽管双方拍板答应“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也只不过是口头应诺，纸上空文。当十九路军正式挑起反蒋大旗，中共方面却按兵不动了。

压了压心中的火气，毛泽东把自己的意见端到了博古、李德的面前，出语就惊煞满屋人。

“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这叫做‘围魏救赵’，我们在井冈山时就用过，能够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朱德一旁解释道。

李德早站了起来，粗大的手指对着毛泽东的面门，大嚷起来：“你们这些中国同志都犯了幼稚病，怎么能轻信蒋光鼐、蔡廷锴这样的军阀，十九路军和我们联合，只是要让红军做他们的挡箭牌，如果我们轻信他们，远离中央

苏区冒险作战，一旦他们反噬，则悔之晚矣。”

一番话说得博古不寒而栗，附和着道：是呀，是呀，王明同志早告诫我们要警惕他们，既使与蒋光鼐、蔡廷锴握手的话，也要在握手的瞬间心里骂他一声反革命。

毛泽东长叹不语，事已至此，夫复何言。他为博古、李德的执迷不悟而惋惜，为红军的错失良机而惋惜，为自己的正确意见遭到拒绝、冷落而痛心。此计不用，万事皆休，第五次反“围剿”取胜之机眼睁睁地与红军擦肩而过。

博古、李德“关门主义”将十九路军送上了绝境。蒋介石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组建不久的福建政府，武力威胁，金钱收买，软硬兼施，花样百出。十九路军尽管骁勇，尽管善战，但以一己之力对付蒋介石，却连三个回合也撑不下来，从他们正式打起反蒋旗号到烟消云散，尚不足两个月，蒋介石又重新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

在这期间，佛采尔心中最紧张，天天询问江西战况，生怕红军趁虚蹈隙，有所动作。但实际情况却令他纳闷，令他安慰，红军像是睡着了，他们每天无所事事地守在山头上，作壁上观，战马困于厩，宝剑藏于匣，博古、李德仿佛将他们忘却一般。

佛采尔真该好好感谢他的那位同胞，事后他得知毛泽东的战略计划，不禁出了身冷汗。毛泽东用兵的奇诡大胆，让他折服，说实在的，红军假如依计而行，他佛采尔还真的想不出对策，“围剿”军的阵脚立刻就乱了。幸亏李德从中阻拦，才成全了他在中国的收山之作，他觉得胸前蒋介石授予的那枚宝鼎勋章，李德也应该分去一半。

“真不知中国共产党人从哪里找到的这个活宝。”佛采尔后来回到德国后还在打听李德这个人。

熬过了“福建事变”这一劫，蒋介石重新放开了手脚，佛采尔也抖擞精神，拟定了一个十分厚重凝实的六路围攻计划，采用梯次配备，交替筑垒的战术，将红军逼向绝境。1934年3月底，顾祝同指挥的北路军，辖罗卓英、樊崧甫、吴奇伟、刘绍光、周浑元等中央军精锐5个纵队及孙连仲、张钫等北方军

队，约25个师又两个旅，为进剿军主力，由黎川、宜黄、永丰、泰和分两路夺取广昌、石城、兴国、宁都。蒋鼎文指挥东路军李延年、卫立煌、汤恩伯、刘和鼎等4个纵队14个大部属于蒋军嫡系的师又两个旅，除刘和鼎的杂牌军留驻闽北和闽中各地外，黄埔精锐均指向闽西。何键指挥西路军刘建绪、陈继承、李韞衍、李生达、梁冠英等14个师又5个独立旅，在赣江两岸向湘鄂赣边区进攻，陈济棠则控制粤军9个师又一个独立旅，布防于粤赣边，严密封锁，中央红军已陷入重围。

一向眼高于顶的陈诚也啧啧赞道：“到底是世界大战的名将，大手笔呀，大手笔，瞧这6路围攻，凝而不僵，稳中带杀，何婆婆（何应钦）一辈子也修行不到这个水平。”他与何应钦素有矛盾，也知道佛采尔与何应钦有矛盾，借这个机会褒一个，贬一个，自然会有效果。

这番话让佛采尔感到受用，因此笔下行私，令陈诚之十八军担纲北路进攻主力，叩关广昌。蒋介石知道佛采尔用心，召来陈诚，叮嘱他一定要争气，打下广昌，攻占苏区的首功就将落在十八军名下。

如果将黎川比喻成苏区的北大门，广昌防御线就是中央根据地的内墙了，一旦踏破，红都瑞金将裸露于炮口之下，势难坚守。蒋介石、佛采尔、陈诚都看清楚这一点，因此对广昌的攻击已经达到了如痴如狂，如风如暴，片刻不容空暇，片土不留间隙的程度。

博古、李德已经乱了方寸，仅从他们喊出“不是胜利，就是死亡”的拼命主义口号就足以证明其惊慌失措，从前期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消极主义，反差之大，让人难以接受。

不知李德凭什么狂妄，与毛泽东相比，他的头脑明显不够用，缺乏机动和灵活，战略战术上毫无创意可言。面对敌人大兵压境，他在广昌一线布下阵势，由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分兵把关，明刀明枪打起了阵地战。

大概总忘不了过去的那点街垒战经验，针对敌人的碉堡战术，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这让佛采尔大为宽心，让进攻的国民党将领大为宽心，在此之前，他们与红军作战，还从未发现红军占领整然一线的防御阵地，构筑工事，采取有形的防御战斗，这样使他们每每捉摸不定红军的动态而惶惑

苦恼。既然对手现在布下堂堂之阵,反而让人放下心来。那些费尽力气修成的碉堡不外泥土、石头、树木堆积而成,能挡住飞机下蛋吗?能挡住大口径的卜福式七五山炮吗?“往往是一阵狂轰滥炸后,成排成班的红军尚未投入战斗,已封杀在自己所筑的堡垒里。”

有红军战士在发牢骚:“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去同人家比堡垒,这是搞什么鬼呀?”

与李德“以堡垒对堡垒”战术相配合的,则是“短促突击”,就是在敌人离开碉堡向我军进攻时,猝不及防施以反冲锋。最初曾侥幸得手几次,但敌人很快学乖了,你一突击他就缩了回去,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预埋伏兵打你反突击,红军屡屡受挫,战士们愤怒言道:

“短促突击,等于送死。”

刚来苏区不久的陈云则言,“短促突击”拒绝了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术。

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也反对这种愚蠢的战术。他们都是打运动战的专家,短促突击非驴非马,说穿了,也就是阵前的反冲锋,仅是千变万化的战术手段之一,到了李德嘴里,却成了包治百病的祖传秘方,说得神乎其神,成了这一阶段的战术指导思想。

1934年2月24日,林彪、聂荣臻联名签署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要求停止“以堡垒对堡垒”及短促突击之类的打法,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林、聂都是红军中第一流的将领,说话的分量自然很重,李德很惊慌,害怕自己威信受损,通过博古、项英向林、聂施加压力,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命令,不要脱离中央的轨道。

自从毛泽东遭到排挤后,聂荣臻就发现,林彪的心情大变,苍白的脸上愈益少了血色,更加沉默,更加内向,更加阴沉。这位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正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他是公认“毛派”的人物,博古一进入苏区就没有给过他好脸色看,这让他一直心怀不安。随着毛泽东大权旁落,他更是谨慎小心,从感情上讲,他更接近毛泽东,也钦佩毛泽东。但人往高处走,水往

低处流，他怎么愿意因此而背黑锅，受牵连呢。林彪思索着，他意识到，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关系着命运，关系着前程。

自从与聂荣臻签署了那份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意见而遭到批评后，林彪就懊悔不迭，责备自己太冲动，太冒失了。得罪了李德，就是得罪了博古；讨好了李德，就是讨好了博古，林彪心中一动，主动将李德请到军中，听他胡说八道，讲短促突击。

李德很高兴这样的邀请，他的指挥才能已遭到红军将领的普遍怀疑，现在有林彪这样的“常胜将军”向他求教，最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了。李德口吐白沫讲了整整一天，自我感觉很好，他发现，台下的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一样，认真真记着笔记，还时时做出若有所思状。

其实，林彪早在心里嘲笑开了，什么“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坚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云云，空洞无物，拾军事教科书牙慧而已。

战士们也大喊“听不懂”，林彪忍住鄙视，装出莫测高深的谦虚：“你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太懂，不懂就学嘛。”

林彪果然学出了名堂。6月17日，大作《论短促突击》发表，洋洋洒洒，共提出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李德击节赞赏，深感快意。

聂荣臻却感到了担心，年纪轻轻的林彪，心高气傲的林彪，怎么一下子变得这样世故，这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篇文章的关键，不是在谈战术，而是他的政治表态。

毛泽东得知此事，也不由地大摇其头，但却宽厚地原谅了林彪，“到底是个细伢子，还嫩着呢。”一种长者的慈爱，使他未能从本质上发现问题，查找原因。

广昌保卫战打到了关键时刻，横村、樟树之战，凤翔峰之战，南丰之战，泰宁、新桥之战，红军战战失利，蒋军已经打到广昌门前，博古、李德坐不住了，亲自上前线，就地指挥。

一介书生的博古在军事上完全是个外行，指挥作战远不如他搞党内斗

争那样擅长，现在他完全寄希望于李德，幻想能扭转乾坤。李德的狂妄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一次，他在阵前一眼瞥见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也不管罗荣桓是什么身份，喝住命令道，带一个排去前沿铺设地雷。

罗荣桓没在意李德的无理，像一个普通军官一样接受了任务。

刚刚返回，李德又心血来潮，命令将已铺好的地雷全部起出。

此时，炮声已响起，敌人的新一轮进攻即将开始，罗荣桓为难地解释，这时候让战士们去起雷，有生命危险。

李德吃惊地转过身来，乜斜着罗荣桓，居然有人敢违抗他的命令！他威胁道：

“你不去去？”声音透着杀气。

罗荣桓：“不去。”

“违反命令，杀你的头。”李德狂躁地暴跳。

博古闻声走了过来，连忙打着圆场。

李德就是这样骄横，这样狂妄，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到日尔曼人的优雅、彬彬有礼，而是那样的缺乏教养，缺乏对人的尊重。

周恩来遭他冷眼，朱德遭他冷眼，身边的工作人员遭他冷眼，一个普普通通的军事顾问，一个副团级的军官，几乎凌驾于整个中国共产党之上。几十年后，瑞金当地的老百姓回忆起对李德的印象，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这个人好凶啊。”

仗已越打越被动，陈诚的十八军纠集其他部队，沿盱江两岸分道而攻，江东受阻江西推进，江西受阻江东推进，交替着边筑堡垒边滚动，红军对此束手无策。4月下旬，广昌西北的重要据点长生桥、高洲墩被陷，广昌已完全置于敌人的炮火笼罩之下。

胜券在握，佛采尔反不急于拿下广昌，而是电令陈诚放缓进攻节奏。他向蒋介石献计说，就是要利用红军死守广昌的心理，在这里拚消耗，拚实力。“你共产党不是叫嚷要打一场保卫马德里之战吗？”佛采尔脸上露出一些残忍，他要让广昌成为红军的滑铁卢。

彭德怀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迎向前来检查作战的李德，尽量放缓语

气，建议撤离广昌：“我们用土木构筑的工事，是经不起敌人飞机重炮轰击的，如果固守广昌，用不了几天时间，红军主力将全部毁灭。”

李德瞪大眼睛，想不到素来以打硬仗、打猛仗出名的彭德怀也提出撤退。为了打消对方这一念头，他依然喋喋不休地讲他的堡垒对堡垒，讲他的短促突击。

“够了！”彭德怀拍开了桌子。前几天他检查战场，在一块不到500平方米的阵地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肢残足，惨不忍睹，其中不乏佩手枪和望远镜者，这些中上级指挥官都投入了冲锋，死得壮烈，死得委屈，这些都是李德那一套蠢猪式战术造成的后果。

感情的闸门一旦放开，彭德怀就豁出去了，他要一吐为快。从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一直讲到今天的失败，他指着李德的鼻子骂：“你是瞎指挥，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连追击炮放在地图上的某一曲线都规定了，实际上你李德手中这幅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是问测而绘制的，有的地方连方向都不对。不是红军善战，一、三军团早被你葬送了，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

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为彭德怀暗暗担心，没有全翻。从李德的表情上，彭德怀猜到一定是伍修权嘴上留情，他转向刚刚接替滕代远红三军团政委职务的、他的新搭档杨尚昆：“请你把我刚才的话重翻一遍，一个字也不要漏。”

果然，杨尚昆刚刚译完，李德咆哮起来：

“封建！封建！”他气得失去了方寸。

“无耻！无耻！”彭德怀不客气地回敬。

广昌保卫战最终失败了，此战整整打了18个昼夜，是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参战红军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而且缴获甚少，人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是一次典型的消耗战。战后，红九军团所剩兵力不足一个师，红十四师团伤亡太大，已从中央军委的战斗序列中取消了番号，中央红军元气大伤。

按照佛采尔的建议，蒋介石继续稳打稳扎，步步为营，打下广昌后，即停止前进，命令其前方部队修筑公路和碉堡，并在广昌郊外建筑飞机场，一切安排就绪，方于7月初向苏区腹地再度施压。至8月6日，红都瑞金最后一道防

线驿前、石城被陈诚、汤恩伯部突破，整个北线防御，终告崩溃；在东南线，蒋鼎文重重迭迭叠起了无数的碉堡，红军难越雷池一步；至于湖南军阀何键率领的两路军，长期被肖克、王震的红六军团和徐彦刚的红十六军牵制着，始终未能东渡赣江，这是敌人包围圈的薄弱所在，日后的长征之所以最初选择西线为突破口，也是大有原因的；在湖广边境，“南天王”陈济棠惟恐蒋介石乘“围剿”中央红军之机通过赣南打进广东，挤掉他的地盘，因此他对进攻红军并不积极，并派代表赴瑞金与红军签定互不侵犯协定，因此，在整个战役期间，双方基本处于相持状态，所谓“南线无战事”。陈济棠的心理，周恩来洞若观火，已暗暗打下利用之主意，他与毛泽东、朱德私下商量过，知道留给红军的机会、时间都不多了，必须当机立断。

博古、李德也面面相觑，红都瑞金已经能听到对方卜福式山炮的隆隆声，兴国、宁都、石城的相继失陷，使国民党军队已陈兵扬威于中共临时中央的鼻子底下。博古叹了口气，他意识到自己那副瘦弱的肩膀扛不了这份压力，只能一走了之，将这一片浸透几万红军鲜血的热土抛给了秋风冷雨。

李德的灰眼睛里也是一片茫然，他没有检讨失利的根本原因，却从心里升出一种恐惧，自叹技不如人，较之那些德国军界名宿，他还太嫩，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人评论，这场战争其实是德国人之间的战略战术较量，因为双方主帅的参谋都是德国军官，他们一言九鼎，影响和决定了战局的发展。

20

塞克特鸠占鹊巢 佛采尔含怒而去

还在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事进行到很关键的时刻，陈诚曾从前线回了一次南昌行营，晋见蒋介石，汇报战况。

陈诚的情绪很振奋，他报告蒋介石，新的战术见了效，现在“围剿”军已牢牢把握住战场的主动权，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不愁一雪前几次“剿匪”失败的耻辱。

蒋介石的情绪也被陈诚带动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心有所感地道：“能与中共作战成功实乃不易，几耗尽心血矣。”他顿了顿，评论说，“若论此次战术改进最见成效的地方，当属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薛岳所提的‘碉堡战术’，居功厥伟，不可埋没。”

但凡蒋介石表扬别人，陈诚听了一概不痛快，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状：“若论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不过是校长‘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思想继续发挥；而‘碉堡战术’，若不经校长和佛采尔顾问的提炼、补充，也不见得能起到今天这样大的作用。”

陈诚官场上的功夫比他指挥打仗还要见长，这番话既贬低了别人，又顺带吹捧了蒋介石，而且不露痕迹。

但蒋介石的道行更深，他警惕起来，陈诚为什么要专门提及佛采尔，难道他有什么想法？

果然被蒋介石料中，陈诚此来，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佛采尔说情。

陈诚与佛采尔的关系,说不上亲热,但佛采尔与何应钦不和,陈诚就有理由帮助他,为自己的政敌保留一个对手。最近,他得到一个消息,说蒋介石一待战事结束,就会立刻辞退佛采尔。还有人传言,正在南京的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电话找朱家骅,托其向德国外交部交涉,务必使塞克特能够来华工作,以顶替佛采尔。

既然蒋介石已经看透了自己的心思,陈诚也就放开胆子,实话实说,他不明白,佛采尔究竟有什么地方让蒋介石不满意。

“普鲁士作风严重,树敌太多。”蒋介石嘟囔着,但最关键的一点他没讲,即佛采尔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打得过于火热。为了说服陈诚同意自己的决定,他又将塞克特的《陆军改革建议书》捧了出来。

这份《建议书》,陈诚已经翻阅过,“没有什么新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很多国民党军官都有相同的看法。

蒋介石从陈诚的表情上读出了这种不屑,他正了正神情:

“我们国家要建军,建军是不容易的事,主持建军的人,要具有很高的学识经验与品德,冯·塞克特元帅正是这样一个能胜任的人,其言行皆可为人之师法,余甚有感。”

看到蒋介石如此推崇塞克特,陈诚只能长叹一口气,为佛采尔而不平,而惋惜。

邀请塞克特的行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但佛采尔一点不知情,仍一心一意地与红军作战。

自从返回德国,塞克特就一直处于矛盾之中。面对蒋介石的盛情相邀,他心有所动,但他的自尊和良心总绕不过佛采尔那道弯,因为明摆着是去抢佛采尔饭碗的。

一者是为了抬高身份,二者也确实是顾忌他与佛采尔的友情,在中国时,佛采尔已将那副酸溜溜的表情挂在脸上了。因此,塞克特只能是一再推托,并表示他可以推荐两位高级助手法肯豪森和法勃尔来华帮助工作,他保证这两位助手也同样是出类拔萃之辈。

蒋介石却是非塞克特不可,他是个虚荣心很强的人,塞克特的名气比佛

采尔更大,是前德国国防军司令,军界领袖,让这样一个人做自己的总顾问,自然水涨船高,主人的派头更大。

大概蒋介石也知道塞克特的难处,他开始向德国外交部施加压力。1933年底的某一天,柏林威廉街上的总理府邸,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与德国国防部部长柏龙白在希特勒面前发生了一场争吵。

希特勒一屁股坐在他那张高高的办公桌上,饶有兴趣地看着驻华公使转来的朱家骅的一封信函,信中对塞克特充满了赞扬:“委员长予余极深刻之印象,彼经由塞克特之谈话中,深慕其人格与超人之工作潜能。”

希特勒有点洋洋得意:“既然中国人这样器重我们德国军官,我们同意塞克特将军去华工作,但中国人要保证供应我们充足的钨沙,这是交换条件。”

外交部长气急败坏地拦阻道,佛采尔在中国,已经引起日本人的无数抗议了,塞克特的影响不知比佛采尔大多少,日本人岂不要吵上门了。

希特勒皱起了眉头,在他的价值天平上,日本人比中国人似乎要稍重一点,因为日本人曾打败过俄国,在希特勒的全球战略计划中,日本人可能会做为一个棋子今后帮助德国牵制苏联,因此暂且得罪不得。他转向国防部长柏龙白,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们可以开出一份名单,随便中国人挑选两位,只要没有塞克特就行。”

柏龙白不耐烦地打断希特勒,现在的希特勒还有求于陆军,不像以后那样至尊至重,冒犯不得。

“中国人已经申明,除非塞克特来华,否则暂不考虑其他推荐的人选。”

“哈,看来那个蒋委员长还挺倔强,有点像自己的性格。”希特勒暗暗好笑,他也是看中了什么东西,就一定要弄到手不可。

“蒋委员长还说:塞克特不能来华,惟有让德国军事顾问撤退,而现在法国人目前正寻求此职位,如塞氏不来,中国将改聘法国贝当元帅所率领的顾问团。”柏龙白气愤地瞪着牛赖特,好像是他把贝当元帅引进中国的。

希特勒也坐不住了,蹭地从桌子上跳下:“不能让我们的宿敌法国占据

德国人已经占据的位置。”他挥舞着一只胳膊嚷道，同时也立刻做出了决定，“关于日本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用处和利益，那是将来的事，现在与中国人打交道，却是很实惠的，我们应该鼓励塞克特将军去华工作，而且是大张旗鼓，尽可能地扩大我们在中国的影响。”他瞟了一眼牛赖特，发现对方有点忐忑不安，知道是顾虑日本人的反应，一挥手道，

“至于日本方面，一定对塞克特去华工作很敏感，这是个爱吵闹的国家，但我相信我的外交部长会找出一万个理由去搪塞他们。”

有了希特勒的拍板，塞克特此次出行再无什么顾忌，他可以对佛采尔理直气壮地说他是接受德国政府的任命，带有官方的色彩。事实上也是这样，他在临行前曾与兴登堡总统和柏龙白有一席谈话。那天，兴登堡难得清醒了一次，也许是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往日里对塞克特的怨恨突然冰释了，他拉住塞克特的手，表示将全力支持他在中国的工作。

柏龙白也表示，德国国防部将坚决地站在塞克特的身后，有求必应，甚至愿意向顾问团提供现役军官。

“你的人现在都成了纳粹，说心里话，我可不喜欢他们。”塞克特用手指着柏龙白道，

“我还是欣赏以前的德国陆军，军人就是军人，不要涉及政治，我的老朋友法肯豪森就是榜样，他将随我去中国。”

“法肯豪森——”兴登堡突然插了一句，他也记起了这个名字，“挺不错的小伙子，很有风度，也有骨气。”在他眼里，即使是花甲之年都可归入“小伙子”一类。

1934年3月，塞克特偕夫人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助手法肯豪森另船而行。

其时，“剿共”战争正打到吃紧时，蒋介石无暇在南京接见他，又用炮舰将塞克特悄悄接到了庐山。

为了避免刺激佛采尔，这一切都是瞒着他进行的。来中国前，塞克特曾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总顾问一职仍为佛采尔保留，自己则享有“事实上充分的权力”，共同在中国服务，以维持往日的友谊和良心上的安定，岂料他的建议遭到佛采尔的坚决拒绝。种种传闻终于澄清了，塞克特果真覬觐自己的

位子，真是令人寒心，令人痛恨，火暴脾气的佛采尔气得用家乡的土语发出一连串的咒骂。

他骂塞克特这件事干得不地道，采用了一种东方式的阴谋手段，是从他的阳台跑进了自己的领地。他恨自己引狼入室，对朋友愤愤言道：

“如果不是我介绍，塞克特还在自己的花圃里浇玫瑰花呢。”

鉴于佛采尔的这种愤怒，塞克特自然想避开，免得尴尬。对这种心情，蒋介石自然理解。

蒋、塞再度相见，那一份亲热更是溢于言表，蒋介石对塞氏的那种优宠，连陈诚看了都气不过，待遇之高无以复加。

关于塞氏在中国的地位、职权、办公方式，均以条文形式明确规定如下：
名义：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籍顾问之指挥事宜，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私宅内处理；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并于此时间招请有关各军事人员。

时间：每周二、五上午10时至12时。

蒋介石规定：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各部、次长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皆要准时到会，向塞克特汇报情况，如蒋氏本人不能出席会议时，塞克特具有代表他发布命令之全权。

投桃报李，塞克特也拿出了自己的本领。在建军方面，塞克特认为，目前江西“剿共”战事虽然已接近尾声，但中国内部并不稳定，更何况还有日本的强大威胁，中方决不可贸然裁军，眼下之计是要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赶快组建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模范军。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花费5000万元重新装备60—80个师的目标过大，难以完成，不如首先新编成6—8个师的军队，然后扩展到18个师（30万人）。

陈诚冷笑一声，他的十八军和十一师均属王牌，深得蒋介石宠爱，如果增加军费，那一定近水楼台先得月。现在塞克特提出新编模范军，他的“土木系”（十一师和十八军两个数字合起来恰成土木），岂不被遮去了光辉，想到这里，他忍不住站了起来：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与其建立新军，不如整理旧军，这样，财政上也可节省，新编6个师的军费可整编旧军30个师，请委员长明察。”

蒋介石尚未答话，塞克特已勃然变色，来中国的第一炮就放不响，何以立威？何以办事？

蒋介石连忙朝陈诚一瞪眼：“一切听塞总顾问的。”

塞克特脸色缓和了些，又拿出一份“后勤供应计划表”，要求中方详细填写各项内容，以便德方有计划地予以供应。蒋介石大喜过望，塞克特面子果然比佛采尔大得多，一些先进的武器和通讯装备都赫然在目，许多都是德国方面对外保密的。有塞克特开道，德国军火商通往中国的路肯定越走越宽敞。

这一次塞克特在庐山没有久呆，一共只有6天。蒋介石在送他下山时保证，一定尽早地打发掉佛采尔。

未想到佛采尔自己找上了门。这几天他在前线看到高级军官纷纷往庐山上跑，蒋介石也有一段日子未露面，未来电了，不禁纳闷，心想一定出了什么大事。

有人告诉他来了一个德国老头，蒋委员长正在庐山招待他呢。

佛采尔一听就明白了，他的心里是存不住事的，立即赶赴庐山。因为他以前已经向蒋介石声明过，只要塞克特一踏上中国土地，他立即走人。

面对佛采尔的质问，蒋介石有点内疚，也有点惋惜。他知道佛采尔的脾气，现在就是想留也留不住，想到佛采尔即将要走，反而念及他许多的好处。

“率真得可爱。”这是蒋介石的评价，佛采尔脾气是火爆了点，性情高傲，但绝不虚伪，绝不奸滑。刚才陈诚汇报了一件事，使他对塞克特的好感减去了几分，原来陈诚在塞克特那里撞了钉子后，立即派人调查塞克特在广州和克兰帮助陈济棠建造兵工厂及购买德国飞机诸事，这是蒋介石最最不能忍受的，也使他对塞克特的为人有了几分警惕。“娘希匹，刚刚和我亲热过，又去和陈济棠套近乎。”相形之下，佛采尔对他则要忠诚得多。

所以，蒋介石忍下了佛采尔的无礼，只是一个劲地温语抚慰，对他在中国的“成绩”予以肯定和赞扬。他使了个眼色，一旁的侍卫官邓文仪连忙拿出一个大号牛皮纸信封，蒋介石把它递向了佛采尔：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佛采尔接过来，掂掂分量沉甸甸的，透过信封开口，一叠美金晃入了他的眼帘，就像一帖镇静剂，抚平了他心中的创痛。

佛采尔终于走了，留下来的塞克特也未能干多久。作为一名军人，塞克特是优秀的，也不乏某种传统的正直，确实为中国办了一些事，比如说帮助中国发展军火工业、开展军事技术研究、设计未来对日战争的总体战略、引进科学技术人才等等。与佛采尔不同的是，他不仅仅对战争感兴趣，凡是与战争有关连的他都投入了精力，这种繁重显然不是他这个年龄的人能应付的。据闻，塞克特某一天在庐山蒋介石官邸做客时被火炉绊了一跤，从此就卧病在榻，根据医生建议，1935年春，塞克特返回德国疗养。临行前，他以“最诚恳之心情”，向蒋介石推荐了他的得力助手法肯豪森接替他的职务。蒋介石此时早忘了因塞克特帮助陈济棠而引起的不快，连连点头，他注意这个带夹鼻眼镜的德国军官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是个人才”，他相信塞克特的推荐，相信自己的眼光。

南京东面，出中山门约30公里处有亚洲最大的炮兵学校和最大的炮兵靶场。在中国随员陪同下，金秋十月，法肯豪森兴致勃勃地前往汤山，视察新建的炮兵学校。

在学校大门外，刚刚接任塞克特职务的法肯豪森受到了炮校校长邹作华和德国炮兵顾问巴赫及学校学员、教师们的热烈欢迎。

邹作华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毕业的，原在奉军任炮兵旅长、炮兵司令、东北炮兵训练总监。1934年任中央炮兵学校校长。但他在日本只学过山炮和野炮，对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并不精通。

汤山炮校的炮库是按山炮和野炮的规格修建的，而且是在德国顾问巴赫指导下修筑而成的。当巴赫兴致勃勃地带领法肯豪森参观炮库时，法肯豪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用德语对巴赫说：“你竟然不负责任地设计出这样小的炮库，连一门榴弹炮和高射炮都容纳不了，我再也不能信赖你了。”接着设计炮库的德国工程师也遭到了训斥。

从1934年夏天开始，法肯豪森在军事委员会边塞组织长、参谋次长贺耀祖的陪同下，对中国沿海沿江的江海防工事进行了视察。他们乘一艘小型的巡洋舰从南京下关出发，经过长江，从黄浦江入海，再往南驶往镇海和乍浦。镇海即今天的舟山群岛一带岛屿对面的重要港口。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便在此设立了一种居高临下、用砖修成的脆弱掩护工事，半圆型的暴露的炮台设施，以及堆集着的各种大小不同的炮，均历历可见。这些过时的炮台和落后的岸炮对于现代化的防御功效起不到任何效果。

法肯豪森指着半山上那些暴露的炮台说：“即使这些军事设备尚有其存在和利用的价值，一旦打起仗来，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亦会预先被敌人发现，通过空中打击完全可以摧毁它们。”

在浙江北部的乍浦，法肯豪森看到，从海岸平原突出的地面上也筑有钢筋水泥的步兵防御工事。法肯豪森对贺耀祖说：“这些工事暴露在地面上，又缺乏纵深。此处敌军最容易登陆，而敌人一旦从此登陆，不但上海，连杭州也要受到威胁，这里的工事急待改进与巩固。”

法肯豪森的巡洋舰进入长江口以后，溯江上驶到江阴要塞。法肯豪森对贺耀祖说：“江阴一地很重要，长江在此骤然收缩而小，此地必成为前往南京、武汉的重要大门。”他们上岸，依山道登上江阴炮台。这里的工事多为前清修筑的，法肯豪森看后一个劲地摇头，说：“江阴的防御设施需要整修或重建。”

贺耀祖问：“一旦战争爆发，顾问先生，您认为这里应该如何防御？”

“封江！”法肯豪森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再加上新建筑的炮台和德国克虏伯厂生产的最新式大炮严密封锁，敌人是无法从这里渡到南京的！”

回到南京后，法肯豪森就急待改建的海岸、江防工事方案写成了报告。不久，他又前往海州港，去视察那里的防务。他还就南京和镇江的江防工事和改建计划，提出了方案。

法肯豪森通过对中国海防江防的视察，对未来战争的危险和防御工事的脆弱形成了一个很深的印象。他代理总顾问以后，对日的态度与塞克特有明显的不同，他强调说：“中国必须加强对日防御力量，一旦日本进攻中国

时，遇到真正的抵抗，日本对中国的压力就可能改变，它将形成两者实际上的对抗……”

但中国军队的落后状况，又使法肯豪森感到气馁。他说：“这是一架太破的牛车，你不拉它，放在那里要散架子，你稍稍动动它，走不出几里也将散架子。我只能仔细地观察它，争取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去替换，我的工作就是一个修车匠的工作！”

要修中国这辆破旧的车，首先要扭转中国军队主要负责人错误的军事观点，而且不能得罪这些“地头蛇”，法肯豪森必须很圆滑地提出几个反驳在国民党领导人中间公开流传的观点。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法肯豪森站在地图前耐心地指出：

“尽管军队还没准备好打一场现代战争，它应当一开始就在沿海或黄河一带对敌予以抵抗。尤其是长江沿线，是坚决不能放弃的，尽管它很长，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难以防守的达达尼尔海峡一样，必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去防守它，何况它还有重要的、有战略意义的首都南京。”法肯豪森强调指出，“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增援平汉线和武昌到汉口的铁路沿线的防务。”

“顾问先生，请问您的战略思想与我国当局的防御思想是否有不一致的地方？”一个年轻的军官提出了这个较为敏感的问题。

法肯豪森谨慎地说：“蒋委员长已经对他的敌人有了新的认识，在武器、装备、训练、素质都不如人的情况下，打算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我的看法是为挽救国内外的危机，国防军必须扩充并加以革新，尤其陆军的任务更大，同时，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而交通运输特别困难的状况，对于空军的训练尤为重要。”

“顾问先生，你认为中国首先应当训练多少陆军为宜？应当怎样训练，比方它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另一名军官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法肯豪森耸耸肩，两手一摊：“这个问题要视情况而定，根据德国的经济，有10万大军足可以保障国内的安全。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首先应当训练一支强健可靠而有战斗力的陆军，至少在质的方面要够水准，这是第一个应该达到的目标。德国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协助中国政府，通力合作，做到

这一点。而建立中国国防军的训练这项任务的内容应包括：如何制造武器、饲养战马、使部队机械化、如何测量全国地形和维护海岸线；如何准备行军材料；如何注意运输、交通制度、防空；如何补充人事物资等等，这都需要德国顾问与贵国政府通力合作、团结一致的精神。”

塞克特在首次访华时，向蒋介石提出《陆军改革建议书》，目标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法肯豪森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书，并用心加以思考，以便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制定一项新的陆军整顿措施。

法肯豪森根据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判断，他相信，日本在今后的两年还不足以准备好打新的战争，而1934年10月，江西的红军被国民党军打败，被迫离开根据地。这正是天赐良机，“如此使中央政府得有喘息的机会以致力建设计划，此计划首先要着重重建一支现代化而具有战斗力的军队，最先以10个师为限。其次逐渐将现有的200个师裁减为60个国防师。”

在法肯豪森的建议下，军事委员会拟定了《全国军事整理草案》、《全国军事整理会议组织条例》。

军事委员会第二处处长龚浩原是唐生智的参谋长和军长。在1930年1月的反蒋军事活动中其部被杨虎城消灭，龚本人向蒋介石投降。龚浩的经历，使他对国民党军中的一些弊病了解较深。一次，他请法肯豪森同游中山陵，两人站在高处，极目湖光山色。龚浩说：“金陵一地，相传王气很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怕别人夺了他的江山，便派人开凿秦淮河以泄王气。”

“那以后怎样了呢？有没有人夺秦始皇的宝座呢？”法肯豪森问道。

龚浩说：“秦始皇派人搜尽天下的兵器，运到咸阳，铸成12个大金人。但秦始皇死后，天下很快大乱，秦国也灭亡了。”

龚浩的话，对法肯豪森启发颇深。鉴于国民党军队中，部属与长官之连带关系甚深，即长官多恃部下维护其地位，而部下又恃长官保障其生活的现象很普遍，他首先建议，在整顿军队期间，被裁撤的各部队应停止补充新军，其次，宜将现有军用品包括枪械弹药及早收集，使军队失去武力反抗政府的可能，再次，对这些被撤消军队中的官长，除一些降级使用外，其余的宜设法维持保障短时期内之生活，尽量避免纠纷，以此昭示公众，政府并非不念旧

日功勋,最后,对于普通士兵,一旦被遣散的太多,流向社会非为乞丐便为盗贼,法肯豪森建议可仿德国志愿工人队的形式,或从事兵工生产,从事筑堤、修路和其他工程建筑,裁撤各部队中的可靠分子,可编入警察部队,隶属各省主席,担任绥靖地方的任务。

法肯豪森将这些建议转呈蒋介石后,蒋介石连连点头。他与陈布雷有这样一段对话:

“一个德国人,能对我国军队的情况如此熟悉,提供这么多好的建议,他是全心全意为我着想的。而我们的长官都是酒囊饭袋,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怎么能行呢?我打算调驻赣绥靖预备军总指挥陈诚,在武昌行营设立陆军整理处,陈为处长,综理陆军整理事宜。”

陈布雷则显得很世故:“委座,中国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民国十八年(1929)军事编造会议后酿成新军阀一系列混战的教训,以及现在两广与南京的军事对立,恐他们会借机大作文章,又借口中央排斥异己,兴兵作乱,那就麻烦了。”

一席话,也让蒋介石深思不语,半晌问道:“先生,依你之见应如何?”

陈布雷小心翼翼地讲:“凡是法氏对中国军事的建议与措施,在外,要防止日本对此抗议;在内,又要防止贻反蒋派以口实。我认为要避免令人注意,编造不设整理机关,仅在武汉总部、南昌行营或绥靖公署下附设暂编处或编练处。对准备抗日的部队,更应该小心谨慎,千万别让日本间谍将情报窃了去……”

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圈,对陈布雷说:“德国顾问的建议和实施情况,都属于最高机密,请注意亲自负责。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但要加紧进行,这叫内紧外松。”

一切计划,都在暗中进行之中。

21

起草应付时局建议书 构思中日战争形势图

红军像一条巨龙，自江西根据地出来，进入广东、广西，1935年进入贵州，忽东忽西，飘忽不定，四渡赤水，兵临贵阳，逼迫昆明，令在前线督师的蒋介石防不胜防，穷于应付。在昆明督师三个星期，无可奈何，只好回到重庆。

蒋介石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话：“（红军）未得完全歼灭，恐遗后患。是乃智虑学识不精之过。”

就在蒋介石在西南追击红军的时候，北方的日本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又藉口中国当局援助义勇军孙永勤部破坏《塘沽协定》，以及天津日租界有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事件，均为中国排日行为，调关东军大批入关，威胁平津，并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

日军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要求五点：

- 一、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党部，包括铁路党部在内；
- 二、撤退驻河北的第五十一军、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
- 三、解散国民党军分会政训处及蓝衣社、勵志社等机关；
- 四、撤免日本指名的中国官员；

五、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

国民政府一一屈辱答应，签订所谓的“何梅协定”，丧失了在华北的主权。

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为所欲为，令蒋介石气得咬牙切齿。5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雪此耻乎！”

这里所提的“建设计划”便是蒋介石在德国顾问帮助下制定的抗日计划。

1935年7月，南京的夏天，溽暑如蒸。法肯豪森鉴于中日之间的紧急形势，挥汗如雨，起草《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

建议书中写道：

一、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延迟其实现。华方宜求时间余裕，作整军经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进。

日本国内表面虽显分两派：一为军人派，专取速之军事动作；一为外务省，所取途径，偏重倾向外交上之“和平解决”。然卒之积极派几无处不占先着，中国宜计算日方军人得势，故应规定对付方针，从事准备。

本年六月间华北事件，显示日方军事政策之如何进行。此种政策，适合日中奏案范围，日本新闻纸不断明目张胆声言以“占领黄河北岸，包含山东全省”为今后目标。苟达到此项目标，则山西全省及迤北国境，自必胥陷敌手。日方必先设法不战而必达到此项目的，明知其实力之足恃，故必仍如本年六月陆续提出要求。日方苟愈测华方一味退让，如六月间对华北事件，则愈知无须冒险，用最后通牒式之空词恫吓，即可如愿以偿，则要求之范围必愈大，而其连续提出也必愈速。至日本外交当局乐于坐观厥成，自是不言而喻。

在分析完日军欲用恫吓之办法逼中国就范以达其侵略目的后，法肯豪森提出自己的看法：

按屡次申言，深信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此种抵抗，宜具两种性能，即具实力及理想之抵抗实力，即先造成一种临时积极、消极之抵抗力，

虽小无妨。设想则政府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

抵抗意志必须具有实力之兵力，方有固定之基础，目前中国陆军，固不能担任新式战争，但未若不可用持久抗敌，迫使其增加兵力，一切重要莫过于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

法肯豪森提出了新式军队与原有陆军，持久战与短促击相结合的战术。摆出这种架子，即：

若具备上述各种先决条件，则日本未必不自知；若再提出要求，难免冒险，所有要求，非用战斗，且非加入强大兵力，不能获逞，且事先绝无把握。

目前战略情况，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直受危险；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长江北岸、南北两个路惟一之横贯联络，极占重要之陇海路暨其重大城市（洛阳、巩县、开封等），起首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区防线，不难由山东方面取席卷之势。

由海方之进攻方向有三：即经海州，上海、乍浦、镇海诸处，该三处俱向长江流域，至迤南各海岸、港埠（浙南、福建、广东），一时未必作大战策源地之用。故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敌苟能控制中国最重要之中心点直至武汉一带，则中国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据，即范围广大是也，于是直达中国内地，中国截分为二。

日后中日战争，日军果从华北和上海方向南下，或西上将中国东西切为两段，抗战大局休矣，从此可以看出法肯豪森顾问的战略分析眼光。

法肯豪森接着推测分析：

因是引起一种设想，起首即将主抵抗线退至沿平汉路之线，所有前地直至海岸，只任局地部队抵抗，而惟固守南京、南昌。此种战斗方式，足使沿海诸省迅速陷落。国外向腹地之输入完全断绝。最要之城市与工厂，俱相继陷落，于是陆军所必需战具迅速告罄，无大宗接济来源，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

职意认为，前地部队之抵抗力并不甚大，苟咸知决战地在数百公里之

后，则精神不振，战斗力必更减少。即离前地稍远之最精部队，自知孤立无援，必遭失败，则抵抗力起首即蒙不利影响，任战斗之部队，莫不欲最高指挥官在其附近，否则至关重要之个人主动力，联络失其效力，而统一指挥，随之丧失。（世界大战时马尔纳河会战，德方即其成例）

日本人至是是否继续进攻，实成疑问，其作战方式，不过驱逐华军，使入川境山地。而惟将已得之富庶地区，从事固守整理耳。

日军作战情形（参照要图〔略〕），大致如左：

第一部，驱伪国之日本军队（两师团），用伪国军队增强，占领河北，破坏郑州之铁道交叉点，于以后作战过程中对我沿平汉路，第一主抵抗线之左翼；

第二部，（约三师团）兵力，同朝鲜及日本两部占领山东，暨新筑港之东海，先破坏铁路交叉点之徐州，然后占领之。

第三部，（约四至五师团），进出长江，攻击首都，沿江向上进至武汉。

对东南各省海岸，日人先占领根据地，用以实施封锁，并作飞行场用。

故参加第一次攻击之日军，计有十师团之谱，适占日本全部现役军之半数，按经验可以计算，此种作战，犹如弈者之先后下子一般，进行颇速……

日后的中日战争大势，基本如法肯豪森分析、预测的一样：日军先在华北挑衅南下，占领黄河以北；然后从上海进入长江，攻击南京，并上溯至武汉；同时占领南京的军队与天津、山东方面的军队南北对进，占领徐州，而中国军队退入川境和大后方。

读了法肯豪森的抗日意见书后，不能不佩服他的分析之准确与精辟，好像日本统帅部是以他的方案而发动战争的。既然法肯豪森已指明日军的进攻方向和企图，中国方面应该如何来进行抵抗呢？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法肯豪森进一步指出：

冲突时间（即中日战争时间）不能由我秉政者选定，故我方必须设法使所有兵力随时能作最大抵抗。必须利用一切余裕，就大范围部署我之抵抗力。宜分别何者为目前应急处置，何者为固定目标。一切应急处置，俱应按计划就合固定目标。目前我军所有主力，俱集中于南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

省之兵力，分驻各区，使能应作战之用。作战取战略上守势，且在内线主要威胁由东、北两方，顾虑交通路，凡作战所用部队宜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间（参照图二〔略〕）。（旁批：兵力集结地）由该区可以迅向各方集中。北方则掩护陇海路及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故最初抵抗区务必向北推进（旁批：抗线），是以沧县、保定之线宜绝对防御，为保全通山西之主要交通，不使于初战时即失陷起见，此举实系必要。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旁批：最后抵抗线）

读到这里，我们才知1938年6月徐州会战之后，为防止日军西进占领郑州，南下武汉，国民党军在郑州花园口扒黄河的举措，原来在1935年6月便已经在法肯豪森的计划书中出现了。战局的发展，以及徐州、武汉、南昌、南京的几大会战也和法肯豪森计划中的兵力集结地是完全一致的。

法肯豪森继续谋略：

东部有两事至关重要，一是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两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

法肯豪森阐发自己的观点说：

江面虽宽，然究为极隘之水道，航路异常困难，稍大战舰不易机动，下流已有许多窄隘可用，应用方法（游动炮兵、飞机）作有效之封锁。……

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江防须封锁江阴，陆防须利用许多地险及天然便于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附近。

南京为全国之首都，必应固守，故极宜增筑东正面及东南正面之工事。

派往作战之部队，宜酌视情况加入全局需要之处。

次之为南昌、武昌，可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联络。此时广州实为惟一对外输入地点，故增筑该联络线，使其输送力特形重要。

终至四川为最后防地，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旁批：最后根据地）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自有重大意义。若目前即用作造兵工业之中心，时间空间均不相宜，建设宜完全从新入手，完成须俟五十年以上。

目前惟一之联络线为长江，然五百公里之长，系一长峡，不无危险。铁道只能筑于江之南岸，由长沙经贵阳，或直向重庆，再由重庆于江之北岸展至成都、万县、康定，该处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惟通缅甸铁路末端因地形困难，故目前不能建筑大输送力之铁路，即西安、成都铁路亦有甚大价值。

中国有广大地区和丰富资源，加上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法肯豪森认为，面对日本即将发动的进攻，“俱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军事上反对是说之惟一原因，为若是则敌能完全利用物资上之优势，而中国应先放弃敌方联络线长之优点。鄙意以为此说亦非正当，因南北两大干路更要者为长江，俱是为敌之便利输送线，可以充分供给前线之所需，但中国则抵抗力之策源地已经很少，早就委诸敌手。然防御苟切实准备，则攻者未必能以迅速运到之兵力，一蹴而破我之抵抗。盖我方步兵与机关枪比较甚多，根据上项诸项考虑，故关于编制、驻区、教育、补给、防共等等项建议分别寄呈钧座及军事委员会者，鄙意亦适用于陆军之编制与驻区。”

法肯豪森认为，如果中方寸土不肯轻弃，就像1932年“一·二八”和长城抗战那样奋起抵抗，才能引起与上海及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的列强国取积极的支持或干预态度；如中方不在开始时取坚强的抗战态度，列强断不会支持中国的。

法肯豪森将抗战视为中国当前第一急务，于是制定了详细的固定计划，如下：

(甲)用现有部队准备抵抗区工事及演习战斗实施，关于此节，业于七月三十一日面呈钧座之《检阅总报告》中短简叙述，是在用步兵数量及其所属重兵器（机关枪、轻迫击炮）之优势，抵消其他兵器之劣势。……

(乙)陆海空军须有计划之密切合作，据取得印象，三者之间并无充分合作，虽竭力促其实现，迄无成就。

(丙)指派适当负责人员，在各正面准备抵抗事宜。

(丁)迅速成立本年內原拟整理之五师，就现有器材，尽量予以新式装

备,施以新式训练,并于可能范围内指定受过新式训练之师(如第七师),按要图二,分配驻区,第一批为南京、徐州、郑州。

(戊)购办国内不能自选而必不可少之兵器,最要者为江阴附近封锁长江之水雷(一百具),及十二与十五公尺各种要塞炮之必要弹药(每炮五十发),购办计划及估价单久已呈阅。

(己)根据同时呈钧座之五年计划,设计兵器与弹药之补充。

是项计划,原系一种固定计划,此时若见实施,须有稳定之进展。应急计划,目前即须入手,就现有设备,增加出品。

其增加之数如左:

步兵弹每月增至9至10000000发;

重机枪 9至100挺;

八二厘米迫击炮 20门;

现有之步兵弹药

存于军械库者 10000000发;

正在制造中者 20000000发;

国外订购者 30000000发;

共 60000000发。

适合于10个四团制新式师之三分二各部队所存弹药数量,并未列入,大概可供一月半所需,至以后所需步兵弹药,拟购自国外。绝对应购者,最初为10000000发钢心尖弹。轻机枪存库者,6300挺,足供20师之用。

现有166门二公分机关炮,计有弹457000发,每炮2750发,合二月至三月所需,120门七公分五卜福斯山炮,计有炮弹86000发,每炮720发,合二月至三月所需。120门七公分五高射炮,计有炮弹19000发,每炮950发。

新兵器(七公分五轻迫击炮及十五公分重榴炮),本年内可以抵华。

空军已大加扩充,惟战斗机似急需增加。

最后则谍报组织之重要,不容置而勿言,前次虽逃经设法,然迄未能作必要之应付。

窃以华方所有新式武器,从未有今日之充足,故苟以之临敌,我特能用

以拒敌方初次攻击,并能用以逆袭,获局部胜利,阻止敌方攻击,如是方足启列强干涉之机。

法肯豪森认为,如果中方能增强自信心与毅力,从上述计划入手具体实施,而中国的地位可在短期内获得巩固和提高,减轻日本的威胁状况。

8月上旬,法肯豪森携带计划书上四川峨眉山去见蒋介石。

一艘小型兵舰溯滔滔长江而上。夏日消融,江河横溢,长江发洪水,所到之处,树木、村落皆泡在水中。兵舰经过汉口、沙市、宜昌、南津关,进入了两岸皆是险峰峭壁的长江三峡。陪同法肯豪森的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说:“顾问先生,这便是著名的西陵峡,过了西陵峡便是巫峡,水流湍急,地势比这里还要壮观,最后是瞿塘峡。三峡加在一起便有二三百公里,只有这一条水路到四川,江中还有无数急流险滩,自古以来,已有无数的船只在三峡中翻沉。”法肯豪森不由赞叹道:“太奇妙太雄伟了,这三峡是防御日本的最佳地形,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根据地设在三峡另一端,那日本人怎样奈何你们呢?我们要在峡口和险要地段修筑要塞。”

沿峡而上,整个地形像一条巨大深长的巷道,两岸有赤身裸体、背纤拉船、顶急流而上的纤夫,悲壮悠长而高亢的号子声,打动着法肯豪森的心,他激动地写道:“纤夫的精神便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与外国相比,的确落后许多;但伟大的民族奋斗不屈的精神,是任何力量不能征服的。”沿长江的考察更坚定了法肯豪森抗日的决心,在制定抗日计划书时,心中便更有把握了。

法肯豪森进入四川以后,不禁为四川的特殊地理环境所折服。当时的四川周围全是高山峻岭,除长江直通中下游外,其余地方几乎与外界隔离,是一个天然建设好的民族大后方和复兴基地。汽车出了富庶的成都草原,向西南方而去,崎岖不平的路,几乎将法肯豪森的五脏六腑都颠簸出来。八月的骄阳像火一样,法肯豪森大汗淋漓,车行一日后,渐渐感到气温凉爽起来,第二天,沿途青山绿水,风景迷人,傍晚时分,终于来到风景秀丽的峨眉山下。眺望俊秀如画的山形,法肯豪森问俞大维:“这座山在中国人的眼中的价值

如何？”俞大维说：“这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与安徽的九华山、山西的五台山、浙江的普陀山齐名。”法肯豪森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中国有句话叫天下名山僧占多？”

俞大维说：“顾问先生，你看。”他用手指着远处林峰深处，“蒋委员长就在那里举办了峨眉山军官训练团。目的表面是为了剿共，轮训营长以上的军官，其实是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次请你来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第二天一早，便有几名衣衫褴褛的轿夫抬着“滑竿”接他们上山。所谓滑竿是用两根粗壮结实的茅竹中间捆扎一张躺椅。法肯豪森和俞大维一人一副滑竿，当他看到瘦小的轿夫时不禁怀疑他们是否能抬动自己，而俞大维则告诉他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他勉强坐上去，在轿夫们的肩头上下有节奏的颠簸下，看着轿夫们健步如飞但汗湿衣衫的情景，便坚决要求下来，他对俞大维说：“这样太不公平，太不人道。”

俞大维舒服地躺在滑竿上说：“顾问先生，这是最人道的东西，没人坐滑竿，这些人都会饿死的。”

法肯豪森摇摇头说：“中国有好多事情都是不可思议的。”

俞大维半开玩笑地说：“正是你这种思想，你们德国人中才出现了马克思，大讲剩余价值、剥削的原理，惹得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要革命，要推翻旧的一切。而我们看来，如果没有人剥削人，那就没有世界，穷人和富人，都要统统饿死了。”

才走了一半路途，法肯豪森便气喘吁吁，再也爬不动了。他只好“投降”，又上了滑竿。等他适应后，不得不承认坐滑竿的确是一种享受。

峨眉山的色秀美，金顶上长年积雪，有六月雪的美称，真是一个清凉的世界。法肯豪森与南京、汉口、重庆三大火炉相比，觉得真是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下。

在清音阁，法肯豪森终于看见了蒋介石，一脸微笑早已等在那里了。

“啊，欢迎你，尊敬的法肯豪森先生！”蒋介石热情地上前与他握手。

“很荣幸见到你，尊敬的委员长先生。这里的确不同凡响，风景很美丽。”

两人寒暄过后，蒋介石问：“顾问先生，中国东南到西南，很多地方你都

去过了,对这些地方有什么感想?”

法肯豪森说:“从沿海沿江,从平原到丘陵,从三峡到四川,我敢打赌,蒋委员长先生,你已经找到了真正的抗日大后方。”

蒋介石眼睛一亮,心想:“英雄所见略同,果然不假,看来这个法肯豪森的确不是凡人,胸中果有雄韬大略。”但他装出谦虚的样子,“哪里哪里?哪有心思和精力考虑这些?”他用手杖指指北方,“在川北,有一块数百里泥沼草地,地图上叫沮洳地。现在‘剿匪’大军和川军从东南两面包围,已将毛泽东的红军困在岷江上游和大小金川之间。北上松潘是他们惟一的出路,但我胡宗南的天下第一军正在松潘张网以待,红军已陷入绝境,只有进入草地。草地里只有草和有毒的水,他们只能走向死路,即使不进入草地,严寒的冬天也会冻死他们。”他得意地说,“我在这里是坐镇‘剿匪’的,没有别的考虑。”

法肯豪森摆着手:“我在中国呆过,也懂一些中国的计策,三十六计中有声东击西之计。而你,委员长先生,你是在声西击东。三年之内,你将和日本人在上海和首都作战。你不再找寻复兴基地,将意味着什么也来不及了。朱毛红军进入绝境,还不是死境,你如再这样下去,将会走上一条民族灭亡的死路。”

蒋介石服气了,拉着法肯豪森去他的别墅,走到办公室前说:“顾问先生,我承认,你讲的复兴民族基地,我已经找到了。来,你用德文,我用中文,各写在纸上,看看两人是不是想的一样。”他用起三国时诸葛亮借东风时与周瑜同时写在手掌心上的办法。

法肯豪森龙飞凤舞,流畅地写下“四川”,拿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已工工整整写下“四川省”三个字。两人看完,都哈哈笑了起来。

蒋介石说:“不瞒你说,从1927年北伐时,日本军队在山东济南向我军挑衅,制造了济南惨案,便令我刻骨铭心。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小不忍则乱大谋!有雪耻之志,而不能暂时容忍,是匹夫之勇也,也不能达到雪耻的目的。中国内战不已,朱毛红军又捣乱于内,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敌,现在已到御侮的关键时刻了。”

两人坐在沙发上,蒋介石喝着白开水,侍从给法肯豪森送上了一杯浓浓

的咖啡。

蒋介石又接着说：“从‘九一八’到‘一·二八’以至长城抗战，我只考虑一个问题，抗战容易，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我到四川以后，觉得以这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我们对抗暴日就有希望了。”

法肯豪森说：“委员长先生，四川只是持久抗战的后方。前线上海、南京、武汉、郑州、广州都是战略要点，不能轻易放弃；还有长江这个黄金水道要把守坚决。”

蒋介石说：“日本的兵舰先进，一旦打起来，不放弃长江恐不现实。”

法肯豪森说：“现在就要筹划，打起来立即在江阴封江，阻塞航道。中游保卫首都、保卫武汉，才能保住三峡、坚守四川。”

蒋介石手中的杯子重重往茶几上一放，里面的水都溅了出来，大声说：“顾问先生，好极了，你的想法很多与我是一致的。”

法肯豪森立即从随身带的公文包中取出《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意见书》：“委员长先生，这是我的抗日计划书，是我到中国以后考察了许多地方综合写成的，拿出了我的全部力量与真心，以备委员长参考与采用，不当之处，请钧座指出。”

蒋介石很慎重地接过说：“顾问先生，我委托你立即着手筹划对日作战。你先在这里住两天，观赏一下周围的山水风光，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的计划书。”

是夜，峨眉山月半轮，清光如水，万籁寂静。蒋介石办公室内透出明亮的灯火，他正在一字一句琢磨体会法肯豪森的计划书，不时用笔记下其中的要点及心得。一个部署抗战的方案，在法肯豪森的描述下，与蒋介石心中的计划正合二为一。他决定，立即在上海到南京间修筑一条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兴登堡防线，该防线用一连串的钢筋水泥碉堡与坚强的防御阵地组成。在中德兵工专家合作下，应迅速发展军火生产。他派人找来兵工署署长俞大维，问：“俞署长，中德合作发展军火，要在德国专家指导下，短期内达到军火自给需要多久？”

俞大维搓着手：“委座，最快也需要5年时间，才能达到自给自足。”

蒋介石坚决否定：“5年不行，争取两三年，在南京、巩县、汉阳等兵工厂生产德式马克西姆机枪、八二迫击炮以及毛瑟步枪，派经济代表团访德，给他们需要的钨、锑等战略物资，以最快的时间，发展军火生意。时不我待，我们要学习德国顾问的工作精神，也赶快拿出一个军火发展计划，转告徐道邻，立即搞一个促进中德邦交办法来。”

同样的夜晚，法肯豪森也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蒋介石将筹划对日作战的大任放到他肩上，感到沉甸甸的，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托。他披衣而起，在庭院中悄悄而行，脑中闪过一个一个画面。终于，他想到要在上海到苏州、无锡、南京间修筑国防线的方案。

22

张治中密筑“兴登堡防线” 中国军装备德意志军火

1935年冬，蒋介石在法肯豪森的建议和筹划下，决定兴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即在淞沪一带修筑国防线，以备日后与日本作战。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在国联的调停下，是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日军永久停驻吴淞、闸北、江湾等地；南市、浦东不驻中国军队；从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苏州河为止，由日、英、美等国共管。

在淞沪一带修筑国防线，有与《淞沪停战协定》精神冲突的地方，因此，法肯豪森与蒋介石多次讨论后，决定将这一秘密的重任，交与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时为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来执行。

在“一·二八”抗战中，张治中率领德国顾问及装备的第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与日军血战庙行、浏河等地，尤其是庙行一役，使中国军队在国际上声誉倍增，各国舆论莫不交口称赞。张治中有与日寇作战之经验，又有熟悉淞沪地理环境等特长，是修筑国防线的最佳人选。于是，1935年冬，张治中奉命兼任京沪区的负责长官。

张治中自知此项任务干系重大，中日之战早晚是要爆发的，早一天准备就可早一天减少中方的损失。他在中央军校中挑选了一批干部，又在东大楼教育长办公室旁挂出了一块高级教官室的牌子。这个“高教室”其实是一个实际的司令部，门口站着双岗，戒备森严，里面的办公室又分成参谋处、秘书

处,军官们武的就派在参谋处,文的就派在秘书处。

张治中召集所有人员说:“我们的工作严格保密的,决不允许任何人对外、对家人泄漏我们的工作性质的机密性。我们这个小小的司令部,是孕育揭开全面对抗暴日的司令部。如果有人问起这里是什么地方,你们只能说,这里是一个教育作业休息的地方。”

随即,每位在此工作人员又发给秘密通行证。

张治中建设了秘密机构之后,决定了两项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对国防工程的,一个是对民众组织训练的。他先后派出两批人,化了装以旅游名义去了京沪各地视察,一个多星期后,所派的人员陆续返回南京,向张汇报情况。张治中仔细分析了各方面情报后,去见德国顾问法肯豪森。

张治中说:“我决定将‘高级教官室’移驻苏州,以便就近指挥国防线的修筑。”

法肯豪森认为可以,但不放心地问:“张教育长,你打算怎样才能不引起别人,尤其是日本间谍的注意呢?高教室的名义是不能长期掩护工作的进行的。”

张治中一想也有道理,便说:“请顾问先生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意见,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将此事办妥当的。”

法肯豪森很爽快:“那样很好,一个月后我要去苏州视察的。”

张治中临行时,去军校蒋介石官邸辞行,蒋介石拿出一本普鲁士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递给张,说:“文白,这是我经常读的书,希望你好好看看。”

张治中其实也有《战争论》,但因是蒋介石送的,于是欢欢喜喜地收下。他在去苏州的途中翻阅《战争论》时发现,书中有许多地方都被蒋介石用红笔圈点,可见蒋何等用心。张治中到了苏州后,才明白蒋介石的用意,是希望中国军人用德国军事家的军事理论来武装头脑,以便更好地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将日本击败。

苏州是个美丽隽永的风景胜地,以各种布局不同的园林著称。

张治中问左右:“苏州哪座园林最能代表苏州的风景?”

秘书说：“苏州名园很多，留院、拙政园、狮子林、沧浪亭等等各有千秋，但依我看来，最是令人留连忘返的首推留园。那座漂亮的名园是清朝鼎鼎大名的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家园，是他花费巨资修建的，有东方古典艺术特点，有楼有阁，有水榭、有亭台，假山处处，曲径通幽，有名花异草，古树参天，水中有各种各样的金鱼，林中有五色斑斓的小鸟……”

张治中微笑着说：“我们这个中央军校高教室，不，改称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就设置留园中怎么样？”

张治中带着一群人进驻留园，立即规定了几项工作纪律与工作时间。他常常集合参谋人员，或在嶙峋嵯峨的假山之上，或在茂林修竹之中，讨论多种对敌作战的方案，制定各种各样的工程计划。

张治中派出一批一批的人员到淞沪线、吴福线（吴江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进行实地侦察、测量、绘制地图、草拟方案。这些人员回到留园后，不久便完成了战术作业和初步的施工方案。

张治中带着第一手资料，风尘仆仆又赶往南京见法肯豪森，共同研究。

法肯豪森听了张治中的情况介绍，表示满意，他用红铅笔在上海外围的大场、浏河至吴淞粗粗地画出一条线，又在无锡至江阴和苏州至福山都标出了记号，对张治中说：“有了这些国防线，是抵抗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江阴封江；第三步是保卫首都。我们能在这里坚持一年两年，国际局势就会发生变化的。”他又对张说，“你去向委员长报告，等他批准后，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将宋希濂的第二十六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等都调往这一地区，具体办法是先修筑小炮、机关枪和碉堡工事。在德国顾问指导下，秘密工作，千万不要为敌方侦知，想尽办法，用巧妙的手段来进行掩护。”

蒋介石见到张治中后，高兴地说：“文白工作得很有成绩，修筑工事的经费，你还要向行政院接洽请示，要多吃些辛苦。军校的校务还要兼顾，要经常回南京汇报，也要去上海，我让铁道部给你指定一节专用车厢，随时可挂在任何一次客车上。”

法肯豪森制定了修筑国防线的方案后，张治中负责具体落实并实施。他

将京沪杭三角地带划分为京沪区、沪杭区与南京区三个防御区，京沪区为防守重点，选淞沪线、吴福线、锡澄线为主要阵地，并设置了前进阵地和后方阵地，构筑永久性和半永久性阵地。

沪杭区在乍浦、澉浦、招林等海岸要点，构筑永久工事和防守要塞，以防日军海军陆战队登陆，并选定乍(浦)嘉(善)线和海(盐)嘉(兴)线为主要阵地，并设置前进阵地和后方阵地。

南京防御区在城外构筑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在乌龙山、栖霞山、青龙山、淳化镇、牛首山、大胜关一线，形成一弧线阵地，复廓阵地以南京城墙为内廓，以紫金山、麒麟门、雨花台、下关、幕府山要塞炮台一线为外廓阵地，形成城内城外两线，相互为用。在江北浦口构筑桥头堡阵地，在后头山、大连山、湖熟、秣陵关、江宁镇一线布置警戒阵地。

这里面难度最大的，要算在日本人眼皮底下修筑吴福线、锡澄线了。

在法肯豪森建议下，张治中尽量利用天然地形障碍物，辅以人工障碍物为掩护，使其编成坚强的防御阵地。在重要的地段采用以团为单位的阵地，次要地段以营或以连为单位构筑永久性或半永久性阵地。先修筑地下掩体和碉堡组成骨架，一旦战起，在碉堡与掩体之间再挖筑壕沟，使之相连，以适应野战需要。次要地段基本上构筑营阵地。当时步兵营一般是3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连，1个迫击炮连组成；每个连包括3个排阵地，而排阵地又分第一线和预备阵地，形成纵深梯次配置。再辅以必要的射击、观察、通讯、交通、障碍、掩体等，形成一个系统的有机工事。各阵地都构成环形防御，互相配合，形成立体交叉火力网，而轻重机枪、战防炮、观察所、弹药库都是步兵阵地的骨干。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德国顾问凌克和工兵学校、中央军校的教官、工程师组成设计小组，确定了步兵骨干阵地的工事标准，以能抗敌人15公分口径炮弹和500磅炸弹为标准。地下工事以抵抗1000磅以上的炸弹为标准。

重机枪工事分正射、侧射三种类型，正射工事只有一间战斗室，射孔采用外八字型，形成90度开口。工事顶盖和前、后、侧墙厚度均在一米左右。侧射工事除战斗室外，还有一小间寝室，射孔为内八字形，成70度开口，也有外

八字形，呈60度开口。

轻机枪工事分单射孔与多射孔。单射孔工事有一间战斗室，射孔呈外八字形。正面射孔100度开口，侧面射孔均为50度开口，前后墙较重机枪工事稍薄。

战防炮工事有一战斗室，射孔成70度开口，顶盖和墙的厚度均在一米左右。

各工事的门都是用钢板制成，都是参照兴登堡防线的工事标准予以加强的。

张治中先后派第三二六、五十七、八十七、八十八师担任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和南京阵地的工事建筑。

留园里，为了加强军事上、政治上的研究设计工作，又设置了军事研究委员会和政治研究委员会两个附属机构。这两个委员会搜集有关军事的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材料，研究国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各方面的情形，向军事委员会做出报告和建议。

一日，法肯豪森来到苏州，名义上是观光苏州景致，和其他外国游客一样，脖子上挎着莱卡照相机，在虎丘、拙政园、沧浪亭、天平山游览，实际是秘密视察吴福线的修筑工事。他对指导修筑工事的德国顾问说：“工事修得太慢，质量不过关。”当得知这些工事都是夜间、阴雨天修的，他只好抱歉地对战地指挥官说：“没办法，但一切为了未来的战争。”

法肯豪森经常在各地视察兵营、工事和军事学校，就发现的问题暨修改意见直接呈报给蒋介石，希望能得到纠正。

从德国进口的机械化战车防御炮、机械化二公分高射炮、装甲车等先进武器运至中国后，参谋本部决定将这些装备用来拱卫首都，于是在南京城外江宁县的方山，修建大规模的营房，将这些机械化装备都安置在方山。

法肯豪森去方山视察后，立即发现了问题，他说：“这些战车、摩托车、高射炮、装甲车统统集中在一处，是缺乏现代战争意识的严重错误。如果日本发现了这些现代化武器都在一处，方山是首都的重要陆地标识，如果日本飞机来轰炸，这岂不是要受到严重损失？”他立即起草一份意见，是这样写的：

窃查方山北坡近已建筑营房者，有战车营及机踏车机关枪连。正兴工建筑者有交辐学校。拟准备建筑者，有机械化战车防御炮营、机械化二公分高射炮营、装甲车团团部及交通兵第一营各营房。取对于机械化部队群集一处，认为非常危险。尤以方山为首都附近最显著之陆地标识，以如此贵重器材囤积一处，若被敌轰炸，宁不可惜！此后修筑机械化部队营房，宜预计其使用地点，并尽量避免群聚首都附近，是否有当，理合呈请鉴核。

他在信封上恭恭敬敬地写上呈“蒋委员长亲收”字样。

蒋介石收到后，大为感慨，说：“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战争，对中国的装备如此操心，而我国的一些军事要员，却浑浑噩噩，对这些全不研究，盲目安排，实在太令人失望。”

他立即密令参谋总长程潜：

查方山高耸平原，势如孤岛，为首都附近最显著之目标，建筑多数营房，自非所宜，前经令飭，凡有重要建筑，必先经参谋本部审核在案。兹据前情，除令该校几未动工者，应即停止兴建外，合行重申前令，嗣后任何重要建筑，应先经由该部审核，以免窒碍，仰即转饬遵照为要。此令

委员长 蒋中正

军事委员会关于总顾问法肯豪森建议南京方山不宜群建营房的密函，亦发到行政院，函称：

密函。查智字第 号

案奉军事委员会执一字第八四九号密令开：‘案据总指问法肯豪森呈称云云，仰即转饬遵照为要。’等因，奉此，查阅于国内有稍大建筑，应先由本部审核，以期与军事互相联系密切一案，曾于二十三年（1934）九月案准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感已代电即开：已由钧院密令各省会主管机关遵照办理在案。奉令前因，相应函请转陈，重申前令，转饬所属严加注意，以免窒碍，实为公便。

此致

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处

从上面这些密令档案中，可以看出法肯豪森在任期间，克尽其任，为中国抗战的准备阶段，做出了贡献。

1937年5月，应蒋介石命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委任法肯豪森为军事总顾问的任命下达。法肯豪森为选派德国军事暨技术人员，向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提出人员名单和运用建议。名单如下：

一、拟任新式十五公分暨八公分海岸炮事宜者：

(甲)退役海军上尉威蒙生担任该二种火炮专门教练之负责指导员。

教授军官射击学、射击法、射击演习及战斗演习之计划及实施。

该员直辖人员如下：

(乙)退役海军少尉布布里教操员，担任炮上操作教练、探照灯器材操作、火工暨弹药兵训练。

(丙)退役上级军械军士皮劳，担任射击指挥所人员训练。

(丁)退役一级上等兵舒里格尔，担任测远机训练。

(戊)退役炮兵机械师芳因，担任炮兵机械师训练。

(己)克莱舒乐德，担任探照灯器材技术教练。

(庚)担任火炮机械之机械长威尔格，暨斯皮德列尔二员，勤务上均隶属退役海军上尉威蒙生。

法肯豪森解释说：“这种新式火炮暨附件是最新之特种构造，只能由专门人员担任训练，所以有由海军上尉威蒙生独立指挥全盘专门教练之必要。”

威蒙生为此制定了最初3个月的训练计划，法肯豪森要求军政部立即下令投入训练。

对于长江下游江阴的防御薄弱情形，法肯豪森心急如焚，他在建议书中认为：“目前汤山炮兵学校所用于海岸炮兵班、要塞炮兵训练之训练器材，如测远机、装填炮、射击指挥所之辅助暨瞄准修正器材等件，宜立即转拨江阴训练班应用。另有迅速建设机械厂修理厂暨炮械库之必要，最低限度应装置业经到华之两门8公分八火炮于营舍内作教练炮用。

此外宜斟酌者，即为目前隶属汤山炮兵学校之要塞炮兵班是否完全移至江阴。查该外之优点处在备有各种火炮，将来亦推行于各路要塞，且能实地训练。

二、担任二公分暨三公分七高射炮、探照灯、听音器以及三公分七战车

防御炮训练事宜者：

(甲)副技士希尔格担任三公分七战车防御炮训练事宜，暂宜在兵工署服务。

(乙)技师舒尔次担任二公分及三公分七高射炮训练事宜。

(丙)克莱舒乐德担任探照灯暨听音器材训练事宜。

三、担任装甲车训练事宜者：

(甲)技师哈毕尔马斯

机师劳特尔

以上二员，先在兵工署服务，然后派至装甲兵团，在该团归教官鲍硕特指挥。

四、担任快艇暨鱼雷事宜者：

(甲)佛格尔

(乙)技士格尔特列尔少尉

以上二员，在江阴电雷学校工作……

法肯豪森想与日本抢时间，在战争到来之前，训练好中国能控制、掌握新式武器的人员，以及加强在江阴的布防工作。不管效果如何，他已尽心尽力了。

法肯豪森是位比较正直的德国军人，担任德国顾问团总顾问期间，对中国的军事训练、改革及部队装备、海空军、防空设施都认真研究，投注了大量心血，尽心尽责。他认为：军人应该注重军事战略，对政治来讲，不要涉入。当时南京的国社党国外组织的地方集团想拉拢德国顾问团的成员，但是法肯豪森却予以制止。他回忆说：“当时在南京，也有一个国社党国外组织的地方集团，由于德国顾问多半是反德国社会党者，所以他们的势力并不大，而且，凡有违背我们在中国职守的任何政治活动我均一律予以禁止。”

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此时进入了蜜月的阶段。

中国德国军事、经济代表团不断往返于两国之间，双方签订了中德共建飞机厂等合同。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在访问德国期

间,同德国军火商签订了价值1000万马克的军火合同,分3年交货。许多德国军火、工业商看好中国这块广阔的大市场,纷纷在中国设立商业机构、洽谈生意。

这样,法肯豪森身价百倍。军火商为推销产品,必须打通总顾问的门路,并不惜以重利相诱。

法肯豪森在任顾问期间,除了在军事方面提出整军、装备和战术战略的设想并逐一加以实施之外,对中德间的军工合作方面也起到积极的作用,穿针引线,尽量使买卖双方互惠互利,各取所需。

法肯豪森回顾在中国的难忘岁月时说:

“我常出面强调,宜斟酌中国特殊情况而提供意见为原则,职是之故,我常竭力介绍于中国最有利益而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物品及列定公平的价格,而不顾虑到原产地的情形和商号。上述这种立场我一直坚持到底。”当时德国合步楼公司(Hapro)负责向中国提供军火,法肯豪森经常与该公司负责人进行交涉。他说:“当时合步楼公司试图向中国销售一批军火和武器,而这种武器固然适合于欧洲战场,但依中国人之需要却没有考虑的余地。因此我曾代表中国提出异议。”该公司有些人气恼地骂法肯豪森“是不是德国人?”

法肯豪森回忆道:

“有一批德国年轻党员(即纳粹党),其主要任务专作党政演说,明目张胆地以为只要有人给中国销售若干货品,不论品质优劣,中国人也就求之不得,尽够满意了。他们还要求我站在德国利益方面坚持此种立场,我却不以以为然,并屡次给他们作辩论的解释,认为他们的此种立场不仅会损伤德国的信誉,也将减削商业方面的利益,因为我在中国服务,惟有介绍适合中国的需要的物品,才算称职。

“另一商号代理人,当我向西门子公司补购一批大型探照灯时,要求我将这批生意让给他。但我向他说明,因为我已向中国政府担保将来在灯光仪器受到损毁时,能补送具有同等功效的货品,或必要时可予退款,而且要照每一零件的完全同样模型重新订制。”

当时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的经理是约翰·拉贝先生。他是一个

和蔼可亲的老人，办事讲究信誉。当南京城门安装上西门子公司的大型探照灯后，拉贝先生的命运便和南京人民联系在了一起。到了1937年8月以后，日本飞机经常空袭南京，这些探照灯在空袭中发挥了作用。而当战火逼进南京时，德国大使馆告诫拉贝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为了这些探照灯的维修和南京下关电厂发电机的维修，他选择留在南京城中，经历了火与血，生与死的考验。在日军的刺刀面前，他和一些留在南京的正直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等一道，建立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担任了委员会主席一职。他利用自己是纳粹党党员的身份，勇敢地保护了许多中国难民不受或少受日军的野蛮兽行，并得以生存下来。拉贝先生在战后被人们称为“中国的辛德勒”，他与那位保护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免遭纳粹杀害的犹太义士辛德勒一样，永远受到正义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尊敬。

拉贝先生曾代表西门子公司对法肯豪森作过产品质量的保证，法肯豪森拒绝了德国另一商号代理人的丰厚回扣，“这公司代理人便以嫉愤的态度威胁我，宣称他在德国已同西门子订立合同，依此合同双方享有利益均沾的订货权。但我坚持强调订购货品的种类和厂商自当由买方自行决定，买主可自由同德国的公司直接达成协议。”这样，减少了中间环节，为中国减少了不必要的费用。

法肯豪森说：“经由国际贸易公司的介绍，中国拟定购大型德制军用货车。当时有四家德国厂商提供货样及单价，其中三家开出的单价每辆在22000至23000马克左右，而另外一家只索价12000马克。起初我们认为其中必有错误，但经电询证实并无错误，因此这家厂商获得此项订货合同。其他三家厂商代理人则向我提出激烈的抗议，说Ondireke厂商违反规定，不应提供国际市场价格而该提供国内价格，当国内市场标价低落时，方可减价，现在他们也愿意以同样的价格交货，但差额必须由德国关税担保弥补，但于此情况下已不成为真正的交易了。我并非蓄意谴责德国的工商业界不义之行为，而只是说明他们处于一种进退维艰的局面之中。”

德国当时掌握大权的是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人。为了与中国保持合作关系，1936年5月13日希特勒致函蒋介石：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德国领袖兼总理用笈) 柏林 五月十三日

蒋委员长勋鉴：塞克特上将转来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函一件，至为欣感。钧座决定与敝国友谊合作，以实施建国事业，尤希所引为幸慰也。希于钧座勋业仰望已久，关切亦深，尤愿竭尽绵薄，以资推进之助。

中德两国之货物互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获蒙钧座异数关怀，谨为申谢。

贵代表团由顾振先生之领导，希获与之接席劳问，藉审钧座对于经济合作之感想，鄙见亦同，并深信两国互相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而两国密切友谊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是以希对于此次交涉之良好结束至为庆幸者也。谨布尺楮以表欣感，倘一荷钧座不遗，尚希接受敝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藉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

绥祺

专此敬颂

希特勒(签字)谨启

同时，德国军方为进一步加强中德军事合作及对华施加更大的影响，决定派遣国防部长柏龙白的助理、希特勒的亲信冯·莱谢劳将军访问中国，与蒋介石进行会谈。为此，国防部长柏龙白上将连致蒋介石三封信。

第一封信是1936年5月19日，全文如下：

敬呈南京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委员长蒋委员长钧鉴：克兰先生将于日内偕同莱谢劳将军联袂出国，以贡献其能力于中德合作事业。关于莱谢劳将军之赴华，前曾函呈钧座，以为先容。

已签订之货物互换合同，实赖克兰先生为之奠定根基。而钧座遣派之顾振代表团之一切经过，克兰先生赞襄协作之力尤非浅鲜。

用敢敬愿钧座于克兰先生旅华期中不吝雅爱，仍畀予信任，酌采其宏富经验，不惜提携维护，以促其工作之完成也。

谨布景慕，敬颂

钧安

柏龙白 谨启

在5月26日的信中，柏龙白介绍了第七军军长莱谢劳中将的情况，信函说：

委员长钧鉴：敬启者：敝国领袖兼总理已派定敝国第七军军长莱谢劳中将来华报聘，冀使钧座与克兰先生间已形融洽之各项磋商得正式继续，而钧座与敝国政府间之政治与经济合作获有进展也。

我所确信，莱谢劳中将久在我国国防部及前敌行营任参谋长多年，必有为钧座胜事及国防经济诸问题咨询赞襄之任知如往日也，敬请钧座界以无限信任，则幸甚矣。

莱谢劳中将现为我国最大军区之司令官，我国国社会主义政府下之各项任务都很繁杂严重，以待解决。久在钧座沿察之中，事势所迫，莱谢劳中将很难长期留在中国候候调遣，这是我引为深惜而遗憾的。但我相信，两国的友好交往日益密切，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此期间从容获得圆满的解决。……

在第三封信中，柏龙白说：送给蒋介石3辆汽车，一辆与德国元首兼总理希特勒与柏龙白检阅军队时所乘车一样，其余两辆为德国国防军的侦察车，而“车将于日内运华，呈交钧座”。

但柏龙白丝毫未提及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在莱谢劳访华期间，要求蒋介石不要让非国社党员的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参与会谈。法肯豪森对此很有自知之明，他说：“德方人士中许多人意图拒我于德国代表团之外，因为他们生恐在双方成交时我将为了中国的利益而可能对他们为难。莱谢劳将军很清楚这其中的内幕，所以总是和我保持着距离。”

1936年6月，中国南方进入炎热的夏季，而绿荫环绕的古城南京，又显示出无比的甚至比夏天还要热上许多的热情。德国国防部部长助理莱谢劳中将到达南京，受到国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在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响德中两国国歌。个头很高，身着白色军礼服的德国第七军军长莱谢劳中将，代表德国总理希特勒和国防部长柏龙白上将向蒋介石赠送了汽车3辆和德国国防军荣誉军刀一把；向孔祥熙授予德国国防红十字勋章。

莱谢劳随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中德双边关系的发展及取得

的成就。随后,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了德国向中国提供一亿元军需品的条款,用飞机、高射炮、装甲车换取中国的桐油、锑矿、钨矿、锰矿产品以及机械工业原料交换农产品花生、大豆等协议,在莱谢劳主持下进行了签字仪式。

蒋介石与莱谢劳将军在马标的中央军校礼堂就中德双边合作中的诸种问题以及中国军备重整、军重工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莱谢劳认为中日之间难免一战,建议中国“效仿德国整军的经验,成立60个国防师,编制与装备全采用德国式,由德国派遣现役军官逐渐取代目前的顾问团,包括法肯豪森等人,薪俸全由德国政府担负”。

法肯豪森等德国顾问团有60多人,分甲乙丙三等,甲等每月月薪800元,乙等500元,丙等300元以上,加上来华离华旅费甲等每人每次2000元,丙等每人每次1200元,对财力匮乏、捉襟见肘的国民政府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莱谢劳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不禁令蒋介石大为所动。

蒋介石问:“德国现役军官来华,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干涉,不知贵国是何打算?”

莱谢劳说:“我认为德国政府有能力说服日本政府放弃对中国的侵略政策,联合德国一致抗俄。日本侵华也会对英国利益产生威胁,英方必然支持德国帮助中国整军备战。”莱谢劳又说,“中国的军事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他建议,“是否中国未来的军事组织系统宜采用德国或意大利的制度,以委员长兼任行政院长,另创设国防部。”

蒋介石只关心德国军事顾问的问题,问道:“德国政府推荐优秀军官做顾问是可以的,但拟采取何种形式呢?”

莱谢劳建议:“可设立一个居统帅地位的总顾问,这个总顾问代表整个团体对委员长提出意见,只对你负责,其余顾问听总顾问指挥。”对此种方式,蒋介石不能同意,他固执地说:“每个顾问都必须以个人名义与中国政府签订聘约,总顾问可以统筹重大事情,但不能因此使中方断绝与其他顾问的联系,所有的顾问都应该对中国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德方人员负责。他们都应受中国政府的管辖,尽管他们可以拥有较大的权力,但决不能成为独立于

中国政府之外的力量。”

莱谢劳在中国的报聘活动，一直到8月份。他在中国各地进行访问时，亲眼看到日本军人和浪人的活动，作出一个大胆的预言：“危险也许在半年之内就会发生，德国需要帮助中国反对日本的霸权。”

是年9月7日，蒋介石为了促进中德全面合作关系致函希特勒：

希特勒总理大鉴：荷蒙荣宠，特命莱谢劳将军聘使来华，无任欣感。莱将军临观敝邦，不独以地位见重，其丰采精神、宏猷硕划尤足为两国所利赖。余于其行旌旦暮西指，实不胜怅惜之情。

信使传来藉审台端对于中德合作之感想，至堪欣慰。拙见主要方针已为莱谢劳将军道梗概。莱将军当能向台端面达视缕也。货物互换合同不过为吾两国合作之基础，余极望其进展程度远超出此现有范围。敝方现已开始树立经济组织机构，以求提高农产品及矿产效率开发富源。今后中国供输贵国原料之可能性亦必继涨增高，必使此供输贵国之数量足为贵国所重视也。为求目前实施开始起见，已令飭所属准予本年内供给贵国以三千万华币计值之货物。

蒋介石又向希特勒讲述中国的国防问题：

中国国防建设期在实施，故中国原料之必须巨量供给贵国，余亦熟虑已久。

今兹西南两省归附中央，中国之统一遂得圆满实现，内政建设不惟刻不容缓，更须加紧实施，尤须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与贵国携手合作，以助他山。

莱谢劳将军对于建国行政以及国防组织、军令更新所建议各点，后者尤属重要，余甚感谢，并已采纳，令飭施行。

贵国首须有一军政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派遣来华，以资襄助一切革新工作之实施。

余切望中德合作大计随时有工作实效为之保障，而两国信使往还交欢樽俎亦永如今日之盛况也。

前蒙赐予贵国国防军荣誉宝刀一柄，以表袍泽精神亲善正意，高怀远

蒋介石与希特勒

1927—1938 中德关系的蜜月时期

识，良用拳拳，谨此布复。敬颂

勋绥 祝贵邦安福

蒋中正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不愿意破坏中德两国政府间之“蜜月”，希望德国再派一学识宏富之高级参谋军官来华。但是他还是十分相信与依靠法肯豪森的，因为他不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有时会做出违反本国利益的行为，但对于蒋介石来说，他正需要这样“忠心耿耿”的人。莱谢劳的访华丝毫没有影响他与法肯豪森间密切而默契的合作。

23

中日大战一触即发 法肯豪森策划布防

1936年11月1日清晨起，北平上空灰沙弥漫，北、东、西三面不约而同响起隆隆的炮声，夹杂叽哩呱拉的呐喊嘶杀声。城里的老百姓一个个吓得心惊肉跳，不敢开门外出。随着“嘀嘀嗒嗒”的军号声，平津地区的日本驻屯军在北平城外开始大规模的攻防演习。

前面的硝烟中是甲壳虫样的装甲车，步兵端着三八大盖枪，疯狂地向前猛冲，直扑北平城下。中午时分，全副武装的鬼子排得整整齐齐地唱着“君之代”的日本国歌，大摇大摆进入朝阳门，带有示威性质地走在北平的大街上，又从广安门出去，完全一副北平已是其领土的劲头。一个姓朱的女孩高呼“打倒日本！”随即便惨死在日军坦克之下。

日军对北平的演习整整4天，5日分批返回天津。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挑衅行为激怒了北平的爱国学生、市民和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与抗议，联名要求地方当局和政府作出相应的反应。

11月7日，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在北平西直门外的红山口举行对抗性军事演习。11日，该军冯治安部第三十七师、赵登禹部第一三二师官兵约3000余人举行秋季大演习，宋哲元任总监，张维藩任参谋长，设总监部于平南庞各庄。12日，在冯治安指挥下，冯师与赵师在黄村、固安间演习对抗战。14日，演习完毕，宋哲元在庞各庄举行阅兵式。

日军的活动也引起国民政府和顾问团的不安，从11月13日起，在苏北地

区,军事当局也秘密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法肯豪森带领德国顾问团指挥和参加了这场实战演习。经过德国顾问整理的5个步兵师参加,有2个步兵师进行防守,3个师实行攻击。苏北平原上烟尘滚滚,机械化部队快速反击,步兵的勇猛冲锋和严密防守,都显示了新式陆军的训练成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演习获得了圆满的成功,法肯豪森对中国步兵师给予评价,说:“按照目前的进度,再有两三年,中国的步兵在训练上、装备上、战术上都会有一个大的突破。国防军的雏形已经看得见了。”

蒋介石在着手训练陆军的同时,也很重视空军的建设。1932年,他命令航空署扩大航校编制,在杭州笕桥成立中央航空学校,聘请意大利和美国人担任教官,并从意大利购买了多种歼击机与轰炸机。

蒋介石将空军看成是宝贝蛋,多次前往笕桥进行视察。他还邀请法肯豪森和数名美国空军顾问去参观笕桥航空学校。

法肯豪森在听取陈庆云校长介绍航校近年的发展情况后,观看了该校学员们花里胡哨的飞行表演,认为“空军训练离实战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要求空军训练课目中加强空军与陆军的协同作战”。他还对这所航空学校的选址表示不理解:“这里离海口和海岸太近,一旦中日发生战争,便很容易也很快会遭到日机的轰炸与破坏,容易发生危险。如果设在内地,毗邻南京,形势就要好得多。”

陈庆云说:“总顾问的意见很好,我们也意识到这个布局的不合理。我们已在洛阳建立了分校,目前正把一些重要的器材、优秀的教员向那里输送。”

法肯豪森告诫说:“空军的脑袋里,时刻不能少了战争意识。如果明天上海开战,你们这里将是第一批受到打击的目标,希望你能记住我这句话。”

对长江中下游的防守,法肯豪森始终坚持一旦战起,便立即封锁长江下游的主张,重视江阴的要塞和长江下游两岸要塞的布防。

1936年6月,长江下游进入梅雨季节,连日不绝的阴雨,使人们心情很烦闷。法肯豪森却顾不上这些,他与意大利籍海岸防御专家诺达尔多洛在南京下关码头登上军舰,驶往下游,他要对长江下游各阵地、要塞进行视察。

船到江阴,透过迷茫的雨雾,法肯豪森仿佛看到了未来战争的场面,江

上腾起巨大的水柱，重机枪的子弹打在水中，形成串串水花。日军的军舰被江底的沉船阻在江中，江阴要塞的德国生产的最新式克虏伯大炮，向日本军舰猛轰，一艘一艘中弹起火，沉入江心，打得日舰鬼哭狼嚎。日海军在坚如铜墙的江阴要塞前，无法越雷池一步，这便是法肯豪森的封江计划。

他们一行登陆上岸，爬上一座又一座的炮台，观看了德国15毫米口径的要塞大炮和8.8毫米要塞炮。

要塞炮兵连为他们表演了新式炮的操作，法肯豪森敏锐地发现了问题，演习完毕后，他告诉炮兵连长：“这种炮的精密程度很高，在操作时不能将炮弹随便放在地上，如果炮弹沾了泥沙，在发射时就可能损坏全部炮管，导致操作人员的伤亡。”他又指着另一些尚未安装的新炮说，“这种新式炮要由厂家派专门的技术人员指导安装，自行安装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导致可怕的后果。”

法肯豪森等人还观看了江阴要塞守军假想敌人快艇来袭，进行阻击的模拟战斗演习，他对守军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临阵意识不甚满意。

法肯豪森对中国军队的整体训练印象是：来自德国的先进军用品正快速装备中国的各重要部队，例如张治中的第五军、桂永清的“首都教导总队”都装备了全套德式武器，并拥有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野战重榴炮。德国军工厂生产的、特别适合中国士兵使用的Stockes Brand式轻手榴弹，以及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大型探照灯都配备到部队和首都南京周围的高地上。南京城防也配备了德制8.8公分口径高射炮及德式防空警报系统；在南京街道上，可以看到7.5公分口径克虏伯炮和亨舍尔及M·AN坦克；梅塞施米特和斯图加型战斗机即将被购进，补充在中国国内装配的容克式飞机；中国海军已向德国订购了12艘潜水艇和几艘战舰。

法肯豪森对中国军队的改进、战斗力的提高，尤其是国防线的修筑以及战略大后方的选定；对日作战的战略等等取得的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感到自豪和欣慰。他对此曾乐观地说：“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如果抗战迟一、两年爆发，日本人将不可能侵入中国内地。”

日本军界、政界对蒋介石的整军肃武和德国顾问在中国的作用深感不

安,于是派出外交人员与代表团访问德国。其中最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安的,是1936年2月日本军事代表团访问德国,在德国国防部的同意下,参观莱茵钢厂。此秘密活动被中国驻德的谭伯羽先生侦知,而莱茵钢厂当时正负责为中国建造抵抗日军的大炮。蒋介石大为恼火,向德方提出严重交涉,并停止向德国付炮款。

2月15日,德国国防部致电中国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

中国财政部因谭伯羽先生报告:谓有日本军官参观莱茵钢厂之大炮,遂停止付给炮料代价,敝部谨向钧座郑重声明:日本军官实未尝见及大炮,我方担保一切均守绝对秘密,俟中国代表团莅止后,自应将此误会面告详尽。德国国防部国防经济厅。

蒋介石于3月3日致电柏龙白,曰:

柏龙白将军:二月十五日来电敬悉。中国在德制造军器,自不应使他国人知悉,既承声明,中国约定应付款项仍当照发,请勿念。近时中国代表顾振、鄧悌、凌宪扬、王守竞等在德接洽,诸承商谈,至为感谢,仍请切实商定早为实行。

蒋中正

廿五年(1936)三月三日

1936年2月,中国组成了以顾振为团长、鄧悌等人为团员的访德代表团。在原赴华军事总顾问塞克特的帮助下,代表团会见了德国政府总理希特勒、国防部长柏龙白及军界、经济界领袖人物。双方进一步具体磋商了中德易货事宜,德国向中国贷款一亿马克用以购买军火及设备,中方每年可用2000万马克向德国进口军火及工业设备,以1000万马克的农矿产品偿付德方,为期10年。

顾振等交给德国国防部经济厅长陶默斯一份军火订购单。如下:

订单号	货物名称	订货数量	备注
A.陆军订货:			
1001	钢盔	220000	
	花样(钢盔)	241000	
1002	3.7cm 练习炮弹	3000	
1003	SMK 子弹(79 铜心弹)	30000000	
1004	SS 子弹	100000000	
1004a	子弹盒	6000000	
1005	燃料车	1	
1006	3.7cm 防战车炮	124	
1006a	上项 124 门炮中 20 门为摩托机化	(20)	
1006b	(上项 124 门炮中 104 门为马牵引)	(104)	
1006d	3.7cm 防战车炮瞄准镜	124	
1007	3.7cm 防战车炮附车	20	
1008	3.7cm 防战车炮炮架牵引架	104	1ttl4/1
1009	3.7cm 防战车炮炮弹	124000	
10020	6 吨战车	15	6 个连
10030	侦察钢甲车	1(连)	
10040	10.5cm 炮连同每炮 1000 发炮弹	60	I·F·H18 炮
10040a	上项 10.5cm 炮弹	60000	
B.海军订货:			
11001	15cm 炮	4(1 连)	SKL
11001	15cm 炮	4(1 连)	SKL
11003	轻汽油快艇	3	
11003	上项快艇用鱼雷	24	
11004	快艇随护舰	1	
11006	江道封锁线及指挥仪器		
11010	8.8cmSKL45 炮	20(5 连)	
11010c	8.8cm 炮连探照灯	8	
11020	快艇(地 Diesel 摩托)	5	
11020	上项快艇用鱼雷	40	
11021	水雷布艇	1	
C.空军订货:			
12001	2cm 高射炮	120(10 连)	
12002	2cm 高射炮炮弹	3000	
12011	3.7cm 高射炮	60(10 连)	Flak 摩托化
12012	上项高射炮炮弹	180000	
12021	炮兵探照灯连全部装备	1(连)	摩托化

陶默斯看后说：“凡贵国所需物品均可以开单，以后需要还可以陆续补充。我国政府尽量满足贵国需要，下令各兵工厂赶造，但是7.5高射炮因防御能力薄弱，德军已改用8.8口径，你们可与我方专家重新研究。”

顾振问：“贵国先进武器器械及一切附件是否可以提供？”

陶默斯表示：“都可以提供。军火单中所列，有现成的成品立即可运华，其余的一定赶造。此后除由德国国营公司与贵国接洽供给军用品外，商人不得私售。但已签合同未完全交货的，政府不便干涉。”

顾振等因谈判成功大为高兴，致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说：“我国既不须付现，得巨量之军火，现时购办军火之款似可划作建设国防工业乃开发供给德国农矿各物所需现款之用，因机料虽可向德国赊取，而建设事业在本国工料仍须现款也。”

鄧悌等在致蒋介石电中说：

南京委员长蒋钧鉴：……连日代表团晋谒希特勒、沙赫脱、柏龙白、开布乐等，均表示竭诚与中国合作，尤对钧座特别敬仰。各种新式军器及国防工业建设用品，以及各项专门优秀人才均愿尽量供给，对我无苟且求，其意在使我政府知彼等无野心，故处处表示诚意与慷慨。……职等以为此次中德合作成功不仅予我国防有极大之助力，且将来我民族复兴赖此更巨。

电文中特别提到：

此事塞克特与克兰竭力助成，故有良果。

德国军事顾问和德国军火的大量输入，可谓雪中送炭，使中国部分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大加强，为未来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法肯豪森预测未来的中日战争应该会在1938年爆发，他赶在战争之前制定了《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之建议书》如下：（时间为1937年7月5日）

（一）平时用整理军计划，确定国防军之编制。

国防军共计为10个军，每军由两个甲种师编成。计为：

甲种师20个师；

乙种师10个师；
丙种师10个师；
以上总计40个师。

(二)以上各部队中，以甲种师之战斗力为最强，且特宜于北正面作战。乙种师大概用于华中方面。

(三)平时部队的驻地，按以前的建议，务须适合国家军事政治情况。故对于北正面及东正面须加区别。北正面最重要地区在黄河以北的河北省；而东正面最重要地区则为上海正面。

(四)建议之驻地，系假定察绥晋鲁暨南方各省防务，由各省军队担任，而40个整理师则专用为国防军。

(五)附件暨地图指示所建议之平时驻地。

根据以上所述，各军之配备如下：

(甲)北正面(共9个军加7个炮团)

子、右翼兵团：第一、二两军，共4个特种师；

丑、左翼兵团：第三、四两军，共4个甲种师；

寅、直属预备队：第五、六、七、八4个军，共8个甲种师；

卯、固定桥头堡守备队，两个甲种师；

辰、两个机械化榴炮团，一个机械化重炮兵团，四个高射炮团。

(乙)东战场

子、上海方面

右翼兵团(杭州湾与太湖之间)，两个乙种师；

左翼兵团(太湖与长江间)，两个甲种师；

丑、上海正面直属预备队，两个甲种师；

寅、1个机械化轻榴炮团，1个机械化重炮兵团，3个高射炮团。

(丙)归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者：乙种丙种师各8个师。

(六)所拟整理10军中(甲种师)之10个炮兵团，其中仅有6个团可用于1937年年度内整理完毕。此6团拟配备一、二、三、四、六、七诸军。至卜福司山炮4个团，以分隶上海正面各军为宜。”

(七)为求弹药供给妥确起见,宜为国防军作下列处置:

(甲)部队方面:屯储并经理两日所需弹药(即半批弹药);

(乙)弹药库(图二地名旁划一蓝线表示已有)。

北正面

北正面国防军——(东兵团)及山东军,第一批弹药预备于济南,屯储4个师两日所需弹药。济宁,屯储6个师两日所需弹药。徐州,屯储4个师两日所需弹药。

北正面——(西兵团)第一批弹药预备于新乡,屯储两个师所需弹药;洛阳,屯储两个师两日所需弹药。

晋绥军第一批弹药预备于太原,屯储3个师一日所需弹药;大同,屯储两个师一日所需弹药;包头,屯储两个师一日所需弹药。

上海正面第一批弹药预备于歙县,屯储4个师两日所需弹药。

总数:屯储40个师半批弹药。

(丙)总弹药库

津浦路(滁州——蚌埠):屯储10个师一批弹药;

平汉路(信阳):屯储4个师一批弹药;

陇海路(潼关):屯储6个师一批弹药;

京沪路及长江(南京):屯储8个师一批弹药;

浙赣路(南昌):屯储4个师一批弹药;

粤汉路(珠江南):屯储4个师一批弹药;

平汉、粤汉路及沿江(武汉):屯储4个师一批弹药;

总数:屯储40个师一批弹药。

法肯豪森计划中的整理军都布置于北正面战场,甲种师、乙种师、丙种师所拟驻地如下:

甲种师

第一军:德县

第一师:德县;第二师:临邑;

第二军:高唐

- 第三师:夏津;第四师:高唐;
第三军:安阳
第五师:武安;第六师:安阳;
第四军:道口
第七师:道口;第八师:浚阳;
第五军:洛阳
第九师:洛阳;第十师:郑县;
第六军:开封
第十一师:开封;第十二师:商丘;
第七军:济南
第十三师:济南;第十四师:泰安;
第八军:徐州
第十五师:徐州;第十六师:沛县;
第九军:南京
第十七师:浦镇;第十八师:南京;
第十军:无锡
第十九师:江阴;第二十师:吴县;
乙种师:
第二一师:泰兴;第二二师:嘉兴;
第二三师:芜湖;第二四师:杭州;
第二五师:歙县;第二六师:兰溪;
第二七师:安庆;第二八师:汉口;
第二九师:武昌;第三十师:南昌;
丙种师
第三一师:齐河;第三二师:武陟;
第三三师:潼关;第三四师:长安;
第三五师:许昌;第三六师:信阳;
第三七师:株州;第三八师:淮阴;

第三九师：江都；第四〇师：宣城；
机械化重炮兵第一团：南京；
机械化重炮兵第二团：徐州；
机械化轻野榴弹炮第一团：济宁；
机械化轻野榴弹炮第二团：开封；
机械化轻野榴弹炮营：汤水县；
高射炮第一团：济南；
高射炮第二团：郑县；
高射炮第三团：洛阳；
高射炮第四团：徐州；
高射炮第五团：江阴；
高射炮第六团：杭州；
高射炮第七团：南京；
七公分五高射炮第一营：南京；
七公分五高射炮第二营：巩县；
七公分五高射炮第三营：杭州；
装甲兵团：暂驻南京，将来移驻蚌埠。

法肯豪森这份《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之建议书》，是他根据中国陆军现状而提出的整理办法，各种师的安排、部署及弹药的储备完全是按备战原则来计划的。可以说，如果中日战争真的推迟发生，日本军所受的损失即打击肯定要大得多，而中国在战争时必能更有效地打击日军，可惜时不我待。

法肯豪森将建议书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时，又写了一份公函，函称：

兹随函附上整理军平时驻地及弹药补给建议一份，系以前经函达关于国防各函件尤其重要者，北正面与东正面防务，并以兵工署之兵备计划为根据。鄙意目前时机已届，亟宜指定各整理师固定及永久之平时驻地，须适合集中计划，是以甲种师分驻北正面，乙种师大都驻华中（长江流域）。

法肯豪森解释说：“所建议之驻地，只能作大概之标准，部队宿营须适合

现有各种可能。但无论如何，即成立许多机械化部队，无须新筑许多营房等项。因输送情形困难，故难免各部队麇集于有限地区，但不妨永久配属单独部队驻区以外之补充区。”部队有了永久之平时驻地，好像有了第二家乡，各补充区、永久补充人员都有了保障，并能遣回役期已满之士兵。

“关于弹药库之建议，先以屯储两批弹药（等于8日所需），内两日所需存于部队，又两日所需存储预料战线附近，其他四日所需则屯储总地点，作弹药预备。”

法肯豪森还画了驻地和弹药储存地点之草图。他以德国军事总顾问办公厅名义，将建议书交军政部，何应钦特令军政部参事王观洲审阅。王观洲立即逐字逐句，仔细揣摩，提出了自己的观感。他认为有以下几点：

1、中国幅员辽阔，交通不发达，一旦发生战争，集中兵力必然困难。总顾问主张，平时即驻重兵于前线，藉以迅速占领国防要点，掩护大部队集中。这点甚为见地，建议采纳。

2、平时驻扎重兵于前线之要旨，既为占领国防要点，其军队驻地当以所欲要占领之线而定。就北正面而言：国防要点第一线在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第二线在沧县、保定之线。前者足以截断敌之联络线，在敌挑衅之初，必具攻击之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迅速击破敌之主要抵抗中心（如北平、天津）及敌之可能防御地带（永定河流域）；后者因近于北平、天津，故当为敌必攻之点，亦为便于防守（左以太行山脉，右以渤海湾为倚托，正面宽约二百余公里，易于攻势转移之线，当为不能固守塘沽、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之时，所必占领、固守之要点。

按法肯豪森的观点，北正面的要点并不在塘沽、张家口、北平、天津之线，而是在沧县（沧州）、保定之线。此条线即是国防重要之线。

3、北正面之平时驻地，以能迅速占领沧州、保定线为标准。法肯豪森主张左翼兵团之驻地应沿平汉铁路，右翼兵团之驻地应沿津浦铁路，这是很合理的。但王观洲认为，总顾问将右翼兵团之驻地拟在德州、高唐、夏津及临邑等处，而这些地方都在山东境内，应将右翼兵团之驻地，改在河北的南宫、冀县、吴桥及景阳等地，这离国防线较近，而且在紧急集中时，津浦铁路不能许

可四个单位同时运输。南宫和冀县两处的部队,尚可利用公路,以载重车向河间推进。左翼兵团之驻地也存在着类似问题,拟将驻地改为正定、获鹿、深泽等处。这样,离所要占领的国防线又较近,在战时平汉线运输紧张时,又可利用公路向保定集中。

4、关于北正面之直属部队驻地中的济南与泰山,王观洲拟改为徐州和汤山两地。

5、济宁之榴弹炮驻地,拟改为徐州。

6、以上所拟,均就河北可以驻兵而言之,如事实上不可能的话,左翼兵团的驻地,仍按总顾问所拟者,而右翼兵团则拟以第一军分驻海州、新安,第二军驻徐州。而徐州的直属预备队两师可拟移驻沛县、丰县两处。

7、东正面,总顾问拟以甲乙种师各两个师为第一线,而以两甲种师为直属预备队,似欠薄弱。

8、关于弹药之补充准备,拟须于兵工署商讨。

法肯豪森所提的建议完全是从实战和模拟日军为目标而制定的,中国军政部就其可行性及修改意见也很快提出。正待进一步实施,不料,就在同时,日军已磨刀霍霍,迫不及待了。

24

卢沟桥引燃全国烽火 张治中出手先发制人

1937年6月起，华北的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和宛平城周围不断进行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军事演习，当地的中国百姓和守军已司空见惯，只是略加提防而已。

7月7日这天，宛平城外的日本兵又照常演习，折腾了一个白天。当夕阳的余辉将宛平城头和青纱帐抹上万道金黄色后，日本兵开始整队，嚎叫着军歌陆续返回营房。

宛平城头高度警惕的第二十九军士兵，暗暗松了口气。天色昏暗以后，城上拉起了吊桥，黑幕渐渐拉开，遮掩了原野、高粱地和城垣，只有永定河水呜咽着流向远方。卢沟桥头，清乾隆御碑“卢沟晓月”旁，身背寒光闪闪大刀片的持枪哨兵，警惕地盯着黑暗。偶尔，田野中传来几声蛙鸣，夹杂着饿犬凄厉的吠叫。闷热干燥的气候，使人们憋得喘不上气来。

日军三八大盖枪上一闪一闪的刺刀和第二十九军战士大刀片上明晃晃的幽光互相辉映，寻找着爆发战争的火星和焦点。

夜沉沉，一队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哗啦哗啦”的皮鞋声打破了四野的寂静。黑洞洞的宛平城下，震撼人心的脚步声停止了。一个日本军官嗷嗷叫着，说有一名演习的士兵“失踪”了，估计进了宛平城，要求“开城检查”！

守城值夜的哨兵连忙报告给营长金振中。金营长命令严密监视，之后便飞速报告睡梦中的团长吉星文。

吉星文便是那位“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爱国抗日名将吉鸿昌的亲侄子。自从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以后，吉星文心里一直窝着一股无名怒火，恨不得立即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当他听说日军又来挑衅时，一下子便火了，大声说：“狗日的小鬼子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命令弟兄们都起床，操家伙，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双方剑拔弩张，一方坚决要进城“搜查”；一方誓死不让，形势骤然紧张。中日双方决定天明后派员去调查情况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在途中便见到许多耀武扬威，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向前方运动。调查尚未开始，战争便开始了。城下城上弹如飞蝗，日军的野炮打在城头上，硝烟弥漫，砖石乱飞，整个宛平城一片火光。

7月8日全天，卢沟桥上，永定河边，到处是熊熊燃烧的战火。隆隆的炮声传至北平，传到华北，传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了。此时，日军已包围北平东北西三面，只剩下卢沟桥通向内地，如果卢沟桥失守，那平津将成为日军的囊中之物，而华北平原、山西及山东都将成为第二个东三省；陇海铁路、中原地区乃至长江流域的南京上海，也将落入日军的铁蹄之下。

驻北平军政部参事严宽立即向南京军政部报告：“昨夜日军强迫侵入卢沟桥镇，遂与我驻卢部队发生冲突。”“日军示威多日，此次在卢发生冲突，系日军有计划行动……”

此时，南京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正移驻九江庐山上办公。每年夏季，蒋介石便带着文臣武将到庐山避暑办公。

夏日的庐山，葱葱茏茏，万峰青绿。山下炎炎大暑，山上却凉爽宜人。白云雾气，变幻莫测，瞬息万变，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云遮雾障，不识此山真面目。

法肯豪森是随蒋介石一道上山的。近来，凡有军事上的大事，蒋介石总是与他商量，法肯豪森已经成为他离不开的“拐杖”了。多年的军旅习惯，使法肯豪森起得很早，他活动活动关节，便沿着河边的山路开始跑步。他也很喜欢庐山，住在一幢哥特式房顶的别墅中。这里离“美庐”，即蒋介石、宋美龄下榻的别墅不太远，跑了不到一里路，路边绿荫丛中，便出现了美庐的红顶

和白墙。他天天早晨从这里跑过，已成为习惯。当他刚到大门口时，便看见蒋介石站在那里，身边还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他隐隐感到出事了。蒋介石的脸上虽然平静，但从旁边人的眼神中已看出有重大的事件发生了。

“你早，顾问先生？”蒋介石向他打着招呼。

法肯豪森跑到跟前，虽然没穿军装，却行了个标准的军礼：“委员长好！今天起得早哇！”

“其实，我平时也都起这样早，只是在院子里活动活动。”他话头一转，“顾问先生，请回去更衣早餐，立即到我这里来。”

法肯豪森的第六感是正确的。于是他慌忙回去换了衣服，喝了牛奶，只吃了两片面包便匆匆忙忙来到美庐，上了二楼的平台，蒋介石、熊式辉都坐在那里喝茶，等着他的到来。

蒋介石开口便说：“法肯豪森先生，日本军队在宛平城、卢沟桥已和我守军发生冲突。”他拿出茶几上的电报，“这是宋哲元的电报，你看看吧！”

眉头紧锁的总顾问接过来，电报是这样写的：

“特急。委员长蒋、行政院长蒋、洽密。日军驻丰台部队炮四门，机枪八挺，自阳夜十二时起，藉口夜间演习，向我方射击。企图占领我卢沟桥城，向该城包围攻击，轰击甚烈。我驻卢沟桥之一营，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不能不与之周旋，现仍在对峙中。除了在事态不扩大可能范围内沉着应付外，如何处之，请求机宜。职宋哲元。齐辰。参战印。”

蒋介石又递过来一封电报说：“中共方面行动得好快。第二天即发表告全国通电，毛泽东又来电，申明抗日。”

毛泽东电报说：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步骤已定。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剴切陈词，不胜惶恐待命。”

原来，蒋介石并没有将红军困死在沮洳地之中，毛泽东率领红军走出草地，进入甘南，突破天险腊子口后，走进六盘山区，后到达陕北瓦窑堡一带。

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亲自赶到陕西的西安，指挥丧失家园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及中央军，几十万大军继续“围剿”陕北。在全国抗日救国形势感召下，张、杨两将军抛弃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破旗，毅然发动了“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在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的调停下，蒋介石终于答应六项协议，即：(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这样，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五项条件和四项保证，蒋介石被迫同意确立停止内战的国共合作政策。

现在，毛泽东又抢先一步，提出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日的主张。蒋介石急于召法肯豪森来，便是商量抗日的办法的。

熊式辉是个老于世故的官僚，善于察颜观色，揣摩老蒋的心思，试探着说：“委座，卢沟桥事变是否是一场误会或是小冲突？我看最好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不要上毛泽东的当。”

蒋介石有些气恼：“这些年来，对日本我可以说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东北丢了，热河丢了，现在北平只是一座危城，早晚要成为日本人的口中之食，还要我怎么样？献出北平？天津？我身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再不抵抗，共产党联合老百姓就要革命，就要赶我下台！”

熊式辉仍在劝说：“委座，是不是命令宋哲元与日本人就地停火，进行谈判？”

法肯豪森忍不住了，说：“日本人现在会坐下来谈判的，因为他们的大部队尚未赶到，一旦赶到，形势又是一个样子。”

“娘希匹！欺人太甚！这一次我必抵抗。北平是个关键，日军如进攻北平，这是关系到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这件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界限。这是临界点，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只有应战，只有牺牲，只

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是只应战不求战!”蒋介石说明了自己的立场。

法肯豪森胸有成竹,也发表意见:“委员长,依我的看法,日本既然已发动挑衅,决不会轻易罢手。按我们原来的方案,派一部分主力北上石家庄或保定集中,将主抵抗线沿平汉线布防,防止日军直下河南,夺取郑州、武汉,否则将中国东西一分为二就难办了。”

蒋介石叫侍从取来地图,放于台上。法肯豪森指着长江口一带说:“日军很可能会从海上向长江口一带进攻,上抵武汉。委员长,在抗战爆发之时,我们应即刻回南京,以部署上海和南京的防务。”

蒋介石叫来侍从室负责作战的参谋,口授电报给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守土应具抗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成为要。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见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果然不出法肯豪森所料,7月9日、10日两天,中日双方在北平经过谈判,达成了停战协定。第二十九军决定向永定河方向撤退,冀北保安队接替宛平城防务。就在10日凌晨2点左右,日军突然向宛平城开枪开炮,保安队刚刚进入宛平城,未及吃上一口饭,又操起枪还击日军。也就在10日这一天,日军援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山海关等处带着大炮、坦克杀气腾腾接踵而至,关外一列接一列的军车沿南满铁路经京奉(北宁)铁路,风驰电掣般驶进关来,大战即在眼前。

7月11日上午,日本内阁举行五相会议,陆相杉山元气势汹汹地叫嚣:“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从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5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

下午6点35分,日本参谋总长就对关东军发出“临参命第五十六号”令,命令关东军急速派遣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飞行集团一部6个中队,高射炮两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等主力部队开往华北。9点40分,参谋总部又发“临参命五十七号”令,命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迅速开赴天津、唐山、山海关附近集结待命。

日本援军逐渐云集华北。

同日晚，蒸笼般的南京军政部大厅内，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刘光、军政部次长曹浩森、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和军政部军需署长、兵工署长、军务司长及负责兵站、情报、交通、作战的负责长官齐集会议室中。电风扇旋着热风，连续不断地吹向参加会议的大员们，他们个个挥汗如雨。

罗科长首先向参加会议人员介绍情况说：“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情报表明：日本国内陆海军已全面动员，战争机器已经启动，关东军和驻屯军已完成对平津地区的包围。”

何应钦说：“接委座庐山电，根据德国总顾问的建议，立即将新购置的武器3.7公分战车防御炮、3.7公分高射炮、8.7公分高射炮分发到部队，部署于江阴等地。令各部队迅速就国防位置。”

会上还决定，为在华北作战，拟在太原设立根据地，按50万部队，10万马匹准备一个月的粮秣和两个月的备用粮秣，运至黄河北岸储存。会上还决定了飞机、防空、通讯等部署。

7月17日，蒋介石全副武装，在法肯豪森等陪同下，来到庐山图书馆，向出席庐山谈话会的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宣布四点立场：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投过来坚定而信任的目光，使蒋介石觉得背后有德国政府的支持和英法美等国的同情，胆气壮了许多。他义正辞严地说：“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须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

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蒋介石的声音变得高昂激越: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惟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

7月25日,日军经过近20天的准备,大规模的战争在平津地区激烈地展开了。日军袭占廊坊,截断了北平与天津的联系。7月27日,日军攻占了通县、团河、丰台等地,第二十九军军部决定由南苑移驻北平。28日,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北平南苑、西苑及北苑发动全面攻击。血战中,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十三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同日,天津守军也同日军展开激战。

29日凌晨,宋哲元决定第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几天之内,中国军队撤出平津,平汉线防务由孙连仲、万福麟两部接替。当时,孙连仲部固守涿县、定兴、新城、徐水一线;曾万钟部固守定县、曲阳、新乐;关麟征部固守清宛、高阳、满城、完县,陈铁部固守涞水、易县,各部的任务是阻敌南下。

华北大平原,已集结了日军的重兵,随时准备南下中原,直趋汉口。

蒋介石与法肯豪森于7月18日,先后由九江飞回南京。

战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法肯豪森的计划,但他仍劝说蒋介石:北正面以沧州至保定线宜绝对防御,以保全山西之主要通道,千万不能在初战时便失守,这是抗日全局的关键所在。应节节抵抗,最后退至河南黄河一带,不惜人工炸开河堤,以阻敌南下汉口,将中国一分为二。同时,他建议主动在东部战线出击日军,将日军主力吸引到东部,减轻北正面的压力。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要坚决死守长江,在江阴实行封江,保卫上海,拱卫南京。东正面的第一国防线在淞沪、锡澄、吴福一线,第二线在武昌与南昌,必然全力固守,不得有放弃之动摇的观念。

法肯豪森的意见使蒋介石的战略思想有了一个完整的模式,这便是后来人们争论的“八·一三”事件是不是中国方面制造的事端。其实,这只是蒋

介石早设下的一个圈套，日本人正好中计，自己挑起事端，正好予中国方面以抗击的口实。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正在青岛养病的张治中不顾医生劝告，急驰回京。这时他的部队第八十七师在苏州、常熟，第八十八师已调至无锡、江阴，江苏省和上海市只有几个保安团队。张治中为抓住战争的主动权，待第二师补充旅到达苏州后，便令其一团化装成上海保安队，进虹桥、龙华两飞机场，加强警戒；一个团化装成宪兵，开驻淞江；又调江苏保安第二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四团集结到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

张治中和法肯豪森的意见一致，即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先下手为强。蒋介石已有吸引日军主力南下淞沪的计划，准备集中主力在淞沪与日军主力决战，一是争取国际舆论与在上海有利益关系的国家和国联出面干涉；二是利用在上海抵抗和封江的时间，掩护国民政府和主力从容退守武汉、南昌，保存实力，并拉开战线，相机破敌。

张治中到蒋介石官邸，正好法肯豪森也在座。张治中的第五军皆为德国顾问训练而成，他对法肯豪森自然也怀着一种敬意。

张治中主动请缨：“委座，我有个观念，一定要先发制人。中国对付日军，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是他要打我而我不还手，‘九一八’便是这种；第二，是他先打我，我才还手，‘一·二八’、长城抗战属第二种；这次淞沪作战，应是第三种，就是先下手为强。”

蒋介石频频点头，不时与法肯豪森交换眼色，但是他说：“文白，我和总顾问同意你的观念，先发制人。但怎么去具体做，什么时机好，我们还要研究。文白，你先接受京沪警备司令官的职务，立即去上海做好准备，以待命令。”他又对法肯豪森说，“总顾问，我委托你与熊斌次长一同前往北方前线，去视察那里的实际情形如何？”

法肯豪森不说二话，立即去了河北。当他赶到保定时，那里万福麟的第五十三军已与汹汹而来的日军接上火。万是前清巡防营骑兵队队长出身，思想陈旧，该军武器装备又差，见了法肯豪森便垂头丧气地说：“总顾问，我们中国军队根本打不过日本人，我们那几条破枪管啥用？人家有坦克车、飞机、榴炮、野炮、山炮，一个大队可以打我们一个师，甚至一个军。我们拿什么打

人家？”

法肯豪森说：“万军长，我们人多，只要指挥得当，还是能抵挡日军的。前面的日军不多，推进至永定河没大问题。”

万福麟头摇得像拨浪鼓，谈日色变：“总顾问，话说得容易，你去瞧瞧那些当兵的，就知道了。”正说话时，外面响起了空袭警报，万福麟吓得面如土色，急忙向外面的防空壕窜去。法肯豪森出了万福麟司令部，外面的枪声和飞机马达声在头顶上响成一片。他抬头望去，只见两架日本老式侦察机大摇大摆地从容飞来，投下一枚12磅的小炸弹，从天而降。远远地看，像一泡鸟粪，落在地面上，腾起数丈高的浓烟和泥土，一群士兵抱着头四下躲藏。法肯豪森不禁摇头叹气，这种军队如能再有一两年时间整理、训练，配以新式武器，断不会像今天这样缺乏战斗力。

日机又俯冲下来，飞得很低，几乎擦着树梢，气浪灼人，连飞行员得意狂妄的表情都能看清。高射机枪架在战壕里，却没人会使用，眼看敌机肆虐嚣张，一条挖得很浅很不像样的战壕中跳出十几名光着上身的战士，勇敢地端着步枪向飞机开火。在飞机的扫射中，一名战士中弹牺牲，另几名都负了伤，但他们还是在瞄准射击。由于都不懂打飞机要有提前量的道理，子弹也不知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是他们依旧在射击。

一架飞机见地面上有人射击，又丢下几枚炸弹，慌慌张张地逃走了。另一架飞机的驾驶员被枪击中，飞机拖着长长的黑烟，栽到地面上，阵地上一片欢呼。

法肯豪森向这几名无畏的战士问道：“你们为什么不隐蔽射击？这样是很危险的。”

第五十三军是东北军，那几名士兵说：“我们的家乡已让小鬼子占了6年了，这是我们扛枪的人的耻辱。鬼子有飞机大炮，我们有命有血，能拼一两个也是够本的，死了也有脸面去见家乡父老了。”

法肯豪森被士兵的精神深深感动，又问：“为什么万军长指挥时说你们不行呢？”

一个士兵鄙夷地说：“那老小子贪生怕死，脓包一个，让他领着我们打回东北，收复失地，连想都别想。别看我们这几枝破枪。”他拍着枪身说，“照样

能将小鬼子的飞机吓跑！”

法肯豪森在前线观察几日，回到南京，立即将在前线看到的问题告诉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光，并提交了下列报告：

1、日方中级以上军官，愿意作战；下级军官和士兵，则甚恐惧。我方适与相反，士兵奋勇，高级军官恐惧。各部队一般士气旺盛，但枪支太窳劣、落后，例如万福麟部。

2、敌机轰炸保定，系侦察机，其所投炸弹不过12磅，由于我方不善用高射兵器，故敌机如此活跃。又观击落之敌机系旧式，如果我空军出动，必占优势。

3、工事线似注意沧（县）石（家庄）线，实嫌过于落后，即沧（县）保（定）线亦嫌落后，最好推进至大清河。

4、我军如在一星期前来取攻势，必可将平津敌人歼灭，但目下再准备攻势，尚未为晚，因集中在前线的部队已经不少。

5、我方情报工作太不良，不独敌情不明，即自己兵力位置前方负责将领无一人完全明了者，此为最危险之事。以后应特别注意情报之搜集与整理，每日至少有二次将敌我情况，作图对照。

6、取攻势时，卢沟桥及其以西地区地形良好，永定河亦便于渡过，选为攻势地区，最为相宜，就派各级军队长官前往该地区认识地形。

7、第二十九军不可担任一方面作战，宜调至后方整理。如仍使其担任一方面之作战，将必引起大不幸。此事关系太大，虽牵涉人事，故亦直言之。

8、我方高级军官过于怯懦，如万福麟即其一也。我曾向万福麟建议，击退当面敌人少数部队，推进至永定河，但万说其部队不行，故不敢实行等语。我考察其部队的士气甚旺，实在是万本人不行。

法肯豪森从前线回来的视察报告，在卢沟桥事件第三十次汇报会上，引起了国民政府中高级将领的重视。何应钦立即决定电令刘峙为总司令，速赴保定组织集团军指挥部，部署反攻。德国顾问在前线的从容活动，也稍稍安定了一些高级大员惊慌机惶之心情。

25

上海滩日军遭遇德国式战争 巧施美人计日舰逃出长江口

8月9日午后，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乘摩托车直闯上海虹桥机场军中禁区。中国卫兵急忙阻止，大山勇夫掉转头直闯机场大门。此时已近黄昏，天色暗淡下来，机场警卫见情况紧急，当即开枪，将其击毙。

淞沪一带，形势骤然紧张。

中日双方均拔剑出鞘。

总顾问法肯豪森急切地告诫蒋介石：“中日全面战争的架式已拉开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建立战时大本营，制定全面的作战方略与实行坚决抵抗和封江计划。

蒋介石尚在犹豫。办公桌上正放着一封来自上海前线，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的电报，他已反复读了多次。电文分析道：

我在北方作战，固不宜破坏上海，自损资源；然若敌方有下列征候之一，如：

（一）敌决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轮输送时；（二）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三）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四）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即断定敌发动无疑。则我主力军远在苏、常以西，输送展开在在需时，且上海保安团抵抗力薄，诸种关系，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蒋介石下不了决心，来回踱着步子。天气炎热使得他好像喘不气来。正

在这时，军统局长戴笠悄悄进来。

“雨衣，有什么事？”蒋介石一脸愠怒。

戴笠急忙说：“校长，根据情报：8月10日，日军陆海军紧急磋商，决定向上海增兵，得到内阁会议批准。12日，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000匹马，向上海先派两个师团。”

“就这些吗？还有什么？统统讲出来。”

“据说日本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和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蒋介石终于下了先发制人的决定了。

是晚，留园“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的电话铃突然尖厉地响起来，全副武装的张治中抓起电话，里面传来蒋介石略带兴奋的熟悉的宁波官话：

“文白兄，你这把利剑立即开始行动，要神不知鬼不觉，勇猛地插在敌人的心脏。”

“委座，明白了，我立即执行！”

张治中放下电话，立即命令：

一、八十七师一部进至关淞，主力前进至上海市中心区；

二、八十八师前进至北站和江湾间；

三、炮十团第一营及炮八团进至真如、大场；

四、独立第二十旅在松江的一团进至南翔；

五、令炮三团第二营及五十六师自南京、嘉兴兼程向上海输送；

六、派刘和鼎为江防指挥官，率五十六师及江苏保安第二、第四两团任东自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并控制主力于太仓附近。

千军万马，一声号令，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上海滚滚流去。

12日清晨，东方欲晓。上海的居民一觉醒来，只见满街都是精神抖擞、全副德式装备的国民党主力军，个个惊喜交加，互相询问：“这些部队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样神速？一点点声音都听不到就占领市区了。这下，中国人不怕小日本了。”

8月13日下午，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和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驻沪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当即向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发动猛烈进攻。

德国榴弹炮铺天盖地飞向敌阵，燃起熊熊大火。日军向来小觑中国军的战斗力，受到致命的打击才意识到眼前的德国顾问训练、德式装备武装的这支部队，早非吴下阿蒙，他们攻势如虹，训练有素。大川内少将惊呼：“上海滩，我们遇到的是一场德国式的战争！”他一面向国内紧急求救，一面令黄浦江中的第三舰队用舰炮火力向中方反击，掩护陆战队固守待援。

14日上午，我空军为配合陆军的攻势，隆隆飞抵淞沪上空。

第二十四中队队长刘粹刚率领的9架“霍克一号”式驱逐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后，沿长江向东搜索前进，在上海川沙县白龙港附近发现悬挂日本旗的敌舰，立即俯冲轰炸。第一枚炸弹炸偏，在水中掀起一个高高的水柱，第二枚炸弹正落在敌舰尾部，敌舰立即腾起滚滚浓烟。

暂编大队第三十五中队的5架侦察机从杭州笕桥机场出动，飞抵上海日商公大纱厂上空，轰炸了纱厂内的日军仓库。

第一批飞机刚走，第二大队孙桐岗指挥的21架“诺斯罗普”式轰炸机，从安徽广德机场起飞，也到达黄浦江上空，轮番轰炸了吴淞口外的日舰及汇山码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公大纱厂等目标。

下午2点多，中国飞机第二大队轰炸机21架补充了弹药后，再次黑压压地临空上海滩，公大纱厂、汇山码头、北四川路等敌据点，多次燃起大火。

空军的有力支援，又鼓舞了陆军的进攻。

敌据点五洲公墓、爱国女校、粤东中学均被占领。第八十七师第一百五十九旅两个连合力突入敌阵，占领了敌海军俱乐部之一重要据点。沪江大学、公大纱厂等处均在激战。

第八十八师主力在炮火中向日本坟山、八字桥、法学院、虹口公园猛攻，双方往返争夺，杀了个几进几出。仅法学院一处，已牺牲有一个营的兵力。

惊天动地的淞沪抗战，从此开始。

8月16日，蒋介石向张治中发布拂晓全线进攻的手令：

最急。南翔。张司令文白兄：第三十六师或钟松旅，加入第八十七师方

面，预定拂晓全线总攻击，一鼓歼灭敌军，占领虹口为要。中正手令。

17日上午，张治中亲赴前线督战。在万国体育场附近，他看见部队士气高涨，在炮兵阵地上，只见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张治中手持望远镜观察：炮弹准确地飞向敌阵，炸得日军人仰马翻，于是兴奋地说：“日本海军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可惜没有燃烧弹，否则，敌司令部早完了。”

至18日，中国军队已进展至闸北、杨树浦虹口之线，形成极有利的形势。至21日夜，攻击部队一度冲抵汇山码头，但有一通路皆为日敌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攻击部队伤亡惨重，依然强攻。

在杨树浦日租界前，部队被敌人炮火打得抬不起头。张治中赶去，见几辆德式旧坦克停在路旁，坦克连连长是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张治中问：“前面部队在流血，你们为什么不进攻？你立即冲进杨树浦去！”

“报告司令：车子太坏，是刚刚从修理厂开来的。而且敌人火力太猛，我步兵又很难跟上。”

张治中火了，大声说：“那不行。你的坦克不攻人，休来见我！”

于是坦克连长带着几辆破坦克，猛打猛冲，冲到汇山码头后，连人带车都被日军炮火击毁。我军虽一度冲到汇山码头，仍站不住退了回来，张治中痛心不已。

抗战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大本营在德国顾问团参与下，颁发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

方案决定：

大本营对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甲、第一部

第一战区(冀鲁两省)

近迫该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以吸引其主力，俾我第二、第三战区之作战，得从容展布，但如敌军企图真面目与我决战时，则应毅然尽全力以防制之。

第二战区(晋察绥省)

打破敌军惯用包围行动之企图，使其对我一战区不敢放胆施行正面之攻击，同时牵制热河以东之敌军，使其对青岛、淞沪之作战，不能转用兵力。

第三战区(苏沪浙地区)

迅将目下侵入淞沪之敌陆、海军及其空军陆上根据地扫荡扑灭，以准备敌军再来时之应战，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

第四战区(闽粤两省)

除对敌海、陆、空之扰乱，完成战备态势外，应充分准备参加第二期之作战。

第五战区(鲁南、苏北、皖东)

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藉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作为作战指导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

战争指导方案对海军作战的要点，作了明确的指示：

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以内之敌舰，并绝对防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以一部协力于各要塞及陆地部队之作战。

江阴封江之战即将展开。

戴笠耷拉个脑袋，听着震怒的蒋介石在咆哮：“娘希匹，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不把隐藏的日本间谍给我找出来，我就撤你的职！”

原来，江阴封江的绝密消息走漏了。

长江下游、中游、上游都有日本的商船和军舰，日本海军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率领的驱逐舰、炮舰就在长江中游一带江面上游弋。中国军事当局战前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立即封锁江阴江面，再俘获或击沉

长江中的日本舰队和商船，同时封锁长江口。但是，困在长江上的日本舰船却意外地溜走了。

戴笠认真调来7月下旬行政院会议、国防联席会议记录和参加人员，逐一排查疑点，捕捉可疑的对象，终于发现了问题。

7月27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侃侃而谈，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他说：“我海军就质而言，不能于远海开战；就量而言，也不足以防卫各海口，因此海军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决战，保持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具体行动：第一，第一、第二舰队迅速集中长江，先与空军和要塞炮兵配合，扫除长江内敌舰；再与要塞协力，担任长江下游防守，协同陆军作战。”“如果能在长江里俘虏几艘日舰或商船，一旦开战可作为与日方交换的条件。”

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发言：“根据有关情报，日本海军在江阴下游至汉口一段的长江中，有大小兵舰70余艘，陆军陆战队员3000多名，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只要能将这些军舰封锁在江阴以西，我空军可随时出动大队炸沉他们。”

蒋介石兴奋之极，目光转向风流倜傥的国防最高会议副议长汪精卫，说：“封锁长江，先发制人，这也是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的意见，不知精卫兄有何高见，对抗战前途怎样看法？”

原来汪精卫对中日战争的前景一直持低调悲观的态度，经常散布一些战必亡、战必败的论点。但在公开会议上，面对一个个高喊抗战的军事将领，自然身不由己，随波逐流，也起来发表了几点意见：

“一、目前中国的形势已到了最后关头，只有以战求存，绝无苟且偷安的可能。鄙人认为最后的胜利，是操纵在有崇高道德之一方。至于，先发制人，主动求战，还需再三斟酌，不要贻人口实，授之以柄……”

他的身后，坐着秘书黄瀚。此人五十多岁，清瘦瘦削的脸庞，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手中一支笔，龙飞凤舞，迅速记录着开会的发言要点。

黄潜字秋岳，福建侯官人，是名噪一时的才子。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邀其入幕，为行政院主任秘书，颇得宠幸。此人出手阔绰，善于交际，又好风雅，与汪精卫等人诗词酬唱，大受青睐。汪任行政院院长期间，又将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黄潜之子黄晟，也调到外交部供职。

黄潜是参与重要会议者之一，又是担任记录的。

7月28日上午，汉口海军要塞发现一个情况，居住在汉口租界和其他街上的日本侨民发疯一样涌向码头，正装好货物待发的日本商船匆匆卸下货物，让大量的侨民有秩序而上。这些人大多未带行李衣物；有的在饭店端起碗刚要吃饭，突然放下碗便匆忙登船。重庆、宜昌方面的日舰、日轮，也纷纷启锚，全力驶往中下游。

南京下关狮子山炮台报告，市区的日本侨民也急急忙忙乘车赶到码头，纷纷上船，在日本驱逐舰的保护下，向下游的长江口一带驰去。江阴要塞守兵来报：不知何原因，这几日内数十艘日舰争流而下，逃向公海……

蒋介石得报后，极度震惊：“娘希匹，一定有内奸给日本方面通风报信，所以长江中的日舰船都逃之夭夭了。”于是，他把戴笠找来臭骂一顿，限期破案。

戴笠不愧老牌特工，有丰富的经验，经过多方侦察，发现黄潜经常去南京汤山温泉。而在7、8月南京盛暑之时，去洗温泉肯定是有名堂，于是便派人盯梢。凭直觉，特务们发现黄潜与一个名叫廖雅权的温泉女招待打得火热，关系非同一般。戴笠立即查此人的底细，原来这个漂亮轻佻的女招待有日本血统，而且相当有文化，身份来历却不明，但其到汤山温泉做女招待的介绍与担保人都是黄潜。

汤山温泉是南京政府和沪上要人休闲的一个好去处，达官显要多，情报自然就多，难怪被日本间谍盯上了。

此时戴笠已心中有数，只待找个机会便下手。

又是一次会议，蒋介石提出要去上海前线视察，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起而阻止：“委座，连日来日机活动频繁，京沪一带经常遭到轰炸，万一有个闪

失……”

蒋介石大声说：“我乘英国大使许阁森的车去，车顶上有英国标志，日机断不敢炸！”

是日夜，黄晟进了南京新街口一家咖啡厅，顺手将凉帽挂到墙上，走时“遗忘”了。几乎同时，廖雅权出现了，取下帽子追上去说：“先生，你的帽子忘了！”

黄晟鞠躬，“谢谢！”两人竟装做不认识。

第二天中午，许阁森的车出现在苏州至上海的公路上。轿车前是猎猎作响的米字旗，车顶上，在阳光下呈现一个大米字。但蒋介石却不在车上，他中途下车，折回了南京。

就在这时，云端中迎面飞来一架日本战斗机，带着凄厉的尖叫，向许大使的车俯冲而来，对着汽车“咚咚咚”一阵狂射，车被炸飞一只前轮，翻下公路，许阁森受了伤，一头从车中滚了出来

军统特务立即行动，分头捕捉了黄潜父子和廖雅权。

经审讯，廖雅权真名叫南造云子，是日本间谍。而黄潜父子有好色之疾，早在温柔乡中被俘虏，做了汉奸。黄潜父子经蒋介石亲自下令：枪毙。而南造云子居然从森严戒备的监狱中逃得无影无踪。

8月11日上午，法肯豪森见蒋介石时劝道：“委员长，中国有句古话，叫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日本舰队逸出长江，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免得他们内外夹击，麻烦就大了。既然已下战斗命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让海军执行封江任务，以防止敌舰以突击方式直抵南京，保证淞沪前线攻击的胜利。”

蒋介石正为泄密之事气得头晕，猛听总顾问的告诫，拍着脑门说：“幸亏你的提醒，不然就贻误大计了。”他立即拿起电话，接到海军部。而这时陈绍宽也正因为此事着急，听到蒋介石命令后，不敢怠慢，是日晚，下达了舰队向江阴进发的命令。海军码头上，第一批用来堵塞江心的老式兵舰一共有8艘，分别是“通济”、“大同”、“自强”、“武胜”、“德胜”和“威胜”及“辰”、“宿”2艘鱼雷快艇。

尤其是“威胜”军舰，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1929年5月28日上午10时

许,孙中山总理的灵柩从北平南下抵浦口,过江到南京,举奉安大典。“威胜”军舰即担负运渡灵柩过长江这一重大而光荣的使命。当时,该舰栏上皆帷以黑布,甲板上放满鲜花。灵柩移至舰上,下铺氈氍,上复篷帐。孙中山的家属,迎柩人员、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要员齐集舰上,肃立两旁。11点30分,“威胜”舰渡江时,江上中外舰船皆下半旗,鸣礼炮;狮子山炮台鸣礼炮101响,飞机回翔空中。经过半小时的航行,“威胜”舰终于将总理灵柩送过大江。该舰历史较长,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收德国在华的商船改装的,排水量为932吨。其余“辰”、“宿”等鱼雷艇都是清末从德国购进,经历过甲午海战和辛亥革命的。如今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作为首批沉船而驶往江阴。此外还有轮船招商局和各轮船公司征用的20余艘船只也一起驶往江阴。

陈绍宽亲自督领陈季良的第一舰队驶往江阴,指挥封江。一艘艘舰船按预定方案在主航道上依次下沉,经过一天一夜的时光,沉塞工作顺利完成。

法肯豪森得到报告,心里一块悬石落地。他督促第二批、第三批沉船继续沉入江阴封锁线。中国海军部又陆续征用“公平”、“万宰”、“泳吉”3艘商轮和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各地的8艘日本趸船拖往江阴进行堵塞。第一道水上防线终于完成。

9月25日,为加强防线的力量,在德国顾问团坚持下,海军部忍疼割爱,在为数不多的舰只中,抽出较大吨位的“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艘旧式巡洋舰下沉,组成另一道辅助防线。此外,还征用185艘民船和盐船,装载总计约3000多方的石子,陆续填在水下空隙处,以防止日本炮舰钻入。在阻塞线以外,海军又铺设了大量的水雷,以防止日舰来袭。

在封锁线完成以后,法肯豪森亲自赶到江阴视察。他说:“不要以为封锁了长江,日军就进不来了,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单单靠水中的沉船和要塞上的火炮还不足以抵御日本军队的进攻。要将海军舰队调到封锁线以内,以加强防守。”

法肯豪森这个主张遭到了海军部的抵制,他们认为舰队前往是白送给日机去炸。但蒋介石支持这一计划。

为了贯彻德国顾问团和大本营加强江阴封锁线的指示和命令,陈绍宽

命令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领“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主力舰驶往江阴要塞，列阵前沿；又令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随后而起，跟进支援。

日本舰队的炮舰，原拟攻入长江口，从中国军后侧实行攻击，瓦解在上海前线的攻势。但海军舰队列阵江阴，有力地遏制了日本海军的攻势，其军舰只能在长江口活动，无法实现溯江而上，一鼓夺取首都，打垮中国的战略。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决定：无论如何要突破江阴封锁线，下令派出精锐的海军部队，即海军航空兵轰炸中国舰队和江阴炮台。

26

坚守要塞 海陆两军遭重创 偏袒日本 陶德曼调停战争

8月22日，太阳从长江口升起，照亮沉沉四野，江阴要塞的山峦、哗哗流淌的大江都沐浴在血红的阳光之中。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起得很早，迎着习习凉爽的江风，登上“宁海”舰的甲板，命令该舰挂起指挥舰的旗帜。

“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兵舰一字排列在封锁线内，要塞下面的江心之中。浪涛拍打着舰身，很有节奏地微微摇动着。大约在上午10时许，要塞上响起了巨大的防空警报，8架日机借着阳光掩护从东向江阴上空飞来。

陈季良下达了战斗的命令，各舰上的高射炮、高射机枪和要塞上的8.8厘米德制高射炮将来犯的日舰套在各自的瞄准环中，炮身飞快地转动着。

敌机鱼贯而下，向江上的舰队扫射、投弹。霎时，陈季良一声“打”的令下，一片火网腾空而起，天空中爆炸着点点白色的弹花，像秋天池塘中盛开的一朵朵荷花。

江阴要塞是海陆军共同守卫的。要塞司令许康、江防司令欧阳格也各自指挥东山上和肖山上的防空火器，展开对空射击。德制8.8厘米高、平两用半自动炮的观察、通讯、弹药设备齐全，射程在9000米以内，射高6000米，火力猛烈，打得日机不敢低飞俯冲，拼命爬高，将携带的炸弹胡乱扔到江中便仓皇逃去。

第一批敌机是带有侦察性质的，它们飞回去以后，立即将江阴的防空火力向舰队基地指挥部进行报告。日军采取分头包干的战术，连日对江阴要塞和第一舰队发动猛击。

一架敌机见久攻不下，气急败坏，斗胆低飞俯冲，向挂着指挥旗的“宁海”舰冲了过来，舰长陈宏泰命令大副亲自掌舵，巧妙地避开敌机投弹；同时高射炮指挥、军校毕业的见习生孔繁均、刘馥等配合默契，当敌机第三次俯冲下来时，一串炮弹击中敌机翼，顿时空中燃起一个大火球，敌机翻滚而下，粉身碎骨。第一舰队在要塞高炮兵的合作下，与一批批前来空袭的日机空战一个多月，敌机始终被扼制，无法得逞。

9月22日，日本海军“加贺”号航空母舰和第二联合航空队联合攻击江阴要塞和防护舰只。敌军兵力火力大大优势于我，“加贺”号航空母舰舰载机有42架；第二航空队为陆基航空兵，有轰炸机30架、战斗机24架、攻击机12架。敌机再不像过去那样，几架、十几架前来空袭，而是黑压压一大片，大有黑云压城欲摧之势头。

一场生死恶战开始了。日本飞机首先围攻“平海”舰，十几架飞机轮番扫射、投弹。枪林弹雨中，该舰官兵在舰长高宪申的英勇指挥下，集中火力，浴血奋战。激烈的战斗从上午9点持续到下午3点多。舰长高宪申在舰桥上指挥时，被一块弹片击中腰部，血流如注，由于形势万分危急，不下火线，忍着剧痛继续坐在甲板上指挥。高射炮指挥见习生孟汉霖、高昌衢在对射中中弹牺牲，血染炮位。炮手周壮发左臂中弹，他用一条白毛巾扎住伤口，仍使尽全力紧张装弹；全舰34名官兵伤亡惨重。在对战中，共击落击伤日机5架，是役，“应瑞”舰亦被敌机击中，受了重伤。

9月23日，从清晨开始，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8架日机有重点地开始围攻“平海”舰和“宁海”舰，又一场恶战开始了。一上来，双方对攻得难解难分。中国海军官兵都抱着视死如归、与兵舰共存亡的决心，坚守岗位，奋力应战。因前日“宁海”舰击落击伤了几架日机，这次成为日机轰炸机报复的首要目标，疯狂的机枪扫射与凶猛的投弹，多次击中军舰和舰上官兵。舰长陈宏泰身负重伤，全舰由副舰长叶可钰代行指挥。航海员林人骥等人在战斗中阵亡；枪炮官陈嘉得、军需员陈惠、枪炮员等军衣破烂，负伤多处，仍裹伤奋战；见习

生孔繁均见炮手牺牲，抢过炮位，瞄准敌机猛发炮弹；机关枪指挥见习生刘馥在紧急激烈的战斗中，见高射机炮发射过多，炮管打红了，出现了故障，立即冲向露天炮位，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且修且战。至枪架被日机击断纵轴时，毅然端起炽热的无架机枪向日机射击。

在敌机疯狂的攻击下，舰队的弹药告罄；在强敌面前，“平海”、“宁海”两舰多次中弹，锅炉起火爆炸，军舰开始倾斜。陈季良见军舰保不住了，遂移驻“逸仙”舰。弹痕累累、遍体鳞伤的“平海”、“宁海”以击落日机4架，击伤日机多架的战绩，缓缓沉入江底。

25日，日机十几架又来围攻“逸仙”舰。连续作战，官兵已疲惫不堪，再加上弹药将尽，情况十分危险。在敌人猛烈的投弹下，该舰舱底破裂，大量进水，士兵们奋力堵塞，依然挡不住滔滔江水往里灌。当船体倾斜之际，官兵们仍在抵抗，并用舰首主炮击毁两架低空而来的日机。陈季良急令“建康”号前来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战斗中，共有官兵14人牺牲，重伤8人。终于，陈季良悲愤下令：“弃舰。”

“逸仙”舰在最后时刻，舰首直立，昂头向天，终于沉没。

前来救援的“建康”号在龙梢港遇上敌机，全舰官员操起高射机枪乃至步枪对空射击。日机第一次攻击炸弹便击中指挥台，舰长齐粹英、副舰长卢文彬、航海员孟维澆当即身负重伤。第二次攻击后，便有官兵7人阵亡，27人负伤，军舰多处中弹，各舱大量进水，只得弃舰登陆，该舰最终下沉。

到10月下旬，中国第一舰队4艘主力舰都被炸沉，第二舰队在曾以鼎指挥下，前往江阴接防后，损失也很大，“楚有”、“青天”、“湖鹏”、“湖鹗”、“江宁”、“应瑞”等舰艇先后悲壮地在江阴封锁线保卫战斗中沉没了。几百名官兵阵亡或负伤，中国海军元气大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海军剩余舰只退守长江中游两岸，将舰口的重炮拆卸下来，在岸上组建炮队，对进入内地的敌舰实行腰击。海军舰队奉命拆下舰上大炮、建立炮队，分发江阴炮台等处，协助封锁长江江面。

在上海前线，从8月23日，日本援军陆续从海上到达，到10月初，兵力增加到20万人。军舰40余艘，停泊在吴淞口至定海桥，掩护步兵登陆，并开炮助攻。

蒋介石与法肯豪森原来设想,在上海各国,尤其是英、法、美、俄等国巨大利益,只要中国努力抗战,必须会引起国际间的调停与干涉。为此,蒋介石不能派一些不经打的军队去上海,派出的都是德国顾问训练和德式武器装备的最精锐的部队。随着战争的推移,蒋介石逐渐增加兵力,淞沪前线大约集中了中国军队的半数以上,与日军寸土必争,使日军受到了相当的打击。

对蒋介石抗战的决心和全力以赴防守上海的战略,法肯豪森予以赞赏的态度。他认为蒋介石所采取的方针就是他在建议书中提到的方略,并且,蒋介石的抗战已获得国内外政治上的支持和苏联等国的援助。

在抗战之初,法肯豪森对中国抵抗的前途抱着乐观、充满信心态度。

8月29日,法肯豪森在《介绍在前线的军队战术与军队组织》一书所作的序文当中有这样的观点,即“为了进行一场持久战,一定要守住上海”。

9月上旬,蒋介石请法肯豪森到其官邸,征询总顾问的意见时说:“总顾问先生,我准备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任副长官,你看怎么样?”

法肯豪森很有信心地说:“这个主意是很明智的,随着淞沪前线各个援军的增多,尤其是资历相同的指挥官可能会因指挥权发生问题,及致影响战局。您能亲任司令官,大兵团协调工作将会很顺利的。”

蒋介石指着淞沪敌我态势图说:“我准备以张治中第九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左翼加上陈诚的第十五集团军,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为右翼。”

委员长亲自指挥,使法肯豪森看到了中国坚决抗战不可动摇的决心,欢欣不已。

且不说蒋介石调兵排阵,到10月初,日军第一〇一、第九、第十三师团等在上海登陆,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第三战区左翼各兵团向右转移至新阵地,中日双方军队在蕴藻浜南岸阵地进行激烈的争夺。

法肯豪森对中国军队的英勇反击评价很高,在写给德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有把握地说:“中国军队在他们第一次出击之后打得如此勇敢,以致使日军想要占领上海,或强行攻击长江要塞江阴的企图不能得逞。”

法肯豪森认为:只要中国军队守住上海,守住江阴,战争便有希望。

但是,中国部队总体素质不高,武器陈旧,加上空中力量急剧减弱;而日军的飞机已取得淞沪战场的制空权,敌登陆部队在兵舰大炮和空中支援下,顶住了中国军队的扫荡。日军在火炮、坦克车等先进火器支援下,战局开始逆转。10月26日,大场失陷,中央作战军放弃上海北站至江湾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

10月下旬,日军参谋部又将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等部,组成第十集团军,在海军的协助下,于11月5日拂晓,先以炮舰对杭州湾北岸金山卫附近中国军队阵地轰击数小时,然后在航空兵掩护下,成功登陆。随即以第十八师团及第六师团主力向淞江方向进攻。10日,第十集团军渡过黄浦江,占领淞江城,我淞沪守军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在此紧急情况下,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力主中国军队应立即放弃上海,向吴福线、锡澄线等国防线既设阵地转移,利用中国的“兴登堡防线”,阻止日军的推进。

在征求法肯豪森的意见后,蒋介石下令:前线各部向吴福线转移。但第二天,蒋介石又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说现在正召开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只要我军在上海坚持数日,九国公约国家将会主持正义,制裁日本侵略,有可能结束中日战争,各军必须坚守原阵地。他又说:“我要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

于是,中国守军丧失了主动转移的有利时机。待11月9日,前线守军自乱阵脚,争先恐后向吴福线转移,沿途遭日机轰炸,联络中断,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撤至吴福线和锡澄线的部队,虽准备利用碉堡工事,但有的碉堡铁门都紧锁着,掌握钥匙的人早已逃走,而无法开启;有的工事过于突出,不便利用;有的部队未受过工事防守训练,认为在工事中战斗,机动性受到限制,而不愿利用。这样,修筑了几年的国防线基本上未能利用。

11月13日,上海失守了。日军集中七个师团的兵力沿京沪铁路南北向吴福线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又退往锡澄线。25日,无锡失陷,日军切断江阴至无锡的公路,锡澄线也失守了。

日军向江阴进逼,要塞处在日军的包围之中。这时安置在巫山上的12厘米口径的4尊舰炮发挥了作用。11月30日,当下游的5艘日舰逆江上驰至六助

港时，舰炮在队长陈东清指挥下向敌舰轰击，当即击中一艘敌舰。其余敌舰当即开炮，在炮战中，我第三炮位被击毁，第一炮位受伤，但敌舰二艘被我击伤。

12月1日，敌陆军进抵江阴城，巫山下已有敌便衣队活动。江防总司令刘兴召集各师研究是固守是撤退的意见，后经请示南京，同意撤退。在激战5日之后，要塞工事大部分被敌摧毁，江阴要塞失陷了。

此时，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挺进。

中日战争越打越大。

留着小卫生胡子的希特勒对此左右为难。德中关系由相识到“蜜月”，正“爱”得难解难分；而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上的同盟。

战争之初，德国决定采取中立政策，调停战争。对于德国政府对战争的态度，蒋介石曾约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很友好地说：“大使先生，中国对德国在中日事件中的态度十分关切，希望德国能够使用德国和日本反共协定中的有关条款来约束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

陶德曼则使用外交辞令，代表德国外交部说：“德日反共协定中没有对日本侵华行为可实行约束之基础条款，德国因此只有与日方商议出面调停的可能性而已。”

希特勒出于本国和日本的关系考虑，表明了基本立场，他对外交部长牛赖特说：

“本元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因为中国已在本年8月21日与苏联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是我们的仇敌，中国的行为显然对德国不友好。对中国和日本表示中立，不要再对华提供信用贷款或新的军火订货，原来签订的协定要尽可能地瞒住日本。”

9月的一天，德国首都柏林的外交部大厦，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停在门前，日本驻德大使东乡茂德会见牛赖特外长。

东乡茂德向德方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向中国出售军火和立即撤出德国

军事顾问的要求。

牛赖特外长解释说：“目前及稍早的时候，德国并未向中国提供任何军火武器，日本指责德国将小量军火卖给中国毫无根据。”他耸着双肩说，“为保持中立态度，德国将不再供应中国军火物资。”

谈到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时，牛赖特外长说：“目前在中国的德国军事顾问，都是一些退役军人，不是现役军官，这只是民间的交往活动。如果政府进行干涉，要求这些军事顾问从中国撤出，即为与南京政府为敌，德国将不考虑采取此项行动。”他又抬出苏联为幌子，“德国军事顾问如撤出中国，将使苏联顾问乘虚而入，想必日本也不愿见到此类事情发生吧？”

日本大使悻悻地说：“我们希望在华的德国军事顾问不要参加实际战斗任务，这一点希望贵国外交部能向法肯豪森等人作出明确的指示。”

10月22日，当上海前线中日两国军队在枪林弹雨中血战时，德国驻日本武官欧仁·奥特与日本参谋本部代表马奈木敬信，秘密到达上海新关码头。德国驻华大使馆的车将他们接到领事馆，小心翼翼地避开新闻界的嗅觉。

陶德曼大使已在门口等候奥特武官了。两人寒暄过后，奥特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文件，说：“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的停战条件备忘录。”他又介绍说，“这位是马奈木先生，是日本参谋本部派来的代表。”

马奈木敬信说：“鄙国参谋本部希望陶德曼大使通过德国在华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先生，将备忘录转给蒋介石先生，希望能答复日本提出的条件，从而结束目前的冲突。并转告德国顾问团，立即停止帮助中国抗日。”

陶德曼大使说：“这封备忘录，我可以通过法肯豪森转交。在华的德国顾问不会起有害作用。对日本来说，与其让苏联顾问来华还不如让德国顾问留在中国。”

陶德曼还说：“日本军队侵略上海，已严重违背了德国在上海的商业利益。”

奥特说：“正因为如此，才希望大使先生担任中日间的调停人。”

10月31日，陶德曼大使电告柏林德国外交部，电文说：“我已在上海会晤德驻日大使馆武官奥特，得悉日本参谋本部和平条件，将设法由本人或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将此条件转达蒋介石。”

德国外交部复电陶德曼说：

“就目前来说，中日直接谈判比较有帮助，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愿意作联系的途径。”

陶德曼立即行动，在南京汉口路20号德国驻华参赞斐尔诗的寓所内，与汪精卫、何应钦等共进晚餐，并单独与汪精卫商谈与日停战的条件。

陶德曼还会见了法肯豪森，让他转交日方谈判的备忘录。但是，法肯豪森拒绝了，只答应转告蒋介石：“德国政府将为中日谈判做努力。”

深秋时节，秋风夹杂秋雨而至，纷纷扬扬的黄叶在空中飞舞，又零落成泥，紫金山峰隐在云雨中，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

南京中山门外的美龄宫，是蒋介石以宋美龄之名命名的一座宫殿式别墅。二楼的小会客厅中，壁炉里已燃起熊熊的炉火。

陶德曼大使在客厅中，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会谈，财政部长孔祥熙也在座。

陶德曼拿出了日本提出的七项和平谈判条件，蒋介石仔细地阅读：

一、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的自治政府。

二、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为非武装地区，由中国警察队担任维持治安。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政府，惟希望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日本的要求。

三、上海非武装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关于其他方面没有再加以改变的企图。

四、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

五、共同防共。

六、降低日本货进口税。

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力。

蒋介石看完日本提出的条件后说：“我首先感谢德国政府为中日和平所做的努力，但是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我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条件。因为我假如同意日本的要求，中国政府就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

中国就会发生革命。”

陶德曼对此表示遗憾，并说：“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得出一条经验，一个国家不应该等到精疲力尽时再寻找和谈之路。”

蒋介石说：“假如日本继续作战，中国当然不会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中国不会放下武器。”

结束会谈时，蒋介石要求陶德曼对这次调停活动要“严格保密”，不要让浴血奋战的军民知道政府正谋求谈判；但还要陶德曼本人继续充当调解人。

远外传来高射炮的声响，日本飞机又开始空袭南京城了。陶德曼内心希望中国接受日方的条件，结束战争，于是，他离开蒋介石后便去找法肯豪森，要求他按照德国政府的意旨，不要再为抗战出谋划策，并在南京的军界要员和政府要员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说服中方在合适的机会停止抗战；并在向蒋介石汇报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在瑟瑟秋风中，法肯豪森驱车到中华门一带进行巡视，他看见从上海撤退而来的军队，乱糟糟的，士气低落，内心十分痛苦。作为军事顾问，这几年的辛勤工作，努力的目的，是希望中国在最初的抗战中抵挡住日本的进攻，并唤起列强的干涉，而布鲁塞尔九国会议只是在纸上谴责日本侵略；而上海失守，长江沿线及国际线都未能发挥预想中的作用，日军已逼近南京，他很失望。陶德曼大使要求他利用特殊的身份接触国民党要人，劝说他们接受日本的停战条件。这是代表德国利益的，尽管他内心反对这样做，但行动上还必须按政府的指示去办。

法肯豪森意识到，首都南京是守不住了，于是他分别向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说：“目前的战局很严重。”

法肯豪森认为在关键的时刻，国民政府和大本营犯了一个错误，即过分致力于外交解决，依赖布鲁塞尔会议，而不是立即组织主力兵团反击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十集团军，使他们站稳了脚跟，导致了上海的突然大撤退。蒋介石不听他的建议，在下令撤退时一下子全部撤除了苏州河地区的防线。法肯豪森计划在太湖西岸组织抵抗，利用锡澄线阻止日军前进的方案，被仓促撤退的部队冲得干干净净。他悲观地认为首都南京是守不住了。

他对孔祥熙说：“该是设法停止战争的时候了，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

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

悲观的情绪刮得比秋风还要快，日军已从东北三面合围南京。

蒋介石三次召集高级僚行开会，研究南京的弃守问题。

在第一次会议上，大本营作战厅长刘斐发言：“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越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事前与法肯豪森讨论过，认为东战场作战达3个月之久，部队损失很大，且疲惫不堪，无法在短时期内再组织大规模的守城战役。他发言时说：“应当宣布为不设防城市。”他解释说，“南京城墙虽高，但很难挡住日军的立体进攻。日本人气势正盛，应该避开其锋芒。”何应钦、徐永昌都点头同意这个主张。

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声震屋瓦地表态：“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蒋介石赞许地说：“你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

最后，蒋介石决定任命唐生智率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首都警卫军谷正伦和桂永清教导总队、宪兵部队和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及炮兵、防空、装甲、通信、运输等部共13个建制师又15个建制团，总计15万人进行南京保卫战。

法肯豪森在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认为蒋介石将把德国顾问一手训练的精锐都毁于一旦；而且他的建议和方案自上海失守前便无人愿听，大受冷遇，也意识到该结束德国顾问团的历史使命了。

27

大战台儿庄 中外幕僚运筹帷幄 召回顾问团 德国元首掣剑入鞘

台儿庄前线，炮声隆隆，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正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师团展开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会战。

为保卫徐州，防止日军南北对进，打通津浦线，李宗仁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令两个军向峰县、枣庄日军侧背进攻。

1938年3月24日，蒋介石带着法肯豪森和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组织的临时参谋团赶到徐州，协助李宗仁组织会战。

31日，中国军队将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浴血苦战至4月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部队像潮水般一浪又一浪扑向敌阵，战至7日凌晨，一万多名日军被歼灭，中国军获空前大胜。

台儿庄战役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场参观战果。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会见了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战果。法肯豪森预言：“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这里不久即将陷于敌手，日军将转攻河南。”

会战开始时，法肯豪森便主张诱敌深入，即以一部兵力死守台儿庄，诱敌主力来包围，然后由中国军队再包围日军，内外夹攻，将其击灭。战役的发展与法肯豪森的计划是一致的。他在战场的指挥部中说：“我们在台儿庄给敌军致命一击的最后战机即将展开，它将与德国统帅兴登堡在1914年包围俄军于塔恩堡战役同样著名。”

台儿庄战役日军遭受惨败后，一部分突围至峰县，固守待援。形势对中国军队极为有利，法肯豪森十分高兴，向蒋介石建议：“要命令军队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

蒋介石决定扩大战果，但并未采纳法肯豪森的建议立即发动进攻，而是忙于将各战区的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与日军决战。

法肯豪森对蒋介石的作法表示反对，他固执地说：“如果汤恩伯军团不能乘敌援军未到来以前一举将败退峰枣地区之敌歼灭的话，日军便会很快将8—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便来不及了。”

法肯豪森回忆说：“但是中国军队只听从蒋介石的防守据点和以空间换时间的主张，丧失了战机。”

当时他气恼地狠命揪着自己的头发，哀叹良机的丧失。

果然，4月7日日本大本营制定了《徐州地区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4个师团向陇海铁路以西沿线进攻，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又以主力南下徐州，同时命华中派遣军两个师团北上攻击。

不到一个月，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集结了50多万人，而日军已向徐州实行了大合围。

白崇禧很高兴地打电话告诉李宗仁：“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徐州增援。”

李宗仁问：“委员长调这么多部队干什么？”

白崇禧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李宗仁无可奈何地叹道：“现在已太迟了！”我军只有尽快撤出战场。

5月初，李宗仁命各军仓促撤退，自己的长官部也数次被敌炮火击中，狼狈而走。

日军沿陇海线两侧向西追击，连克砀山、归德、杞县、通许、尉氏、朱仙镇、兰封、开封、中牟，离郑州不到70里。如占领郑州，再南下直趋武汉，中国抗战前途大局堪虞，将无法再赢得保卫武汉，建立大后方的时间。

关键的时刻，蒋介石突然想起了1935年8月法肯豪森在建议书中所主张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的方案。为

阻止日军进攻,他下令国民党军扒开郑州东北的黄河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水狂泻向东南,从中牟、尉氏、扶沟直到安徽、江苏,一片汪洋。果然,日军大炮、坦克、辎重陷于泥水之中,慌忙向东撤退。但以水代兵,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法肯豪森等德国顾问出现在徐州前线,参与台儿庄会战之事,引起德日两国的重视。

此时,希特勒已改组了德国政府,解除了国防部长柏龙白、外交部长牛赖特、经济部长沙赫特等亲华派人物的职务。

1938年2月20日,德国元首希特勒在国会中公开发表袒护日本的演说,宣布承认满洲国,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抗议,但这只是开端。

4月27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召见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通报了德国政府的最新精神。

魏茨泽克说:“德国对中日战争维持中立,故不愿有军事顾问留在中国。”

程天放说:“军事顾问在中国是他们自己的私人的行为,与德国政府的中立政策并不相违背。”

魏茨泽克坚持说:“虽然是私人行为,究竟和德国政府政策相违反。”

程天放反问:“那么德国政府对西班牙内战也标榜不干涉,但是有德国志愿兵在佛郎哥部下作战,德国政府又为什么不召回他们呢?”

魏茨泽克说:“德政府在远东是真正严守中立,在西班牙却希望佛郎哥取胜。”

程天放紧咬不放:“德国在远东似乎也在袒护日本。”

德使并不否认,程天放又问:“我今天来并不是和你辩论的,我只想确实知道,德国是否要召回军事顾问,以便报告政府。”

魏茨泽克只得承认:“国防部已将德国政府不愿意军事顾问留在中国的意图通知了他们,但还没有正式下令。”

法肯豪森等顾问团接到政府通知以后,便向德国政府发出一份报告,说明德国顾问均以个人身份受聘于中国政府,绝大部分顾问的聘用合同

是1939年或1940年才到期,如果单方面中止合同将在经济上、法律上遇到麻烦。

希特勒一意孤行。

5月23日,迁往重庆的德国大使陶德曼约见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正式提出:

“德国元首希特勒现在决定对于中日战争绝对恪守中立,希望中国政府允许德国顾问解除契约,准其一律回国。德国对蒋委员长及中国政府近年在建设事业和反共方面的成绩表示敬佩,但各国报纸宣传德国顾问帮助中国作战,这对德国政府所定国策有所妨碍,故不得不决定召回在华顾问……”

王宠惠严肃地说:“德国政府现在突然决定撤回顾问,使我们不仅感到失望,中国国民必以为德国实行此举,是间接袒日而反对中国。况且贵国顾问都是以私人资格在华服务,他国国民也有以个人资格在我政府机关服务。该顾问与各该国政府实无何等关系,也无有涉及中立问题,望贵国政府再加以考虑。”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只希望留下法肯豪森等几个人,而将大多数顾问遣回,并希望德国委其以驻华武官名义留下来。

可是,6月20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名义向中国方面紧急交涉。同时里宾特洛甫电令法肯豪森:

本部长亟待留华全体德籍军事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由现居地启程及离开华境日期,请电达柏林。顾问中倘有启程遇有障碍,着即向就近德国官署报告详情。在华顾问若违反上述令,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

接到电报的法肯豪森,浑身战栗。当他决定离开中国时,这个日耳曼人哭得很伤心。

同年7月8日,在广州码头上,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向缓缓离岸的轮船频频挥手,法肯豪森等顾问站在甲板上,也向中国大陆做深情的最后的凝视,但他们怎么也看不清,泪眼迷离,一切都模糊了……

至此,中德关系进入了冰封期。

对于全面中止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正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希特勒并不十分介意,只是偶尔会产生一丝纠结,因为德国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德国为了日本这样一个国家而对中国背信弃义是完全不值的,这不仅违反了德国人的道德价值,也不符合德国的实际利益。为此,希特勒解释说,不要以为日本这个生活在海边的民族只会捕鱼,他们也特别会吵架,为了中德之间的关系聒噪不休,让人心烦。而德国则需要这个盟友。说到这里,希特勒不禁沉吟着,转向地球仪上苏联的位置,这一大片土地让他垂涎,也让他担心,这是他心目中的假想敌,将来必定要有一战。然而当年横扫欧洲的拿破仑都在这片土地上丢盔弃甲,德国人能够不重蹈复辙吗?他没有十足的把握。因此,他需要盟友,与之对苏联形成前后夹攻之势,而这位盟友的人选,只能是日本。两害相权取其轻,两权相利取其重,现在他已经顾不上什么道貌岸然的教义和诺言了。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到了关键时刻。蒋介石正在专心组织武汉保卫战,虽然身边少了德国顾问的辅佐,但他仍自信从容。他深知,只要能挺过目前的难关,就会看到胜利的曙光。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蒋介石更是把外交的重心转到了美英诸国,而完全不屑于希特勒矣。

主要参考书目

[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孙瑞芹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张其昀:《中德文化论集》,台湾1966年版。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张水木:《对日抗战期间的中德关系》,台湾,《近代中国》第35期。

程天放:《使德回忆——柏林初期生活》,《传记文学》第3卷第2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傅宝真:《法尔克豪森与中德军事合作高潮》,《传记文学》第33卷第6期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德国顾问之贡献》,《近代中国》第45期。

《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传记文学》第25卷第1期。

《塞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

《德国顾问在南京时期工作的回忆》,《传记文学》第20卷第4期。

吴景平:《汉斯·克兰与抗战前的中德关系》,《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

《民国档案》杂志1989—1996年各期有关德国顾问史料。